



# REAGAN

## 里根传<sub>下</sub>

[美] H·W·布兰兹◎著 杨清波 向平◎译

The Life

H.W.Brands

中信出版集团

# 版权信息

书名:里根传：下册

作者:[美]H·W·布兰兹

译者:杨清波 向平

ISBN:9787508669144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站在总统右手边的埃德温·米斯对新总统很失望，因为他把白宫办公室主任一职给了紧靠他左边的詹姆斯·贝克。米斯极不情愿地担任了总统顾问。与里根和南希都有特殊关系的迈克尔·迪弗成为贝克的副手。



后面左边位置的国务卿亚历山大·黑格没有跟大家一起大笑，他几乎从来不会开怀大笑，因为他通常认为大笑对自己无益。国防部部长卡斯帕·温伯格正指着总统喜欢的什么东西。詹姆斯·贝克密切倾听着温伯格对里根说的话，他总是这样。



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凯西说话含混不清，里根很难听懂。他们能沟通起来真是个奇迹。有时他们不交流，凯西自己保守着某些秘密。





掌管预算的戴维·斯托克曼个子矮小，自信，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他与一位记者的谈话对总统造成了恶劣影响，但里根发现解雇他人不是那么容易的，于是就原谅了他。



乔治·舒尔茨代替亚历山大·黑格之后，白宫与国务院的关系缓和下来。舒尔茨很敏感，但他赢得并一直得到总统的信任。



南希·里根看着丈夫的背影；迈克尔·迪弗保守着南希的秘密，特别是有关星象师的。



唐纳德·里甘和南希根本相处不来。第一任期期间，里甘任职财政部部长时，他们几乎没有交往。但后来，当里甘成为白宫办公厅主任后，他们经常发生冲突。最终南希让人解雇了他。作为报复，里甘对世人讲出了关于



南希与星象师的事。



对于里根来说，1981年3月30日的演讲非常少有，因为他的演讲让听众感到不友好。演讲结束之后，里根从华盛顿的那家酒店退场。几秒钟之后，他将遇刺，几近丧命。



除了众议院议长、民主党人蒂普·奥尼尔之外，他几乎迷住了每一个人。如



果有必要，副总统乔治·布什随时准备把他们分开。



不列颠的“铁娘子”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是唯一一个威胁过他的人，但他欣赏她的政治立场和决心，撒切尔夫人对他也是惺惺相惜。



在国际事务中，他们应该是最奇葩的一对儿：谴责苏联是“邪恶帝国”的美国总统和该帝国的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但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工作关系和私人友谊。图片中，在日内瓦的寒风中，年长许多的里根没穿大衣、没戴帽子会见穿着臃肿的戈尔巴乔夫。



在雷克雅未克，他们几近达成共识，同意废除核武器。他们脸上露出失望之情。



在里根的任职记录中，“伊朗门”事件是最黑暗的污点。总统从托尔委员会主席约翰·托尔和成员埃德蒙·马斯基那儿拿到了令人尴尬的调查报告。



这不是他和戈尔巴乔夫希望的改变世界的条约，但这份中程核武器条约依



然是一件大事。



1989年1月20日，里根在担任总统的最后一天，向美国人民挥手告别。



从复杂的政坛到简单的快乐：空中牧场的悠闲生活。

**第五部分 不可小觑的对手 1984~1986**

里根的幽默极少有怪诞含蓄之嫌。他讲的笑话是那种任何人都可以理解的。经过几十年的讲话实践——与演员、通用电气工人、扶轮社成员、商会、贸易组织、政治捐助人以及无数不同的其他人——他的表达得到了完善，无须依赖专业知识或共同背景。然而，在他竞选连任的第一篇演讲的关键段落中，里根却旁敲侧击，让自己的听众感到难以理解。这件事发生在1984年1月的国情咨文里面。里根在连续4年的年度国情咨文里早早地就开始了竞选连任的活动。他认为没有理由拒绝利用这样无与伦比的平台。面对聚集在一起的国会议员和众议院议事厅之外的电视观众，里根开始高调吹嘘自他当选以后政府所取得的成就：经济重回正轨；20世纪70年代以来，可怕的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大幅削减了惩罚性税率；令人窒息的监管数量降低；美国在外交事务中再次肯定了自己，重拾自尊，并得到了世人的尊敬。里根说道：“整个国家重获生机，积极乐观。美国又回来了，傲视群雄。”

当然，需要做的工作还有很多。里根说道：“我们已经前进了很远，但我们还有更远的路要走。富兰克林·罗斯福在50年前的这个月曾告诉我们：‘文明不能后退，文明也一定不能停滞不前。我们已经尝试了新的方法。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完善、改进和变革。但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要向前发展。’”政府开支依然居高不下。里根呼吁制定宪法修正案，授权进行平衡预算工作，授予总统单项否决权。

税法必须进行彻底改革。里根说道：“让我们奋勇向前，进行历史性的改革，为发展争取公平、简化和动力。我正要求财政部部长唐纳德·里甘制订一份行动计划，来简化整个税法，这样一来，所有的纳税人，无论大小，都可以得到更公平的对待。”在不经意间提到那些没有足额纳税的人时，总统表示，税法改革可以获取那些失去的税收。“它也可以让征税基数更宽泛，这样个人税率就可以降低，而不是上升。”里根环顾了一下众议院大厅，而后盯着摄像机镜头说道：“我已经下令，与这些目标一致的具体建议要在1984年12月提交给我。”

里根在提到这个日期的时候微微笑了一下，但直到他下句话讲到一半的时候，国会议员们才反应过来。“我们的第二个重要目标是要塑造美国的开拓精神……”犹犹豫豫的笑声打断了他的讲话，笑声逐渐大了起来。“我说的有什么可笑的吗？”他一脸无辜地问道。笑声变得更响亮了，在房间内涌动着，形成两股力量，一股是共和党人欣慰的笑声，另一股是民主党人嘲讽的笑声。共和党人感到欣慰，因为他们听到税法改革将推迟到11月选举之后；民主党人嘲笑里根不愿意详细说明谁的公牛将被杀戮，但选民们



依然会遵照这一信息进行投票。

唐纳德·里甘脸皮薄，喜欢选择性地看和听。这位财政部部长在政府内部努力进行税法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现在，他却几乎看不到共和党人的支持，反对民主党人的嘲笑。里甘回忆说：“我的座位刚好在总统站的那个地方的讲坛的下方，从那儿我可以看到许多众议员和参议员的脸。他们脸上闪着欢快的光芒，彼此交换着会意的眼神。他们在嘲笑我跟总统。我猜想，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总统的提议是选举年的开场白，意在拉取选票。即使在我血往上涌的时候，我也意识到，他们大多数人之所以发笑，是因为就像白宫里的人一样，他们认为真正的税法改革不过是黄粱美梦。他们甚至可能会认为总统也是这样想的，否则的话他就是真正的幼稚——因为除了他之外，谁还会认为一项牵扯到这个国家最为强势集团利益的、涉及最为自私目的的措施会在他所设定的最后期限之前——目前只有11个月的时间——完成呢？笑声更大了，我的怒气也上来了。我对自己说，等着瞧吧，会给你们这帮家伙点儿颜色看的。”

里根在演讲快结束时，脱离年度报告手稿发表演讲，演讲对象不只是国会和美国人民，还有国外一群特殊的听众。他说：“我想对苏联人民说几句话。我想告诉他们，我们的政府内部的确存在严重分歧，但我们的儿女从来不曾战争中互殴。如果我们美国人可以自主行事，他们永远不会。”然而，要想避免战争，就需要积极争取和平。“苏联人民，对我们国家和你们国家来说，只有一种理性的政策可以保护现代社会的文明：核战争没有赢家，永远不能发动核战争。”

里根停顿了一下，以便让听众完全理解他的讲话。有人曾指责他喜欢战争，认为美国可以赢得核战争。里根从没有这样认为过，但他也从没有这样清楚地表达过自己的想法。现在，他公开发表了自己的想法，以正视听。

里根进行了总结，说道：“在我们拥有核武器的两个国家中，唯一重要的是要确保永远不会用到核武器。既然如此，如果能够彻底销毁它们不是更好吗？”里根说，问题的答案取决于苏联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美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民族。如果你们的政府也希望和平，那么就会有和平。我们可以友好、互信地走到一起，为我们的孩子以及我们孩子的孩子建设一个更加安全、更加美好的世界。”

里根向苏联人民，而不是向苏联领导人发表讲话，部分原因是为了修辞效果。他说，美国人民渴望和平，而苏联人民想必也同样渴望和平。政府应当让其人民得到他们想要的和平。但是，里根与苏联人民对话出于另外一

种原因，一种更为现实的原因：当时，他还无法判断谁将担任苏联领导人。在韩国客机被击落之后，尤里·安德罗波夫就消失了。先是有传言说他生病了，后来被报道出来，最后得到证实。白宫和克里姆林宫之间的沟通中断了。最后，在1984年2月，传来消息说尤里·安德罗波夫去世了。

在里根等待继任者消息的时候，他开始反思破晓前的启示。“三年的经历让我了解了与苏联人有关的令人惊讶的事情。许多苏联高层领导人都非常害怕美国及美国人。或许我不应对此感到惊讶，但这确实让我吃惊，事实上，最初我难以接受我自己的结论。我一直觉得，从我们的行为来看，任何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国是一个讲究道德的民族。从我们的国家诞生之日起，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把我们的力量仅作为世界上正义的力量在使用。比方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只有我们拥有原子弹，但我们没有用它来征服或控制。相反，我们通过马歇尔计划和麦克阿瑟将军对日本的民主管理，慷慨大度地重建了我们之前的敌人的经济。”相比之下，苏联看起来一味地要搞征服。“我们有无数理由要求我们警惕这头赤色之熊，因为从它在俄罗斯大街上诞生之日起，它就一心想要吃掉民主世界。”

里根对苏联的这种先入为主的想法伴随着他来到白宫。“在我入主华盛顿的最初几年里，我想我们政府中的许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苏联人同我们一样，认为很难想象美国会向他们首先发起攻击。但是，随着我与苏联领导人交往的增多，我开始意识到，许多苏联官员害怕我们，不仅仅因为把我们看成对手，而且把我们看成潜在的侵略者，可能会首先对他们展开核武器攻击。因为这个原因，或许还由于苏联曾遭到拿破仑和希特勒的入侵，这让他们内心存在着深深的不安全感和偏执，所以，他们把巨大的核武库对准我们。”

经过很长时间之后，里根才逐渐认识到政治学家所谓的“安全困境”：一种自相矛盾的情况，尤其是在核武器时代，一方认为的防御性措施常常被对方看作一种威胁。美国核武库最初是用来威慑苏联对欧洲的常规进攻，但苏联人将其视作是一种威胁。为了自卫，他们建设了自己的核武库，而美国将其视作一种威胁。诸如此类，一直到用于二次打击的核武库和里根所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

里根对于安全困境的认识促使他向苏联人民——也向美国和西欧的批评者们——再次保证，他认为核战争没有赢家，因此，永远不应当发动核战争。这还促使里根继续与安德罗波夫的继任者康斯坦因·契尔年科进行军备控制谈判。

乔治·布什在安德罗波夫的葬礼上见过契尔年科，副总统对他的印象是，契尔年科可能比安德罗波夫更容易合作。回来后布什对里根也是这样说的，

而里根希望布什是正确的。里根在日记中写道：“我想面对面地跟他讨论我们的问题，看一下能否说服他，假如他们加入世界大家庭中来，那么对苏联来说，是有物质利益的。”然而，里根不想行动得过于迅速。“我们不想显得急不可耐，因为这会诱使他们要挟，可能会怠慢我们。”

契尔年科并不感兴趣。事实证明，他同安德罗波夫一样固执，先是针对美国的挑拨训斥了里根，而后又宣布苏联将抵制洛杉矶奥运会，因为美国曾在1980年抵制过莫斯科奥运会。“他们完全是在抵制我们。”里根抱怨说。

里根也不能完全怪罪他们。他所认识到的安全困境也隐藏在莫斯科看待世界的视角里。或者这种看待问题的能力也许只是最近才得以运用。对此，在里根的政治生涯中，他一直愿意抨击苏联，目的是肯定美国做法的正确性，强化美国人的决心，加强他认为必要的国防建设。但既然目前他试图让苏联领导人参与到有意义的对话中来，那这就理所当然应当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国会中的民主党人继续反对为洲际导弹计划提供全额资助，而欧洲反对核武器的团体也在向他们的政府施压，要求取消允许部署美国中程导弹的计划——潘兴II型导弹和巡航导弹——来对抗最近部署的苏联导弹。里根曾提议，如果苏联同意拆除他们现有的导弹，那么美国就放弃部署中程导弹，但莫斯科方面拒绝这种所谓的“零选择裁军”，认为这种不对称要求是无法接受的。反对核武器的积极分子也谴责这种建议的虚伪性，说它的目的就是要对方拒绝。里根意识到他在军备阵地上所面临的政治局，也意识到契尔年科亦是如此。里根写道：“我扪心自问，假如我是苏联领导人，发现美国和西方盟国领导人之间的这种摩擦，我将做何感想呢？我一定会尽量利用这种摩擦的。”

这也正是克里姆林宫方面的做法。莫斯科继续称美国是个战争贩子，希望增加欧洲反对核武器的压力，或许也可以增加美国国会的压力。当有报告说契尔年科生病了，任期甚至可能会比安德罗波夫更短的时候，里根就把在1984年大选之前与苏联取得进展的希望搁置到了一边。

里根最近认识到，苏联可能害怕美国，他把这种见解当作秘密，秘而不宣。为了公共消费的原因，里根详细阐述了美国应当害怕苏联的原因。“在过去的15年间，苏联军事力量的增长为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带来了本质上的巨大变化。”他在1984年5月对全国观众讲道。这并不意味着即将发生核战争。只要美国自己的核武库足够强大，就不会发生核战争。但不管怎样，这是个威胁。“当前，他们采用一种不同的武器来挑战我们：颠覆活动和代理人势力。”在一个接一个的发展中国家里——越南、老挝、柬埔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也门、阿富汗、尼加拉瓜、萨尔瓦多——苏联的代理人要么已经攫取了政权，要么正在削弱当权者的力量。

当天晚上，里根把重点放到了尼加拉瓜、萨尔瓦多和它们邻国上面。国会资助了总统的加勒比盆地计划，但资助没有达到里根希望的水平，因为众议院的民主党人对萨尔瓦多政府，尤其是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猜忌颇深。来自马萨诸塞州的民主党人爱德华·博兰是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他发起了修正国防拨款法案的活动，禁止领导反政府武装的中情局为了推翻尼加拉瓜政府而耗费资金。政府及其盟友回应说，他们不是要试图推翻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只是要他们停止颠覆萨尔瓦多政府的行动，但反政府叛军没有这么谨言慎行。因此，国会批准了博兰的修正案，大幅削减了政府要求资助中美洲的额度。

里根认为，博兰修正案不是明智之举，或许有违宪之嫌。但里根没有正面挑战这些规定，而是重申反政府武装战争的目标只是要制服桑地诺分子，而不是要推翻他们。他要求国会再行资助，并命令中情局像之前一样继续行动。里根批准了一项反对桑地诺分子的更为猛烈的进攻计划，包括在尼加拉瓜的港口埋设地雷，破坏来自苏联和古巴的补给，从整体上削弱尼加拉瓜的经济。

里根对于这次秘密战争很满意，直到1984年春天地雷行动为公众所知晓。此时此刻，甚至连一些总统的坚定支持者也发出了警告。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巴里·戈德华特给威廉·凯西发去一封措辞严厉的书信，同时把信的内容向媒体公开。戈德华特写道：“亲爱的威廉，在过去的整整一周内，我一直在琢磨，应当如何以最平和的方式告诉你，我对总统批准在中美洲某些港口埋设地雷这一做法的感受。最终归结为一句简短的话：我十分愤怒！”戈德华特感到自己遭到了背叛。“上周一整周的时间，以及大上周，我们一直在讨论是否应当增加对尼加拉瓜计划的投资。在此期间，一切进展顺利，直到一名委员指责说总统批准了地雷行动。我当时强烈否认，因为我从没有听说过这件事。但第二天，我发现中情局带着总统的书面许可



参加了此次地雷行动，而批准时间竟然是在2月！威廉，事情没有办法再继续下去了，我发现自己进退两难，被迫向情报委员会委员们道歉，因为我之前对此一无所知。”政府对自身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总统曾要求我们支持他的外交政策。威廉，假如我们不清楚他到底在做什么，我们如何能够支持他的外交政策呢？不错，在黎巴嫩事件中，我们都知道他向当地派遣了部队。但是，尼加拉瓜港口的地雷是怎么回事？这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是战争行为。我就是拼了老命，也不知道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件事。”戈德华特预测说，总统不会争取到国会对于反政府武装的资助。“我的理由很简单，众议院会挫败追加资助的计划，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支持这样的提议，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我们应当得到的信息。尤其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在几周前就中美洲问题向我们通报情况的时候，我们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但命令在那之前就已经签署了。我不喜欢这种做法，无论是总统还是你的这种做法。我想我们不需要太多冗长的解释，因为木已成舟。将来，如果再有此类事情发生，我将不顾一切公开讨伐。”

里根对于戈德华特公开的抱怨和武断的判断十分不满。总统私下抱怨说：“他说我们从没有跟他通过气，但实际上，他在3月8日和13日得到过通知。”然而，里根没有具体讲戈德华特在通气会上得到的信息，这显然没有让戈德华特感到满意。里根也无法否认这一事实，即地雷事件或此事造成的损失对于政府的中美洲政策在国会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国会中产生了反叛情绪，这或许会导致他们终止对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援助——这将让苏联人和古巴人感到高兴。”

里根认为，他的中美洲政策是正确的，如果他可以对美国公众做出满意的解释，他们是会同意的。“中美洲对美国来说是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地区。”里根在总统办公室对着电视镜头说道，“因为它近在咫尺：与休斯敦到华盛顿特区的距离相比，萨尔瓦多距离休斯敦更近。中美洲就是美国，它是我们门前的台阶。”现在它的处境生死攸关。“它已经成了苏联、古巴和尼加拉瓜采取无耻行动的舞台，通过武力在这一半球推行共产主义。”针对中美洲的战争已经打响。“当前，在萨尔瓦多，古巴支持的侵略行为已经迫使40万男人、妇女和儿童逃离家园。而在整个中美洲地区，超过80万人已经逃离家园——其中许多人，如果不是绝大多数人的话，生活的艰难程度超乎想象。”这些难民中的许多人来到了美国，一定还会有更多的人随后赶来。

里根说，这种危险不能再升级了。“如果我们无所行动，如果我们继续无所帮助，那么我们得到的必将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美洲，还有在这一半球大陆上建立的共产党军事基地，以及向南、向北蔓延的政治活动。”那样的话，将可能无法阻止这种潮流的传播。“从巴拿马到我们南部开放边境的数千万人将会处于亲苏政权的统治之下。”

但现在还为时不晚。“我们有能力，也必须帮助中美洲。这样做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利益。从道义上来说，这也是唯一要做的正确的事情。”支持中美洲意味着抵抗试图破坏那里自由和民主的人。国会已经投票支持萨尔瓦多，但还需要更多的支持。“我们提供的支持刚好可以避免彻底的灾难，但还不足以解决这场危机，因此萨尔瓦多目前正处于因流血过多而慢慢死亡的境地。”

里根说，大多数美国人并不理解中美洲危机的严重程度。一些人依然认为，尼加拉瓜的桑地诺解放阵线是温和的改良派。这种观点大错特错。“桑地诺组织的统治是恐怖的统治。”桑地诺分子一上台就暴露出了他们的本来面目。“国内的民主组织、工会和民间团体开始遭到镇压，持不同政见的权利被剥夺，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完全不复存在。”对抗该政权的团体遭到残酷镇压。“他们还试图消灭全部文化。数千名米斯基托人遭到屠杀，或被关进了隔离营。在那里，他们忍饥挨饿，受尽虐待。他们的村庄、教堂和庄稼被付之一炬。”桑地诺分子甚至疏远了先前的支持者。“许多曾与桑地诺分子并肩战斗过的人们发现，他们的革命遭到了背叛。他们在新政府中没有得到权力，有些人被关进了监狱，还有些人遭到流放。数千名曾与桑地诺分子一起战斗过的人们开始拿起武器反对他们，被他们称为叛军。实际上他们是自由斗士。”

美国必须支持这些自由斗士。“问题非常简单，那就是：我们是否要支持这一半球的自由事业？我们是否要捍卫我们在这一半球的重要利益？我们是否要阻止共产主义在这一半球的蔓延？”

里根决心要让反政府武装继续战斗下去，无论国会资助与否。罗伯特·麦克法兰回忆说，他曾给过总统一份文件，里面介绍了由于拨款的减少和国会拒绝增加资助反政府武装的惨淡前景。里根看完报告后递了回来，他告诉麦克法兰：“我们必须设法继续下去，老兄。我希望你尽你所能来帮助这些人团结起来，你可以动用一切手段。”

麦克法兰开始行动。1984年6月，他把国家安全计划小组召集到战情室，向总统和其他人介绍说：“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关注中美洲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提出一份现状报告，并讨论下一步必要的行动步骤，来让我们的朋友团结起来，继续朝着我们的总体政治目标迈进。”麦克法兰向大家通报了好消息和坏消息。好消息是国会已经同意向萨尔瓦多追加62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坏消息是立法机构拒绝资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在最近的一次众议院投票中，政府关于反政府武装的提议失去了64张选票，尽管这一幅度可能会缩小，但看起来想要逆转这一决定是不可能的。

威廉·凯西介绍了叛军取得的进展和他们的前景。“北方的FDN（尼加拉瓜民主力量）依然强大。”凯西说道。他指的是最大的反桑地诺组织。“而南方的ARDE”——最近成立的友军——“在压力下处于溃逃边缘。”中情局之前的拨款剩下25万美元，很快将会用光，武器装备也在减少。“我们的武器弹药仓库可以支持到8月。”一旦资金用光，反政府武装只能依靠自己。凯西说：“许多反桑地诺的人们为了养活自己将待在原地。我们估计，大约一半将会在混乱中撤退到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美国不能对这些难民坐视不管。“我们必须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帮助这些撤入洪都拉斯和哥斯达黎加的人们。”

凯西希望国会听从政府对于资助反政府武装的呼吁。但假如不这样，还会有别的选择。他说：“合法的做法是中情局可以得到授权，从第三国寻求支持。事实上，这种裁决”——总统授权的声明——“鼓励第三国参与并支持这一行动。”凯西说他正在从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和洪都拉斯政府（以及某个“南美国家”，一旦此次会议撤销保密，其身份就可以公布）寻求支持。“如果我们通知国会中的监管委员会，我们可以提供直接援助，帮助FDN从第三国得到他们需要的资金。这可能会招致某些批评，但监管委员会中的高级成员会认识到我们有必要这样做。”凯西看了总统一眼，说道，“我们需要得到授权，允许FDN得到第三国的支持。”

里根没有马上对凯西的请求做出回应。他说道：“这全是关于对反桑地诺组织的支持。我们如何才能从国会得到这些支持呢？我们必须更加积极。”

乔治·舒尔茨要求政府继续让桑地诺解放阵线的人回到谈判中来，如果想改变那些说美国置外交手段于不顾，一心想要用武力手段解决中美洲的动荡局面的指控的话。

里根接过了国务卿的话头，说道：“假如我们一味地探讨与尼加拉瓜谈判，那就太过牵强了，因为很难想象同那样一个政府谈判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理性化的解决方案。但如果让国会支持反桑地诺组织，还是会有所帮助的。”

珍妮·柯克帕特里克也认为外交手段有用武之地，但也可能失败，因而一定不能因此而弱化了对反政府武装绝对必要的资助。“如果我们无法得到资金来支持叛军，那该地区 and 世人就会认为我们抛弃了他们。”柯克帕特里克说道，“这将导致该地区难民数量的增加，也会让尼加拉瓜向萨尔瓦多输送数千名尼加拉瓜训练有素的部队，我们将无法阻止这种渗透。”她要求总统再次向国会和美国人民发出呼吁。但是，假如众议院中的民主党人继续无视国家利益，那政府应当采取其他措施。“我们应当尽最大努力来从其他地方搞到资金。”

舒尔茨提出了警告。国会曾就资助叛军举行过投票，最后否决了。这一决定被记录在案，政府不应假装这件事没有发生。威廉·凯西曾说过总统的裁决可以允许从第三国得到资金，对此舒尔茨提出了不同意见。他说：“我也想为叛军获取资金，但詹姆斯·贝克律师说，如果我们试图从第三国得到资金，那这一行为可能会受到弹劾。”

凯西插嘴说道：“我有资格来补充完整。詹姆斯·贝克律师说，如果我们试图在不通知监管委员会的情况下从第三国得到资金，这可能会是个问题。他得知裁决的确可以让第三国参与进来进行合作。一旦他得知总统的裁决鼓励来自第三国的合作，詹姆斯·贝克马上就抛弃了他认为这可能会引发‘弹劾’的观点。乔治，你听到他这样说过。”

舒尔茨坚持自己的立场，说道：“詹姆斯·贝克的观点是，美国政府只能通过国会拨款来募集资金，进行花费。”

卡斯帕·温伯格跳了出来，说道：“我也是一名律师，只不过没有从事法律工作。但詹姆斯·贝克必须意识到，美国不会为反桑地诺解放阵线组织花钱，它只是在帮助这些反桑地诺分子从其他渠道获取资金。因此，美国并不是以一个政府的身份在花费从其他渠道得到的资金。”

舒尔茨要求求助于一名正在代表美国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他说：“我认为我们需要征求一下司法部部长的意见，看一下我们是否可以从第三方获取资金帮助反政府武装。这样做才比较稳妥。”

埃德温·米斯不反对征求司法部部长威廉·弗伦奇·史密斯的意见，但他认为，这一问题应当精心设计一下。他说：“作为另外一个没有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应当告诉司法部，我们希望他们找到合理的法律依据，允许美国帮助反桑地诺组织得到第三方资助。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在你问他们问题的时候，你必须引导你的律师。”

威廉·凯西回到了反政府武装命运的话题上，说道：“很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必须告诉国会，如果他们无法为反桑地诺分子提供资助会发生什么。同时，我们还要继续努力，帮助反桑地诺分子从其他渠道获得资助。总统的裁决的确明确指出：‘美国应当与其他政府合作，寻求其他政府的支持。’”他又补充说：“对于从第三国获取资助这一想法，我们在情报委员会高级官员那里没有遇到阻力。”

里根对于第三方资助这件事一直没有明确表态。他没有放弃对国会的努力。他说：“我要全力以赴推动国会。我们必须得到资助来帮助这些自由斗士。”国会的资助将会给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传递一个信息。“这就是保持压力继续存在的原因。”

此次会议超过了预定时间。罗伯特·麦克法兰意识到，大家难以达成一致意见。“我提议，任何人都无权为反桑地诺分子寻求第三方支持，直到我们得到我们需要的信息。”——从司法部部长那里。他又补充说：“我当然希望，此次讨论的任何细节不要以任何形式对外公开。”

里根面带微笑、暗含警告地结束了此次会议。他说：“如果此次会议泄露出去，我们都将在白宫前面束手示众，直到我们找出谁泄露了会议秘密。”



里根对于环球旅行的兴趣是慢慢培养起来的。战后，他曾到英国拍摄影片《浮生梦痕》，那次经历满足了他从政前不太热衷的旅行，也没有激发起他讨厌飞行的情绪。从政的野心最终促使他克服了对飞行的厌恶。但即使在他当上了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之后，他跨越大洋的旅行里程也只是在缓慢增长。在理查德·尼克松的要求下，他访问了美国的一些盟友。尼克松希望让这些盟友放心，华盛顿一直没有忘记他们。里根会见了中国台湾地区的蒋介石、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以及新加坡的李光耀。在离开萨克拉门托准备竞选总统的时候，里根又前往欧洲和亚洲。这些旅行依然没有让他感到兴奋，但旨在寻求成为国家首席外交官和三军统帅的前州长可以忍受这种在全世界抛头露面的旅行。

当上总统之后，里根终于发现了旅行的乐趣。当然，空军一号让这些旅行本身变得更加舒适。白宫工作人员会做好所有的后勤工作，里根只需走出家门，登上直升机，转眼就抵达安德鲁空军基地，然后登上他自己的波音707专机，起飞出发。

然而，旅行中的这种轻松只是让出国旅行变得吸引人的原因之一。里根的好莱坞生涯让他习惯了名人得到的特殊待遇，但这些待遇与总统得到的待遇相比，不可相提并论。每到一处，里根都是那个星期里最大的新闻人物。美国盟友和一些小国都力求留下美好的印象，这让一个演员所得到的待遇显得微乎其微。并且，尽管美国一直宣称其政治活动止于大洋之间，但这种陈腐的思想常常得不到遵守，而里根却发现，当他出国访问时，针对他行动的批评常常会减弱许多。就连蒂普·奥尼尔也明白，当总统代表国家出访世界的时候，不宜攻击美国的最高首脑。

1981年7月，里根前往加拿大参加在渥太华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然后在当年10月前往墨西哥的坎昆市参加有关经济发展的会议。1982年6月，里根前往欧洲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先是在法国巴黎参加七国峰会，而后前往意大利与约翰·保罗二世教皇会面。之后他又到英国对议会发表演讲，并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家乡与她见面。最后，里根又赶到联邦德国参加北约会议，并参观了柏林墙。在1982年11月底和12月初，里根前往中美洲和南美洲，访问了洪都拉斯、哥斯达黎加、哥伦比亚和巴西。第二年，他飞越太平洋来到日本和韩国。在日本，他在国会发表演讲，而在韩国，他参观了对朝鲜半岛南北方起到缓冲作用的非军事区。

总统出访有助于总统竞选连任，至少大部分竞选连任的候选人是这样认为的。在位的总统们希望借此来凸显他们与挑战者之间的差距。最突出的差

别就在于总统出访声势浩大，而对立党初选中的候选人则不得不从事着单调的工作。里根的竞选负责人深谙此道，因此当民主党人在1984年年初的几个月里奔波于新罕布什尔州的风雪中、辗转于路易斯安那州的河谷中时，白宫方面制订了两项壮观的出访计划。

第一项计划在4月把里根带到了中国。里根出访的策划者们曾感到很尴尬，因为他在1982年到欧洲与教皇会面时曾犯困打起了瞌睡。因而，这次一定要在行程中给他留出足够的休息时间。在此次旅程中，里根在夏威夷停留了2天，在关岛停留了1天，这样在到达中国之前可以把起居时间调整到与中国时间相符。里根在夏威夷与巴里·戈德华特碰面，后者刚从中国台湾回来。理查德·尼克松在里根出发前曾通过备忘录和电话向里根简要通报了情况。尼克松强调了中国在美国以及国际事务中的重要地位。相反，戈德华特一直坚持冷战思维，并对里根出访北京表示不满。里根在日记中写道：“巴里对我出访北京感到不快，这种不快溢于言表。”

尼克松曾向里根介绍过宴会以及类似事情。到达后数个小时，美国总统同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坐到了一起。“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吃12道中国菜。”里根后来写道，提到了他和南希。“我们接受迪克·尼克松的建议，没有问那是些什么菜，只是一味地吞咽。有那么几道菜我一直在我的碟子上搅拌，没有吃。”

第二天早晨，里根醒来的时候，心中充满了期待。“这是个重大的日子——我将与邓小平会面。”他写道。尼克松和里根自己的团队为他与中国经济改革的设计师邓小平的会面做好了准备。里根发现，邓小平有一种搞活气氛的智慧。里根写道：“南希陪我参加了非正式的开场会晤。邓小平非常幽默，邀请她在没有我陪伴的情况下再来中国访问。”但在谈到国际事务的时候，邓小平完全是公事公办的态度。“他猛烈抨击了我们的中东政策，我们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态度等，以及我们在裁军方面的失败。”里根本人接受这种批评，也做出了相应的回应。“他触及到了我们的要害。”

当天下午，里根一行参观了长城。他在提及驱车前往的经过时写道：“我们向大街两旁排队参观我们的人群挥手致意。长城让里根非常震惊。”他回忆说：“尽管我们在照片和电影中见过长城，但它还是令人震撼。当站在长城上面看着它蜿蜒消失在两边山顶的时候，我无法描述那种感受。”

在参观完古都西安和考古学家发掘出来的兵马俑之后，里根飞到了上海。他参观了那里的一家电子装配厂，而后参观了复旦大学。在复旦，他与学生交流，并发表了正式演讲。他的演讲通过中国中央电视台进行了转播。里根充分利用这次机会，向中国观众描述了美国及其价值观。“40年前，当法西斯军队横行欧洲的时候，美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保卫遭到攻击的国家。当法西斯军队横行亚洲的时候，我们与你们并肩战斗来阻止他

们。”美国是一个富于同情心的民族。“战争结束后，我们帮助我们的盟友，也帮助我们的敌人。”美国是一个热爱和平的民族。“我们憎恨战争。我们认为，我们一直认为，战争罪大恶极、劳民伤财。”里根承认美国的方式和中国的方式不同，但两个国家可以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进行合作。

对于自己的表现，里根一直不是一个严厉的批评家，但他认为自己当天的表现相当出色。他简要地记录道：“那次演讲棒极了，学生们被迷住了。”回国路上，里根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们说，他认为自己给中国领导人和中国人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我认为他们理解我们，并对我们充满信任。”

从让里根看起来像个政治家，从而应当赢得连任的立场来看，里根的中国之行确实难以被超越。长城是最终的背景，而他与世界上最古老文明国家领导人的全程会面大大提升了他的形象，远远超过所有竞争对手。

但是，北京之行仅仅是预热。一个月后，里根登上了一个更为引人注目的舞台。为纪念诺曼底登陆40周年的准备工作一直进行了几年。随着这一天的日益临近，里根的竞选负责人不辞辛苦地准备着每一个细节。时机选择、经停地点以及演讲准备——无一不做得一丝不苟。

在前往法国的途中，总统在爱尔兰停留。他在此认祖归宗，参观了巴利波林小镇。他的曾祖父就是从这里出发去往美国的。然后他又来到伦敦，与伊丽莎白女王和菲利普亲王共进午餐。随后又在唐宁街10号会见了玛格丽特撒切尔。

活动当天，里根在美国大使位于温菲尔德庄园的家中醒来。他乘坐直升機飞过英国南部来到英吉利海峡。40年前，美国军舰“艾森豪威尔”号以及其他战艦，连同上千艘盟军战艦劈波斩浪，奋勇向前。

里根登上了奥克角附近的诺曼底海滩。奥克角是一处刀形海角，位于东部的奥马哈海滩和西部的犹他海滩之间。这一地点引起了德军的兴趣，他们的工程人员在海角制高点部署了一个炮兵连，用以阻止进攻者在附近海滩抢夺立足点。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奥克角在进攻计划中的地位十分突出。美国陆军特种兵的一个连接到任务，要登上悬崖并俘虏德军这个炮兵连。

里根在这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悬崖顶上讲述了他们的战斗故事。法国政府本来希望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在当天下午，也就是里根在奥克角讲话之前，接见里根。但这样一来，就会把总统的讲话推迟到美国早间新闻节目之后。迈克尔迪弗提醒法国驻华盛顿大使，在密特朗访问美国期间里根是如

何接待他的。大使把这一信息传到了巴黎，于是重新安排了计划，里根得以让美国人在早餐餐桌旁看到现场直播。

“我们现在站在法国北部海滩一处偏僻临风的悬崖上。”里根对着现场的政要、老兵以及远方的电视观众说道，“现在和风徐徐，但40年前的此刻，这里战火弥漫，喊杀声震天，空气中充满着步枪和大炮的爆炸声。1944年6月6日拂晓时分，225名特种兵冲出英军登陆艇，冲到这些悬崖的底部。他们执行的是此次进攻中最为艰难、最为英勇的一项任务：攀上这些陡峭荒芜的悬崖，摧毁敌人的武器装备。盟军得到情报，这些威力强大的武器会瞄准海滩，阻止盟军的进攻。”

总统在讲述他们英雄事迹的时候，在场的老兵们点头致意。“特种兵们抬头望去，看到悬崖边上的敌人向他们扔手雷，用机关枪射击。美国特种兵们开始攀爬，他们把绳梯发射到悬崖的上面，开始顺着往上爬。一个战士倒下了，另外一个战士会顶上来。一条绳子被割断了，特种兵会抓住另外一条继续攀爬。他们攀爬着，射击着，控制住自己的脚。很快，特种兵们一个接一个地爬到了悬崖上面。他们在抢占这些悬崖阵地的同时，也开始抢占欧洲大陆。225名士兵来到此地，经过两天的战斗，只有90名士兵可以继续战斗。”

里根转头看了一眼他身后的纪念碑，这是一个经过雕刻的石柱，沐浴在沙滩的海风中。里根说，这一雕塑象征了特种兵们插入悬崖、帮他们向上攀爬的匕首。里根再次看了一眼老兵们，说道：“我面前就是那些把匕首插入悬崖的人们，他们是奥克角的小伙子们，他们是占领悬崖的勇士，他们是协助解放大陆的斗士，他们是帮助结束战争的英雄。”

里根郑重其事地询问他们的动机：“占领这些悬崖的时候，你们都还很年轻。你们当中的有些人差不多还是孩子，还没有享受到生活中最大的乐趣。然而，你们不顾一切地来到此地，为什么？你们为什么这样做？是什么促使你们奋不顾身，冒着生命危险抢占悬崖呢？是什么鼓舞着所有来到此处的战士们？”

里根自己做了回答：“答案就是信仰与信心，忠诚与热爱。诺曼底登陆的士兵们相信，他们所做的是正义的事情，相信他们是在为全人类而战斗，相信正义的上帝会在这个滩头阵地或下一个滩头阵地怜悯他们。正是这种深刻的认识——感谢上帝，我们还没有丧失这种认识——在使用武力争取自由和进行征服之间产生了深刻的道义上的差别。你们来到此地是为了自由，而不是为了征服，因此，你们和其他人对自己的事业深信不疑，这一点你们做得非常正确。”

然而，里根的想法主要是强调缅怀历史、调和现实的主题。“说句心里

话，我们美国人并不希望战争，我们希望把现在人们手中可怕的武器从地球表面清除掉。说实话，我们打算抢占这一滩头阵地。我们寻求从苏联方面能够得到某种迹象，表明他们愿意向前发展，他们同我们一样热爱和平，愿意放弃征服世界的做法。必须要有某种变化，才能让我们把希望转变为行动。我们将一直祈祷，有朝一日这种变化能够成为现实。”他在向自己国内众多的观众发表演讲，但结尾时他提到了现场以及没有到场的英雄们：“他们的勇气赋予我们力量，他们的勇敢鼓舞着我们的精神，他们的记忆支撑着我们的信仰，让我们继续战斗，维护他们为之奋斗与牺牲的理想。”

里根与老兵们握手并向他们表示感谢，随后他前往奥马哈海滩，参观美军烈士陵园。他在小教堂停下来进行了祷告，然后又步行通过9000名阵亡美军士兵的陵墓。他向小西奥多·罗斯福的墓地敬献了花圈。他是唯一一名参与登陆作战的将军，荣获荣誉勋章，后来死于心脏病。里根引用奥马尔·布莱德雷视察部队时的讲话，说道：“当天任何一位登上奥马哈海滩的人都是英雄。”

里根提到了一等兵彼得·罗伯特·扎纳塔。这名士兵随着第一拨攻击登上海滩，他在战争中活下来之后对自己的女儿丽萨讲述了这场战争的故事。“丽萨，将来有一天我会回去的，回去重新看看，看一下海滩、碉堡和墓地。”但他没有能够回来，因为他去世得太早了。然而，他女儿在他弥留之际答应父亲：“爸爸，我会回到那儿的，会去看一下那里的海滩、碉堡和纪念碑。我会瞻仰一下那里的墓园，敬献鲜花，就像您想做的那样。我会感受您在故事中跟我讲述的一切。我将永志不忘您所经历的一切，爸爸。我也不会让所有其他人忘记。爸爸，我永远为您感到自豪。”里根在讲完这个故事的时候，向一位年轻女士做了一个手势，说道：“他可爱的女儿今天与我们一起来到了这个地方。通过她的话，这位登陆日的老兵向我们说明了这一天的意义，这比任何一位总统所能表达的都要好。我们可以向扎纳塔一等兵，以及所有代表了荣誉和勇气的那些在40年前与他并肩战斗的战士们说：我们将永远铭记，我们将永远为他们感到骄傲，我们将永远提高警惕，这样我们就能够永远自由。”

里根继续前往犹他海滩参加几位盟国领导人的聚会。只有法国的密特朗发表了讲话，但美国士兵和法国、英国、加拿大以及其他国家的士兵一起到场，他们代表了把欧洲从纳粹奴役下解放出来的联合部队。“艾森豪威尔”号战舰和其他军舰在附近海域停泊，尽管听不到，却可以被电视转播全面覆盖。

里根搭乘直升机回到伦敦。他再次飞临“艾森豪威尔”号战舰，舰上的5000名士兵聚集在飞机起落甲板上，排列成“艾克”的字样。里根的直升机绕军舰飞行，他通过无线电话向官兵们讲话：“相信我，我们来这儿的所有人



在见到你们这艘威武的战舰以及同你们一起来到诺曼底海滩的战斗部队时，都感到欢欣鼓舞。”他说道：“今天，就像40年前一样，我们的海军以及我们所有的武装部队都在推进和平与自由事业的发展。”直升机做了最后一次盘旋。里根说道：“弗拉特利上将，克莱克斯顿船长，以及‘艾克’号上的士兵们，为了你们对自由事业的贡献，我向你们致敬。”

1980年，沃尔特·蒙代尔在与卡特联袂竞选中失利，但他摆脱了失利的影响，声望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就像失利的副总统候选人经常经历的那样。民主党在1982年中期选举中的胜利让蒙代尔和其他民主党人有理由认为，里根在1984年可能会不堪一击。选举之后，经济形势继续恶化，1982年12月的失业率逼近11%。许多选民都有理由怀疑，里根的经济复苏政策事实上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

其他问题也增加了民主党的希望。里根的军备建设，包括战略防御计划和针对欧洲的潘兴导弹计划，继续给反对核武器的左翼分子以口实。放松管制的规定让企业很高兴，却引起了工人的反对，他们依然对解雇空中管制人员的做法十分愤慨。环境保护主义者谴责里根内务部部长詹姆斯·沃特的政策和表态。沃特的政策主要是开放更多的联邦土地，用于商业开发。这些政策让西部人很高兴，却引起了国家其他地方许多人的担忧，他们担心为了一些乱七八糟的公司的利益，国家的宝贵资源正在遭到变卖。然而，更让人们恼火的是沃特的言辞。这位内务部部长是一位保守的基督教徒，他向一个众议院委员会表示说，对自然资源的长期保护是种浪费。他说：“我不清楚在上帝来临之前，我们未来还能有多少代人生活于世。”沃特痛斥对手不是美国人。他说：“我从不使用民主党和共和党这样的字眼，应当是自由人和美国人。”他嘲笑平权行动，在提到一个煤炭咨询委员会时，他说：“我有一个黑人，一个妇女，两个犹太人和一个残疾人。”

里根不遗余力地支持沃特。从根本上说，沃特的政策就是总统的政策。里根自认为是一名环境保护主义者，他对自己牧场的经营就是个例子。但里根在提及沃特的做法时，反对他自己所谓的“环境极端主义”。里根对记者们说：“他不是要破坏环境，而是要恢复人们的共识。”

然而，沃特的讲话最终给里根惹来了麻烦。里根疲于应付记者会上针对沃特的提问，而沃特对那个煤炭咨询委员会的冷嘲热讽随着1984年大选的临近，明显说得太过分了。里根明显感到民主党人开始喜欢沃特了。国会中一位民主党人含沙射影地提到沃特，说道：“他是我们找到的对我们来说最好的人选了。”里根也开始这样考虑了。一位记者问，在沃特发表了最近的讲话之后，他是否还适合担任目前的职务。里根让沃特自己感到惴惴不安。“我想这将是他自己必须要做出的决定，到底是否适合这份工作。”沃特听到风声，于是辞职了。

如果说沃特是民主党人的最好人选，那么等到1984年大选帷幕拉开的时候，他们得到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经济。经济衰退的热浪在1983年年初中

断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一些重要的经济指数开始向着有利于国家，也有利于在位总统的方向发展：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下降，生产和利润上升。里根一直声称，一旦他的计划开始生效，经济就会复苏。现在，既然经济正在复苏，那你就令人信服地获得了信任。

沃特·蒙代尔一马当先，杀入了1984年民主党的初选，击败了科罗拉多州参议员加里·哈特。选民们认为，哈特分量过轻，难当美国政坛之大任。蒙代尔还击败了杰西·杰克逊，此人是一位非裔美国牧师和政治活动家。他让黑人观众为之疯狂，在南方三场初选中获胜，但其他地方的多数人对他的兴趣不大或十分冷淡。因此，蒙代尔波澜不惊地获得了民主党提名。

蒙代尔选择杰拉尔丁·费拉罗担任自己的竞选伙伴，她是纽约的国会议员，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获得主要政党总统竞选提名的女性。此举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他的其他竞选活动相对更为传统，主要关注的是联邦赤字，并承诺要控制住它。蒙代尔在旧金山举行的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发言说：“未来的真实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在依靠借来的钱和借来的时间生活。这些赤字抬高了利率，击垮了出口，阻碍了投资，扼杀了就业，破坏了发展，欺骗了我们的孩子，压缩了我们的未来。无论谁在1月就任总统，美国人民都必须为里根先生埋单。预算会紧缩，税收会上升。任何否认这些的人都没有对美国人民说实话。”蒙代尔通常被当作自由派分子，但是在这一核心问题上，从标准的财政意义上来说，他采取的立场使得他比里根更为保守。“我是严肃认真的，到我第一任期结束的时候，我将把里根的预算赤字减少2/3。说实话，必须做到这一点，必须如此。里根先生会增加税赋，我也会；他不会告诉你们，而我会。”

蒙代尔把这一信息带到了秋季竞选活动中。他同里根进行了两次辩论，在路易斯维尔的第一次辩论中，他说道：“对领导人的关键考验之一，是此人能否看清我们国家所面临问题的本质。或许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国内问题是，我们应当如何解决这些巨大的赤字。”总统曾许诺要平衡预算，结果却相去甚远。“这届政府对赤字数额的每一次估计都会有上亿美元的出入。事实上，在过去的4年里，他们的误差将近6000亿美元。他们曾对我们说，我们将会拥有平衡的预算，结果却出现了2000亿美元的赤字。”当前这一财政年度看起来更加糟糕。“事实上，我所听说过的每一次经济分析，包括知名的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分析——我想几乎所有人都尊重它——都认为，即使会有创历史新高的经济增长，我们依然会有2630亿美元的赤字。”

在蒙代尔讲话期间，里根一直在摇头。他在回答中无视蒙代尔的数字，转而攻击他在党代会上的演讲。里根说道：“我不认为蒙代尔先生能有平衡预算的计划，但他有增加税赋的计划。”

蒙代尔重复了他在旧金山讲过的话：“竞选之后，里根先生将不得不提议增加税赋。”蒙代尔一直在密切关注唐纳德·里甘在税收改革方面取得的进展，他希望里根能坦白承认哪些是以他的名义准备的。“他的财政部部长说，他正在研究销售税或增值税。其实它们是一回事，伤及的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和中等收入人群，而几乎触及不到美国的富人阶层。”

一位辩论提问者直接向里根提出了下面这个问题：“您认为，对中等收入的美国人征税过高还是过低？”

里根脸上露出了标志性的腼腆笑容，说道：“你看，我本不想说的，可我又忍不住，而你又来了。”他因为听众的笑声停顿了一下，观众笑得很敷衍，并不像4年前他讲到这句话的时候那样感到由衷的快乐，并报以掌声。里根继续说道：“我并不打算抬高税赋。我们的问题并不是我们国家有谁缴税过低，问题是政府过于庞大。”

蒙代尔对里根再次使用同一幽默手段早有准备：“总统先生，您刚才说：‘你又来了。’对不对？”

“是的。”里根回答道。

“您记得您上次说过这句话？”

“嗯，嗯。”

“当卡特总统说您要打算削减医疗保健的时候，您说过这句话。当时您说：‘噢，不会吧，您又来了，总统先生。’竞选之后您做了什么呢？您一意孤行，试图削减200亿美元的医疗保健费用。因此，您看，当您说‘你又来了’的时候，人们记住了这一点。”

蒙代尔机智的回答赢得了喝彩声和阵阵掌声，这表明他在这一回合当中表现得更为出色。媒体的评论推测说他赢得了整场辩论。里根清楚自己表现得很糟糕：他游离于话题之外，引用了太多的统计数据，忘记了做最后陈述，看起来缺乏个性，紧张不安。在为数极少的一次自我负面回顾中，里根承认道：“我必须承认我失败了。”但他并没有归咎于自己。“我拼命地用事实和数据来说明问题，因为蒙代尔在竞选活动中一直在讲一些完全不符合事实的事情。我想我表现得过于平淡。”里根拒绝承认实质性的失败。“蒙代尔从来没有能够反驳我所展示的任何事实，只是一味地在重复那些完全虚假的事情。”然而，在所有人当中，里根深知，政治绝不仅仅是关于问题的本质，在观众眼里，此次辩论结果对他不利。

里根的失望很快就消失了，一如他对失望一贯的感受。第二天，他写道：“我们离开路易斯维尔的时候感觉并不太糟，昨晚酒店里有一次集会——1000多位见证过辩论会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认为我赢了。”

但是，正如南希·里根所知道的，酒店里的这群人是里根竞选团队的先遣组准备的一份礼物。对于里根糟糕的表现，南希比她的丈夫更难受。她后来回忆说：“这在罗尼的政治生涯中是最为糟糕的一个晚上。从一开始，他就表现得情绪紧张、思维混乱、步履蹒跚。他缺乏权威性，表现得磕磕绊绊。这是我之前从没有见过的罗纳德·里根，看着辩论让人心痛不已，没办法，那场辩论简直是一场噩梦。”辩论一结束，南希就冲到讲台上。里根十分沮丧。南希记得他对自己说：“我表现得糟透了。”南希一直安慰他，却没有表示异议。“我们都清楚他说的对。”辩论之后的当晚，南希无法入睡。里根说宾馆的房间太闷了，南希也这么觉得。“但我们俩都清楚，真正的原因是这场辩论是一场灾难。”

南希开始寻找原因。她责问迈克尔·迪弗：“你们对我的丈夫做了什么？无论如何，不要再发生了。”她要求解雇辩论准备负责人理查德·达曼。但是，达曼的老板詹姆斯·贝克拒绝了。贝克回忆道：“我从没有同她产生意见分歧，除了这一次。”这一次关系到里根失败的责任问题。贝克认为，这完全是因为里根没有研究透彻，这让南希更为恼火。她在从路易斯维尔返回华盛顿的路上，向同行的保罗·拉克索尔特抱怨了一路。拉克索尔特回忆说：“上帝啊，南希·里根非常不开心。我同南希一同返回，在两三个小时的时间里，她一直在说这场辩论被搞砸了。”南希发誓说一定要扭转局势。拉克索尔特回忆当时南希的话，说道：“我对天发誓，一定要扭转局势，下次的准备工作一定要做好。”

媒体刊登了让南希生气的、没有说出来的恐惧，一直支持总统的《华尔街日报》毫不掩饰地刊登了醒目的大标题：“健康问题——竞选中的新问题：美国最年长的总统现在是否露出老态？里根在辩论中的表现引发了对他执政能力的公开质疑。”标题下面的文章继续写道：“在星期天晚上的辩论之前，年龄一直不是竞选活动中的大问题。而今，这可能会发生改变。总统的反应杂乱无章，偶尔表现出明显的思维不清，这将给竞选带来难以预测的新的变数。”这篇文章引用了一位曾在1980年支持里根竞选的管理专家的话：“作为一名心理学家，我非常关心他缺乏自我思考的能力，缺乏表达连贯的能力，以及力求稳妥的冗言赘述……我很担心让他担任公司总裁，我更担心让他担任美国总统。”这篇文章引用两位老年病学家的话，认为里根应当进行一次阿尔茨海默病精神障碍测试，并把结果公之于众。

其他报纸和记者也纠缠上了年龄问题。《华盛顿邮报》的卢·坎农自加利福尼亚时代就追随着里根。他在撰写报道之前采访了许多人。“总统的顾问



们被迫要对他们认为此次非同寻常的糟糕表现做出解释，他们试图维护73岁的里根，不承认对于他尽显老态的指责。”詹姆斯·赖思顿在《纽约时报》中写道：“年龄可能是导致他在路易斯维尔表现得支支吾吾的原因。通常他在舞台上表现得游刃有余，观众越多表现越好。但这次他忘词了，甚至忘了自己提前背过的演讲结束部分。这的确让他最忠诚的助手们感到惊讶和困惑。”

里根的竞选团队除了要谋取观众的帮助，提升这位候选人的士气外，他们还感到有必要让他的一位医生出面证明他思维正常。“里根先生思维敏捷，精力充沛，看起来比他所说的年龄要年轻。”这位医生声明说。

里根表现得镇定自若。在好莱坞时期，他曾遭到恶评，却坚持了下来。这一次，他还会挺过来的。民调显示，他依然领先蒙代尔，即使支持率比之前低一些。他听取了詹姆斯·贝克的意见，贝克对年龄问题不屑一顾，认为这是重复一些鸡毛蒜皮的做法。“这是老生常谈。”贝克后来说道。里根更加刻苦地学习，他甚至让南希帮他放松和休息。南希对所有听她讲话的人说：“让罗尼成为原来的罗尼。”在第二次辩论之前，南希安排莫琳和罗恩以及他们的配偶同她和里根在堪萨斯城会面。无论这些孩子是否给里根带来了南希希望的精神支持，他们都让他感觉好了许多。

里根后来说，让批评他的人闭嘴的那些话是即兴演讲。第二次辩论的主题是国家安全。为《巴尔的摩太阳报》撰稿的外交记者亨利·特里惠特是专题讨论小组成员。辩论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特里惠特说道：“总统先生，我想提一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一直潜伏了两三个星期，希望从国家安全角度提出来。您已经是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了，您的一些工作人员说，在您最近与蒙代尔先生交锋之后，您十分疲惫。我记得当年肯尼迪总统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曾不得不持续多日几乎不曾休息。在您的心目中，您是否怀疑自己在此种情况下也能履行职责呢？”

里根明白，这个问题还是来了。他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表明，他对此有所准备。他的回答并不十分切题，却达到了目的。里根说道：“特里惠特先生，我丝毫不曾怀疑过。我希望你明白，我不会让年龄成为此次竞选活动的一个问题。我不会为了政治目的，利用对手的年轻和没有经验这一点。”观众笑了，许多人长舒了一口气，甚至连蒙代尔也不得不笑了。里根喝了一口水，以便让这种效果被人们记住。随后，他说的一句话几乎破坏了这种效果，这句话完全破坏了他回答问题时那种随机应变的优点：“如果我还有时间，特里惠特先生，我想补充一下，我想说我记不清到底是谁，是塞内加还是西塞罗，曾说过：‘倘若不是有年长者纠正年轻人的错误，那么就不会有国家的诞生。’”

里根的一句俏皮话达到了他所需要的全部效果。这句话没有根除关于他年龄的问题，因为他依然73岁，但它使所有问题失去了作用。如果里根拿自己的年龄开玩笑——如果他要让自己的听众发笑，甚至让自己的对手发笑——那这个玩笑该多严肃呢？他在第二次辩论中的实质性表现比第一次辩论略微好一点儿，但人们所记住的唯一事情就是那句俏皮话。

里根的竞选活动继续向前推进。播放竞选主题的电视广告把美国刻画成在能力突出和鼓舞人心的总统的领导下走向再次觉醒的国家。在美国人民幸福地参与到朝气蓬勃的活动中的画面里，一个充满自信的声音说道：“美国再一次迎来了清晨的阳光。今天，与以往相比，更多的男人和女人走出家门，参与到工作当中去。利率降低到了1980年创纪录高度的一半，今天，将近2000个美国家庭将购买新房子，比过去4年中的任何时候都要多。今天下午，6500位年轻人将喜结良缘。通货膨胀率比4年前的一半还要低，人们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这是美国迎来的又一个早晨。在里根总统的带领下，我们的国家越来越自豪、强大和美好。我们有什么理由希望回到4年前呢？”

美国的选民们当然不想回到过去悲惨的日子里。当他们在11月参加民意调查时，他们赋予了里根压倒性的胜利。总统在50个州中的49个州里获胜，只在蒙代尔的家乡明尼苏达州失利，选票只比对方少了不到4000张。里根在普选中的支持率是59%，而蒙代尔是41%。这18%的差距表明，自里根在1964年登上全国政治舞台之后，美国人的政治倾向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自由派候选人林登·约翰逊在普选中以超过20%的支持率击败了保守派候选人巴里·戈德华特。1984年，保守派的里根以相似的差距击败了自由派的蒙代尔。

里根记得在戈德华特失利后，许多专家学者曾宣称保守主义已经死亡，甚至在共和党内部，竞选活动也尽力避免被理解成是最后的祈祷。但里根从没有动摇过，拒绝改变自己的观点。在1980年和1984年的竞选活动中，里根采用同样的形象，甚至使用了他在1964年演讲中用过的一些同样的语言表达。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保守主义呈现出一片荒凉的景象。在这些岁月中，里根的乐观主义思想——即这个国家将在保守主义中发现智慧——经常看起来天真幼稚，如果不是痴心妄想的话。但当他再次当选的辉煌胜利变得越发明显的时候，曾经被视为痴心妄想而被人忽视的思想被人们重新认识，认为是远见卓识，而他的单纯幼稚被认为是最具判断力的现实主义。

里根有理由认为，他的压倒性胜利会增加他在国内和国际谈判中的可信度。他认为媒体依然对他抱有偏见——“媒体现在正试图证明这次胜利不是压倒性的，或许我应当说这是一次选民授权？”他在大选后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抱怨说——但他很高兴地看到民主党领导人在关注此次选举的结果。“蒂普·奥尼尔私下里跟我说，他非常清楚我得到了59%的选票。”

苏联人也在关注选举的结果。克里姆林宫的特使曾中断了在日内瓦举行的军备谈判，抗议里根坚持在欧洲部署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的做法。但大选之后，他们表示愿意回到谈判桌前。里根认为这是个好兆头，他决定利用这次机会。他在11月底召集召开国家安全计划小组会议。中情局的道格拉斯·乔治大致列举了一下苏联方面的潜在条件和可能的谈判战略。他说：“苏联担心美国的利益有可能会削弱他们已经取得的优势。”克里姆林宫希望国会可以延缓洲际导弹计划，希望欧洲人能够反对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部署。但真正让苏联领导人夜不能寐的是战略防御计划，乔治说道：“苏联认识到，在战略防御计划方面，他们没有资金投入可以让它们与美国展开成功的竞争。”

卡斯帕·温伯格声称，这使得战略防御计划显得尤为重要。这位国防部部长说：“正是这种战略防御才使得美国可以对苏联造成影响。”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约翰·维西将军没有就战略防御计划与温伯格争辩，但他强调了洲际导弹的作用。他说：“洲际弹道导弹对苏联的军事力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研发还击手段。”

里根回到道格拉斯·乔治的观点，进一步展开了讨论。他询问苏联是否担心美国的经济力量。

维西将军回答道：“苏联的军事和工业基地比我们多，但我们在高科技方面领先。”

温伯格补充道：“问题的关键是战略防御计划。”但美国必须迅速行动起来。“我们无法像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样有时间来动员组建工业基地。”

里根还有一个更为技术性的问题。他问道，假如政府公开采取“接到预警就发射”的政策，那威慑力是否会得到提升。与会的每一个人都明白，洲际导弹计划的要点就是让美国可以承受住苏联首先发动的进攻，并能进行毁灭性的报复。但由于洲际导弹还没有成型，里根问的是美国是否应当一

侦察到苏联的发射就马上发射。照着这样的思路考虑，美国人的这种一触即发的反应可能会让苏联人打消率先攻击的念头；但照另外一条思路考虑，这可能会让苏联人紧张，容易产生误判。并且，这也需要美国方面可靠的侦测手段。里根随即问这种手段是否存在。

温伯格承认说美国的雷达覆盖范围有漏洞，但维西说这些漏洞仅适用于苏联从潜艇上发射的导弹。

罗伯特·麦克法兰认为温伯格和维西低估了“接到预警就发射”这一政策带来的问题。他说：“我们不具备这种攻击评估能力，但我们这种政策需要依赖这种能力。”美国雷达可以发现飞来的导弹，却无法判断这些导弹瞄准的目标是美国的导弹还是美国的城市。

维西表示同意，说这种侦测手段不可靠，因而“接到预警就发射”并不可行。

保罗·尼采曾率领政府代表团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中程导弹谈判。他从政治立场的角度反对总统的建议，认为这种建议是“软弱的政策”。

但威廉·凯西认为“接到预警就发射”可能有助于敦促国会资助战略防御计划。他说，这一政策“会让战略防御计划看起来非常完美”。

温伯格干脆地说道：“战略防御计划是对付苏联威胁最好的回应。”

里根也同意这种观点。从1984年年底到1985年，他采取了一个双管齐下的攻击性手段：迫使克里姆林宫方面参与到意义深远的军备谈判中来，同时给国会施压，让其资助新的武器系统，即洲际导弹和战略防御计划，这样可以使谈判更具意义。里根认为他可以成功。“我们和苏联可能走到一起来，比许多人认为的更近一步。”他告诉国家安全计划小组。总统重申了他对于苏联的认识，即苏联实际上害怕美国的能力和意图。他说：“我们可以利用苏联保卫家园的执念，明确阐明我们无意发动核战争。”克里姆林宫方面对于国防的担忧可能会为战略防御计划提供一个机遇。“我们不反对他们拥有国防力量，但我们必须审视我们自己的国防力量。”他承认这将是一次艰难的谈判。“他们害怕战略防御计划。”政府的工作就是表明他们无须害怕。“我们必须告诉他们，国防不具备威胁作用。我们必须明确表明我们寻求的不是战略优势，而仅仅是防御。”

美国分析家报告说，苏联在反卫星技术，或反卫星武器（ASAT）方面领先于美国。苏联人把ASAT比作SDI，或许是作为交易基础。里根拒绝接受

这种比较，他说：“我们愿意就ASAT谈判到底，因为它们是攻击性武器。”但他不会廉价出售战略防御。苏联人对于战略防御的恐惧也正是继续这一防御计划的理由。里根说：“SDI赋予了我们巨大的影响力。”

罗伯特·麦克法兰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希望得到国会以及媒体中政府批评者们的帮助。“苏联人可能在赌一把，认为美国无法推行其战略防御计划。我们需要为战略防御赢得支持。”

里根开玩笑说：“我们可以开始取消订阅《华盛顿邮报》。”然而，总统对待那些在政治上反对政府武器计划的做法非常认真。同《华盛顿邮报》一样，那些来自自由派的指责并不让他感到意外，但保守派的抵制让他十分惊愕。巴里·戈德华特认为洲际导弹计划是浪费公款的开支。这位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认为，五角大楼的开支已经太多了，而洲际导弹则是更大的浪费。里根担心戈德华特的反对立场具有传染性。总统写道：“他很可能帮倒忙，成为死亡之吻。”

里根邀请参议员和两党代表前来白宫。他极力推销洲际导弹计划和战略防御计划，称其为削减军备的必要条件。“我希望我们可以让他们意识到，我们不能单方面裁军，寄希望于以此来说服苏联人。”里根后来写道。几周之后，他邀请参议院中民主党两位主要领导人戴维·博伦和萨姆·纳恩来白宫参加鸡尾酒会，并讨论洲际导弹问题。“我认为我们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里根写道，“事实上，他们提到国会在外交事务中干预总统是十分错误的，提到两党应当如何在危险的边缘团结一致。”

蒂普·奥尼尔并不支持，但也没有蓄意阻挠。里根在与这位众议院议长共进午餐后写道：“蒂普让我感到惊讶。他没有刁难洲际导弹计划，但本身也不支持。他说这是要凭良心来决定的问题：有了洲际导弹，就可能会激怒苏联人发动核攻击。”里根对奥尼尔在这一关键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正直进行了适当的赞扬，却没有表扬他的智慧。“当被问及我们如何能国不设防，而让苏联人用上千枚导弹瞄准我们的时候，他无言以对。”

1985年3月11日，里根在日记里记录了一件事，这件事标志着当代历史中一个时代终结的开始，尽管他当时没有意识到。里根写道：“凌晨4点被叫醒，他们告诉我说契尔年科死了。有消息说戈尔巴乔夫被提名为领导人。”

美国分析家关注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有一段时间了。罗伯特·盖茨回忆说：“我们对他了解很多。”盖茨是代表中情局这样讲话的。自安德罗波夫中间短暂上台之后，中情局认定戈尔巴乔夫有希望成功上位。事实上，出于多方面的原因考虑，中情局一直在支持戈尔巴乔夫。首先，苏联面临的严峻形势需要有一位心甘情愿的、有能力的人来掌控改革这一难题。盖茨说：“我们关注着双重危险，一是社会混乱，二是他们可能为了经济出路而突然发动不顾一切的军事进攻，或是可能会转移国内问题。美国欢迎最终上台一位领导人，可以有准备地、坚定不移地解决这场危机。”其次，中情局分析家认为，如果不进行大幅削减军费开支，苏联的危机就无法解决。“许多人都相信，戈尔巴乔夫终将面临这一现实。”再次，他们希望戈尔巴乔夫可以帮助缓和美苏关系。“中情局专家和其他美国人一样，都认为美苏冲突在最近这些年里有点儿过于激烈。”最后，与他的前任们相比，戈尔巴乔夫更有研究乐趣。“经过多年观察一群老态龙钟、毫无趣味、令人厌倦的苏联领导人之后，这一位有血有肉，精力充沛，行动敏捷，感情丰富，看起来决心要进行变革。”

盖茨和中情局曾向里根汇报说，戈尔巴乔夫有可能成为契尔年科的继任者。盖茨和中情局预测说：“如果戈尔巴乔夫被选中，这可能会产生一位更具口才、更加自信的苏联领导人。他可能会更多地推进苏联经济改革，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机会和挑战时会更加灵活和创新。”

里根曾考虑参加契尔年科的葬礼，这次比参加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的葬礼考虑得都要多。但他还是决定不冒险，不要看起来急不可耐。里根再次派遣乔治·布什在乔治·舒尔茨的陪同下代他前往。

到现在为止，布什对这种事情已经轻车熟路了。“我记得詹姆斯·贝克跟我说了这样一句顺口溜：‘你死翘翘，我飞去吊孝’。”布什后来回忆说。他和舒尔茨参加了契尔年科的葬礼，然后出席了国宴。戈尔巴乔夫在国宴上接见了他们。舒尔茨当即就被打动了，他回忆说：“戈尔巴乔夫一开始说得很漂亮，感谢我们‘向契尔年科总书记表示敬意’。然后，他阐述了外交政策，这是我从苏联领导人那里听到的最为全面的阐述。他开始讲道：‘大家自然会猜想，随着一位总书记的离去和新书记的上任，可能会发生哪些变



化。美国应当从这一前提出发，即苏联在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两个方面都将保持政策的延续性。’接着，戈尔巴乔夫提到了大厅中一台古董钟的报时装置，面带微笑地说，这台钟太老旧了，没人指望它能发出任何信号。”

对于这次宴会，戈尔巴乔夫是有备而来。厚厚的一沓纸清楚地列出了他打算讲的内容，但他将其搁在一边。舒尔茨说：“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仿佛是在大声地自言自语，或许他就是。”布什的级别比舒尔茨高，这位副总统代表美国一方首先发言，让舒尔茨留心观察。舒尔茨回忆说：“我聚精会神地听着、观察着戈尔巴乔夫，试图判断一下他是怎样的一个人。戈尔巴乔夫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注意到我在第一次会面时观察他，并揣测我的想法。”

这位总书记讲到了国际事务方面的内容。他提及了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刚刚取得独立的许多国家，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和主题。他说：“没有人，甚至连苏联和美国都不能忽视这一点。我们必须学会把我们的关系建立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戈尔巴乔夫提到了他所谓的那些“美国高官”的言论，这些人似乎把当前世界的所有问题都归咎于苏联的祸害。“看起来莫斯科方面无所不能啊。”他嘲讽地说道，然后又继续严肃地说，“苏联没有扩张野心，其拥有的资源足够自己使用几个世纪，无论是从人力资源、自然资源还是疆土面积来说。”戈尔巴乔夫又稍微补充了一下，说道：“我们对美国没有领土要求，甚至对于阿拉斯加或旧金山的俄罗斯山也是如此。”他又提到了昔日的合作，尤其是“二战”期间的合作——“那是苏美关系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以及在缓和紧张局势对话期间的合作。

戈尔巴乔夫直视着布什，发表了一番他明显认为十分重要的讲话。他说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从没有打算进攻美国，现在也没有这种打算。苏联领导层从不曾有过这样的狂人，现在也没有。苏联人民尊重你们的权利，你们有权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管理你们的国家。同样，苏联人民有权决定苏联自己的事务。苏联绝不允许任何人指手画脚来教自己如何管理自己。”他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至于哪种制度更好，这可以留给历史去评判。”

戈尔巴乔夫又谈到了军备竞赛和军备控制。“如今两国在各自军备建设中都达到了新的水准，来自科技革命方面的任何突破——更别提把军备竞赛升级为太空竞赛——都可能启动不可逆转的、无法控制的程序。”他对美国方面的认真程度提出了质疑，质问里根政府中的人为什么经常听起来对军备谈判如此怀疑。“他们把这些谈判说成是要历经年复一年的过程。美国方面真的对这些谈判感兴趣吗？它真的有意要取得结果吗？还是美国发现这些谈判很有必要，可以让其继续进行军备竞赛，研发更新型的武器呢？”

舒尔茨比以往更震惊了。他写道：“即使是在忙碌了漫长的一天之后，戈尔巴乔夫依然表达流畅，思维敏捷。他表现得视野开阔，精力充沛。”跟以往一样，戈尔巴乔夫展现的立场没有新的变化。

布什代表美国和里根回答了戈尔巴乔夫的问题。副总统说道：“我们无意蛮横地决定苏联的治国方式，我们从没有这样想过。”然而，他接下来解释说，尊重人权是美国世界观的核心。“这一问题对于总统和美国人民来说至关重要。”美国无法忽视苏联残酷对待持不同政见者的做法，也无法忽视苏联拒绝向本国犹太人签发出国签证的做法。

戈尔巴乔夫回击说美国无权就人权问题来教训苏联。他说：“美国不但在自己国内违反人权，而且在国外也是如此。”美国压迫本国黑人种族，支持国外独裁者。“它不但无视个体人权，而且无视整体民族和国家的人权，残酷打压人权。”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同意可以通过外交人员来讨论这一问题。但随后他又回到了原来的立场，声称国内事务不适合在两国政府间进行谈判。美国人好像在用这些问题来拖延或阻止重要的谈判。“在每次有我们两国参加的会议上，美国都会提出这些问题。”他打算为社会主义工作辩解。“谢天谢地，因为有社会主义。正是因为有了社会主义，之前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们才获得了更多的权利。”

里根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封信，让布什和舒尔茨代为转交。“在您新近担当大任之际，我愿借此机会强调一番，在未来数月、数年间，我们两国可以发展一种更为稳定、更具建设性的关系。”里根说道。他并没有低估其中的挑战。“我们有很多分歧，因而我们需要继续前进，把分歧和共同利益都考虑进去。”但是，这两位领导人都承担着维护和平的重任。“国际形势需要我们加倍努力，找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政治解决途径。”里根郑重地保证参加与戈尔巴乔夫的正式谈判。“秉持着此种精神，我希望能邀请您在近期方便时来华盛顿访问。”

舒尔茨向戈尔巴乔夫解释说，在他动身之前，里根曾向他简要交代了几句，让他在呈送总统亲笔信的时候，向总书记转告如下内容：“里根总统要我直接见您并当面转告您：‘罗纳德·里根相信，这将是人类历史上非常特殊的时刻。’”舒尔茨说道。这位国务卿继续转达着里根的意思：“您现在开始走马上任担任总书记，而罗纳德·里根则开始总统第二任期。谈判即将在日内瓦开始。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找到了解决一些问题的办法，尽管不是重大问题。假如真的有可能的话，美苏之间必须要建立更具建设性的关系。里根总统清楚他自己必须为此努力工作，他也做好了这方面的准备。”舒尔茨说，总统邀请戈尔巴乔夫访问华盛顿证明了他的决心。不能再浪费时光了。“如果可以达成重要的协议，那就越早越好。”

戈尔巴乔夫反应积极，尽管他并没有做出承诺。他同意苏联和美国正处在一个“独一无二的时刻”，一定不能浪费。戈尔巴乔夫说道：“我准备让苏美关系重回正轨。我们有必要互相了解，找时间见面讨论突出问题，并寻求办法促进两国关系。”

国宴结束之后，布什给里根发去电报，介绍了会谈情况，并对克里姆林宫的新领导做出了自己的评判。副总统写道：“与任何一位（我重复一下，是任何一位）前任相比，戈尔巴乔夫能更加有效地把苏联的方针路线整合起来，推销给西方世界。他笑容和善，眼神温和，非常善于在尴尬中迅速缓和气氛，与谈话者建立起真正的沟通。他可能非常固执，举个例子来说，当我谈到具体的人权问题时，他打断了我的讲话，重新提到了我们之前曾听到过的同样的大话空话。引用一下他的原话：‘在美国国内，你们不尊重人权。’或者（指的是非裔美国人），‘你们残酷地压制他们的权利。’但说完之后，他又接着说道：‘我们准备考虑这一问题。’以及‘让我们任命书记员准备进行讨论。’其核心意思是——‘不要在人权问题上教训我们，不要攻击社会主义，但让我们把问题都摆出来讨论。’”

第二任期的总统们因其业绩而在全民公投中获胜，他们也因此获得了公信力。对里根来说，此次全民投票呈现出一边倒的优势。凭借此次历史性的胜利，里根按说应当可以以强劲的势头开启第二任期。但是，第二任期的总统们面临极大的工作困难，这会抵消他们的公信力。这些挑战不仅仅是第二任期的总统们通常会领导替补团队。在首次选举中，总统们可以挑选自己党内最优秀的成员，任命党内的第一阵容在关键的内阁岗位和白宫岗位任职。但第一阵容的这些人会变得工作倦怠，厌烦政务，不满意相对较低的薪酬，因而他们常常会在第二任期正常开启前离任。他们的继任者偶尔也会有很优秀的，但更多情况下他们缺乏经验、判断力、特质以及那种可以让他们入选第一阵容的才能。好的帮手难以找到，更难找到的是在政府高端部门的人才。在这些部门里，错误会被彻底审查、放大并公开。

唐纳德·里甘是第一阵容中的人，他厌倦了自己的工作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泄密和背后诽谤曾经把黑格赶出了政府，它们也让里甘尝尽了苦头。1984年间，他遵照总统的指令提出了税收改革提案。他试图对有关提案的讨论保守秘密，防止在这项提案整体公布和得到拥护之前，反对变革的人行动起来，攻击他们的面子工程。大选三周之后，里甘兴冲冲地向总统提交了一份全面的计划。里甘认为这份计划并不完美，却有所改进。“1984年11月26日，当我把这份沉甸甸的文件交到他手里的时候，我还在想，我们依然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简化我们的计划”——262页的正文和536页的附录——“但它比用来放置现有税法及其索引的19米长的书架要短许多。”他说道。

为了提醒总统这次改革的必要性，里甘问了他一个不相关的私人问题：在他成为总统以前，他是否曾一年能赚到100万美元这么多钱？

里根显得很惊讶，他说绝不可能。

“那6位数呢？”里甘追问道。

里根点了点头。

里甘问道：“那您当时缴纳多少税呢？”

里根意识到里甘意有所指。他说自己大约把一半的收入纳了税。

“吸血鬼！”里甘大声说道，“如果有合适的律师、合适的会计师以及恰当的避税手段，即使您一年赚的钱超过了100万美元，您也无须支付一分钱的

税——并且这样是合理合法的。我们现有税收制度的目的是要让富人很容易避税，而让那些工薪阶层的人们几乎难以避税。作为一个在这种制度下赚了很多钱并且受益的人，我想告诉您，如果能让高收入的人同时拥有优秀的纳税顾问，那就太棒了。但作为您的财政部部长，我要跟您说的是，这样做不公平，并且是在破坏纳税人的信念，危害经济。有太多高收入的人躲避了纳税，您要求我制订计划来改变这一切，我今天带给您的就是这份计划。”

里甘继续详细地解释这份计划，他的陈述持续了1小时40分钟。里甘回忆说：“那是到当时为止我与总统最长时间的一次面谈。”这份计划的本质就是简化。个人纳税的14个档次减少到3个，税率分别是15%、25%和35%。大幅减少特殊情况下的扣税和补贴——对那些没有从中受益的人造成的漏洞。公司税率削减到33%。资本收益不再得到特殊待遇，而是作为普通收入进行征税。

里根喜欢他所听到和看到的，这给了里甘希望，以为可以付诸实践。里甘回忆说：“假如总统按照自己的原则采取行动，我对结果充满希望。我丝毫不怀疑我们制订的这份计划非常诱人，我知道我们给了总统一个强大的杠杆，如果他立场坚定，那他可能会撬动这一特殊的世界。”

然而事实证明，保持立场坚定是很困难的。无数利益团体倾向于消除改革，围攻国会，而参议员和相关委员会的代表们开始摇头表示反对。

但真正让里甘恼火的是总统周围那些人的破坏活动。里甘写道：“国家之舟开始像筛子一样泄露秘密。早晨，我把该计划递交给了总统，（在我自己向媒体介绍之前）这份机密通报的内容就由一位匿名的总统幕僚泄露出去，刊登在《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头版。甚至连《巴尔的摩太阳报》也能在我向记者们透露之前详细讨论我的计划。媒体引用不愿透露姓名的白宫方面人士的话说，总统决定要疏远这一计划。”

里甘还真无法指责这些报道的内容，因为它们十分准确，包括总统与税收改革提案保持距离的那部分内容。里甘自己曾提议里根不要急于支持税改提案。里甘说道：“不要马上支持整个计划，而要保持冷静——静观其变。”当前深受欢迎的利率会努力保持它们的优势。如果它们被证明对国会极具说服力，那么总统就可以置身事外，将这种小题大做归咎于里甘。

但是，里甘对于被别人抢占先机感到非常恼火。他认为消息泄露破坏了计划本来可以通过的可能。他认为总统的幕僚们太过保护他的形象。“推行

这一计划涉及巨大的风险，而冒险不是形象树立者的语言。”这种阻力反映了他们对最近的选举的看法。“总统没有以税改许诺参加竞选，而是以良好的感觉进行竞选。他的顾问们认为，这是他们操纵媒体的结果，这也不无道理。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有必要让总统和自己遭受税改斗争的公开蹂躏呢？他们的心思已完全不在于此了。”

里甘认为，由于这些不思进取的顾问们的原因，总统得到的是糟糕的服务。他说道：“就像之前的许多问题一样，进行税改斗争的有利做法应当是，将其弱化成媒体间的一场争论，而不是由总统领导的一场关系国家未来的大辩论。”后者完全是管理不善的结果。“在我看来，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了4年之后——其中政策的制定是以相信公众意见为基础的，几乎达到迷信的程度——总统一方需要正确的管理建议。不管愿不愿意，罗纳德里根在4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果他的政府组织得更好，他的思想能够被更系统地转化成政策，那他会有什么作为呢？”

当关于税收的报告最终成型的时候，里甘的想法在一次内阁会议之后达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乔治·舒尔茨同意里甘对泄密问题感到沮丧的做法，并提议里甘向总统提及此事。在此次内阁会议上，里甘这样做了，他先是汇报了税收改革团队所取得的进步，然后强烈要求政府工作人员必须闭上他们的嘴巴，违反规定者必须严厉惩处。总统看起来表示赞同。但在第二天上午的《华盛顿邮报》中，里甘读到了一篇报道，里面详细记录了他在内阁会议上关于税改的发言。

里甘回忆说：“对于这种针对总统和我的阴险狡诈的侮辱，我感到怒不可遏。上午7点50分，我手里依然攥着那份《华盛顿邮报》，我打电话给詹姆斯·贝克，用海军陆战队的脏话表达了我的抗议，通话结束时我高喊着一些难听的骂人的话，用力扣上了话筒。”

里甘当即口授了一封辞职信，派一位助手呈送总统，并命令不要交给理查德·达曼。此人是贝克的助手，负责文书工作，也是多次泄密事件中里甘主要的怀疑对象。

几个小时之后，里甘接到了总统的电话，里根说道：“我接到了你的辞职信，我给你打电话是要告诉你，我不接受你的辞职。实际上，我正把你的辞职信撕毁，扔进壁炉烧掉。”

里甘回答说：“非常感谢您能这样说，总统先生，但我的意思已经写得很清楚了。这种泄密、不信任的氛围让人完全无法容忍，我打算离职。”

“你不能这样做，唐纳德，这是我最后的请求。你是我在这儿唯一的朋友，如果你走了，我也要卷铺盖走人了。”



里甘撤回了辞职信，他回忆说：“能拒绝美国总统说这些话的人还没有诞生。”

贝克很快来到里甘的办公室。里甘说：“显然，贝克想要解释泄密事件并打圆场。我请他留下来吃午饭。我的怒火平息下来，很高兴有机会与贝克一起交谈。贝克看起来疲惫不堪，心烦意乱。他疲倦地倒在椅子上，大声叹着气，摇着头，面带讽刺的微笑。我问是什么让他如此烦恼。他接二连三地叫苦，然后描述了一些他与美国政治与政府领导人物的幕后经历。”贝克说，税改斗争只是整个画卷中很小的一部分，年度预算战争如火如荼；数十人提出了几十条建议，即使你不同意这些人的意见，你也不得不聆听他们的声音；媒体总是在抱怨；他不得不弥补自己手下和其他管理人员的过错。

“贝克，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你太累了。”里甘回答说。

贝克盯着里甘看了一会儿，承认说：“你说的对，我真的很累，我要摆脱这一切。”

“你不能那样做，你是个政治瘾君子，你已经上瘾了。”里甘说道。

贝克没有否认，他们又谈了一会儿，而后里甘说：“你知道我们应该做什么吗？我们应该交换工作。”

里甘后来声称他在半开玩笑。他写道：“我不假思索地抛出这些话，但贝克像是被某个观点打动的人那样频频点头。”

“你是那样想的？”贝克问。

里甘思考了一会儿，回答说：“我想是的。”

他们默默地坐着，然后贝克起身离开，他说：“当心，我可能会接受你的建议。”

“没问题，当你准备找人说话，我随时恭候。”里甘说。

贝克称其团队为三驾马车，他们是理查德·达曼、玛格丽特·塔特怀勒和他妻子苏珊·贝克。贝克首次和他的团队提出了这件事。达曼和塔特怀勒要陪着他前往财政部，如果他决定要去的话。达曼同贝克一起制定了一份一页纸的得失清单，上面列举了留任的代价和好处。这份备忘录列举了留下的原因：“很可能成为国务卿。”贝克非常喜欢这一高级内阁职位，他认为，

如果他坚决要求得到这一职位，那他可能会得到它。在提到到财政部工作的时候，这份备忘录写道：“不如在国务院好。”乔治·舒尔茨同里甘和黑格一样，都对政府泄密事件感到非常不满。或许有一天，当他受够之后，可能会辞职。但也许他不会，如果这样的话，那贝克何去何从呢？贝克和达曼的这份备忘录中写道：“一鸟在手，胜过双鸟在林啊。”

手中的这只鸟胜出了。两周之后，贝克再次与里甘会面，讨论了税收改革。其间，贝克问了大量问题，超过了内阁部长所能解答的范围。在结束会谈时，贝克问里甘，对于变换工作他是否依然认真。里甘并不感到惊讶，说自己非常认真。

贝克问道：“对此，我们如何向总统解释？”

里甘回答说：“管他呢，我去跟他说。”

贝克有一个更好的主意，他说道：“我们需要让迪弗参与进来，如果不告诉迪弗，我们永远做不成。”贝克认为迪弗应当知道，因为他曾经希望成为办公厅主任，而他离开政府的原因之一就是他认为自己不会成功。更为重要的是，迪弗可以试探出南希·里根的意见，她的支持对于交换工作至关重要。

贝克让达曼帮他写一份给迪弗的备忘录。备忘录开头写道：“到了该变革的时候了。”贝克和里甘都厌倦了他们目前的工作，也耗尽了他们的政治资本。交换工作可以让他们重新焕发活力，也会让政府焕发生机。里甘具有超强的经济头脑，在制订财政部税收改革计划方面工作非常出色。而贝克具有超强的政治谋略，可以尽最大可能赢得立法支持。同时，作为预算鹰派人物，里甘可以帮助控制白宫开支。贝克和达曼说，他们希望迪弗会喜欢这一主意，他们要求他报告总统和第一夫人，但不要告诉别人。“走漏消息可能会引发冲突，这将会破坏其中的主要好处：注入活力。”

贝克和里甘与迪弗私下会面。他们三人在贝克家里共进午餐，贝克家远离媒体与自己手下人的监视。里甘开始解释这次工作对换的目的和原因，之后，他意识到，迪弗已经下定了决心——在与南希沟通之后。“我太天真了，竟然没有想到迪弗在与我讨论这一问题之前，甚至在与总统讨论之前，已经与第一夫人达成了一致。”里甘回忆道。南希接受了这一主意，迪弗也是如此。对于贝克和里甘，迪弗说道，在第二任期开始的时候进行变革是合理的。他又补充说，里甘一直忠于总统，从没有因为任何个人事务带来政治麻烦。“这将是你的最后的工作，唐纳德。”迪弗说道。迪弗是在暗示即将年满66岁的里甘来纠正自己的说法，但里甘并没有这样做。

他们三人决定等待下去，直到总统夫妇在加利福尼亚牧场度完假之后再

求见总统。但新年伊始，他们就在椭圆形办公室碰到了里根。迪弗面带微笑地说道：“总统先生，我给您带来了几个与您年龄相当的人一起玩耍。”

里根面带微笑，一脸疑惑。

迪弗说道：“唐纳德想跟您讨论一些事情，他曾跟詹姆斯和我讨论过这些事情。我们认为非常有意思，想听一下您的意见。”

里甘回忆道：“里根仔细地听着，没有表现出任何惊讶。他看起来平静放松——几乎没有一点儿好奇。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看来似乎有点儿奇怪。我提出的交换工作这件事本身非常重要，但在总统最亲近的助手之间一系列的工作变换中，这只不过是最近的一件而已。”迪弗将要离任，埃德温·米斯将成为下一任司法部部长。而今，白宫三驾马车中的第三名成员贝克即将前往财政部，他将被里甘替代，而里根认识里甘，却不十分了解他。里甘说道：“如果我处在总统的位置，我就会问这位求职者许多问题：你将与贝克有何不同？你将如何处理与国会的关系？你对国防和外交事务知道多少？你将让谁加入、让谁离开你的团队？你想改变哪些做法？你将如何处理与媒体的关系？你为什么想做这份工作？”但是总统什么也没问。“里根没有提问，我不清楚他这种消极的态度说明了什么。”

里甘暗示说，他可能需要时间考虑这件事。

里根要求里甘再接着说下去，里甘照做了，总统依然没有提问。里甘回忆说：“里根友善地点着头，他盯着贝克和迪弗，好像在审视他们脸上的表情，但也没有问他们问题。”里甘讲完后，总统说道：“好的，我支持这项提议。”

对于这样一次重大的人事变动，总统表现得明显没有经过认真思考。里甘对此无法适应，他写道：“这太让我吃惊了，总统轻而易举地就全盘接受了这一全新的主意，对调了自己的办公厅主任和财政部部长，也因此改变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政府工作。他看起来不是在做决定，而是在接受一个既成事实。有人可能会猜测，此事已经由不在场的某一方提前解决了。”

里甘再次要求总统仔细考虑。里根再次挥手示意没有必要，他说道：“我就不明白了，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这样继续下去呢？”

世人很快就知道了总统的办公厅主任和财政部部长在交换工作。不久，他们发现作为办公厅主任，唐纳德·里甘并不是詹姆斯·贝克。贝克在享受他作为财政部部长的新生活，这儿不必每天都做一些重要决定，也不必决定何时、何地做出这样的决定，他们经常避开媒体聚焦白宫的严厉审查。换到相反位置的里甘则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贝克看起来如此疲惫。办公厅主任必须同时处理十几项工作，尽管贝克努力告诉他如何处理这些工作，但由于里甘缺乏经验，有些事情还是不可避免地没有解决好。

1984年11月，这种工作中的摸索首次引起了世人的注意。当时，里根与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举行会谈。科尔来到华盛顿，讨论盟友事宜，并为次年5月在波恩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做准备。科尔坦言道，他和其他德国人感到非常愤怒，因为他们的国家被排除在纪念登陆日40周年活动之外。科尔还说道，之后他和法国领导人弗朗索瓦·密特朗在“一战”战场凡尔登举行会谈，双方冰释前嫌，两国关系转好，西方国家联盟的关系也总体向好。科尔总理希望里根总统能同他一起，在他访问德国的时候，举行类似的仪式，或许可以在某个战时公墓举行。科尔完全理解犹太人的感受，他们对任何看起来好像是忘记大屠杀的行为都很敏感。因此，他提议里根在达豪集中营或别的集中营举行纪念活动，以此来平衡公墓之行。

里根原则上接受了科尔的邀请，让国务院和白宫工作人员安排具体工作。国务院方面负责准备通气简报和其他材料，可以向世人告知总统德国之行的实质内容。白宫方面则负责演讲效果。

遗憾的是，白宫员工正处在从贝克向里甘过渡的中间时期，一些细节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1985年2月，迈克尔·迪弗率领一队前站人员前往德国查看总统要访问的地点。这一次，科尔手下的人指定了位于比特堡的一处军事公墓。比特堡是总理的家乡，也是联邦德国的一个区，当地即将举行一次重要的选举，迪弗和其他人一起参观了这处小公墓，白雪覆盖下的公墓看起来静谧安宁。迪弗的一位助手后来说，当时他们曾问道，是否有恶名昭彰的纳粹党卫军埋在那里，得到的答案是没有。但是，迪弗和他的助手们都没有清扫墓碑上的积雪亲眼看一下。

同时，总统级别的人物前往达豪集中营参观也可能引起反对。德国媒体暗示说，前往达豪集中营是里根的主意，而白宫方面否认了这一报道。乔治·舒尔茨告诉里根，到达豪集中营访问具有象征意义，但是里根认为这种象征意义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他希望放眼未来，而不是辗转于过去。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总统被问及这一问题。他回答说，美国和德国需要继续前进。“我强烈地感受到，此次我们纪念那次伟大战争的结束，不是要再次唤醒沉睡的记忆和那一时代的激情。相反，或许我们应当将这一天视作40年前的那一天，将其视作和平友好的起点。因为现在我们同曾经发生过战争的国家已经成为盟国和朋友，现在我们是在庆祝一个时代的结束，也是在庆祝40年前和平时代的到来。我认为，由于德国人民——只有极少数仍然健在的人还记得那场战争，而他们当中当时没有成年人，也没有参与到战争中去——怀有一种感情，一种他们强加在自己身上的负罪感，我认为这没有必要，他们应当被看作是他们所创造的民主和他们现在所拥护的民主原则的化身。”

里根的讲话激起了强烈的反应。“里根总统显然认为，今天健在的所有德国人都在60岁以下。”犹太大屠杀幸存者儿童国际组织的梅纳赫姆·罗森沙夫在《纽约时报》上写道：“看起来应当简短地补习一下历史课了。1943年，当我父母到达奥斯威辛的时候，他们刚刚30岁出头，大部分折磨他们、把他们家人送往毒气室的德国卫兵和医生跟他们年龄相当，或者比他们年轻。同样，特雷布林卡、贝尔根-贝尔森和达豪集中营以及许多其他死亡集中营中的杀人犯们，在他们参与惨绝人寰的屠杀600万欧洲犹太人的时候，都是20多岁或30多岁。”由于这些人是警卫人员及非战斗人员，因此，他们很少死于战场。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当中只有少数人因为其罪行而被处决。“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现在六七十岁，依然在德国生活得很好。罗森沙夫认为，在所有的总统当中，里根应该最清楚这些人活了多长时间。奥斯威辛臭名昭著的首席医生约瑟夫·门格勒现年74岁，与里根同岁。罗森沙夫说：“不知为什么，我认为门格勒还在惦记着第三帝国。”总统曾前往诺曼底纪念阵亡在那里的将士们，他也常常向美国阵亡士兵表达敬意。然而，现在他却抽出时间来纪念那次大屠杀。罗森沙夫说道：“他明确表明，达豪集中营的死难者代表了所有纳粹集中营的死难者，与诺曼底阵亡的士兵，或者与埋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里的美国士兵相比，他们不值得被如此尊敬。从本质上说，里根是在告诉全世界，他更关心的是德国人的感受，而不是希特勒的受害者们的记忆。作为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我非常愤怒；作为一名美国人，我感到羞愧。”

当白宫宣布总统将访问比特堡军事公墓时，里根的麻烦接踵而至。拉里斯皮克斯解释说，他要敬献花圈，上面写道：“本着和解共处的精神，本着40年和平历程的精神，本着经济与军事兼容的精神”。这一声明招致了来自犹太人团体和美国退伍军人的抗议。数百名国会议员恳请总统重新考虑。

但里根丝毫不妥协。他对一群编辑和新闻人员说道：“这一切好像都是让我在面对不利情况时做出让步。我认为参观那处公墓没什么不对，那里

的年轻人也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即使他们穿着德国军服在战斗，为执行那些令人讨厌的纳粹意志而应召入伍。他们是受害者，就像集中营中的受害者一样。”

里根将大屠杀中的犹太人受害者与纳粹士兵相提并论的做法让很多美国人感到惊讶，认为这是难以置信的反历史的做法。美国希伯来会众联盟的拉比亚历山大·辛德勒说道：“把一心想要征服世界的德国军队士兵的命运与600万犹太民众的命运相提并论，包括100万无辜的儿童，这是对历史的歪曲，是大放厥词，是对犹太群体的无情冒犯。总统这一糟糕的表态给美国人民带来了耻辱，它侮辱的不仅仅是犹太人以及那些在集中营中受苦受难乃至丧命的人们，它还侮辱了每一位美国人，以及每一位为把欧洲从纳粹的死亡阴影下解放出来而献出生命的盟军士兵。”

此刻，记者们已经参观了比特堡公墓，结果发现，埋在那里的还包括党卫军士兵——希特勒精英卫队的武装力量。这一发现把争议提升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因为即使在战后40年，单是提到党卫军，就会让那些曾遭受过纳粹统治的人们胆战心惊。进一步的调查把比特堡阵亡的这批人与党卫军在战争期间所犯下的最残暴的一次罪行联系在了一起：在1944年的这次暴行中，他们屠杀了一个法国村庄的600多名平民百姓。

美国政府试图缓解所造成的伤害，他们邀请大屠杀的幸存者埃利·维泽尔来到白宫，向他为人权工作所做的努力颁发一枚奖章。维泽尔向总统和美国表示感谢，感谢他们击败纳粹，解放了死亡集中营。他说道：“但是总统先生，假如我不告诉您在过去的一周时间内我所感受到的悲哀，那么我就不再是我，而您也就不会再敬重我这样的人。我相信您也因为同样的原因感到遗憾。我能做什么呢？我属于经历过战争创伤的一代人，对我们来说，就像对您一样，象征是非常重要的。”很不幸的是，总统参观比特堡的象征意义被误导了。维泽尔相信里根的说法，认为当他接受科尔的邀请前去参观的时候，他并不知道那是党卫军的坟墓。“当然，您当时不知道，但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总统先生，如果有可能的话，我能否恳求您做另外一件事，设法找到另外一处地点，总统先生，那个地方不是您应当去的地方，您该去的地方应当是党卫军受害者的地方。”

华盛顿的媒体倾向于把此次比特堡公关事件灾难归咎于唐纳德·里甘。专家学者或窃窃私语或高声表态说，假如贝克依然担任办公厅主任的话，那他永远不会允许此类灾难发生。里甘对这些指控非常不满，他回忆说：“当我到达白宫的时候，这些安排已经出现在总统的议事日程中。”里甘指责迈克尔·迪弗，说他没有掌控全局，尤其是没有仔细检查比特堡埋葬人员名单。当党卫军坟墓这件事曝光以后，他责问迪弗：“该死的，怎么能发生



这种事情？”华盛顿内部人士都知道，迪弗有酗酒的毛病，他在离开白宫之后也承认了这种毛病，并在一次院外活动调查中被指控做伪证。迪弗酗酒的劣习没有阻止陪审团对其定罪（尽管这有可能减轻对他的判决），但它让人们相信了当时比特堡事件的传言，说他贪恋杯中之物，严重影响了履行办公厅副主任的职责。里甘再次提到了这些传言，意在指责迪弗忽略了党卫军的坟墓。里甘写道：“据说他一天能喝将近1升的苏格兰威士忌，而当他在白宫工作的时候，他会用薄荷糖来隐藏他满身的酒气。”里甘补充说，他自己并没有能够发现迪弗造成的危害，因为迪弗隐藏得非常巧妙。“我从没有看见哪怕是一丝迪弗喝酒过量的迹象，事实上，我当时觉得他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

华盛顿的一些人指责赫尔穆特·科尔，说他故意为难总统。科尔的选民中包括一些“二战”老兵，这些人非常不满，因为由于大屠杀所带来的国际舆论迫使德国低头认罪。他们当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向往着昔日第三帝国的岁月，但许多人认为，他们终生饱受战争罪行的错误指责。科尔安排里根前往军事公墓参观会让这些选民们感到欣慰，让他们相信总理同情他们。

然而，比特堡之行已经出现在里根的行程安排中。总统一意孤行，决定顶着公众的批评，前往参观。里根以其特有的方式指责媒体对于政府的失误小题大做。他在争议刚刚发生的时候，在日记中写道：“媒体终于得到了一次实战的机会，可以因我接受了赫尔穆特·科尔的邀请而攻击我。赫尔穆特心里想的是纪念‘二战’结束，并以此作为仇恨的终结，作为持续了40年的友谊与和平的开始。”媒体却煽风点火，激怒了那些原本心怀善意的人们。“我反复说过，我们一定不能忘记大屠杀，我们一定要记住它，这样它就不会再次发生。但是，我们的一些犹太朋友现在正走在战争的道路之上。”然而，他们不肯改变自己的想法。“我绝不会放弃去寻求庇护。”这将会向世界发出糟糕的信号，除了缺乏正义感之外。里根写道：“是的，德国士兵曾经是敌人，是整个纳粹时代的产物。但是，我们赢得了战争，杀死了那些士兵。如果我们说一声‘我们永远不要再做敌人了’又有什么错呢？如果赫尔穆特前往美国访问的时候，假如他前去参观阿灵顿公墓，那他又有什么错呢？”

里根的决定并没有妨碍他试图缓解参观公墓所带来的影响。科尔再次邀请里根前往参观一处集中营，这一次里根接受了，他说道：“赫尔穆特可能会很好地解决我们的问题。”他派遣迪弗到德国去，最终敲定出访计划，并特别指示不要再出现新的问题。

然而，公众的怒火并没有结束。里根写道：“媒体紧咬不放，一直在尽其所能煽风点火。”他尽力宣称他将参观集中营以及军事公墓。里根抱怨说：“傍晚时分，电视媒体开始歪曲报道这一声明。”

迪弗从德国返回，向总统报告说，前往集中营的访问已经在行程中确定，但是与达豪集中营相比，科尔更倾向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并且他没有理由坚持访问前者。科尔亲自给里根打电话，确认新的行程安排，并感谢总统坚定的态度。里根在提到这次电话的时候说，总理“充满感情”。里根非常满意这一信息及这种感情，他对自己说道：“科尔告诉我说，我的讲话——阵亡士兵是纳粹主义的牺牲品，就像犹太人是屠杀的牺牲品——在德国得到了普遍认同。他非常赞同，如果取消参观公墓，那在他的国家将会是一场灾难，对德国人民也是一种侮辱。我告诉他不会取消的。”

里根也从国内一些亲信那里得到了鼓励。乔治·布什在给他的信中写道：“我为您的立场感到骄傲。假如我能帮助您分忧，那就请让我参与战斗。这并不容易，但您是正确的！”

里根非常重视这些支持，但是批评对他坚定自己的立场也同样重要。他不无嘲讽地写道：“《新闻周刊》和《时代周刊》长篇累牍地报道对于此次德国之行和参观比特堡公墓的批评。他们不愿善罢甘休。既然如此，无论这些浑蛋如何叫嚣，我都不会取消任何计划。”48个小时之后，里根再次写道：“好像每天一开始，最新的媒体报道都是关于我应不应当前往德国比特堡公墓的。该死的，我认为从道义上来讲这是正确的，因此我将前往。”

5月初，总统在波恩参加了七国集团峰会，主要讨论了贸易与经济问题。日本的中曾根康弘提议进行新一轮贸易谈判，该贸易谈判自“二战”之后定期举行。他试图阻止贸易保护主义，尤其是针对日本汽车的进口。法国的密特朗则推进货币谈判，要求调整汇率，因为汇率曾对法国经济造成伤害。英国的撒切尔则一如既往地强化她与总统之间惺惺相惜的关系。

赫尔穆特·科尔与里根私下交谈了将近一个小时。里根向他保证自己不会受到媒体煽动性报道的影响，科尔很高兴。里根记录道：“他说我立场坚定，赢得了德国人民的心。”德国人民证实了科尔的说法。“我们的车队所到之处，道路两旁都站满了人，他们鼓掌、挥手、欢呼——他们这是要让我明白，他们并不赞同媒体一直在离间参观比特堡这件事。”

5月5日上午，里根拜祭了联邦德国首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位于莱茵河畔山上的墓地。南希·里根和科尔夫人为墓地敬献了鲜花。然后，里根夫妇和科尔夫妇登上空军一号，飞往汉诺威。一架德国直升机从那里把他们送往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

里根不习惯向充满敌意的观众发表讲话。担任加州州长的时候，他偶尔会遇到捣乱分子，但担任总统之后，他和持不同政见者就被隔离开了。然而，那一天明显出现了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来自德国、美国、英国、法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他们当中有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有平民和退伍军人，有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和至今保持沉默的人。出于对死者的尊敬，警卫们把这些人挡在集中营之外，但是，他们从纪念场的边缘高声叫喊以示抗议。他们高声喊着，明显指的是比特堡公墓：“你不属于那儿，我们不希望你去那儿。”

里根看见也听见了他们的呼喊，他表现得不为所动。当被问及他如何看待此次示威行为时，里根耸了耸肩，说道：“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但里根明白，他有一次机会可以纠正形势，或者至少是改善形势。当里根和南希步行穿过死于集中营的人们的坟场时，灰蒙蒙的天空飘起了细雨。里根站在象征死难者的方尖碑前，低头默哀，然后在纪念碑前敬献了花圈，挽联上写着：“美国人民敬献。”

里根讲话声音非常低沉，与当时的场景和情绪十分吻合。他谈到了希特勒给世界带来的罪恶，尤其是给埋在这里的人们带来的罪恶。他说道：“在希特勒和他的罪恶被完全摧毁之前，这里就是人间地狱，年复一年。人们被带到这里，不为别的，只为受苦和死亡——饥饿时食不果腹，生病时无人照顾，恶念生起时备受折磨，深陷痛苦的深渊时完全被痛苦所吞噬。”死神控制着集中营，但是死神没有永远控制它——这就是为什么他和科尔总理当天来到此处集中营。“我们来到这里，因为人类拒绝接受这样一个事实：人类的精神自由能够被消灭。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纪念生命最终战胜了大屠杀的悲剧和大屠杀这个死神——战胜了苦难、疾病、考验以及毒气攻击。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为了证实恐怖永远不能战胜希望，即使是在形势最为危急的时刻，希望也永远长存人间。”

里根引用死于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的安妮·弗兰克的话，说道：“我看到这个世界正逐渐变得野蛮，我听到越来越近的雷声将会毁灭我们，我能感觉到上百万人的苦难。然而，每当我抬头仰望天堂，我都认为，这一切都会结束，这种暴行也终将结束，和平与宁静将重回人间。”他又引用了《塔木德》：“只有通过苦难，以色列的子民才获得三件梦寐以求的无价之宝：摩西五经、以色列地和未来世界。”里根又用自己的话补充道：“的确如此，在这种罪恶之外——尽管它非常残暴无情——依然存在着世界的希望以及未来世界的希望；在这些废墟之外——有希望也有痛苦——依然存在着对世界的承诺。”当代人见证着这份痛苦，也见证着这份承诺。“我们都是目击者，我们都坚信希望存在于每一个人的灵魂之中。如果我们相信它，那么希望就会引导我们成为林肯总统所说的更美好的大自然的天使。到那时，我们将摆脱所有的残忍，摆脱这悲剧般的梦魇时代，摆脱所有的

苦难、痛苦和劫难。到那时，我们就可以，也必须对天发誓：永不再犯。”

里根演讲结束的时候，没有人鼓掌。此刻，掌声是不合时宜的。但他的讲话削弱了抗议者的声音，甚至连他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他相当严肃。无论他有其他什么缺点，他非常清楚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以及它所代表的意义。

一行人继续前往比特堡公墓。在经历了所有的喧嚣和不满之后，里根尽量不让自己引起公众的注意。他既没有发表演讲，也没有敬献花圈。他委托美国退伍将军马修·李奇微代他行事。李奇微将军曾在1945年同艾森豪威尔和美国部队一起攻入德国。李奇微与一位同样受人尊敬的德国军官握手致意，其间，一支军乐队演奏德国的葬礼安息号。迈克尔·迪弗为他的公关失误做了部分补救工作，严格限制电视画面，保证镜头不会从总统身上摇到带有党卫军标志的墓碑上。几分钟之后，里根夫妇和科尔夫夫妇就离开了。

唐纳德·里甘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此次访问进行得非常顺利。他写道：“在和平时期，很少有总统能够经历这种沉重的悼念活动。从早到晚全是这种对于不合时宜的阵亡者的纪念活动。里根在整个纪念活动中表现得像一位总统，双肩笔直，面色凝重，每一个动作都恰到好处。很明显，他感觉到自己正在完成一项艰巨而富有历史意义的任务。”里根全身散发出阴郁的气息。里甘回忆道：“总统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演讲结束之后，我们一同走向汽车。当时，我小声地提到了天气状况，希望能够转移他的思绪。里根身体战栗了一下，说道：‘我真感觉有点儿冷。’”

里根暗地里对结果非常满意，他当晚评论道：“从道义上讲，这样做是正确的。”科尔的反应证实了这种观点。第二天，总理及其夫人向里根和南希道别。“他们充满感情。”里根写道，“赫尔穆特发誓说，要永远保持友好关系。”

南希·里根对比特堡这件事的看法十分不同。她在回忆参观公墓这件事时说道：“我对赫尔穆特·科尔感到非常愤怒，因为他没有让我们摆脱这种窘境。”她曾经希望自己的丈夫重新考虑这件事。“我曾强烈要求罗尼取消这次访问。”当他拒绝的时候，南希非常沮丧，就像所有使她处于不利境地的事情那样让她感到沮丧。她说道：“然而，我还是为罗尼感到骄傲，因为他听从了自己的良知。”

南希责备里甘，因为他让自己的丈夫陷入这样一种尴尬的境地。她还委婉地批评自己的丈夫，因为他允许里甘肆意妄为，造成了这种伤害。南希写道：“假如我能有某种魔法的话，我就会收回里根总统的一项决定，那就是他在1985年1月同意詹姆斯·贝克和唐纳德·里甘交换工作。”在迈克尔·迪弗把这一决定提交给总统之前，谁本来可以否决这项工作交换呢？南希为自己辩护道：“在当时，这看起来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或许有点儿不同寻常，但还算合理。”贝克厌倦了办公厅主任的工作，而里甘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进来。“当贝克和里甘提出交换的时候，没有理由会认为这一新的安排会带来一场政治灾难。”

里甘自己对于这份新工作以及它所蕴含的所有问题也有疑问。他向一位朋友透露道：“与财政部的工作相比，我更喜欢这份工作，因为它更刺激，并且‘位高权重’。然而，它给我的思考时间不及财政部给我的时间多。我当然也就不能够像我在美林证券公司那样有时间来分析问题。”里甘试图

弥补这种分析方面的缺陷，为总统设计第二任期的战略。他和他的下属制定了一份文件，列出了美国国内和外交政策中的当务之急。这些活动包括税收改革、国内一直在进行的预算之争，以及大量在国外实施的各种计划：与苏联人进行的军备控制谈判、与美国贸易伙伴进行的贸易谈判、在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打击左翼分子的斗争，以及在中东地区推进和平进程的努力。

里甘从自己在公司的活动中得出了这样一种经验：在公司内部，总裁的下属会制订一份行动计划，并提交给老板。而老板会同意部分计划，拒绝另外一些。里甘认为，他提交给总统的这份计划切实可行，并且可以进一步与总统的行动形成呼应。里甘非常了解里根，并没有期望他能逐行审阅。但他认为，总统可能会非常认真地对待，仔细阅读这份计划，并提出实质性的意见。里甘回忆道：“相反，罗纳德·里根在牧场的时候看了这份计划，回来之后，就把它返还给我，没有说也没有写下任何评语。”

“您认为这份计划怎么样？”里甘问道。

里根回答说：“很不错，真的很不错。”

里甘希望总统能详细地评价一下，但他没有。里甘写道：“他没有提问，没有反对，也没有任何指示。我曾认为，这一政策将会在未来的两年中决定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发展进程，并深刻影响共和党在1986年中期选举中的命运。”

里甘无法相信总统的反应竟然是这样的。他回忆说：“我感到很不安，难道总统真的希望我们不经过进一步讨论就执行这些计划吗？”里甘曾试图要求总统明确表态，总统真的希望自己的下属就按照计划中所规定的内容来执行该计划吗？但是，出于对总统工作的尊重，他欲言又止。“对一个普通人冒昧地说出你的想法是一回事，而对美国总统说‘等一下’又是另外一回事。办公室工作的秘籍就是要学会有效的控制。你只能暗自体会，总统自有他的理由。”

里甘意识到，里根的领导风格非常独特。他写道：“换成是另外一位总统，他可能会对政策的运行有自己的观点，但里根不会为此等琐事而费神劳力。他的思想可以被称作‘局外总统’。他非常乐意让他人去处理政府管理中的细枝末节。”里甘知道，肯尼迪常常会就政策细节越级质询中层领导。尼克松则在对中国和苏联的政策制定方面亲力亲为。卡特更是以微观管理而著称。“里根却是挑选自己的幕僚，然后听从他们的建议，几乎没有任何质疑。”

在大部分时间里，这一做法十分有效。但即使在出现问题的时候，里根也



一直是从容不迫，超然于外。里甘写道：“里根总统从来没有——据我所知，绝对没有——真的发过脾气，或者出言不逊。他从没有直接发布过命令。尽管有时候我真希望他能这样做。他倾听、默许、发挥自己的作用并等待着起草下一法案。”由于里甘来自私营企业，因而他认为这种行为容易引发混乱，但他不能挑总统的毛病。“里根的办法十分有效，让他成为美国总统，并且让他成功地领导这个国家从悲观走向乐观，领导其经济从停滞不前到稳步发展，领导这个国家在世界上从软弱走向强大。大家普遍认为，总统所知道的某些事情是我们普通人所无法知道的。我的任务非常清楚，那就是按照他的方式做事。”

里根的做事方式并不总是能被领悟到的。比特堡之行一个月之后，总统遇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自从他与吉米·卡特竞选之后就一直在准备。里根曾严厉批评卡特没有安全保证52名在伊朗的美国人质获释。他感到很自豪，逮捕这些人质的伊朗人在他上台之前就释放了这些人质。人质问题不再成为标题新闻，但并没有消失。其重心转移到了黎巴嫩。这个国家的内战让武装组织可以自由行动，不受惩罚，其中真主党是最为活跃的一个组织。该组织由伊朗人支持，不定期发动针对以色列占领的黎巴嫩和支持以色列的国家的战争。美国位于以色列支持者之首，因此也就成为真主党行动的目标，包括绑架行动。到1985年年中时，该组织一共绑架了黎巴嫩境内的7名美国人。

里根试图不公开人质的困难处境，以防公开之后会刺激更多绑架事件的发生。他深切同情这些人质及其家人，但他也发现了卡特曾经得到过的教训：释放人质的手段要么令人沮丧，没有效果，要么代价高昂，难以实现。美国情报部门无法确定人质被关押在什么地方，因为逮捕人质的人好像经常转移他们。任何军事救援行动都有可能杀死本来打算要营救的人员。里根回忆说：“我们几乎束手无策，晚上我长时间地思考如何营救这些人质。刚一闭上眼睛，那些孤立无援的美国人的形象就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几乎在每天早晨的国家安全通气会上，一开始我都会问同样的问题：‘把人质从黎巴嫩解救出来的工作有何进展？’”

到了1985年夏天，依然没有答案。当年6月，人质问题变得越发糟糕。与真主党有关的两名劫机者控制了从雅典飞往罗马的环球航空公司847号航班，机上153名乘客和机组人员绝大多数都是美国人。劫机者迫使飞机改变航线，飞往贝鲁特。在贝鲁特，他们释放了一些妇女和儿童，重新加油，然后飞往阿尔及尔。在那里，他们又释放了一些妇女和儿童。劫机者随后命令飞机飞回贝鲁特，在那里，他们扔下了美国海军潜水员罗伯特·斯特西姆的尸体。他们杀死了他，意在表明他们的决心。几名同情劫机犯的武装人员登上了飞机，飞机再次飞往阿尔及尔。又有一些乘客被释放了，飞机再次飞回贝鲁特。

美国情报人员一得到劫机的消息，马上就向总统示警。随着危机的发展，总统一直密切跟进。他得知劫机人员要求以色列释放700多名以色列部队在黎巴嫩俘虏的什叶派战俘，以此作为释放美国人质的条件。以色列曾秘密向美国政府表示，他们计划释放阿特利特囚犯，因为这些人是在以色列有他们自己的拘留地，然而，以色列政府不愿意在恐怖主义的胁迫下这样做。但是如果美国政府提出这样的要求，以色列还是愿意帮忙的。里根在

日记中写道：“美国最高层必须要求他们这样做。这当然意味着我们，而不是他们，将会违反我们不与恐怖分子谈判的政策。如果这样做了——与恐怖分子谈判——当然会鼓励更多的恐怖主义行为。”

尽管如此，里根认为，可能还会有别的办法来影响谈判，目的是满足劫机者的要求，同时，保住拒绝与恐怖分子谈判的面子。一位黎巴嫩什叶派人士纳比·贝里出面充当劫机者的代言人。里根认为，美国政府可以同贝里谈判，这样就不会违背自己不与恐怖分子谈判的规定。里根在与自己的国家安全团队开会之后写道：“我提议，如果以色列与贝里对话——我们怎么都会释放这些犯人的，如果你们释放这些美国人，我们就会加快进度——那就没有人对恐怖分子屈服了。”

乔治·舒尔茨不喜欢这种说法，因为无论是否通过中间人，美国都是在与恐怖分子谈判。舒尔茨说道：“总统先生，您此举很难两全。”

在公开场合，总统坚持这一既定政策，当他周末从戴维营返回，走下直升机的时候，记者们大声向他提问。一位记者问道：“先生，这也能谈判吗？”另一位问道：“您愿意看到以色列释放那些什叶派囚徒吗？”

里根回答道：“这是他们应当做的决定，这一决定并不只是简单的交换囚犯，而是关于在什么程度上你可以从恐怖分子那里得到预期的结果，同时还不会让恐怖分子觉得他们的策略取得了成功，从而危害他人。”

“也就是说，您依然反对？您依然反对与恐怖分子谈判？”

里根说道：“是的，这一直是我们的立场。”

“那么，这怎么才能取得成功呢？”

“无可奉告。我认为我们应当继续我们目前的工作，并希望他们能够看到，为了他们自身的安全，他们最好释放这些人质。”

两天后，在一次正式的记者招待会上，里根的语气更为强硬。他说道：“美国永远不会对恐怖分子让步，这样做只会招致更多的恐怖活动。我们也不会要求或强迫任何其他政府这样做。一旦我们落入他们的彀中，那将会无休无止，无辜人民的苦难将永无尽头，所有文明国家的流血冲突将永无休止。”

然而，以色列方面在到底是否与恐怖分子谈判这件事上摇摆不定。里根私下抱怨说：“以色列人没有帮忙。他们公开声明，如果我们提出要求，他们就会释放囚犯。可是，我们不能那样做，因为一旦如此，我们就是在奖励恐怖分子，也会鼓励更多的恐怖活动。”第二天，里根抱怨说，以色列

国防部部长伊扎克·拉宾“无中生有，搞砸了事情”。

最终，美国政府和以色列政府协调了它们的行动。以色列政府让里根相信，他们确有意释放什叶派战俘，如果没有发生劫机的话，可能已经释放了。里根以此作为有力的证据，鼓励叙利亚领导人，同时也是一位刚出现的、很有希望的中间人哈菲兹·阿萨德传递一条信息。“在这件事上，美国的立场自始至终都是这样的：劫机和劫持人质妨碍了以色列对阿特利特囚犯的释放计划。”乔治·舒尔茨在给美国驻大马士革大使馆的电报中这样写道：“因此，你可以告诉叙利亚人，总统认为，在环球航空公司847号客机乘客获释之后，叙利亚人可以期待黎巴嫩囚犯的释放。不要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

这种理解成为人质获释的基础。美国人被带到了叙利亚，他们在那儿登上了美国空军的飞机，然后运往联邦德国。以色列则在几周之后释放了什叶派囚犯，并声称这一决定与劫机无关。

里根谨慎地庆祝这次胜利，因为罗伯特·斯特西姆的死亡带来了一丝悲哀。他在阿灵顿国家公墓斯特西姆的坟前献上了一束鲜花，然后飞往安德鲁空军基地，接见人质及其家人。里根写道：“这是一次温馨的回家之旅，暖人心扉。”

但是，最初那7位人质依然被扣押。里根继续询问他的顾问们，人质释放问题是否取得了任何进展。

里根的岳父洛亚尔·戴维斯医生长期以来一直提倡定期体检。随着里根的年龄增大，乃至后来成为总统，他也意识到这一建议的重要性。在1984年的一次结肠镜检查中发现了息肉，切除后发现是良性的。在随后1985年3月的一次体检中发现了另外一块息肉，他的医生们安排在7月12日星期五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进行切除手术。总统开始为这次手术做准备，避免进食固体食物，转而喝聚乙二醇，这种泻药可以彻底清洗他的消化系统，尽管不是很舒服。

里根在1981年与死神擦肩而过，在他手术期间引发的关于指挥系统的问题让白宫方面对此类事情十分敏感。因此，这一次在被麻醉之前，里根依照宪法第二十五条修正案签署命令，暂时把权力移交给副总统布什。

麻醉开始起作用后，手术开始了。手术团队切除了这块息肉，但在手术过程中发现了另外一块更大的息肉。南希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前，就感觉到会有这样的结果。她在回忆那个下午时说道：“我坐在等候室中与拉里·斯皮克斯聊天。术后罗尼头脑清醒，一切正常，像以往一样开着玩笑。但我注意到医生们没有笑。我还感觉到他们看我的表情怪怪的，尤其是罗尼的主治医生约翰·赫顿，他似乎在躲避我的眼神。医生们建议罗尼平躺，让我跟他们来到另一个房间。其中一位医生拉过一把椅子，说道：‘我们有个坏消息要告诉您。’”

从1981年3月开始，南希就一直担心自己丈夫的身体状况。她慢慢地学会了抑制住这种担忧，但现在这种恐惧再次袭上身来。“我感到自己仿佛被一辆10吨重的卡车撞到了一样。”南希说道。她要求医生们告诉自己他们所知道的一切。

他们解释说，他们在结肠的肠壁上发现了一块高尔夫球大小的息肉，这块息肉看起来是恶性的，尽管他们只有在完成活体切片检查之后才能确定。但无论如何必须将其切除，以防癌变。他们还必须要检查里根的其他器官，看一下是否有癌变的迹象。

“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难以置信。”南希回忆道。她静静地听着赫顿医生对治疗方案的介绍。她和里根可以像他们计划的那样，前往戴维营度周末，然后在周一回到贝塞斯达进行手术。或者，他们可以等上10天，直到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结束对美国的访问。或者他们可以让里根住院，在第二天切除息肉。

南希几乎没有考虑前两个方案。她说道：“我所想的一切就是尽快进行手术。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息肉的存在，我无法忍受让它继续待在罗尼的身体里，哪怕是多待一刻钟。”

南希决定自己来处理这件事，她对医生们说：“让我来跟他说，等我们进去看他时，请不要提到癌症。我们还不确定是不是癌症，因此没有必要使用那个字眼，除非我们确定以后。”

南希清楚自己的丈夫不喜欢手术前的准备工作，尤其是使用聚乙二醇来清洗肠胃。因此，当她解释有必要进行二次手术的时候，南希是这样说的：“既然我们已经在医院了，那为什么我们不在明天就进行完呢？因为假如我们下周再来，你又要再次喝那鬼东西了。”

不知是因为他讨厌聚乙二醇，还是因为他爱自己的妻子，抑或是仅仅因为他做完这次手术，不管怎样，里根同意了。手术安排在第二天上午。

唐纳德·里甘回忆说：“每当南希心烦意乱的时候，她就会有些轻微的口吃。当她从贝塞斯达海军医院给我打电话时，她的声音颤颤巍巍。”里甘对于随后关于里根手术的决定的记忆与南希的记忆不同。“此类疾病的治疗关键是要尽快手术，因此，当她跟我说手术可能推迟一天半的时候，我很担心——确切地说，是很震惊。我很谨慎地说道：‘我想这别有用意。’因为我们是在电话中交谈。‘我们是有充分根据才这样做的？’”

“‘是的，也许吧。’第一夫人回答道。”

南希后来说，她当时言辞谨慎地说明自己的丈夫病情严重。“我当时的意思是，罗尼的情况可能非常严重，我不愿意在电话中谈及此事。”

里甘认为，在南希闪烁其词的回答中，他听出了作为妻子的担忧，但他还听出了一些弦外之音。“我担心两件事——第一，里根总统的病情比他妻子在电话中说的要更严重。第二，第一夫人是在咨询了她的星象师之后选择了手术日期。在这两种可能性中，第二种更有可能。事实上，在我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期间，里根夫妇的每一次重要行动和重大决定都提前向旧金山的一位女士请教过”——里甘当时还不知道琼·奎格利的名字——“这位女士会利用占星术，确定星球的排列对于事业有利。”里甘继续写道：“她成了我工作中，乃至国家军国大事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以至于我曾经在办公桌上放了一个标注了颜色代码的日历（用绿色笔迹标注的日子代表‘吉日’，红色代表‘凶日’，黄色代表‘变幻莫测的日子’），以此来帮助我记住什么时间是黄道吉日，适合美国总统出行，可以安排他在公开场合

讲话，或者可以与外国开始谈判。”

在这件事上，南希的星象师好像在左右总统的治疗。“里根夫人从贝塞斯达打来电话，继续坚持要推迟息肉手术。‘告诉拉里·斯皮克斯，就说总统要在下周进行手术。’她说道。现在是星期五。‘拉里可以说这个息肉比想象的要大，但他除此之外不能多说一个字。’”

里甘同情南希，但对她的决定表示质疑。“她的语气很迫切，充满焦虑。此刻不应当质疑一位焦虑妻子的想法。但我完全不同意她给我的建议，因为这很明显，不让媒体得知丝毫消息是有风险的，因而也会造成企图掩盖事实的风险。同样，发表声明，改变原来的手术时间也存在风险。”

里甘给在医院的斯皮克斯打电话，警告他讲出他所知道的一切，但没有得到更多的信息。“他没有装腔作势，也没有惊慌失措。”

过了不一会儿，里甘与主治医生就病情通了电话，得到了医生第一次专业性的简短介绍。息肉必须切除，总统应当住院一个星期到10天的时间。

据里甘回忆，决定第二天就进行手术的是里根。总统问医生：“为什么要等下去？马上检查，进行手术。我在医院和在家一样，都可以办公。”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长出来的息肉被切除了，同时被切除的还有总统的一小段结肠。比较麻烦的问题是如果有癌变的话，这种癌变是否已经扩散。活体切片检验发现，这块息肉的确是恶性的，但随后的检查表明癌症没有扩散。里根要求不做化疗，也不做进一步治疗，尽管他还需要经常体检，确保癌变不会复发。

在担任办公厅主任期间，詹姆斯·贝克保留了一份档案记录，名字叫“拉姆斯菲尔德规则”。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担任杰拉尔德·福特的办公厅主任，他把自己的工作经验与贝克分享。拉姆斯菲尔德的第一条规则是“不要逾越总统”。后面还跟着12页的其他规则，最后一条还是“不要逾越总统”。贝克自己又加上了他担任办公厅主任的总结：“没有人选举你当总统。”

假如唐纳德·里甘曾看到过“拉姆斯菲尔德规则”或听说过贝克的建议的话，那他肯定是没有从中吸取到经验教训。里根手术之后，里甘的总裁身份日益明显。《纽约时报》在7月15日报道说：“里根总统的办公厅主任唐纳德·里甘成了白宫的主宰，他规划着政府运作，而里根先生则在腹部手术的恢复之中。助手们说，里甘先生的作用已经超越了负责白宫运作的范

围。”这篇头版文章还刊登了两张照片，一张是里根和南希在医院，另一张是里甘在工作。

第一张照片让南希很满意，但第二张并非如此。她也不喜欢文章中吹捧里甘的内容。“白宫幕僚们说，66岁的里甘先生是近年来涌现出的最有影响力的办公厅主任。里根先生的生病让这位办公厅主任直接处于国内外政策决策的中心地位。”这篇文章说，最近发生的事情强化了自里甘进入白宫后出现的一种趋势。“甚至在总统生病之前，里甘先生就向白宫工作人员和政府官员明确表明，他自己掌控着接近里根先生的大部分机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里甘对于政府机构的控制越发牢固。一位未提及姓名的白宫幕僚说道：“每个人都在为里甘工作。”

南希对这篇文章的整体基调十分不满，认为这是对自己丈夫的不尊重。但最让她恼怒的部分是其中有句话说，好像她自己也屈从于这位办公厅主任：“总统的妻子南希·里根也逐渐越来越依赖里甘先生，这更加巩固了他的位置。”

“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我们相安无事。”南希在提到里甘的时候这样写道，没有提及她对比特堡事件的愤怒。“直到1985年7月，当时罗尼在进行癌症手术，我跟唐纳德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在手术后的48个小时内，唐纳德想让乔治·布什和罗伯特·麦克法兰与总统会面。我认为时间过早——医生也是这样认为的。但唐纳德认为让罗尼重新开始工作更为重要。我跟他讲：‘我们再等上一段时间，毕竟他刚做完一次大手术。我知道他是总统，但别忘了他也是个病人，跟其他病人一样。如果你催得过紧，他可能会旧病复发。’”

南希努力戳穿在她看来里甘的做作虚荣之处。她回忆说：“唐纳德每天都来贝塞斯达医院，他希望乘坐直升机来，这在我看来是不对的。我认为，除了总统之外，其他任何人不应当使用直升机，除非在紧急情况下。开车到医院大约需要45分钟，其他所有人都是坐车来的。那时，我就开始有种联想，对于里甘越来越讨厌，因为他常常表现得好像自己是总统一样。”

里甘认为，南希表现得过于防范。在他看来，总统十分强壮，远非南希眼里那样弱不禁风。里根接见了里甘和白宫法律顾问弗雷德·菲尔丁。他们走进术后康复室，来看一下总统是否准备重新担负起手术期间他移交给乔治·布什的权力。刚一进门，总统就开玩笑说：“苏联人扔炸弹了！”他指的是里甘和菲尔丁脸上的严肃表情。里甘让总统放心，说他们只是担心他的健康。犹豫之下，里甘递给总统一封必须要处理的信。“您能看信吗？”里甘问道。



“让我看一下。”里根边说边抓过这封信。他双臂伸直展开信纸，因为他的眼镜没有在手边。

“您看懂了吗？”里甘问道。

“是的，”里根说道，“我马上签字。”他很花哨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里甘继续写道：“随后，他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清醒，提起了他被麻醉前中止的话题。”里根在手术前曾批评鲍勃·多尔不支持政府预算。“鲍勃·多尔怎么样了？”里根又提到了这件事，“他应当是这次预算的领导人。”里甘很少见到里根这么严肃。“他看起来非常强硬，头脑清醒。我用了一两分钟的时间跟他汇报说国际形势比较平静。他听着我的汇报，然后又想到了其他事情，表情变得严肃起来，问道：‘人质问题有消息吗？’”

在探讨了一会儿人质问题之后，里根问道：“我还要在这儿住多久？”里根的哥哥尼尔最近也碰巧做了跟里根类似的手术，几天之后就出院了。里根说道：“唐纳德，我想尽快离开这里。看看你能做些什么。”

里甘说道：“总统先生，不要管这件事，谨遵医嘱就可以了。”

尽管里甘拒绝帮助总统早日出院，但总统的口气和行为让他觉得，里根可以偶尔接见一下来访者，包括布什和麦克法兰。当里根的常规手术变得情况严重的时候，副总统还在缅因州自己的避暑别墅里。布什当即飞回华盛顿，希望能向总统表达敬意。里甘认为他应当获准前来探视。探视可以只占用几分钟时间。麦克法兰也希望占用总统几分钟时间。这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说，自己需要向总统汇报一些重要情况。里甘把布什和麦克法兰安排在探视总统的名单里。

南希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她打电话质问里甘：“你为什么这么做？这太过分了！他需要休息。”里甘解释了自己的想法，但南希不为所动。她借此机会表达了自己的不快，不满意他打算利用总统的直升机从白宫前往贝塞斯达医院。里甘回答说，直升机可以节省宝贵的时间，但她对他的回答置之不理，并且说总统的直升机只归总统所有。

里甘暂时做了让步，他说在允许布什和麦克法兰探视之前，自己将咨询总统的医生，并且说会重新考虑使用直升机的事。

里甘刚放下电话就接到了爱德华·希基打来的电话。此人负责白宫交通事务，认识里根夫妇多年。希基说道：“如果我是你，我就会取消使用直升机。第一夫人的手下都在议论这件事。”

里甘反问道：“他们为什么要议论这件事？我只是想节省时间。我每周必

须前往医院7天，每次坐车单程就要40分钟。这样一来，每周都要浪费10多个小时。”

希基说：“在正常情况下，飞过去比开车过去的理由更充分，但是现在情况特殊。唐纳德，现在谣言四起，你要当心自己的言行。”

里甘后来回忆说，当时自己被惊呆了。在白宫西翼，他已经习惯了流言蜚语，尽管他不喜欢。但来自白宫东翼——第一夫人圈内的流言蜚语是他没有预料到的。对此，他更不喜欢。然而，他感觉到这可能要比白宫西翼的流言蜚语更加麻烦。

“好吧，取消该死的直升机。”里甘告诉希基。

在当上总统之前，里根常常嘲笑个人外交的潜力，尤其是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无神论的政治委员们对于魅力、幽默、劝导或者共享的人道主义没有任何反应，他们只对武力或者武力威胁有反应。

但担任总统之后，里根的观点发生了变化。他对自己的能力特别自信，认为自己可以发现与外国领导人之间的共同之处，哪怕是苏联领导人。里根希望能与勃列日涅夫同室谈判，但这位长期掌权的克里姆林宫之主无视他的邀请，没有参加峰会，之后就去世了。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不久也随他而去。

接下来，戈尔巴乔夫上台。里根认为，他最终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刚开始，戈尔巴乔夫对于里根私下会谈的建议表现得很谨慎。但随着他在政治局站稳脚跟，他表示可能的确有必要举行峰会。日期和地点必须确定下来，但面对面谈判的原则是他可以接受的。

有可能举行峰会这件事在美国外交政策机构内引发了一场论战。亨利·基辛格前往白宫，要求里根不要操之过急。这位缓和紧张局势改革的设计师说，机会确实存在，但必须谨慎对待。基辛格说：“让它成熟起来。”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警告说，苏联可能在峰会上耍弄诡计。“他们会突然袭击，为的是让总统处于被动防守的境地。”布热津斯基跟唐纳德·里甘说道，“这是一场竞赛。”总统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这场论战在政府内部进行得最为激烈。反对共产主义的强硬派以国防部和中情局为据点，他们像里根之前那样反对举行峰会。“卡斯帕·温伯格坚信，与苏联领导人的谈判不会有任何收益，大部分谈判都是危险的陷阱。”杰克·马特洛克回忆道。马特洛克是来自外交部的苏联问题专家，从外交战线提拔起来，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下属的苏联和欧洲分部，成为里根与克里姆林宫方面打交道的得力助手。他认为，温伯格对峰会的反对令人讨厌，但从官场上看是可以预测到的。五角大楼的工作是研发武器与采购装备，而不是外交与谈判，因此，五角大楼的领导人一定会促进前者，反对后者。但是，马特洛克认为，温伯格的反对过于强烈，因为甚至在里根明确表态希望与戈尔巴乔夫会面之后，温伯格依然凭借泄露消息来破坏和暗中侮辱总统。马特洛克认为，里根也是这样想的，尽管他没有受到这件事的影响。“当他的想法被泄露给媒体的时候，最经常出现在《华盛顿时报》或者出现在专栏作家和电视评论员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的

评论中。”马特洛克在提到温伯格时说道，“里根非常恼火，有时甚至恼羞成怒，但他通常还是容忍了他们。他不喜欢与内阁成员发生直接冲突，尤其是像温伯格这样的老朋友。里根也明白，假如要与苏联完成一项积极的议事日程，他需要自己政府内部强硬派的默许，即便不能得到积极支持的话。”

威廉·凯西同里根的关系没有温伯格那样长久，但作为情报局局长，他拥有信息，因此，也拥有政府内部其他人所没有的可信度。凯西认为，戈尔巴乔夫不是一个真心实意的改革者，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外交政策方面。凯西在给里根的信中写道：“尽管一些苏联官员暗示说，戈尔巴乔夫倾向于采用实用主义方法，包括发展私营企业计划，但是，戈尔巴乔夫的声明和行动突出强调了他对当前经济制度的忠心，以及要让它更好地发挥作用的决心。”在外交政策方面，戈尔巴乔夫坚持苏联的传统思想，相信军事力量，相信社会主义必将取得最终胜利。鉴于这一原因，美国需要坚持自己有力的政策，需要让克里姆林宫方面相信它将一如既往地这样做。凯西写道：“要想让苏联人打消莫斯科多年积攒下来的疑虑，相信这一点，需要您取得政治上的胜利。这种胜利体现在您在国会、在美国公众中以及在盟国中推行的政策规划。它还需要技巧和毅力，树立持久的战略观念，处理所有与美苏超级大国斗争有关的问题。”举行峰会最大的好处就是分散注意力，最大的坏处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国务院的乔治·舒尔茨是所有支持召开峰会的声音中最强烈的一个。他也是与苏联政府关系最为密切的人。舒尔茨定期与苏联外交部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会晤，后者大概会传递过来戈尔巴乔夫接受里根邀请的信息。舒尔茨试图打破葛罗米柯冷漠的外表，在一次外交宴会上，葛罗米柯讲述了戈尔巴乔夫发起的反对酗酒运动。舒尔茨回应说，里根政府也在试图制止美国人酒驾。他讲了一个当时在苏联广为流传的笑话，这个笑话来自舒尔茨的线人。两个人排队等待从一家国有商店购买伏特加，队伍几乎没有向前移动。最后，其中一个说道：“我受够了，我要到克里姆林宫去干掉戈尔巴乔夫。”说完他离开了，不久又回来了，他的朋友还在排队。朋友问他：“怎么样，你干掉他了吗？”第一个人回答道：“该死，没有。那儿排的队比这儿的都长！”葛罗米柯没有笑。

但是，葛罗米柯最终提到了峰会问题。他说欢迎里根11月来莫斯科。舒尔茨回答说，这次该苏联领导人前往美国了。葛罗米柯说这绝不可能，但欧洲有可能。

舒尔茨问道：“您是说日内瓦？”

“如果您说的是日内瓦，那我就必须要说是赫尔辛基了。”葛罗米柯说道。

舒尔茨将这一点看作一种进步。他向里根汇报了情况，并想确认他和里根的思路是一致的。舒尔茨发现了一些疑问，很明显，这些疑问是由温伯格和凯西挑起的。里根说，11月恐怕太仓促了，或许他难以应付。

舒尔茨把问题推了回来，他说：“您政府中的许多人不希望召开峰会，而您必须要下定决心，开始行动。当这一问题牵涉到您政府中各个部门的时候，您就无法妥协了。”

里根命令舒尔茨着手安排。克里姆林宫方面同意选择日内瓦，相当重要的原因是戈尔巴乔夫对葛罗米柯明升暗降，让他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名誉主席。外交部归属了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他是戈尔巴乔夫的人，远不及葛罗米柯好斗难缠。7月初，白宫和克里姆林宫同时宣布他们定在11月举行峰会。

这个决定改变了政府内部的形势。随着峰会的敲定，温伯格由反对转变为破坏。尽管参议院从来没有批准SALT II，然而美国——以及苏联——在自觉地遵守该条约提出的武器系统限制规定。这些限制相对比较宽泛，在里根第一任期内，它们没有禁止里根下令进行的军备建设。但在他的第二任期初期，一种新型潜艇开始服役，这使得美国超越了SALT II关于潜艇导弹的规定，除非总统可以让一艘现役潜艇退役。按照美国海军的标准，老式潜艇应该淘汰，美国海军也不希望让它继续服役。然而温伯格以及五角大楼中的鹰派人物在国会及其他部门中的盟友的支持下，认为它应当继续服役。一些人认为，这对美国国防很有必要，另外一些更为坦率的人承认，他们的目标是要摆脱SALT II对这种或其他类型武器系统的限制。里根最终决定让这一老旧的潜艇退役，主要是为了对付苏联人的质疑，即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取得军事优势，威胁世界和平。但这一决定让他在政治上付出了代价——与鹰派人物交恶。这些人明确表明，他们不会轻易支持未来的武器谈判。

中情局采取了不同的战略。与威廉·凯西相比，罗伯特·盖茨对谈判不太敌视，也没有那么多的想法，但他认为应当要求总统对戈尔巴乔夫采取强硬路线。盖茨在给凯西的信中写道：“我认为戈尔巴乔夫希望并且也迫切需要达成交易，来品尝胜利的味道。我曾参加过几次美苏高层会谈的准备工作，还从没看见如此迫切想要进行交易的欲望。”这就给了美国政府重要的优势。“30年前，艾森豪威尔前往日内瓦，会见苏联领导人。从那以后，不断有总统与苏联领导人会晤。此次，里根总统会见戈尔巴乔夫，他手里的牌要比任何一位总统都要好。我们的准备工作应当从这一前提出发，重点关注我们应当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具体的现实的要求——并不是在辩论中争强好胜，而是以具体的方式推进美国的利益——从尼加拉瓜到

安哥拉，到阿富汗，到柬埔寨，到两伊战争，到军备控制，到文化协议，乃至人权问题。”盖茨认为，白宫没有从根本上理解这次机会。“此次会谈是里根担任总统期间我们所遇到的最重要的一次机会。我担心总统的手下参加此次会议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能够挺过这次谈判，而没有对伟大的目标和机会有清晰的认识。”

盖茨提议，中情局应当向总统介绍他所提到的这些机会，凯西同意了。但是，罗伯特·麦克法兰和杰克·马特洛克先到了总统那里。马特洛克回忆说：“甚至在确定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会面的时间和地点之前，麦克法兰就要求我思考一下，我们如何才能让总统在面苏联领导人之前，更多、更好地了解苏联。在与里根打交道的日日夜夜里，总统零敲碎打式的历史知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里根几乎没有与苏联官员接触过，但还是倾向于利用笼统的表述，甚至是口号标语来做出自己的许多判断，而不是根据对苏联现实细致入微的理解。”里根自己也意识到了这种缺陷，因此急于通过专家提供的信息来弥补这种缺陷。他告诉麦克法兰：“我希望国内最顶尖的人才，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无论是学者还是外交官，能让我深入了解苏联。”

麦克法兰和马特洛克组织了一次他们所谓的“苏联101”活动，马特洛克负责监督制作了20多份报纸中的上千个单词，每一个都是关于苏联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的方方面面。新出版的报纸每天都会送给里根，他利用周末仔细阅读。麦克法兰回忆说：“他仔细阅读这些报纸，并做出批注。星期一来时的时候，总统就像得到新玩具的孩子，他会测试他的专家，希望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多的信息。”马特洛克回忆说，里根发现，一些报纸比另外一些更具影响力。他说道：“他对涉及人的内容非常感兴趣，而当你谈论统计数据的时候，他的眼神就会飘忽不定。”有一个关键问题引起了他的注意：“是什么原因让戈尔巴乔夫这样做？”麦克法兰和马特洛克都认为，里根是一名好学的学生。麦克法兰说他“非常非常敏锐”。马特洛克离开政府之后到常春藤盟校教书，他说：“在很多方面，他都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

在里根动身前往日内瓦之前的几天，中情局终于得到了与里根见面的机会。凯西提议让总统和局里的苏联问题高级分析师进行一个小时的会谈。罗伯特·盖茨率先发言，他回忆说：“我向里根讲述了戈尔巴乔夫面临的严峻的国内问题，以及他需要得到喘息的机会和西方社会的经济合作与援助。”然而，盖茨预测，戈尔巴乔夫与西方社会，尤其是与美国的交往会进展缓慢。“我当时说，我认为戈尔巴乔夫不准备付出太大代价来换取同美国的缓和余地——他很可能认为，国防方面的缓和余地早晚都会到来，尤其是战略防御计划。”戈尔巴乔夫认为，里根不会在国防方面维持既有开支。“我说在第三世界国家同样如此。当里根卸任之后，对于第三世界

国家自由斗士的支持也会下降。我的结论是：戈尔巴乔夫一定会打算通过等待里根下台来战胜他。”

盖茨认为，他或他的同事没太打动里根。他回忆说：“我感觉里根很专注，但对我和其他人所说的不太感兴趣。”但有个明显的例外，凯·奥利弗讲述了苏联制度面临的社会压力，包括酗酒、犯罪、腐败以及宗教复活。里根突然来了精神。盖茨写道：“奥利弗的汇报让他精神一振，我想这是因为她谈到了苏联人民、日常生活以及他们的生活条件。这比我们其他人所说的那些战略概念和空洞的地缘政治让总统觉得更为真实。”

盖茨还回忆了总统另外一次不寻常的反应。“我坐的位置离他最近，我讲了大约两分钟的时候，听到一阵刺耳的电子蜂鸣声。里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他伸手调整自己的助听器。几分钟之后，蜂鸣声再次响起。因为我都听到了，因此，我猜想，这声音在他耳朵里一定非常大。当时，他厌恶地把助听器从耳朵里拽出来，反复地在手掌中搓弄了几次，然后又放了回去。他看着我，面带微笑，说道：‘克格勃负责人一定在试图找到我。’”

里根听取了盖茨、马特洛克和其他人的汇报。他根据自己对人性的了解及自己对苏联人的认识，权衡着他们的汇报。他做了一个对他来说不同寻常的举动，把自己的想法写在备忘录上，在进行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谈判之前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维。这也反映了他拒绝公之于众的缜密思维。

里根写道：“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一个相当聪明的领导人，完全致力于实现苏联的传统目标。他将是一个难缠的谈判对手，一定会试图让苏联的外交和军事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同所有苏联总书记一样）依靠共产主义，并需要向他们证明自己的力量以及对于苏联传统目标的忠心。”戈尔巴乔夫寻求军备控制的目的与其说是道义上的，不如说是策略上的。“如果他真的希望达成军备控制协议，那么唯一的原因就是，他希望减少国防开支负担，因为这种开支造成苏联经济停滞不前。”

里根认为，苏联的经济困境是戈尔巴乔夫的阿喀琉斯之踵，可能会迫使他在军备上做出让步。但里根也曾同样认为，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也会如此。但是，苏联体制比他们几位存在得更长久，它也可能会比里根更长久，这无从得知。在里根看来，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不清楚。因此，里根不能一味地屏息静气等待它垮台，他也不能让军备控制这件事听天由命。然而，他依然认为，苏联经济的弱点给他提供了一次向戈尔巴乔夫施压的机会，尤其是在战略防御计划方面。里根写道：“面对高昂的军费，他不想与我们竞争。”

里根认为，从根本上来说，戈尔巴乔夫是保守派，但从政治上来说，他非常精明狡猾。“他不希望进行任何新的冒险，却顽强固守手中现有的一切。”戈尔巴乔夫希望在美国和其北约盟友之间挑拨离间。“也就是说，想让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威胁到了和平，而他看起来却是和平的维护者。”但是，他在国内还有一批支持者，他需要考虑自己的那些强硬派。“如果他必须要做出选择，那么他需要向自己的权力集团表明，他是一个强大的领导人。”

这对峰会来说意味着什么呢？里根承认，召开峰会会引发大量公共关系问题，但这并不会弱化峰会或公共关系的重要性。“在公共关系领域，我们面临两种国内因素，一种观点认为不值得与苏联达成任何协议，无论是时间、麻烦或者是起草协议所用的纸张，因此，我们必须立场坚定，拒绝任何妥协让步。另外，有些人迫切想要达成协议，为此，他们不惜做出重大妥协，因为成功的峰会需要如此。”里根认同这两方的诚意，但是，他选择了一种更为基础实用的标准。“我自己的观点是，从长远来看，任何协



议必须有利于美国和我们盟友的利益。除此之外，我们不会签署任何协议。”里根认为，峰会的成功有几种形式。“从某种形式来说，峰会可以被看作是一次成功，因为我们见面了，握手了，并且互相很友好。即使我们没有达成军备协议，峰会也可能成功，因为我为我们国家坚守住了我们认为的正确的立场。”

里根把自己想象成戈尔巴乔夫，想象成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他们的需要和先决条件是什么呢？”他问道。他从学习和汇报得到的信息中找到了答案。“我认为，他们迫切需要进行贸易和技术转让。毫无疑问，我们在那些方面占有绝对优势。”他决定利用这种优势。“对我们来说，贸易是主要的谈判砝码，我们绝不能放弃。”

人权问题可能会出现在峰会上，无论里根喜欢与否。事实上他不喜欢，尽管他从来没有公开这样讲过。“很抱歉，我们不得不公开讨论人权问题。我们反对破坏人权，我们的反对将会登上头版头条，会让我们从旁观者那里得到喝彩，却无助于人权受害者。”里根在此引用了理查德·尼克松的话，表示赞同。尼克松所指的是，当时迫于犹太领导人的压力，以达成军备协议为条件，敦促克里姆林宫允许更多的犹太人移民。尼克松拒绝了。他得到了勃列日涅夫在SALT I上的签字。只有在那个时候，他才提出了人权问题，结果导致了犹太人大量移民。

在与戈尔巴乔夫打交道这件事上，尼克松向里根提出了明确的建议。“他显得非常乐观，说我可能取得他在1972年所取得的成就，但前提是，我不能强迫戈尔巴乔夫出丑，不能公开让他下不来台。”里根将此谨记于心。“我们必须时刻牢记我们的主要目标”——裁军——“和他的需要——向克里姆林宫的苏联政府展示自己的力量。”他写道。同时，戈尔巴乔夫必须了解美国的力量以及这位美国总统的决心。“我们的另外一个目标——或许可以私下跟戈尔巴乔夫说——就是，假如无法达成可靠的、经得起检验的裁军协议，那么，别无选择，只能导致军备竞赛。倘若如此，我们绝不会让他们赢得这一竞赛。”

里根并没有奢望通过与苏联人的一次接触就解决美国的所有问题，但是他可以以此为开端。“我们认同这只是第一次会面，这次会面本身就会带来成功的氛围，我们将设立一种机制，解决未来的分歧，避免战争。或许我们可以把下次会面的时间定在1987年年初。或许我们可以在莫斯科商讨问题。戈尔巴乔夫也可以在1988年来美国。”

卡斯帕·温伯格没有被邀请前往日内瓦。即使接到邀请，他也不会去的，他依然认为举行峰会是一个糟糕的主意，不相信里根有能力抵挡住戈尔巴乔夫和其他人要求签署协议的压力。为了阻止签署此类协议，他借用他人的名义训诫总统。《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封信，这封信的

内容显然是国防部办公室泄露出来的。在这封信里，温伯格警告里根，提醒他注意在日内瓦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早些时候，温伯格曾接到过里根的指令，收集关于苏联违反现有武器条约的信息，这封信就是根据这些信息进行的预测。国防部部长汇报说，苏联人的违规行为一直不断，非常严重，不要指望能够像新条约提倡者所希望的那样消除。他说道：“苏联违反协议的做法将我们置于特别弱势和危险的境地。”在参加峰会的时候，总统必须牢记这一点，因为兜售条约的人——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内部——会密谋让他忘记这一点。“在日内瓦，你肯定会承受巨大的压力来做三件事情，这些事情将严重限制你对苏联违反条约所做出的反应：一是同意继续遵守SALT II；二是正式同意限制战略防御计划研究、开发与测试，只能在反对反弹道导弹条约最严格的理解的基础上才可以进行，尽管你可能认为稍微宽松一点儿的理解从法律上讲也是合理的。苏联人无疑会寻求得到保证，即你将受制于对战略防御计划研发和测试的严格限制，这将导致国会减少对其拨款。三是苏联人可能会提议发布联合公报或其他语言形式，来掩盖他们违反军备控制记录，提及一些所谓的‘双方都遵守条约的重要性’。”

乔治·舒尔茨读到这封信后几乎气炸了。舒尔茨和温伯格在政见上的分歧逐渐升级，导致二人互相敌视，也使得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之间几乎不可能进行合作。“舒尔茨讨厌温伯格。”罗伯特·盖茨回忆道。他又补充说，温伯格也是以牙还牙。舒尔茨怀疑温伯格坏到了极点，这封泄露出去的信件证实了他的怀疑。他后来说道：“温伯格这封信一定是提前写好的，故意泄露出去，其目的是削弱总统的影响力，破坏此次峰会。总统竟然容忍这种事情的发生，我感到很惊讶。”罗伯特·麦克法兰跟国务卿的观点是一样的。当一名记者问他，温伯格这封信是否是在企图破坏峰会的时候，麦克法兰坦率地回答道：“那当然是了。”杰克·马特洛克认为，温伯格的信代表了一种企图，企图抢总统的风头。马特洛克回忆说：“这封信就是用来泄露的，这是明目张胆地想要抢镜头。”

泄露事件所针对的目标却丝毫没有感到愤怒。“里根自己相当镇定。”马特洛克说道。总统并没有在意这次官场政治之争，就像他对待政府内的其他欺诈行为一样。在一次会议上，他轻描淡写地问手下人：“每个人都不明白卡斯帕的想法吗？”

许多观察家认为，里根没有能力让自己的下属与自己保持一致，这反映了他在领导上的失败。相反，罗伯特·盖茨却发现总统之所以允许内部争斗，是因为他别有用心。盖茨说道：“我想里根希望存在冲突。”盖茨把里根比作富兰克林·罗斯福，后者非常善于让政府内部人员互相竞争，为的是最终的决定总是取决于他。盖茨发现里根也是如此行事。他说道：“这样做让他在决策过程中具有更大的影响力。”肯·阿德尔曼是里根军备控制与裁军

署的主任。他认为，总统善于避轻就重，这让他忽略了内部争斗。阿德尔曼说道：“里根有自己的打算。”

无论原因如何，总统一开始拒绝发表声明，夸大温伯格带来的这一突发事件。但当他到达日内瓦的时候，记者开始对他狂轰滥炸。里根运用他的选择性听力来表达观点。一位记者问道，他是否遭到温伯格的破坏。“没有。”里根说道。

他会解雇温伯格吗？

“你想要一个字还是两个字的回答？”里根问道。

记者说要两个字的回答。

“不会。”里根说道。

里根在与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会晤的前一天晚上写道：“上帝啊，我希望我准备好了。”总统专注于自己的讲话内容，而他的手下则对他的形象担忧。里根先于戈尔巴乔夫到达花泉城堡，准备在戈尔巴乔夫车前迎接他。11月的早晨，寒风凛冽。此时的问题是：总统外出时是否应该穿件大衣？顾问们意见不一，年龄问题再次出现。里根必须看起来跟戈尔巴乔夫一样精神矍铄，精力充沛。但外面非常寒冷，而他毕竟已经74岁了。戈尔巴乔夫会穿大衣吗？没人知道。当戈尔巴乔夫的豪华轿车突然出现的时候，这一问题还没解决。里根让大家安静下来，没穿大衣走了出去。他把手伸向了戈尔巴乔夫。后者从车里下来，穿着大衣，围着围巾，戴着帽子。当全球媒体的照相机咔咔作响的时候，里根的团队一边为自己这边记上一分，一边祈祷总统不要患上肺炎。

峰会计划持续两天，双方主要人物连同他们的下属分别举行单独会谈。“里根总统一开始就告诉总书记说，他们俩可以马上开始谈话。”里根的翻译兼书记员在初次私下会谈中记录道，“总统暗示说，此次他来参加会议怀着深厚的感情，希望双方都可以意识到会谈的重要性，以及他们所处的特殊形势。”里根说，在更大范围的会议上，他们将讨论军备控制和其他政策问题。“但他在想，双方之间的主要目的是否应当是消除彼此间的怀疑。”没有消除彼此的怀疑而进行军备谈判是不会有结果的。他说道：“国与国之间不会因为军备而互相猜忌，而会因为彼此间的猜忌而加强军备建设。”

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他同意里根的观点，两人应当彼此了解。要想弥合两个国家之间的分歧，必须采取严肃的措施，这就需要“最高层次的政治意志”。戈尔巴乔夫承认里根提到的互不信任，但他指出，在文化和贸易的不同层次中也存在着合作。这位总书记承认，两国关系之间的“麻烦”有时确实非常严峻。“但是，他可以郑重声明，在苏联内部，人们对于美国及其人民没有敌意。苏联尊重美国和美国人民，苏联人民和苏联领导人认识到美国在世界中的作用，也希望它不会带来伤害。”

里根表示相信，认为美苏人民将会发现他们的共同之处，更好地了解彼此，发展彼此间的友谊。政府的作用就是让这一切成为现实。“制造武器装备的不是人民而是政府。”里根分享了他一生中与人交往的经验，“人民在互相交谈时不会陷入麻烦，只有在谈论对方的时候才会陷入麻烦。”

戈尔巴乔夫说，当务之急是战争的威胁，尤其是核战争。“年轻人在想，他们是否能够活下去。而曾受尽磨难的老一代人”——在抵抗德国的战争

中——“也在思考这一问题。”如果来到日内瓦的双方能够促进达成消除核战争的威胁，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壮举。失败是不可接受的。“如果不能推动达成这种协议，那将会带来巨大的失望，任何声明或媒体公告都无法证明此次会议的成果。人们将会说我们不负责。”

戈尔巴乔夫提到了一个问题，这一问题一定会在更大范围的会议上出现的。双边关系非常重要，但苏联和美国都不应当忘记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有其国家利益，而美国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其他国家同样拥有他们的国家利益。在国际环境中，我们不能宣扬以牺牲某些利益为代价来发展另外一些利益。”戈尔巴乔夫分享了一句他在日内瓦峰会宣布召开之后听到的一句话：“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应当记住，世界并不仅仅属于他们二人。”

里根说，他没有听到这种说法。他也同意超级大国不应当忘记其他国家的利益。但是，他不得不指出，苏联方面并不总是具有建设性的。

里根指了指时间，提示说他们应当参加大组讨论了，但戈尔巴乔夫不想让总统的说法得不到回答。他说道：“有人认为美国革命应当被镇压下去，法国革命和苏联革命也应当如此。”人民在进行他们自己的革命，这些革命不是无中生有。“美国不应当认为莫斯科方面无所不能，不应当认为每天早晨我醒来的时候，我都在想今天要在哪个国家发动一场革命。”

此次私下谈话原计划是15分钟。“我们的私下谈话进行了一个小时，这让媒体兴奋不已。”里根当晚说道。这也让里根的手下感到焦虑，因为他们想让总统按计划行事。一位手下问乔治·舒尔茨他是否应当中断会谈。舒尔茨回答说：“你疯了吗？这就是意义所在。他们谈的时间越长，效果越好。”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把他们的随行人员召集到一起，面对这一大群人，戈尔巴乔夫首先发表讲话，他又回到了战争与和平这一中心议题上面，说道：“如果我们两人无法解决这一问题，那就很难看到我们如何解决其他问题。”戈尔巴乔夫承认，苏联自己也有类似于美国军事工业联合体的机构。他说道：“两个国家都有与军事事务有关的人们。”但不应当允许这些人发号施令。戈尔巴乔夫说，军方过大的权力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美国和苏联学者都曾指出，军事企业中的一份工作，其成本相当于民用企业的三倍。如果这笔钱用于民用领域，那么就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

戈尔巴乔夫曾读过里根的演讲。他引用总统的话说，核战争没有赢家，因此永远不应当发动核战争，戈尔巴乔夫说他完全同意。里根曾说过，超级大国必须平等对待彼此，戈尔巴乔夫也同意。里根曾说过，两个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会带来和平，戈尔巴乔夫也同意。总书记再次强调了合作的必

要性，说道：“我们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够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因此，我们双方必须思考如何把我们的关系置于新的轨道上。”

他希望总统不要误解他讲话的意思。“如果美国认为我这样说话是在示弱，是在表明苏联比美国更感兴趣，那这必将一无所获。苏联不允许不平等对待。但假如美国方面表现出足够的诚意，那么美国将会发现，苏联人将会积极参与其中。”

里根重申了他之前提到的互相信任的主题。“如果双方想要正式减少堆积如山的武器，那么双方必须找到导致打造这些武器的不信任的根源。”他说道。美国已经表现出了自己的诚意。“二战”之后，美国当时垄断着核武器，但非常克制，限制它的使用。美国把军队从1200万人减少到不足200万人，海军裁减了1/2。然而，苏联并没有投桃报李，多次拒绝美国提出的裁减核武库的要求。并且，克里姆林宫方面增加了其武器库的数量，甚至升级了世界范围内的革命。里根说道：“美国关注着苏联的军事建设，包括核武器。美国同时还关注着苏联的扩张。苏联在古巴有一颗卫星，距离我们的海岸只有90英里。”这种扩张一直持续到现在。“现在，我们看到阿富汗、埃塞俄比亚、安哥拉和也门都出现了扩张迹象——比方说，在安哥拉有35000名古巴人。”

里根说，戈尔巴乔夫高估了军事力量对美国政策和开支的影响。“我们用于人道主义事务的预算——为老年人、残疾人以及其他社会需求的预算——要高于我们的全部军事预算。我们2/3的军事开支用于人力花费，只有一小部分用于军事装备。整个军事预算仅占我们国民生产总值极小的比例。”然而，他也同意，如果美国能少一点儿军事开支，那么它在经济上会更加富有。“继续进行军事建设对美国来说没有经济利益。”

里根说，苏联方面的军备建设在美国人当中引发了恐慌——“或许不是对于战争的恐慌，而是担心苏联可能会获得极不均衡的力量，最终它会下达最后通牒。”戈尔巴乔夫需要解决这些恐惧，正如他愿意解决苏联人对于美国的恐惧。“但光凭嘴上说说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行动。”

里根是第一个提到战略防御问题的人。戈尔巴乔夫之前说过，导弹防御盾牌将会带来局势的不稳定，带来风险，因为它会让美国得到首先对苏联发动进攻的能力。里根否认任何侵略企图。他甚至不知道导弹防御盾牌是否可行，但他希望尝试一下。“美国有一个研究计划，苏联也有类似的计划。美国有望实现这一点。”里根提议双方共同研究反导系统。“如果一方或双方研究成功这一系统，那么他们可以坐下来让每个人都得到它，这样就不会有人担心核攻击了。”这一点非常关键，即使超级大国消除它们的核武库。“某个疯子可能会得到核武器。如果我们能研制出反导盾牌并分享它，那么就没人再担心这个疯子了。”

或许里根意识到，这将是午饭前的最后一次讲话。在好莱坞时期，他就以讲话能切中要害而著称。他介绍完战略防御这一问题之后，大家休息了一段时间。但不知有意还是无意，这段休息时间达到了他的目的，没有给戈尔巴乔夫马上反驳的机会。里根并不肯定，但他可以合理地推测出，战略防御计划将是双方最难啃的一块硬骨头，因此，他希望第一轮的攻击不会引发争议。

戈尔巴乔夫并不想给里根这种优势，他看起来十分愿意占用午餐时间讲话。然而，外交礼仪占去了部分时间，双方分开了。里根很放松，也很满意自己在峰会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而戈尔巴乔夫却变得十分不耐烦。因此，在下午的会议中，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对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进行了猛烈的批驳。他说道：“20年前，不存在战略平衡问题。美国的战略运载系统是苏联的4倍，其近程导弹体系也是如此。假如苏联拥有的数量是美国的4倍，那么美国将如何行动呢？美国将不得不采取行动，就像苏联过去的做法一样，来达到对等的程度。”戈尔巴乔夫否认了里根的说法——苏联超过了美国。“所有研究这一问题的机构，包括伦敦的战略研究院（ISS），都认为现在是战略对等。部队结构有所差别，但它们支持不同的战略需求。”

戈尔巴乔夫说，苏联政府坚持要保持对等关系，但它是在低层次上寻求对等。“如果我们想要找到减少战略武器的方法，我们必须在此期间多接触。现在时机已经成熟，需要我们双方必须鼓足政治勇气，提振务实精神，来取得进展，并停止以诡计打败对方或侵扰对方的行为。即使是现在，由于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一方可以在太空技术上领先。但是我们可以应对任何挑战，尽管你们并不这样认为。我们清楚，美国可以应对任何来自我方的挑战，但我们也可以应对任何来自你方的挑战。但为什么不可以采取行动，来降低军备水平呢？”

戈尔巴乔夫警告说，战略防御计划可能引发太空军备竞赛。他说道：“这不仅仅是防御性军备竞赛，而且是利用太空武器进行的进攻性军备竞赛。太空武器更加难以核查，必将引发猜忌和不信任。科学家们说，任何防御盾牌都是可以穿透的，因此战略防御计划无法拯救我们。如此一来，为什么要打造它呢？它只在防御报复性袭击时才有用。假如苏联研发这些武器，那西方国家会做何感想呢？你们一定会非常恐惧。”戈尔巴乔夫引用卡斯帕温伯格的话说，苏联手中的导弹防御对西方国家是一种威胁。“如果我们先发制人，你们认为这对世界不利，会引发不信任。我们无法接受这种强盗逻辑，认为你们先动手就是好的，而我们先动手就是不好的。”

戈尔巴乔夫说，他知道里根非常看重战略防御思想，但他警告总统不要付

诸行动。“我们必须挫败这一计划，为了粉碎你们的盾牌，我们不惜打造军力。”戈尔巴乔夫煞费苦心地要让里根明白他的讲话。“如果美国开始着手实施战略防御计划，那么接下来就会发生如下事情：第一，进攻性武器不会减少；第二，苏联将做出回应。这一战略不会是你们计划的翻版，而是一个更为简洁、高效的计划。”戈尔巴乔夫希望总统考虑战略防御计划的其他影响。即使这一计划在某种层面上会发挥作用，它也会带来危险的后果。“它需要自动化技术，这将把决定权交给计算机。”他说道，“这可能会开启完全不受束缚的程序。您没有通盘考虑这一问题，它将会浪费资金，也会带来更多的不信任和更多的武器。”

戈尔巴乔夫提议禁止研发太空武器，以此作为削减现有进攻性武器的前提。“核查不会成为问题。”他又补充说道，“如果这一基本问题解决了的话，我们准备彻底核查针对太空武器的禁令。如果对禁令达成了一致，那么这两个国家可以就他们各自的裁军提议展开谈判。”如果没有这样的禁令，那就不可能裁减军备。

里根任由戈尔巴乔夫发表自己的观点。在与这位总书记第一天的会面中，里根就慢慢意识到，一旦戈尔巴乔夫打开了话匣子，那就不大可能让他停下来。因此他就让这话匣子敞开进行，然后再进行回应。里根一开始评论说，总书记的讲话印证了他刚才提到的缺乏信任的说法。他反对戈尔巴乔夫关于当前势力对等的说法，认为对等一说源自20世纪70年代早期签署SALT I期间。打那以后，苏联在军备建设方面远远地超过了美国。在提到军备竞赛背后的哲学问题时，里根说道：“目前，我们受困于一种共同毁灭的政策。美国的洲际弹道导弹在数量上没有苏联多，但美国拥有足够的报复性军事力量，只是这有违文明的宗旨。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战争法律是用来保护平民的，而平民却成了我们现有巨大武器库的攻击目标。”

总统承认，战略防御计划对他来说十分重要，但他认为这对于人类也十分重要。“历史告诉我们，对于每一种攻击性武器，人们都会找到防御手段。我们不清楚战略防御武器是否可行，但如果它们可行，那它们一定不能配备攻击能力。必须减少后者的攻击力，这样它就不会成为一种威胁。如果事实证明战略防御可行，那么我们愿意坐下来消除核武器以及核武器带来的战争威胁。”里根重申，战略防御计划是防御性的。他说道：“美国永远不会利用战略防御计划来提高其攻击能力，或者来首先发动攻击。战略防御计划不应当带来军备竞赛。我们双方可以决定削减和消除进攻性武器。”

午餐休息的时机选择可能是偶然的，但下午的休息时间一定可以安排的。他们举行会议的地点包括日内瓦湖边的一所小房子。里根指示说那里



的壁炉要一直生着火。随着房间内温度的升高，总统提议到外面散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戈尔巴乔夫无法拒绝，但显得很暴躁。于是，他们出去了。从早上开始，气温几乎没有升高，因此，几分钟之后两人都感到寒气逼人。里根提出到那间生火的房子，于是他们走了进去。

里根出示了一份关于他自己的裁军思路的书面材料，这份提纲被翻译成了俄语，让戈尔巴乔夫看。戈尔巴乔夫仔细审阅了这份文件。对于里根提出的把战略武器库减少一半的建议，他说可以接受，但条件是要增加一条：阻止太空军备竞赛。他指出，里根提出的限制欧洲中程导弹军力的那一部分没有把英国和法国的导弹计算进美国的总数之中。

里根坚持自己的战略防御计划，但重申美国会与苏联分享成功的技术。戈尔巴乔夫问，苏联领导人如何才能相信这样一种承诺。里根回答说，美国的实验室可以对苏联科学家开放。戈尔巴乔夫认为这还不够，再次坚持要禁止太空武器。里根指责说，戈尔巴乔夫一直在误解战略防御，因为战略防御根本不需要把太空武器涵盖进去。

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但没有任何进展。里根当晚写道：“他和我都很固执。”他们回到会议大厦，在进入大厦之前，里根邀请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访问美国。戈尔巴乔夫接受了邀请，随后邀请里根在1987年访问苏联。里根同意了。总统后来写道：“我解决了我们一直担心的一个问题——会谈必须要能够持续进行下去。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此次会面取得了成功。”

第二天，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晚宴以及一系列其他场合的会面中不断对峙。里根明白，美国的保守派——以及一些自由派——希望他谈论人权问题。于是，他采取了与先前立场不同的做法，提出了人权问题。他说，国会在批准任何军事条约之前需要在人权问题上得到满意的答复。戈尔巴乔夫表现得十分恼火，指责里根隐藏在压力集团之后，说总统可以得到他想要的一切。里根回答说他希望如此，他说道：“你完全误解了美国总统的权力。”里根重复了自己的观点——导弹防御不会让局势动荡。戈尔巴乔夫变得更加愤怒，说道：“您认为我们都是白痴吗？”

里根后来说道：“这件事的确引发了不良后果，他的确十分好斗。但我——管他呢——毫不退让。”当正式会谈结束时，形势缓和了下来。双方工作人员开始着手起草联合公报。“我和他以及翻译人员进入一个小房间，开始聊天。”里根说道。

对里根来说，这是此次峰会中最重要的一环。他回忆说：“当我们飞回美

国的时候，我感觉不错。戈尔巴乔夫很固执，认为共产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但在将近5年的总统生涯之后，我最终遇到了一位可以与之交流的苏联领导人。”

和里根一样，戈尔巴乔夫离开日内瓦时也是心情非常愉快。这位苏联领导人后来回忆了首次会谈中的紧张形势。他写道：“当我重新阅读会议记录时，对于双方采取的极端的意识形态的立场非常惊讶。回顾往事，这些记录读起来更像是‘1号共产党人’和‘1号帝国主义者’。他们都试图驳倒对手，而不像是两个超级大国的领导人之间的国事谈判。”第一次会面让他怀疑周末将会有事情发生。“我们在住地吃午饭的时候，我跟同事们谈了同里根私下谈话时对他的印象。在我看来，里根不完全是个保守派，而是一头政治‘恐龙’。”在下午的会谈中，戈尔巴乔夫对于他这位美国同行的印象没有改善。“罗纳德里根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在我看来匪夷所思。它是科幻小说吗？是企图让苏联予以合作的阴谋诡计？还是仅仅是赤裸裸的尝试，企图欺骗我们，为的是实施他们疯狂的计划——打造防御盾牌，这样就可以率先发动进攻，而不必担心遭到报复？”

休会期间，他们曾前往生着火的小屋，这在一开始看起来让人有所指望。戈尔巴乔夫说：“散步，地点的改变，木头燃烧的声音——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缓解紧张的局面。”但这种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我们一坐下来，里根马上回到了他那老一套做法。他看起来比较焦虑，认为我可能会再次提起战略防御计划——这一次是一对一——他决定先发制人，拿出了一套提议进行军备控制的清单递给我。正如我理解的，这份文件并不准备进行讨论，而是要求在‘要么接受，要么放弃’的基础上接受。”戈尔巴乔夫自然对这种压力感到不满。

唯一充满希望的时刻出现在返回会议大厦的路上。“我们再次来到外面，我突然感到很冷——这可能是与屋内温暖的炉火或者热烈的讨论形成的对比。当时，总统出人意料地邀请我访问美国。而我则投桃报李，邀请他访问莫斯科。”

然而，这一时刻是一个起点。戈尔巴乔夫回忆说：“现在在我看来，那天我们之间发生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尽管不是所有事情都很重要。我认为有两个因素发挥了作用——责任和直觉。午饭过后，我并没有这种印象，并且当晚我们还在坚持我们各自对立的立场。但是，‘人的因素’已经开始悄悄发挥作用。我们都感到我们必须保持联系，努力避免断交。我们心中都闪烁着一丝希望，认为我们依然可以达成某种协议。”

里根希望加强他认为的日内瓦会谈中的积极一面。他送给戈尔巴乔夫一封

亲笔信，表示希望可以继续交流。里根说：“我们的人民希望看到我们的领导艺术，如果我们不带头，那么没有人能做到。”

戈尔巴乔夫回信比较诚恳，却不太合作。他说，里根对于战略防御计划的坚持阻碍了两个国家达成有意义的协议。假如总统无意重新考虑此事，谈判也不会有结果。然而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完全关闭大门，他说道：“我希望您把这封信当作是我们之间另外一次‘友好谈判’。我不但会维护我们日内瓦会谈的精神，而且会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对话。”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不是唯一对日内瓦精神做出反应的人，两国重要的选民对于日内瓦精神根本不喜欢。卡斯帕·温伯格召集反对裁军的人游说里根，要求他打破尚未获得批准的SALT II的限制。温伯格和其他人同样还试图解释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希望可以允许研发反导体系。

倘若戈尔巴乔夫能在战略防御计划中表现得灵活一些，里根或许可以抵挡住这种压力，但当戈尔巴乔夫毫不退让时，里根怀疑自己被当作傻瓜耍了。1986年3月，国家安全计划小组会议听取了乔治·舒尔茨关于继续遵守SALT II的报告，也听取了卡斯帕·温伯格要求取消条约限制的报告。里根支持后者，除非苏联人同意新的军备协议。他在当天晚些时候写道：“我们可以切实裁减武器或军备竞赛，但我们不会坐视他们继续胡说八道。”在随后几周，他又听到了另外一些争论。等到了5月，他宣布支持鹰派一方的观点。里根发表了一份声明，详细列举了苏联违反SALT的情况，并总结说：“鉴于这种情况，我决定，在将来，美国关于其战略力量结构的决定必须以苏联战略力量所构成威胁的实质和强度为基础，而不是以SALT中包含的标准为基础。”

同时，他拒绝了来自民主党和其他人的呼吁，拒绝同戈尔巴乔夫一起暂停核试验。苏联人刚刚完成了一轮核试验，因此暂停活动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损失。温伯格和鹰派人物让里根相信，暂停核试验会让美国付出重大代价，即应当进行测试的武器系统的稳定性。里根同意进行试验。

然而他在这样做的时候又退缩了。里根不习惯在公共关系中失利。他在美国政坛掌握了公共关系这门艺术，但他意识到，在国际舞台的公共关系中他却输给了戈尔巴乔夫。他的一些做法——在战略防御计划中拒绝违背誓言，决定打破SALT限制，命令恢复核试验——虽然从美国安全立场考虑是合理的，却让自己看起来更像是个战争狂人，因为戈尔巴乔夫一直在宣扬和平和裁减武器。1月，这位苏联领导人提议在20世纪末彻底销毁核武器。里根喜欢这一主意，希望自己可以首先提出来。他写道：“这是场宣传造势。我们真是难以解释如何拒绝这一提议。”

但里根真的拒绝了。政府中的鹰派以及国会正在把他向相反的方向推——

这是直到最近他一直在领导他们前进的方向。而现在他希望改变方向，但他们没有这样的打算。里根不愿意否决他们。

然而，他希望另外的一次或两次峰会可能会带来他和戈尔巴乔夫所希望的裁减军备。戈尔巴乔夫看起来愿意再次会谈。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前来拜访，表达了戈尔巴乔夫对于继续日内瓦会谈的兴趣。里根也做出了积极回应。他写道：“我感觉还可以举行峰会，如果不是在6月或7月，那么可以在选举之后。”

然而，形势变得复杂起来。4月底，苏联乌克兰共和国境内的切尔诺贝利的一个核反应堆由于操作失误引发爆炸，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进入到大气中。这一事故从人类和环境角度来说都是一场灾难，几十人死亡，数千人接触到了危险的放射等级。苏联政府处理此次事故的方式也是一次失败。戈尔巴乔夫好像希望把政府所知道的关于此次事故及其对于公共健康的影响告诉苏联人民，但是苏联官僚机构根深蒂固的保密作风甚至都不想让他知道发生的一切。因此，与从他们自己政府那儿得到的信息相比，切尔诺贝利地区的居民从苏联之外的报道中知道了更多的详情，包括由美国环保局发布的一些信息。

里根提供了美国援助，并尽力不以牺牲戈尔巴乔夫为代价来获取政治支持。但美国方面的其他人充分利用这次机会，指责莫斯科方面渎职和隐藏秘密。反对军备控制的人认为，如果苏联在这样一次紧急事件中抵制自己的人民，那么他们一定会努力反对通过军备控制协议建立的任何检查制度。

戈尔巴乔夫对于自己政府内部的掩盖行为感到尴尬，对西方世界的反应感到愤怒。他抓住一些外来报道中的不实之处，指责西方媒体在构建“如山的谎言”，指责美国发动“无限制的反苏行动”。多年以后，戈尔巴乔夫依然非常恼火。“切尔诺贝利的惨剧被当作铁证，证明我们无意真正实行‘对外开放’，证明我们阴险狡诈，不值得信任。”

戈尔巴乔夫把对于切尔诺贝利的反应当作美国不讲信用的证据，尤其是里根对于SALT的决定，对于战略防御计划、对于洲际导弹以及潘兴导弹的持续支持。他写道：“美国人继续公开宣称他们准备进行严肃的军备控制谈判，但事实上他们再次破坏谈判，并采取新的武器研发计划，让军备竞赛不断升级。”他感到很疑惑。“尽管我很努力，但我就是无法理解这种行为。”他一直在想日内瓦精神到底出了什么意外。“里根总统或许被美国强大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施加了影响？”还是总统担心政治影响？无论是什么原因，其结果对于未来的发展都是不利的。“我最终认定，这是他们的又

一次企图，企图激怒我们，并让我们偏离我们自1985年4月一直在追寻的路线，回到公开对峙的状态。西方世界中的右翼分子对于全新的、富有活力和更加民主的苏联心生恐惧，因为它在向其他国家提供和平与合作。这样一种结果不符合他们当时的战略。”

1986年1月，当“挑战者”号宇宙飞船从位于佛罗里达的肯尼迪航空中心升空的时候，美国人都在观看着。自从太空时代的大幕开启以来，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发射吸引了大量的观众，现场有上万名，而在电视机前有数百万之众。观众们百看不厌，看着巨大的火箭把勇敢的航天员和最近出现的女航天员送进轨道。每一次发射都让美国人的自豪感爆棚。

当天，发射的第一分钟一切正常。发射装置迅速提速升高，摄像机努力跟拍着它渐渐远去的身影。发动机的引擎声渐渐远去，现场观众又恢复了他们的听力，电视机前的观众开始忙碌自己的日常事务。但突然之间，大家的注意力又回来了。由于操作故障，此次发射行动变成了一场灾难。关键部位的一个密封垫脱落，导致从火箭的一个引擎中发射出来的热气脱离了正常排放管道。这引发了一系列事故，导致飞船解体，产生浓烟和蒸汽。7名宇航员全部遇难。

里根当时正在椭圆形办公室，准备向电视节目主持人简要阐述他的国情咨文，该报告计划在当晚播出。最近刚任命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和乔治·布什走了进来，向他汇报了刚刚发生的一切。他们走进书房，观看了电视回放。里根后来说道：“那真是一次让人非常难过的经历。”

里根前去与主持人们会面。他们没有谈论国情咨文，而是讨论了“挑战者”号悲剧。里根说道：“太可怕了，我无时无刻不在思考飞船上那些人的家人所做出的牺牲。我敢肯定，全美国都非常悲痛。”

一位记者问道，总统在得知美国在太空计划中死亡人数少于苏联的时候，是否感到欣慰。

里根回答说：“对此我们非常自豪，但这丝毫不能减轻我们的悲痛。”

一名机组人员是位教师，名字叫赫丽斯塔·麦考利夫。她是为了此次任务而被选拔出来，并进行了特殊培训。她的参与促使美国航空航天局向公立学校提供关于发射行动的特别报道。一位记者问里根，他要对那些观看发射的孩子们讲些什么。

里根说道：“开拓者们总是把生命贡献给了最前线。问题是，对我们所有目睹悲剧发生的人来说，这更让人感到震惊，而不仅仅是道听途说几英里之外发生的事故。但是，我们必须阐明”——对孩子们——“生活还要继续。”

里根想到了麦考利夫的家人，说道：“我无法让自己不去想她的丈夫和孩子。其他人的家人知道他们的亲人从事的是危险职业。”但她不同，她的家人也不同。“你对他们充满了同情。”

里根决定推迟国情咨文演讲。取而代之的是，他将向美国人民讲一下全国都看到并为之感到痛苦的这次可怕事故。他说道：“今天是我们应当悼念和记住的一天。我和南希对‘挑战者’号飞船的悲剧痛彻心扉。我们知道，我们的这种痛苦与我们国家所有人的痛苦是一样的。这的确是我们国家的损失。”19年前，国家损失了一批宇航员。“但我们从没有在飞行中损失过一名宇航员，从没发生过今天这样的悲剧。”

里根朗读了遇难者名单，并向他们的家人表示哀悼。“我们十分惦念你们，你们的亲人勇敢无畏，他们拥有特别的荣誉与精神——‘给我一次挑战的机会，我将欢欣鼓舞地去迎接它’——他们渴望探索宇宙，发现宇宙的秘密。他们希望为国效力，他们做到了。他们为我们所有人贡献了一切。”

里根提到了学校的孩子们，说道：“我知道这很难理解，但有时候像这样痛苦的事情的确会发生。”他又对孩子、他们的家长和其他听众补充说道：“这就是探索与发现过程中所要经历的。这就是勇于冒险，拓展人类视野的过程中所要经历的。未来不属于懦夫们，它属于勇敢者。‘挑战者’号的全体宇航员把我们带往未来，我们将继续追随他们。”

里根差点儿因为猛烈抨击苏联而破坏当晚的情绪。他说道：“我们没有掩盖我们的太空计划，我们不会遮遮掩掩，隐藏秘密。”美国与众不同。“我们都是光明正大，公开在做。这就是自由之所在，我们一刻也不会改变。”

里根简短的演讲接近尾声。观众中的一些人注意到，他提到了《高高飞翔》这首广受飞行员们喜欢的诗。但另外一些人完全被演讲的结尾所吸引：“‘挑战者’号宇宙飞船的宇航员以他们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感到自豪。我们永远缅怀他们，我们不会忘记今晨最后看到他们的情景。他们整装待发，向我们挥手致意，然后‘脱离了大地执拗的束缚’飞上天际，‘亲近上帝慈爱的面容’。”

演讲稿撰写人佩姬·努南是里根演讲的主要撰稿人。她从撰稿人的角度饶有兴致地观看了里根的演讲。她回忆道：“总统演讲结束时，他看起来有些茫然。我明白，他不喜欢这份稿子。”



里根认为这次演讲不算成功。他对努南说：“我刚才觉得自己失败了。”但他指责的是自己。他说：“我想刚才我的表现很糟糕，没有发挥出水平。”

里根的观众并不这样看。或许悲伤和礼节让批评者的声音平静下来，但听众的反应非常积极，变成一边倒的趋势。不久之后，里根这篇关于“挑战者”号的悼词被人们看作他或其他任何总统曾经做过的最好的演讲之一。

作为总统，里根成功的秘密之一，是他有能力专注于最重要的事情，而把其他次要的事情交给下属去处理。1986年的时候，他的外交事务议程就专注于一件事：与苏联进行军备控制谈判。他希望达成中程导弹协议，最好是无选择裁军，并至少开启远程导弹和轰炸机裁军谈判。里根一直坚持在达成这些协议的同时不会限制战略防御计划。

然而，里根发现，他必须处理与军备控制没有丝毫关系的外交政策问题。10多年以来，华盛顿方面一直关注着利比亚反复无常的领导人穆阿迈尔·卡扎菲，对他的不信任日益加深。1974年，利比亚与莫斯科达成一笔武器交易。在像里根这样的许多人眼里，利比亚成了苏联的代理人。这些人觉得克里姆林宫方面在不结盟世界中胡作非为。卡扎菲的狡辩以及对于中东和其他地区恐怖行动的后勤支援使得他变得令人无法忍受。

里根担任总统不久就决定要教训一下卡扎菲。在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卡扎菲卷入芝加哥一桩谋杀案的情况下，里根当即关闭了利比亚在华盛顿的大使馆。在卡扎菲对锡德拉湾宣布主权之后，总统下令美国第六舰队进入该海域。里根在日记中写道：“他是个疯子，一直在侵扰驱离我们在公海海域的飞机。现在，是时候向那一地区的其他国家——埃及、摩洛哥等国——表明要在当地进行差别化管理。”

卡扎菲挑战美国人在锡德拉湾的存在，派遣战斗机对抗这支特遣部队。“尼米兹”号航空母舰命令其F-14战斗机紧急起飞，拦截利比亚人。当后者向美国战斗机开火时，美国人进行还击，击落了两架利比亚飞机。

这一事件引起了美国媒体的议论，主要是因为里根的助手们没有立即向他汇报所发生的一切。总统对这一批评置之不理。他对记者们说：“许多人都在议论，媒体也非常关心，因为他们在凌晨4点30分把我叫醒告诉我这件事的时候，已经过去了6个小时。对此有一个非常好的理由。为什么？假如我们的飞机被击落，他们一定会马上叫醒我。现在是别人的飞机被击落，为什么要叫醒我？”

卡扎菲气势汹汹地进行恐吓，美国情报部门认为他们有可能要威胁刺杀里根。里根说：“很奇怪，竟然会有针对个人的‘行刺契约’。”1981年10月，坚决反对卡扎菲的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遇刺身亡。这更增加了这种威胁的可信度。里根根据情报部门的报告私下里说，卡扎菲在得到消息之前就开始准备庆祝萨达特的死亡了。“换句话说，他知道要发生的一切。”

针对里根的威胁好像变得更加明确了。11月，特工处听到风声，说有人可能要攻击华盛顿的全国新闻俱乐部。里根要在那里发表演讲，他穿着防弹背心讲话，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感恩节期间有报告说，一队暗杀分子从加拿大进入了美国境内。特工处十分警惕，取消了原计划让里根出现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安排。

总统主持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讨论对卡扎菲进行报复。威廉·凯西提议公布利比亚参与恐怖行动的证据，从1977年卡扎菲密谋暗杀美国驻埃及大使开始。

里根表示怀疑，说美国媒体不会相信政府，无论政府提供多少证据。

凯西依然强推这一问题，建议公开一份利比亚恐怖训练营的地图，标题是“恐怖是利比亚的第二大产业”（排在石油产业之后）。

里根依然有些犹豫。将近2000名美国人居住在利比亚，其中大部分人与石油产业有关。里根像以往一样，担心更多的美国人被当作人质，担心任何强有力的行动可能促使卡扎菲抓捕美国人。

亚历山大·黑格当时还是国务卿，他对发生人质事件的可能性持怀疑态度，说道：“人质形势会让在利比亚的西方人惊恐不安。”利比亚需要这些西方人，他们可以保证石油生产。黑格建议进行经济制裁，包括禁止从利比亚进口石油，禁止向利比亚出口商品，以及冻结利比亚在美国的资产。

唐纳德·里甘说，冻结利比亚的资产可能会破坏美国与中东其他国家的关系。他说：“比方说，沙特可能会对美国对利比亚的制裁产生不当的想法。”里甘补充说，如果华盛顿采取的措施危及了大石油公司的底线，在利比亚运作的石油巨头们不会坐视不理。

黑格回答说，沙特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也要求对卡扎菲采取强硬措施，并且准备增加他们的石油产量，弥补美国由于对利比亚采取的石油禁令而蒙受的损失。

珍妮·柯克帕特里克汇报说，针对卡扎菲采取国际行动是不可能的，比如非洲统一组织。她说道：“卡扎菲曾威胁过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没人敢反对他。

里根突然插嘴说道：“美国敢反对他。”

但是，时机还不成熟。此次会议无果而终，里根依然为美国人担心，依然谴责媒体，因为他们不相信政府公布的有关利比亚的情报。“媒体开始指责说我们在虚构卡扎菲的威胁，因为我们没有告诉他们我们的情报来

源。”他抱怨说，“我认为，他们完全不负责，也不会感到满足（在当时），除非有人被‘职业杀手’干掉。”

然而，特工处对于这种威胁十分认真。当里根和南希在12月初飞往戴维营的时候，特工处改变了他们直升机的航线，因为情报显示，利比亚的同情者可能已经得到了可以击落飞机的红外线跟踪导弹。

这些情报没有一份得到印证，这让总统及其助手们猜测卡扎菲是否只是在进行虚假的情报战。然而，他们继续监视卡扎菲的行为，并对他的危害予以还击。当卡扎菲为乍得叛乱分子提供支持、法国政府派军打击叛乱分子的时候，里根命令美军战斗机和空中预警机监视利比亚飞机的动向。当有报告说卡扎菲准备动用飞机支持苏丹政变时，里根派遣空中预警机帮助埃及空军击落利比亚战斗机。

1985年12月，美国与利比亚的紧张关系达到了新的高度。当时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向罗马和维也纳机场开火，卡扎菲赞扬了此次袭击。袭击导致19人死亡，100多人受伤，这是对3年前发生在黎巴嫩难民营屠杀巴勒斯坦人行为的报复。美国情报显示卡扎菲的支持超出了带头喝彩的范畴，而是提供资助，或者进行恐怖分子培训。

里根认为自己对卡扎菲已经忍无可忍。在与自己的国家安全团队举行了一次长时间的会议之后，他签署命令，让利比亚的美国人撤离这个国家。里根冻结了利比亚人在美国的资产，下令第六舰队增加在利比亚海岸线的出现频率。里根希望卡扎菲能够明白其中的含义，但卡扎菲准备采取更多的行动。里根说：“如果卡扎菲先生决定不再采取恐怖行动——那当然很好，我们这种暗示性质的威胁就算成功了。如果适得其反，他将此视作软弱的表现，并继续采取恐怖行动，那么我们就有了攻击目标，并且会立即予以打击。”

卡扎菲决定考验一下里根的决心。利比亚的炮兵连向美国在锡德拉湾的美军战斗机发射地对空导弹，他们装备了导弹的巡逻艇居心叵测地靠近美军军舰。

里根像承诺的那样予以打击。在总统授权下，美国战斗机向炮兵连发射火箭，并击沉了巡逻艇。里根在给众议院议长以及参议院临时议长的通报信中写道：“美国军队将继续他们当前的行动。我们不会被利比亚的攻击和威胁所吓住。我们会按照国际法，在公海海域和上空行使我们的权利。如果利比亚不停止攻击，我们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行使我们的自卫权，保护我们的军队。”

中情局向总统报告说，卡扎菲准备采取其他办法进行还击。“我们获悉，卡扎菲已经命令他在欧洲的几个机构组织策划针对美国的恐怖行动。”罗伯特·盖茨回忆说，“利比亚人通知驻的黎波里的几位大使说，他们与美国开始进入‘战争状态’。我们立即开始搜集关于利比亚准备攻击我们的计划。”卡扎菲的特工在4月初成功得手，在美国军人经常光顾的西柏林一处夜总会引爆了炸弹。一名美国士兵死亡，还有一名土耳其妇女。上百人受伤，其中包括数十位美国人。

里根果断采取行动。他命令对卡扎菲的总部和其他目标进行空中打击，数十架来自美国航母和英国一处基地的飞机轰炸了的黎波里和班加西的目标。飞机离开利比亚领空后不久，里根向美国人民和世界发表讲话，解释说这些打击行动是对柏林爆炸事件的报复，并展示了卡扎菲罪行的证据。里根说道：“3月25日，也就是在袭击前的一周多，从的黎波里方面传出命令，要求利比亚在东柏林的机构组织发动针对美国人的恐怖袭击，要求造成最大化的、无差别的杀伤。随后，利比亚特工安放了炸弹。4月4日，人民机构组织通知的黎波里说，袭击将在第二天上午进行。第二天，他们向的黎波里报告此次行动取得了巨大成功。”卡扎菲的双手沾满了受害者的鲜血。里根说：“我们获得的是第一手证据，这些证据确凿无疑，无可辩驳。”

里根继续说，针对利比亚的袭击是反对恐怖主义战争的一部分。“我曾警告说，世上不会有恐怖分子的藏身之地，也不会有他们训练和练习杀人技巧的场所。我说到做到。我曾说过，如果有可能，我们将与其他国家一起行动；如果有必要，我们将单独行动，以确保世上没有恐怖分子的天堂。今晚我们做到了。”

里根说，反恐战争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完成。“我并没有幻想今晚的行动可以终结卡扎菲的恐怖统治。”但他希望这次行动可以让卡扎菲停止对无辜百姓犯下新的罪行。无论如何，针对利比亚的袭击绝不会是美国反恐的最后一次行动。“我们将坚持下去。”

里根之所以能从吉米·卡特手中抢得白宫，主要是因为他猛烈攻击这位民主党总统在面对激进的叛乱活动时，放弃了温和的保守主义社会制度。保守派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指出，里根采取了相反的立场，支持阿富汗、尼加拉瓜、安哥拉和柬埔寨保守派的叛乱活动，反对激进政权。这一政策广受赞扬，被冠以“里根主义”的美名。里根支持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对抗左翼政府，支持萨尔瓦多政府对抗左翼分子的暴乱。

里根也支持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当时，世界上许多国家试图孤立南非，对其进行经济和外交制裁，里根却站在博塔政府一边。里根和他的政府认为，与南非的“建设性交往”将会促进民主改革，同时使这个国家免受非洲国民大会的控制。德斯蒙德·图图主教是一位南非黑人牧师，曾因反对种族隔离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他谴责里根的政策是“不道德的、邪恶的、完全反基督教的”。最终，国会批准对南非实施制裁。当里根否决这一议案的时候，国会推翻了总统的否决。

起初，里根对待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的政策显示出了类似他对待右翼独裁主义的容忍。里根第一次与马科斯碰面是在1969年，当时他在理查德·尼克松当政时前往菲律宾访问。马科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妻子伊梅尔达美艳动人，让里根着迷。20世纪70年代，当马科斯对左翼骚乱分子采取严厉措施的时候，里根表示支持。他在1982年邀请菲律宾总统和伊梅尔达来白宫参加国宴。里根在祝酒词中写道：“这是一次怀旧的聚会。我和南希经常想起1969年的马尼拉之行。当时，我们第一次体会到了今晚作为我们客人的菲律宾人无与伦比的热情好客。”里根说，这期间许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但是，有一件事情一直没有改变——那就是菲律宾和美国之间的真挚友谊。”美国与菲律宾在国防、经济和其他领域建立了联系。“马科斯总统，我向您保证，美国将尽其所能加强这种联系。”

里根的支持并没有阻止马科斯以及日益恶名昭彰的伊梅尔达遭到的反对有所减少。1983年，反对派领导人贝尼尼奥·阿基诺遇刺身亡，随之爆发了一场危机，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和暗杀事件，要求马科斯下台的呼声越来越高。里根站在菲律宾总统一边，他在1984年与沃特·蒙代尔的一场辩论中说道：“我知道，从当前民主权利的立场来看，菲律宾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来说看起来不妙。从菲律宾独立初期，他们一直就是我们的朋友。我想我们过去已经受够了——有些人在革命的伪装下，让我们以为他们会更好一些，于是对他们放任自流，结果却是彻头彻尾的独裁集权统

治。我认为我们与菲律宾政府站在一起可能会更好一些，尽力维持我们的友谊，帮助他们纠正我们发现的错误。”

乔治·舒尔茨对于里根把菲律宾反对派的活动归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做法感到有些尴尬。国务院发布了一份矫正报告，解释说美国发现菲律宾政府内部合法的民主团体正在谋求变革。而对于里根，舒尔茨认为无条件支持马科斯会打击民主反对派，会增加而不是减少激进派的诉求，会危及美国在菲律宾的利益，包括使用克拉克机场和苏比克湾军事基地的权利。舒尔茨回忆说：“我同总统讨论了所有这些问题，他同意我们的判断以及我们的行动方针，但同时跟我们所有人一样希望马科斯可以改变方式，同我们一起进行改革。”然而，国务卿感觉到里根不愿意向马科斯施压。“我可以看出，罗纳德里根希望能够支持这个人，因为多年以来他一直是美国的老朋友。他领导的国家向美国提供了重要的军事基地。”

里根听取了舒尔茨的报告，但在菲律宾这件事上，他并不信任国务院。他认为有关马科斯健康恶化的传闻出于政治目的被夸张了。里根在1985年10月的日记中写道：“我怀疑国务院内部的一部分人反对马科斯，一直在报告中弄虚作假。”为了了解事情的真相，他派遣内华达州参议员保罗·拉克索尔特作为总统的私人调查员前往菲律宾。此次出行本来是秘密进行的，为的是不让马科斯感到尴尬。拉克索尔特回忆说：“这本来是一次绝对保密的旅行。”但消息泄露了出去。拉克索尔特说：“因此，当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这已经不是秘密了。等待我们的是成群的菲律宾记者。他们是一伙令人望而生畏的家伙……很显然，他们不喜欢马科斯，他们怀疑我作为一个局外人前往那里做什么。”

拉克索尔特发现马科斯很茫然。他后来说：“尽管马科斯精明如猴，但他不清楚发生的一切。我告诉了他整个令人遗憾的事件的原委，告诉他我们情报部门得到的消息。”马科斯不喜欢他听到的一切，尤其是当这些消息是来自美国总统特使那里的时候。拉克索尔特回忆说：“他喜欢里根，那是长期的友谊。”然而，在拉克索尔特看来，马科斯比传闻中行将就木的那个马科斯健康得多。他随后把这一健康评估结果告诉了里根，里根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

在马尼拉期间，拉克索尔特向马科斯建议先发制人对付反对派。菲律宾法律允许总统组织临时选举。马科斯之前曾考虑过这样做，但后来就把这一想法搁置到了一边。拉克索尔特重新提了出来，他后来回忆说：“马科斯一直在跟我讲他在政治上是多么强大，于是我建议说或许他应当重新考虑进行临时选举。如果他像他跟我说的那样强大的话，那就进行选举。这将会在华盛顿方面省去你很多麻烦。”

马科斯接受了这一建议。在同美国记者戴维·布林克利进行的电视采访中，

菲律宾总统宣布他将在1986年年初举行临时选举，比原计划提前了一年。

里根不敢肯定这是一个好主意，他私下里说：“这是敏感时期的昏着。”但在公开场合，他强调美国支持民主进程。他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此次选举对于菲律宾未来的民主意义重大，它是美国在太平洋地区重要的朋友和盟国。”

里根等待着选举结果，希望得到最令人满意的消息。菲律宾人民也是如此，他们中的许多人担心马科斯会操纵选举结果。里根也被问到这种可能性，“总统先生，如果马科斯通过欺骗手段赢得了选举，美国会采取行动吗？”一位记者想知道答案。

里根拒绝做出承诺，他说：“这取决于菲律宾人民，要由他们来决定他们的选举公平与否。”

里根希望马科斯能够公平获胜，或者至少在表面上说得过去。因为令人信服的胜利会让他继续执政，并平息来自美国左翼的批评。但选举日的报道显示，投票中存在广泛的舞弊行为。媒体记者寻求里根的反应。一位记者说：“您主张进行自由公平的选举，那么对于来自我们观察员报告的舞弊行为，美国将作何反应呢？在此之后，马科斯还能再次提出合法性的要求吗？”

里根不想仓促地下结论，他说道：“我将一直等下去，直到有机会同我们在那里的观察员讨论过之后再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样的机会。至于是否现在有足够的证据让你可以真的横加指责，我不清楚。我敢肯定，即使在我们自己国家的选举中，也有证据表明在某些地方和地区存在舞弊行为。我不清楚此次那里选举的舞弊程度——但同时，我们是否有证据证明舞弊行为完全是单方面的？还是说这是当地选举中的某种策略？”

第二天，里根同参议员理查德·卢格和众议员杰克·默撒见面。他们曾前往菲律宾观察选举情况，说舞弊行为比比皆是。竞争对手科拉松·阿基诺——也就是遇刺身亡的贝尼尼奥·阿基诺的夫人——获胜优势明显，尽管马科斯拒不承认。

然而，最终结果还没有公布，因此里根在公开场合保持中立。他跟记者们说：“决定菲律宾政府应当是菲律宾人民自己的事情，而不是美国。”

这并不完全正确。选举结果让里根认为马科斯不再是一笔财富，而是成了一个不利因素。他认为马科斯必须离任，但又不想被人认为自己弃马科斯



于不顾。他倾向于使用自由裁量权。当菲律宾国民议会无视来自中立观察家的大量证据，宣布马科斯获胜时，白宫方面提出抗议。在一份书面声明中，白宫方面称：“尽管我们的观察团还没有完成其工作，但事实已经很明显，此次选举遭到了主要来自执政党的广泛舞弊行为和暴力行为的破坏。破坏行为如此过分，乃至其可信度不仅在菲律宾国内遭到质疑，在美国国内也是如此。”

里根派自己的中东问题调停专家菲利普·哈比卜前往马尼拉。哈比卜很快就得出结论，里根必须采取更为鲜明的态度。哈比卜给乔治·舒尔茨打电话说：“这儿的人一致认为马科斯完蛋了，但让他滚蛋的必须是美国。”哈比卜说，菲律宾总统的一位助手曾给他一份名单，名单上是一直以来支持马科斯的四位政要。“我前去拜访他们，他们四位都跟我说：‘马科斯必须离任，你们美国人必须出手让他离开。你们是教父，应当由你们来做。’”哈比卜说，马尼拉大主教辛海棉敦促他说服里根采取行动：“告诉总统拿起电话让马科斯离开。”

里根依然希望不到万不得已不这样做，但是菲律宾人民迫使他采取行动。数万人涌上马尼拉街头，抗议选举舞弊，要求科拉松·阿基诺就职。

马科斯已经注意到了里根立场的转变。在抗议的声浪中，他肆意指责美国人背叛了自己。保罗·拉克索尔特回忆说：“他惊魂未定地打来电话，说他认为温伯格已经出动海军，他们正在沿河追赶自己。我想了一下，天呐，看在上帝的份儿上，这是在马尼拉进行炮舰外交。这有些古怪，因此我给温伯格打电话，温伯格认为我疯了，说道：‘从没有过的事。’于是，我给马科斯打电话，安慰他说海军没有在跟踪他。”

马科斯要求直接与里根通话。拉克索尔特回忆说：“总统当然不会与他通话。”马科斯很不高兴，只能接受与拉克索尔特通话。他征求对方的建议，问道：“参议员，您会怎么做？”拉克索尔特在里根的授意下，告诉他应当交出权力，并离开菲律宾。拉克索尔特回忆说：“马科斯沉默了很长时间，他非常伤感。”马科斯试图讨价还价，他提到要与科拉松·阿基诺妥协。拉克索尔特更加坚定地重复了自己的话。他说：“我当时说得非常直接。”马科斯不知道如何回答。拉克索尔特回忆道：“我们之间出现了长时间的停顿。我以为他不在电话另一边了。”当马科斯继续讨价还价的时候，拉克索尔特尽可能简明扼要地处理这件事，说道：“总统先生，你要快刀斩乱麻。”

马科斯的确挥了刀，可惜刀并不锋利。他逃离了马尼拉，但试图待在菲律宾，迫使里根明白，这种权宜之计并不足以解决问题。只要他待在这个国家里，美国就不会提供保护，让他免受愤怒的菲律宾人民的攻击。马科斯和伊梅尔达接受了美国空军提供的帮助，飞往夏威夷。

里根对马科斯夫妇感到非常遗憾，南希也是如此。几个星期后，里根在日记中写道：“我打电话给马科斯总统和伊梅尔达，南希同她交谈了一个小时。他们并没有放弃重返菲律宾的希望，夺回他现在依然坚称属于自己的政权。”

马科斯夫妇在夏威夷定居下来。马科斯的健康状况开始下滑，限制了他的行动。但伊梅尔达重复着自己社交中心的角色，哪怕是在更小的舞台上。她经常光顾的瓦胡岛一家饭店的员工说：“她真是个人物。她会订一张4个人的桌子，但来的时候会带着9个人或12个人，还有更多的人会整晚不断地加入到这群人当中。”一家高档女装店店员说：“她总是会得到非常特殊的待遇。”

与作为财政部部长相比，作为办公厅主任的唐纳德·里甘对里根的了解更为详细。他发现总统喜欢有序且具有可预知性的生活。里甘写道：“他每天的工作计划就是他生活的核心。他在每件事情完成之后，都会用铅笔做出标记，然后准备下一件事情。这种一丝不苟的做事方式让他的生活极具规律性，并且可以量化他所完成的工作。这很显然，让他非常满意。看起来他认为自己的工作计划解放了自己：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人相比，他更能准确地知道一整天应当做什么，每天如此。”

里根认为其他人跟自己一样，都很重视可预知性。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他才会打断白宫工作人员的日常安排。在这些情况下，也主要是送上一支生日气球或有趣的礼物。他常常不知道接收者是谁，但他喜欢这种时刻，就像他当年作为好莱坞明星一样，喜欢在公开旅行中当名人的感觉。

里根几乎从没有取消过会议，因为他知道，会议准备工作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并且取消会议会让人们感到失望。里甘说道：“他看起来真心不愿给别人造成尴尬、失望和不便。如果他答应要做某件事，他一定会去做。”

与许多总统不同，里根喜欢召开内阁会议。里甘说道：“他喜欢内阁会议在讨论政策时那种平等交换意见的氛围，届时，他便有机会就他感兴趣的宽泛的一般性原则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总统尤其喜欢有女性内阁成员参加的会议。“驻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或者交通部部长伊丽莎白·多尔出席内阁会议时总会让总统情绪高涨，表现得更幽默、更健谈。”

里根的说服风格很温柔，几乎是被动的，尤其对那些立法者，他喜欢以理服人。里甘说：“总统从没有恃强凌弱、恐吓要挟、花言巧语，他总是这样说：让我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支持这一法案，我希望我们可以期望得到您的投票。他会聆听对方的回答，并一丝不苟地做着笔记。如果参议员或众议员对法案的某一条款提出异议，里根就会向他保证自己会调查这件事，并且每次都说到做到——通常他会把笔记递给我，要求我负责到底。”总统并不能赢得每一个摇摆不定的人，但他得到了更多。

在里甘的经历中，只有蒂普·奥尼尔一直在抵制里根的魅力。里甘认为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它表明公众对总统和这位众议院议长之间关系的认识与事实不符。“尽管他们在每次会议之后的照片表明这两人之间存在着某种潜在的爱尔兰老乡的情分，事实上他们彼此却是铁锤和铁砧的关系。”里甘说道，“奥尼尔仿佛决意要与他作对，不喜欢他，也不同意他的观点。其

结果就是火星四溅。”里根感到很不解，他对里甘说：“我真搞不清楚那个家伙怎么回事，我仿佛就是无法打动他。”

里甘还记得某天下午在白宫举行的一次会议，当时里根邀请国会领导人来讨论预算问题。里根不大喝酒，那一次他却慢悠悠地在品着一杯橙花鸡尾酒，客人们则在大口喝着。里甘回忆说：“当时气氛很轻松，就像原来打算的那样，大家在友好的气氛中讨论分歧。”大家提出了许多不同的建议，讨论可以削减哪些项目。最后，一位民主党人在宽松的会议气氛中开玩笑地建议说，只要总统同意提高税赋，那么许多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里根也同样幽默地回答说：“别扯了，伙计。你知道我不会提高税赋的。”

奥尼尔的反应破坏了这种轻松的气氛。里甘回忆说：“他面色涨红，用自己肥厚的手掌猛敲桌子，震得杯子乱颤。‘那好吧，该死的！’他嚷道，‘如果就这样定了，那我也就没什么好谈的了！’”

房间内的人被惊呆了，大家陷入了沉默。没人能想到美国总统会在自己的办公室被人猛烈攻击。里根自己也吃了一惊。里甘回忆说：“里根满脸通红——比以往更红，因为哪怕是一丁点儿的酒精就会让他原本就红润的脸色变得更红。总统的嘴唇噘了起来，明显是生气了。但他控制住了自己，说道：‘该死的，蒂普。我确实无法这样做。’”

然而，这两个爱尔兰人需要彼此的支持，尤其是在涉及第二任期内里根国内政策的核心问题上。里甘已经从财政部擢升到白宫，主要是为了支持税收改革。作为总统的得力助手，他进一步推行这一改革。里甘解释说，降低税率和填补漏洞的做法对经济有利，对国家有利，在政治上对总统有利。降息带来的刺激和重新调整逃税漏税，把人才和能源用于产能型企业的做法有利于经济发展；同样收入缴纳同等税赋的更加公平的原则有利于国家发展；代表美国人民利益所取得的巨大胜利有利于总统的政治声望。

里根的一些顾问们表示怀疑。保罗·拉克索尔特说，任何超出调整范围的做法都将招致灾难。“当你公开所有税法改革的时候，来自全国，以及可能来自全世界的说客都会从地缝里冒出来。”拉克索尔特说道。

但里根继续向前推进改革。他呼吁美国人民在里甘的团队提出的议案基础上，理解他对于税改的构想。他在提到自己第一任期削减赋税的做法时说道：“我们已经共同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我们现在应当迈出另外一步。为了达到公平、简化和发展的目的，我们必须大力变革税收制度，因为它依然危害到我们的收入，尤其是涉及国税局私人财产那部分的收入；我们必须大力改革这一制度，因为它危害到人们的收入，这与他们缴纳的税赋大

不相同；我们必须大力改革这一制度，因为它依然在使某些人在投资时只是为了避免税收陷阱，而不是为了获得更多的收益。”总统概述了他的改革计划。现有制度下的14个纳税等级的税率为11%~50%。改革之后将变成3个纳税等级，税率分别是15%、25%和35%。低收入者可以通过增加标准扣除额和个人免税额而受益。

税改的指导原则是简化，主要追求的是公平。税改将大力削减特殊漏洞、减除额和免于纳税等情况。这份新计划具有革命性，但理由充分。里根面带微笑地说道：“比较现有制度和我们提案之间的差距就好比是比较T型车和航天飞机之间的差距。我清楚这一点——因为这两个东西我都见过。”税改任务并不简单，因为维护现状的人一定不会愿意放弃他们的特权。但里根相信美国人民，也相信美国人民坚持认为政府是为他们服务的，而不是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他说：“美国梦属于每一个人，它存在于数百万人的心中，可以以数百万种不同的方式实现。有你们站在我们身边，我们将不会停止前进和改革的步伐，直到这一梦想对每个美国人来说都切实可行。”

里根为自己的税改四处奔走。他认为，通过向人们解释，他可以迫使院外活动集团的成员和利益集团让步，就像他在第一任期内所做的那样。在弗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里根引用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反税收理念说道：“此刻，反对不公平税收的思想就像黑夜里的火警警铃。主要的反对者帕特里克·亨利赋予了我们独立运动演变成一场革命的理由——他赋予了这次运动以激情。”里根又引用一位同意征收联邦所得税、反对宪法第十六条修正案的参议员的话说道：“如果我们通过这一修正案，我们很有可能就会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届时政府就会认为它可以征收多达10%的个人收入。”里根的听众开始怀念过去的美好时光。里根说，税法已经变得错综复杂，令人感到无望。“这一制度极度复杂，完全无法解释，甚至连税法专家自己也常常无法确定这些规定到底是什么东西——据说甚至连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都承认说自己无法彻底了解。”里根面带微笑补充道：“大家知道，据说他的头发不是现在看起来那个样子的，直到他填写了自己的纳税表格之后。”

里根飞往西部，到达了威斯康星州。在蓝领小镇奥什科什，他针对税改召集了一次集会。“奥什科什小镇的人们希望我们的税收制度复杂而不公吗？”

“不！”观众们大声回应道。

“你们希望大幅增加纳税等级，从而奖懒罚勤，危害美国家庭吗？”

“不！”

“还是你们希望得到一种极其简化的税收制度，消除税收漏洞，让我们的税收制度简洁明了，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呢？”

“对！”

“你们是否希望看到这样一种税收计划，它可以增加个人减免税额，进一步降低税率，减轻美国上班族和他们家庭的税收负担？”

“是的！”

“很好，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今年就可以，也一定要通过这一税收计划。”

里根参观了亚特兰大的一所中学。他说道：“有人可能会说，对十几岁的年轻人讲税收政策有些奇怪。”但他不这样认为。“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开始兼职打工，我也清楚你们关注着工资单上被山姆大叔取走的那一部分。”里根的演讲撰稿人让他提前熟悉了这些听众的文化层次。里根说道：“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当前的税收制度是一个电视节目的话，那它可能是《莽撞一团糟》或者《我的地盘》。如果它是一张唱片的话，那它可能是《给我庇护》。如果它是一部电影的话，那它可能是《菜鸟大反攻》，或者可能是《傻瓜入狱记》。如果IRS——美国国税局——想要一首主题歌的话，那他们可能让斯汀来写那首‘你的每一次呼吸，你的每一个举动，我都在看着’。”

尽管里根得到了他期望的公众反应，但制定新税法需要数月时间，并需要多次战略妥协。最初的税改计划被命名为“财政部1号文”，后来被“财政部2号文”所取代。第二份文件放过了现有的税收漏洞，调整了某些税率。这一变化在第一份文件创始人唐纳德·里甘和第二份文件支持者詹姆斯·贝克之间制造了矛盾。贝克认为，里甘逐渐成为一种阻力，反对他所支持的条款。后来，贝克在提到里甘时说道：“他缺乏决断力，缺乏政治智慧，这几乎扼杀了税收改革。”政府内部的摩擦助长了来自国会的阻力，这些反对改革的人当中包括许多共和党人。在众议院举行的一次测试性投票中，只有14名共和党人支持政府，从而导致蒂普·奥尼尔宣称，那些叛徒侮辱了他们自己的总统。

贝克回忆说：“总统的确受到了侮辱，变得非常愤怒。”然而，变节行为吸引了政府的注意力。贝克要求总统全力以赴支持所提出的改革。贝克在给里根的信中写道：“税收改革是您两项国内主要政策中的一项（另一项是削减开支）。如果您不支持推进筹款委员会法案，那么它很有可能会夭

折……您必须继续推进这一进程。”

里根表示同意，并且在支持改革的奥尼尔挑战总统，要他拉到至少50张共和党人的选票后，里根采用逐个游说的政治活动形式。他前往国会，与众议院里的共和党人会面。里根后来写道：“这是一次直接对话，各方都有发言权。”反对者表达了他们的怨气，里根说他对此也有些许同意。但他说该议案可以在参议院进行修订。里根的策略非常微妙：他要求众议员们投票支持这一议案，他说如果议案以现在的形式呈现给他的话，他会否决。但如果他们通过这一议案，议案中的缺陷可以在参议院里得到修订。

这一策略有效果，却很艰难。人数统计显示有48位共和党人支持总统，这离奥尼尔的要求还差两人，而奥尼尔显然不愿意让步。贝克召集人手进一步做工作。他回忆说：“我们在我一位老朋友，众议院少数党领导人鲍勃·米歇尔的办公室里召集了一帮人，开始打电话。我们打了无数电话，进行了大量的政治交易。我甚至答应为一位众议员进行巡回政治演说。”但最终他们提供了所需的票数，这一方案也得以在众议院通过。

在两院达成协议之前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其结果却是“二战”之后对税法进行的最为彻底的修改。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从50%降到了28%（里根上台时是70%），4/5的美国人都会归入扩充后的15%的等级。最高公司税率从46%猛砍到34%。资本收益会作为普通收入进行征税，这就使得没有必要再把补偿从后者转向前者。许多最常见的合法避税手段和减税手段都被取消了，而标准的减除额度增加了，个人免除额度将近翻了一倍。

失败者并没有放弃他们的斗争。制造商的代表们预测说，缩减投资税优惠额度会阻碍必要的现代化进程，对整个经济造成危害。之前的税收优惠受益人也预测了相似的不利后果。

众议院筹款委员会民主党主席丹·罗斯滕科斯基支持这一法案，对这一法案的通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认同这些责难，但拒绝重新讨论这一问题。他说：“姑且让这一法案生效，让美国人民和企业自己进行判断。”来自密苏里州的国会议员理查德·格普哈特是支持税改的另一位民主党人。他对这些批评不予理睬，认为他们都有自己的目的。他说道：“我认为大家都在拿这一法案说事，甚至连患上普通感冒也都归咎于这一法案。”

里根很感激民主党这种不同寻常的支持，他同样对这种吹毛求疵的做法不予理睬。他在签字仪式上说：“这一过程历时长久，许多人说我们不会坚持到底。但是，像以往一样，悲观主义者在他们的算计中漏掉了一件事情：那就是美国人民。”里根称这一新的税法有利于企业，有利于工人，有利于家庭，也有利于自由。他认可国会中两党党员对于税收议案成功通过所做出的重大贡献。里根面对笑声和掌声说道：“我感觉我们刚刚打了

一场有关税改的世界职业棒球大赛，最终美国人民获胜了。”

两周后，总统签署了另外一项里程碑式的改革。移民问题从来不是里根考虑的首要问题，但在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时候，他就逐渐认识到，联邦法律关于移民的规定和经济法律关于不熟练工人供求关系的规定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同得克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和亚利桑那州一样，加利福尼亚州的南部边境管理松懈，使得那些想在美国工作的墨西哥人可以跨越边境，无须证件就可以进入美国并取得合法居留权。这一制度符合雇主的要求——主要是农业方面的老板，但也有建筑公司和其他企业的老板——因为它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而且这些人不会向政府部门举报待遇低下，工作环境危险。它也符合雇主的消费者的要求——那些农产品的消费者以及新房子的购买者——他们可以低价购买商品，得到服务。它也符合移民自己的要求，如若不然，他们也不会来到美国。

但是，这一制度并不符合工会的要求。他们指责移民对工资造成了压制效应。这一制度有时候也不符合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要求，因为他们不得不为移民提供社会服务。同时，这一制度也不符合许多美国人的要求，这些人认为，应当加强边境法制，有人也担心来自墨西哥和南方更远国家的大量移民会冲淡美国民族的传统性格与风俗习惯。

1985年，来自怀俄明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艾伦·辛普森提出了一项法案，要求削减非法移民，并让现有的没有登记的移民获得合法地位。辛普森曾处理过移民问题，但没有成功。可这次，他来自肯塔基州的民主党议员罗马诺·马佐利那里得到大力支持。这份辛普森-马佐利议案旨在通过推行更为严厉的边境管控来削减非法移民，关键要对那些明知故犯、雇用非法移民的雇主采取惩罚措施。同时，该法案还提供了一种方法，让许多已经身处美国但没有登记在案的移民获得合法居留身份。

这一法案必须要应对来自雇主们的反对，他们喜欢现状，或者担心因为为求职者打掩护而承担无心之过。另外一些对法案持怀疑态度的人担心这一法案可能会成为引发国家身份证制度发生变化的起因。但是，他们二人，尤其是辛普森采取不同方式回应这些反对者的声音：有时候是通过说理，有时候是通过修正他们的法案，有时候是通过让步条件，有时候是通过里根移民归化局的格雷格·利奥后来所说的辛普森的“柔中带刚的魅力”进行的。

里根放手让辛普森和马佐利开展移民改革的艰巨任务。当法案进展顺利的时候，他向这两位发起人表示自己支持他们。1986年10月，当众议院通过这一法案时，里根写道：“辛普森前来试探一下我是否支持他。我们可



以接受他们法案中的一两处修正，但即使参议院讨论时无法删除它们，我也会签字同意的。目前，我们的确应当重新掌控边境问题，而他的法案将做到这一点。”

参议院通过了这一法案，里根也自然签字同意。他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道：“它将消除非法移民的动力，消除吸引外国人移民的就业机会。”法律规定的合法居留权方针同样重要。“法案中的法律条文将进一步改善现在藏身暗处的那些人的生活，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自由、开放社会的许多福利。这些人当中的许多人不久就可以光明正大地生活。最终，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可以成为美国公民。”

移民法当即引发了争议。一些拉丁美洲团体热烈支持。墨西哥裔美国政治协会中的曼努埃尔·洛佩斯把法案中的特赦条款比作《解放黑人奴隶宣言》。他说：“这使得数百万以经济难民身份来到这个国家的人们找到了更好的生活方式，并获得自由。”然而，移民法的其他条款却在拉丁团体中引发了矛盾情绪。许多合法移民支持对雇主采取制裁，因为这保护了低收入的非非法移民的权益。但其他人担心这些制裁只会让雇主们不再雇用所有拉美员工。雇主们则抱怨说，保护边境的重担被强加到了他们身上。一位芝加哥劳动法专家说：“这让人事经理成为移民归化局的一名特殊员工，帮助他们抵挡移民潮。”负责移民工作的律师和官员预测说，这将会导致伪造的证件大量增加，目的是证明就业和大赦所需要的合法居留权。墨西哥裔美国人维权和教育基金会的律师琳达·黄说道：“我认为，唯一可以最终从该法律中受益的人们就是那些从事伪造证件制作的人。”大量拉丁美洲人集中的社区的官员抱怨说，他们可能不得不需要提高税赋，以便为新的合法移民所需要的各种服务买单。洛杉矶县的督察员说：“国会没有能够采取有效的方法解决这一重大国家问题，再次令人感到失望。”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卡洛斯·卡斯塔涅达认为这项新法律不但没用，而且更糟糕，因为它提高了人们的期望，却无法实现这些期望。卡斯塔涅达说：“这项法案无疑会加剧种族排外情绪，这种情绪在边境地区和其他墨西哥人聚居区日益明显。”

里根无论在忙什么工作，都从没有忘记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回忆说：“他发自内心地担心他们的安危。”乔治·舒尔茨说得更强烈，他说：“里根为这些人质伤透了脑筋，这件事让他寝食难安。”美国总统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对待这一重大问题他却束手无策。舒尔茨说道：“这件事快把他逼疯了。人质被扣在黎巴嫩，美国人在遭受折磨，他却无能为力，而他们是他们的总统。”

里根一直在想方设法来保证这些人质能安全获释。他在祭拜了罗伯特·斯特西姆的墓地、接见了环球航空公司劫机事件幸存者的两周之后，在日记中写道：“从伊朗人那里传来奇怪的试探性声音。罗伯特·麦克法兰明天会来讨论这一问题。这可能会取得突破，让我们的7名被绑架者回家。很显然，伊朗的经济在战争压力下正在快速崩溃。”

麦克法兰考虑伊朗问题有一段时间了。他认为，霍梅尼不会活得太久，他的继任者或许要更温和一些，可能会寻求美国的保护来对付苏联，就像霍梅尼的前任们所做的那样。麦克法兰与几位以色列人联系过，他们的政府同样也期盼伊朗内部的温和派人士上台，以此来平衡对抗以色列的近敌伊拉克。伊朗人自己在同伊拉克进行一场惨烈的战争，他们迫切需要美制武器装备的零件和更新。他们是在伊朗国王统治时期得到这些装备的。麦克法兰设想可以通过向他们提供武器来鼓励伊朗的温和派。运输这些武器装备必须秘密进行，因为与美国政府接触的任何消息一旦走漏，都会危害到参与其中的伊朗人。而且，武器运输违反美国在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中立政策，也违反禁止向恐怖分子支持的国家输送武器的规定。里根政府不止一次地明确声明伊朗属于此类国家。

麦克法兰征求了一下政府高级官员对于自己这一想法的意见。威廉·凯西喜欢这一主意，但乔治·舒尔茨和卡斯帕·温伯格认为这一想法欠妥，可能会适得其反。舒尔茨在给麦克法兰的信中写道：“违反我们当前政策或者鼓励向伊朗输出西方的武器与我们的利益相悖，无论是在牵制霍梅尼主义方面还是在终结其过分统治方面都是如此。改变我们政策的做法尤其违背常情，因为现在与伊朗有联系的组织在黎巴嫩扣押着美国人质。”温伯格同样坚决反对这一计划，他在传给麦克法兰的便条中写道：“这样做十分荒唐，让人难以评说。这就好比邀请卡扎菲前来华盛顿进行一次惬意的聊天。”提议进行改变政策会“被那些我们要求限制此类销售的国家视作明显的政策不统一”，可能只会强化霍梅尼政权。

当时，舒尔茨和温伯格很少能在其他问题上达成共识。他们认为此次两人

联手反对会让这一计划流产。总统的公开声明明显也是这个意思，在对美国律师协会的一次演讲中，里根明确把伊朗当作支持全球恐怖运动的国家，称为“一个全新的国际谋杀组织”。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里根重申了自己对于恐怖分子绝不妥协的立场。他说道：“美国永远不会对恐怖分子让步。这样做只会招致更多的恐怖活动。我们也不会要求或强迫其他任何政府这样做。一旦我们走上这条道路，那将会无休止，无法结束无辜人民的苦难，无法结束所有文明国家所不得不偿付的血腥赎金。”

然而，麦克法兰没有放弃，而是把自己最初的计划做了更隐蔽的伪装。温伯格认为，伪装符合麦克法兰的性格。他后来这样写道：“麦克法兰是一个缺点非常明显的人。他无法隐藏这些缺点，但他的确试图采用高深莫测的手段进行伪装，通常是借助精心策划、矫揉造作、近乎令人费解的言辞，渴望能被视作‘比亨利优秀’。”——亨利·基辛格，曾在20世纪70年代初打开中国的大门——温伯格继续说道：“他非常注意保密，好像认为他所做的事情十分重要，不能公开，也不能与其他任何人讨论。”

麦克法兰把自己的计划呈送给里根，当时里根还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进行术后康复。后来关于此次会面的记录和回忆各不相同。里甘在笔记中这样写道：“中东地区/人质释放/问题。”里甘后来解释说：“大体上讨论了一下人质问题。在我的记忆中，此次谈话是关于伊朗人的，他们在环球航空公司劫机事件中提供了帮助。如果我们对他们更友好一些，他们在其他情况下也可能还会提供帮助。”里甘回忆说，里根对于麦克法兰的计划很感兴趣，提问了几个问题。总统同意这项计划。据里甘说，当时总统告诉麦克法兰：“可以的，开始实施吧。”

但当里根被问及此事时，他说不记得在医院里与麦克法兰见过面。可是他的日记却证实了里甘的回忆，并略微详细地记录了此事。里根在1985年7月18日写道：“罗伯特过来了。看起来伊朗政府中的两名官员希望与我们进行谈判。”里根在这次会面后记录道：“我派罗伯特在一个中立国家与他们会面。”

事实上，麦克法兰当时没有与伊朗人会面，而是与中间人接触。其中一位是以色列外交部部长戴维·金奇，他提议说，如果美国更换导弹的话，以色列会把美国制造的导弹运往伊朗。麦克法兰说他会转递这份建议并转达美国政府的意见。

8月初，麦克法兰与里根在白宫见面。他提到了与金奇的对话以及由以色列向伊朗转运导弹的建议。乔治·舒尔茨也出席了会议，他回忆说，麦克法兰谈到了对伊朗的战略机遇，也提到了人质问题。麦克法兰说，他与之接触的伊朗人可以确保释放4名美国人。舒尔茨反对这一提议，说向伊朗运输武器是个严重的错误。舒尔茨写道：“我认为总统同意了，尽管不大情

愿。”

然而，据之后不久的日记记载，里根并没有同意。总统当时正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牧场度假，他这样写道：“我接到了麦克法兰打来的‘秘密’电话。伊朗政府内部的一位高官好像说他可以在9月初释放全部或部分在黎巴嫩的美国人质。这些人质将被送往的黎波里北部海滩的某处，我们可以把他们接往第六舰队。关于其中的几点问题我还需要斟酌一下——但这些都不难决定。我们现在拭目以待。”

里根的决定包括把陶氏反坦克导弹从以色列运往伊朗。麦克法兰报告说，以色列人在1985年9月的前两个星期把大约500枚陶氏导弹运往了伊朗。9月15日，一名美国人质——本杰明·韦尔牧师获释。

里根希望其他人质随后也会获释。他在9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接到麦克法兰的秘密电话。长老会的韦尔牧师被送往我们在贝鲁特的使馆，现在已经登上了美国军舰‘尼米兹’号。由于其他被绑架者的缘故，我们努力保守这一秘密。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人士说，他们将在48小时以内交付给我们。所有这一切都是高度机密。但突然，在电视脱口秀节目中，他们引用了路透社的一则消息，说有匿名电话公布了韦尔获救的消息。对此我们当然是拒绝承认。”两天之后里根写道：“韦尔牧师及其家人正在我们国内一处‘安全屋’内。他的家人有些难以对付，他们坚持要住酒店，但在他抵达时我们设法把他们转移了。到目前为止，这一秘密还没有公开，他们一家人全都待在一起。贝鲁特的一位神秘人物告诉我们说其他人质将随后获释。”

其他人质没有随后获释，他们依然被扣押着。当时有另外一件事分散了里根的注意力，干扰了他带人质回家的决心。10月7日，一艘意大利游艇“阿基莱·劳罗”号在埃及海岸被4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劫持。劫持者要求释放为以色列羁押的所有巴勒斯坦人。里根的日记显示他严重关切此次劫持事件的每一个细节，因为这批人质中包括数十名美国人。他下令美国海军成立一支营救队伍。

事实证明没有必要营救，因为劫持者命令游艇开往塞得港，在那里他们向埃及政府投降。作为交换，他们得到了对友好国家采取安全通行的保证。里根在日记中这样记录了此次事件：“有消息说，这艘意大利游轮返回了塞得港——劫持者被埃及人带走，交给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该组织把他们带离了埃及。他们只有4个人，但我们得知他们杀死了一名美国人——一位坐轮椅的69岁的男子。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发动营救袭击。除了这一人之外，其他人质都开始回家了。”

这名美国人利昂·克林霍弗之死激怒了里根，他拒绝受到埃及政府安全通行

保证的束缚，命令海军采取行动。他在10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我们海军的F-14战斗机拦截了搭载劫持者的埃及飞机，把他们迫降在西西里——位于锡戈内拉的北约基地。美国人和海外的朋友们感到扬眉吐气，而我们则接到了雪片般的电报和电话。”里根动用外交手段，试图亲自动手解决这些劫持分子。“还有其他一些半夜时分的电话，比如我打给意大利总理克拉克西的电话，要求把这4个人带到美国进行起诉。他解释说自己没有这个权力——意大利行政长官独立于政府之外。这没关系，重点是意大利会进行起诉，而我们以防万一提出了引渡要求。”

里根甘愿承受来自阿拉伯世界的批评，他们指责他故意冒犯国际法，拦截埃及飞机。里根写道：“穆巴拉克十分震怒，称我们的行为是海盗行为。我想他是在安抚自己的民众，因为埃及人偏袒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如果说有什么区别的话，那就是里根很享受这些严厉的批评。他在两天后写道：“我给克林霍弗太太打电话。当时她正跟其他乘客在罗马停留，指认劫持者。她告诉我说他们的确非常憎恨我。在船上的那次严峻考验中，每隔几分钟他们就会大声痛骂我。”

在第一次向伊朗输送武器之后，黎巴嫩的大部分人质还继续处于羁押中。这让麦克法兰和他的手下决定再次进行尝试。这一次伊朗人希望得到霍克防空导弹。麦克法兰支持这一要求，他认为里根之前同意用陶氏导弹交换人质，这次也会同意霍克导弹。因此他只是通知总统说将从以色列进行武器运输，并没有要求重新获得授权。

里根没有反对。在11月22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之后，他写道：“标的物是我们在贝鲁特的人质。我们在通过一位伊朗人的秘密行动来使他们获释。”第二天，里根又写道：“我们依然在焦急等待，要把人质从贝鲁特弄出来。”

第二次的武器交付还没有第一次成功，这一次没有人质回家。麦克法兰变得很沮丧，告诉里根自己想要辞职。里根没有努力劝阻他。麦克法兰最后一次参加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是在12月5日。里根写道：“我们的目标是要通过秘密行动解救被恐怖分子扣在黎巴嫩的5名人质。这一行动非常复杂，只有几个人参与其中。我甚至不能在日记中写下我们在忙些什么。”

政府在忙于武器换人质。这一次，负责实施这一计划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奥利弗·诺思把该计划归纳成一个公式：

人质-小时：1架707/300枚陶氏=1个AMCIT

人质 + 10小时：1架707/300枚陶氏 = 1个AMCIT

人质 + 16小时：1架747/50枚霍克 + 400枚陶氏 = 2个AMCIT

人质 + 20小时：1架707/300枚陶氏 = 1个AMCIT

人质 + 24小时：1架747/2000枚陶氏 = 法国人质

707和747指的是运输机，而AMCIT指的是美国公民。

与麦克法兰不同，诺思没有受到到目前为止效果不佳的影响。他认为政府必须继续施压，以防人质的处境更加危险。他在给当时麦克法兰的副手约翰·波因德克斯特的信中写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走得太远。终止已经开始的一切可能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假如我们当前不再至少尝试一次，我们就很有可能导致一些人质或所有人质死亡。”

里根对这一观点的反应就像他之前支持向伊朗输送武器的观点一样。“总统对于人质的安危十分关切。”麦克法兰在提到白宫的一次会议时回忆道。当时，会议主要讨论了人质面临的新的危险。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回忆说，总统权衡了继续下去的危险，但最后总结说：“如果我们不尽力而为，我想我不会原谅自己的。”里根补充说：“如果此事被公开，我想我可以为之辩护。但这就好像是在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有多少天使可以在大头针帽上跳舞。”

计划继续进行。1986年1月，里根比自己以往在日记中更为详细地描述了这一计划。他在1月7日写道：“今天做了两件事，一是卡扎菲（利比亚），另一件是在黎巴嫩的5名人质。”里根先是发泄了对卡扎菲的不满，然后继续写道：“第二件事的过程高度机密，十分复杂。以色列释放了大约20名真主党成员，这些人并没有真的犯下血腥罪行。同时，以色列向伊朗出售一些陶氏反坦克武器。我们也随之向以色列出售更新换代的武器。真主党释放我们的5名人质。伊朗也保证不再会进行绑架行动。我们在这一过程中保持沉默，没有透露我们是如何让人质获释的。”

结果，这一过程对以色列人来说过于复杂，他们提出要简化程序。总理希蒙·佩雷斯担心伊朗在对伊拉克的战争中失利，因而要求美国直接向伊朗出售武器。这一点引起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的兴趣，他接替麦克法兰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86年1月17日，波因德克斯特呈送给里根一份备忘录，简要介绍了以色列的计划，同时还送上了一份总统裁决，授权直接交易。波因德克斯特在备忘录中写道：“前些日子，司法部部长威廉·弗伦奇·史密斯认为，您可以通过适当授权，允许中情局向法律条款规定之外的国

家出售武器。假如中情局利用必要的授权，按照经济法案从国防部购买武器，然后在收到伊朗方面相应的付款之后，可以把武器直接运往伊朗。这样的话，以色列的目的就可以达到。秘密行动裁决权赋予了上述交易自主权，让其可以继续下去。”裁决书上写道：“美国政府将通过第三方和第三国来与伊朗政府内外的温和派建立联系，向他们提供武器、装备以及相关资源。”之前的一份裁决书曾授权对第三国进行援助，这份裁决书增加了“第三方”，可以理解成是秘密的中间人。

波因德克斯特的备忘录和那份总统裁决书指的是同意向伊朗进行战略开放，但里根是从人质以及如何解救人质的角度进行解读。他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唯一需要解决的事情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希望得到关于解救我们在黎巴嫩人质的决定，这包括向伊朗出售陶氏反坦克导弹。我同意了。”

按照新的裁决书内容，在2月，1000枚陶氏导弹交付给了伊朗，但人质却没有获释。相反，伊朗人让美国人在惴惴不安地等待。里根在2月28日星期五的日记中写道：“今天上午，传来更多关于黎巴嫩人质获释的可能性的消息。这对那些家庭来说是漫长而痛苦的等待。我们在下周四应当能得到消息。”

一个又一个星期四过去了，3月也过去了，接着是4月和5月。“我们依然不知道我们的人质是否会获释。”里根在5月27日写道。尽管罗伯特·麦克法兰不再担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但他依然为总统在执行这份伊朗计划。他曾前往德黑兰，试图解决问题，现在在报告进展情况。里根写道：“罗伯特在电话中说，参与我们计划的两个伊朗人表现得不诚实，尽管通过他们罗伯特与来自总理办公室的一位代表接触过。真主党方面提出了令人恼火的要求，比如以色列必须撤离戈兰高地和黎巴嫩南部地区，科威特必须释放已被他们审判和监禁的凶手，等等。罗伯特说这行不通，于是他们又回到原来的交换条件——出售武器。现在我们可能在未来48小时内知道结果。”

当天晚些时候，里根在日记中又补充道：“罗伯特从伊朗又打来电话。他们再次试图勒索，提出了一些让人恼火的条件——在释放人质前交付武器和零件。罗伯特告诉他们说交易取消。他们又做出让步，说交易继续，但他们必须与贝鲁特的真主党通电话。罗伯特认为，伊朗意识到苏联在他们边境上驻军，而自己却缺乏应对能力，因此希望与我们保持长期关系。这可能是他们谈判背后的目的。现在我们要继续等下去。”麦克法兰依然还在从战略角度考虑问题，但里根一直关注的是人质以及他们获释的条件。“条件就是运输武器装备的飞机从特拉维夫起飞。如果3小时之后我们没有得到人质，我们就命令飞机返航。”

里根第二天写道：“我们就是那样做的。飞机飞行了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

下令返航。这些地毯商人好像说真主党只同意释放两名人质。罗伯特告诉他们见鬼去吧。他前往机场，赶往特拉维夫。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悲痛失望的一刻。”

但里根和麦克法兰都没有彻底离开谈判桌。伊朗人或许觉察到了总统的孤注一掷，于是降低了他们的条件。他们愿意释放一名人质，用以换取霍克导弹零件和额外的陶氏导弹。麦克法兰接受了这一条件。里根感到欢欣鼓舞。他在7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星期六，好消息：我们的一位人质——詹科牧师——在黎巴嫩获释，被转移到了叙利亚。詹科的获释来得太晚，我们为这一计划努力了几个月。但它给我们带来了希望，希望剩余的计划也可以完成。我们一度曾打算放弃的。”

在会见了詹科及其家人之后，里根的欣慰变成了快乐。总统在8月1日写道：“一天中最高兴的事：马丁·詹科牧师回来了。在被当作人质羁押了19个月之后，他刚刚被贝鲁特的真主党释放了。他的全部家人跟他团聚了。真是令人动容的一刻。”



在里根与伊朗就人质问题全力展开斗争的那段日子里，他也在就反政府武装问题与国会进行斗争。中情局在尼加拉瓜港口埋设地雷一事曝光后，产生了另外一项博兰修正案，也是最具约束力的一项。该修正案宣称：“禁止任何国家、团体、组织、运动或个人将中央情报局、国防部或涉及情报活动的任何美国其他机构的经费直接或间接地花在支持尼加拉瓜的军事行动或准军事行动上。”该修正案看起来说得斩钉截铁。

然而里根并没有望而却步。他认为博兰修正案的限制规定判断错误，对美国安全构成了威胁，因而他发起了反击。关于巴拿马孔塔多拉岛的地区性谈判开始后，到目前为止几乎没有进展，但美国政府密切关注。总统表示希望能带给中美洲和平，这就需要他对孔塔多拉岛谈判表示支持，即使仅仅是因为这能够缓和国会中的怀疑分子。但他和自己的团队对于谈判可能带来的结果持严重保留态度。里根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达成地区性协议，让桑地诺解放阵线的人获得国际合法地位。

1985年春，里根公开承认孔塔多拉岛谈判过程，将其作为反政府武装获得新资助的战略的一部分。里根在那年4月的日记中写道：“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我们综合提出一种想法，为的是要求国会资助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并支持和平提案。我认为民主党的众议院不会痛痛快快地按照我们的计划同意拨款。”他等待着进行斗争。里根继续说道：“蒂普·奥尼尔及其同伴已经开始恶意攻击这一想法了，并且蒂普听起来十分不理智。”里根认为这位众议院议长是在对自己发动一场宿怨之战：“蒂普发动了一场党派运动，要让我失败——不管这样做是否会在美洲大陆帮助成立另外一个古巴。”里根对立法机构限制自己行使外交权力的做法非常恼火，他从美国人的义务出发，再次恳求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他对国会议员们说：“美国肩负着明确而不容推卸的义务，不能抛弃这些勇敢的男人和女人。他们正在为争取民主和尊重人权而在尼加拉瓜进行斗争。”但是奥尼尔和民主党人不为所动。里根在5月写道：“与共和党领导人会面——参众两院。我有些生气，告诉他们我讨厌由535人的委员会来决定外交政策。”

里根很失望，这促使他通过别的途径寻求资助反政府武装。他在1986年3月的日记中写道：“前往行政办公楼，对大约150名主要犹太企业的总裁们讲话。主题是尼加拉瓜。效果很好，很受欢迎。”几天后他回忆道：“在行政办公楼，就尼加拉瓜问题向一大群愿意提供帮助的组织的领导人讲话。”一开始，里根只是寻求政治帮助：支付广告费用，向国会施压，再次开启资助渠道。但当立法机构继续推诿时，他开始要求他们自己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他在6月写道：“从五月花酒店到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

会议上，我强烈要求资助反政府武装，结果反响良好。”一周后，他写道：“在行政办公楼的200名各个组织的代表们愿意同心协力，帮助尼加拉瓜的反政府武装。”

同时，总统还从关系不错的外国政府那里为反政府武装募集到了资金。沙特阿拉伯国王法赫德前来华盛顿讨论中东问题。里根愿意帮忙，但他也提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总统回忆说：“我们讨论了中东和平计划，他同意支持侯赛因国王。我想他在我们的建议中发现了有价值的东西。他还打算增加他秘密向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提供的资助。”

资助反政府武装这一问题让国家安全计划小组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里根表达了自己对于孔塔多拉岛谈判的关注，并明确表明自己反对让桑地诺解放阵线维持现状的解决方案。总统对计划小组说：“我们不同意，也不接受任何无法为尼加拉瓜带来民主的协议。任何解决方案的要点必须是回归到反对索摩查革命结束的那一天，让尼加拉瓜人民决定他们想要什么样的政府。”

约翰·波因德克斯特说，在孔塔多拉岛谈判这件事上，政府是在走钢丝。他解释说：“我们现在进退两难。因为即使有机会可以为反政府武装筹集到资金，我们也需要一种谈判路线。但是我们无法保证我们达成的协议就是我们希望的那样。”

卡斯帕·温伯格倾向于与孔塔多拉协议没有任何干系，这样就可以消除政府对于国会的影响。他说道：“我们只需确保谈判不要脱离我们的控制。我们需要阻止孔塔多拉谈判者签署协议，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从国会得到任何帮助。”

乔治·舒尔茨说，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政府不会从国会那里得到任何帮助。反政府武装的形势极度危险。他说：“如果我们不能为这些自由斗士争取到资金，那他们将会完蛋。”一些政府官员提出要努力说服国会中的相关委员会，重新调整对反政府武装的资助拨款。舒尔茨认为这种想法愚蠢且没有意义。他说：“这简直是痴人说梦。更好的做法应当是寻求其他国家的帮助。”

温伯格同意这一观点，认为政府应当从其他国家募集资金，但他不打算放弃国会。这位国防部部长说：“我们应当尝试一切手段，尝试我们可以找到的每一个国家，尝试所有的委员会和美国人民。假如反政府武装在7月完蛋了，那么在将来我们可能不得不亲自上阵。”

奥利弗·诺思作为波因德克斯特的助手参加了此次会议，他赞同舒尔茨的建议。诺思说道：“1986年财政年度的情报授权法案允许国务院通过其他国

家寻求非军事援助。”

“难道我们没有同其他国家接触过吗？”威廉·凯西问道。

“我们联系过，但收效不大。”舒尔茨回答说。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让总统参与进来。”凯西回答说，“沙特、以色列、韩国等都有兴趣。”

此次会议无果而终，也没有提到沙特已经向反政府武装提供的资助。

诺思也没有提到他已经想出了一个单独的办法来资助反政府武装。在2月向伊朗交付陶氏导弹之后，诺思从这一收益中提取了300万~400万美元，把这笔钱存入了一个反政府武装可以提取的账户里。两个月后，他要求获得授权，继续进行这种资金转移。诺思为波因德克斯特起草了一份备忘录，介绍了这家伊朗企业，并解释了来自武器销售的利润可以如何支出。诺思写道：“有1200万美元可以用来为尼加拉瓜民主抵抗部队购买急需物资。”在备忘录的最后，诺思附上了一个建议：“总统应当同意上述做法。”

波因德克斯特后来做证说自己不记得收到过这份备忘录。他说自己曾指示诺思，不要书面记录有关向反政府武装提供资金转移的事情。诺思否认曾接到过这一指示。不管怎样，波因德克斯特承认自己知道这一计划，但只知道大概。根据里甘的回忆，在这件事曝光后，他对唐纳德·里甘说：“我当时感觉发生了不太妙的事情，但我没有进行调查，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事实上，我不想知道。蒂普·奥尼尔的做法让我抓狂，因为他针对反政府武装这件事来回折腾，我的确想知道其中发生了什么。我本来应当知道，而我却不知道。”波因德克斯特对埃德温·米斯讲的也大致如此。米斯回忆说：“他说自己不清楚。奥利弗·诺思给了他足够的暗示，他应当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但他不想进一步调查。但事实上，他的确大体知道在伊朗交货后资金流向了反政府武装。”

再后来，波因德克斯特提供了一份更全面的解释。他说自己知道诺思转移资金这件事，凭良心讲，他也同意了。他说：“我们当时没有发现此事有任何违法之处。”的确，他同意诺思的做法，认为利用武器收入来保持反政府武装的活力是很好地利用了政策。“这些资金就像来自伊朗的礼物，尽管伊朗并不知情。”他说自己故意决定不告诉里根这件事。“我没有将此事告诉总统，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做出合理的推诿。”他清楚这里面包含着政治风险，但这种风险值得尝试。他说：“更重要的是，承担风险的是我，而不是总统。”

于是，资金转移继续进行，而里根也从没有询问过此事。

## 第六部分 冰岛极寒 1986~1988

对利比亚的轰炸本来是很成功的，但轰炸带来的副作用进一步推迟了与苏联方面的军备控制行动。戈尔巴乔夫知道，多年以来，卡扎菲一直是美国的眼中钉、肉中刺。戈尔巴乔夫问自己里根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时机来打击他，他认为华盛顿在试图证明什么。戈尔巴乔夫后来写道：“美国攻击利比亚是为了展示其力量和免受伤害的决心。”日内瓦会面后发生了一系列的挑衅事件，尤其是违反美苏之间的SALT II的规定以及重启核试验。这些事件连同对利比亚的打击让戈尔巴乔夫意识到，美国并没有拿苏联太当回事儿。“难道美国人认为我们没有注意到他们是如何利用刚刚进行的苏美对话作为掩护来开展新的武器计划吗？”他没有谴责里根不真诚，而是谴责他没有能力掌控从军备竞赛中获益的强权集团。“缓和紧张局势的做法，或者哪怕是苏美关系简单地回暖，都不符合西方国家某些人的利益，他们会利用一切借口来破坏在日内瓦发起的改善国际关系的做法。”

发生的一些其他事情也让局势变得复杂。1986年8月，联邦调查局向白宫发出请求，要求批准逮捕根纳季·扎哈罗夫。他是一名受雇于联合国的苏联科学家，有明显证据表明他还是一名克格勃特工。假如扎哈罗夫是名外交官，享有不被逮捕和起诉的豁免权的话，那他将被驱逐出境。而苏联方面也会以牙还牙，驱逐美国驻苏联的一名外交官。但是，这件事没有那么麻烦，因为他不具备外交豁免权，因而可以被逮捕和起诉。

联邦调查局迫切希望进行逮捕，因为最近不断有苏联在美国进行谍报行动的消息披露出来，这让该局处境尴尬。出于类似的原因，中情局和国务院也支持联邦调查局的请求，因而白宫批准了这一行动。扎哈罗夫在一次精心设计的行动中被抓获了。

一周之后，苏联人报复性地逮捕了美国在莫斯科的记者尼古拉斯·丹尼洛夫，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里根对自己说：“这显然是在捏造罪名。”总统在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也是这样说的：“我可以以我的名义向您保证，丹尼洛夫先生与美国政府没有丝毫关系。”里根又补充说道：“你们没有理由拘押丹尼洛夫先生，也不能企图给他加上别的罪名。如果他不能立即获释，那这只能对我们两国的关系造成最严重而深远的影响。”

戈尔巴乔夫不相信里根的话。他在回信中写道：“您9月5日的来信促使我过问了一下您提出的相关问题。主管机关向我报告说，《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杂志驻莫斯科记者丹尼洛夫长期以来一直在从事非法活动，危害苏联国家利益。目前正在展开调查，我们将根据调查结果来对整个案件做出最终判决。”

里根不会轻易发火，但对于别人怀疑自己说的话他变得非常生气。他在日记中写道：“戈尔巴乔夫的回信傲慢无礼，拒不相信我关于丹尼洛夫不是间谍的说法。我愤怒至极。”

里根所不知道的是，中情局没有告诉他事情的全部真相。里根曾问威廉·凯西，丹尼洛夫是不是间谍？凯西向他保证说丹尼洛夫不是间谍。这一点没错，但省略了相关信息。乔治·舒尔茨不信任凯西，也不相信中情局。他要求知道中情局所知道的关于丹尼洛夫的一切事情。他被告知说，丹尼洛夫曾从一位“波将金牧师”那里收到过一个信封，要求他转交给美国大使馆。丹尼洛夫传递了这个信封，里面的内容好像是来自消息人士，此人之前曾传递过关于苏联核武库的有价值的信息。中情局试图通过“波将金牧师”联系到这一消息人士，但在这一过程中提到了丹尼洛夫。这很可能引起了克格勃的注意，也很可能就是戈尔巴乔夫在给里根的信中所提到的。

舒尔茨要求国务院法律顾问亚伯拉罕·索费尔调查此事并提供自己的意见。索费尔报告说：“中情局确实欺骗了丹尼洛夫。根据我对他的行为的理解，丹尼洛夫很可能依照苏联法律遭到起诉，就像苏联记者在美国从事与克格勃有关的类似行为也很可能按照我们的法律遭到起诉一样。”索费尔后来说：“苏联人干得漂亮，他们复制了我们对扎哈罗夫的做法。”

舒尔茨回忆说：“这让这件事看起来完全不同了。”他打电话给白宫的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告诉他自已关于丹尼洛夫一事有新消息要告诉总统。这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看起来并不急于知道这一信息，其中原因是舒尔茨无法知道的，但他也不能拒绝国务卿的要求。舒尔茨回忆说：“我发现里根总统对此事知之甚少，我感觉波因德克斯特很明显不想让他知道太多。”

舒尔茨让索费尔告诉里根他所知道的。索费尔后来说道：“我详细介绍了情况，解释了形势。”他发现里根听得很投入。“他不断打断我，问这问那的。”然而，总统拒绝改变他对苏联处理这件事的看法。“他的基本观点是，他们都是坏人，在捏造事实。”

索费尔曾担任过检察官和法官，他回答说：“您说得十分正确，但这关系不大。如果这是在联邦法院，我们捏造事实，给丹尼洛夫这些文件，就像我们给扎哈罗夫的文件那样，那么他死定了。他在州地方法院就可以被成功起诉。”

里根抗议道：“我们如何才能摆平这些事情呢？”他拒绝接受索费尔的解释。索费尔回忆说：“总统一直坚持自己的观点。”索费尔也在坚持。“我没有放弃，继续说下去。每次他问我问题时，我都直言不讳。最后我说：‘总

统先生，您一直在说真相。真相与司法制度没有任何关系。当然，您总是在设法得到真相，有时候您也能够得到真相，但假如您认为总能通过司法程序得到真相，那您就错了。那不是您想要的。您得到的是一个裁断，是有罪裁断或有罪推论。您不会得到真相，因为这里没有上帝，有的只是人们在努力进行裁断。我以一名主审法官和检察官的身份告诉您，您从审判丹尼洛夫司法制度这里得到的跟您从扎哈罗夫那里得到的是一样的。”

索费尔回忆道：“这些话对他产生了影响。我可以从他眼里看出这对他触动很大。他是个十分现实的人。事实上，他为自己的现实感到自豪。我可以看出这一点。但他一如既往地摇着头。‘好吧，亚伯拉罕，这在我看起来不合理——把一名努力想当名好公民的记者等同于一名职业间谍。’我说，从原则上来说的确如此。但在这件事上，关于丹尼洛夫这件事，结果都是一样的。”

尽管如此，里根依然不太甘心。舒尔茨感觉到他们待的时间太长，再待下去就不受欢迎了。他把索费尔拽到一边，准备告辞。索费尔回忆说：“我们向门口走去，我发现里根在自己的座位上不是很舒服，对此事感到焦虑不安。他起身送我们走到门口，十分不想让我们离开，继续问一些问题。于是，我转过身对他说：‘您看，您需要记住的关键一点是，丹尼洛夫是美国公民，他没有做错什么，只是被我们自己的中情局牵涉其中。如果我们无法为他进行合理交易，那他的余生就要在监狱里度过。’”

索费尔记得当时里根的反应。“他好像被一记左勾拳击中了一样。他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十分关心其他人。他意识到这件事牵涉到一个人，而不是简单的一场抽象辩论。”

但里根依然拒绝把扎哈罗夫和丹尼洛夫在道义上等同起来。里根在日记中写道：“他们的人是个被抓了现行的间谍，而丹尼洛夫则是个人质。”他坚持拒绝——哪怕是对他自己——进行交换。他在看了星期日早间新闻节目之后写道：“大部分节目都与丹尼洛夫有关。一些有关媒体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求对苏联的要求妥协。我对此置之不理。那样做简直是胡闹，他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三天后，他还在指责媒体：“媒体一直想着丹尼洛夫的事，决意要让我们所有人对苏联人让步。对此，他们当然要是与苏联打交道的下下策。但事实是没有人提出与我们进行交易，我们一直在让步。”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当时正在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秋季会议。他顺便前往华盛顿，讨论丹尼洛夫事件以及苏美之间的其他事务。里根向他发起了猛烈攻击：“我让这位外交部部长明白我非常气愤，对于他们指控丹尼洛夫是间谍感到憎恶，尤其是在我亲自递过话去说他不是间谍之后。我让他大致了解了一下我们两国制度的差异，并告诉他说，他们无法理解我们重视

个体的做法，因为他们不具备这种感受。”里根补充说：“我很高兴自己发火了。”

戈尔巴乔夫也很高兴发火，或者至少他发现发火在政治上是有作用的。他让谢瓦尔德纳泽带给里根一封信，他在信中重申丹尼洛夫一案需要进一步调查，他说自己希望可以在平静的气氛中进行。“然而，美国方面过分渲染这一事件。”他继续说道，“他们发动了大量反对我们国家的敌对行动，在美国政府高层和国会都有。看起来这好像是要故意找碴儿，试图破坏苏美关系，增加紧张态势。”

戈尔巴乔夫对于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感到很痛心。日内瓦会议的积极精神消耗殆尽，然而他不愿意彻底放弃这种精神。“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到要向您建议，总统先生，我们在不久的将来拨冗相见，进行一次面对面谈。比方说在冰岛或在伦敦，或许只需要一天时间，进行一个严格保密、私人 and 坦诚的讨论（或许只让我们的外交部部长参加）。此次讨论——无须过于详细，因为讨论的目的和意义是要表明我们的政治意志——将给我们各自的政府部门带来指导性命令，就2到3个非常具体的问题起草协议，等我前往美国访问时，你我可以签署这些协议。”戈尔巴乔夫最后写道，“静候佳音。”

这一要求里根无法拒绝。日内瓦会议之后，里根对于丧失外交发展势头感到很沮丧，他也迫切希望把丹尼洛夫解救回家。总统不再坚持区别对待扎哈罗夫和丹尼洛夫，让舒尔茨同谢瓦尔德纳泽安排交易事宜。这名美国记者未经审判从苏联监禁下获释，被允许离开这个国家。扎哈罗夫则被允许对于间谍指控不提出抗辩，也被遣送回家。戈尔巴乔夫给里根提供了政治掩护，允许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尤里·奥尔洛夫及其妻子移民出国。在扎哈罗夫获释的当天，美苏政府宣布，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将在10月的第二个周末在冰岛的雷克雅未克会面。



在超级大国的历史上，还从没有听说过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通知召开峰会。白宫方面在努力宣布冰岛为此次会议——“峰会前的预备会议”——而不是峰会的举办地，但这并没有平息人们对于举行峰会的怀疑。这些努力失败了。峰会一直是媒体的重大新闻事件，至少在西方国家是这样的。因此，媒体拒绝放弃“峰会”所带来的戏剧性事件和电视收视率。

怀疑者猛烈攻击里根。里根在政治生涯中第一次发现自己遭到了来自右翼分子的嘲笑。批评者们无法断定总统是否让自己被乔治·舒尔茨和政府中其他热衷于峰会的傻瓜所欺骗，或者，更让人警觉的是，此事是否表明其中潜藏着像缓和政策那样的妥协成分。里根认为他已经针对此类攻击做了充分准备，发誓要完全致力于战略防御计划，这也是保守派所喜欢的战略方针。他在一次全国广播讲话中说：“我们的战略防御计划研究不是谈判筹码。”他说自己将和戈尔巴乔夫讨论消除进攻性导弹，而不是防御体系。“需要减少的是进攻性核武器的数量，而不是削减让人类免受这些致命武器的攻击的努力。”尽管如此，媒体还是穷追不舍。战略防御计划是否会被提到与戈尔巴乔夫的谈判桌上来？还是作为削减进攻性核武库谈判的重要内容？面对源源不断的指责，里根回答说：“我们对于要求我们中止或者延缓研发、测试战略防御计划，要求我们关门歇业的回答是：没门。战略防御计划不是谈判筹码，而是通往更加安全、更为稳固的未来的途径。”

或许批评者们根本没有听进去，或许他们希望加深这些指责。无论如何，他们让里根明白，假如他在冰岛显示出丝毫的软弱，那么他将付出惨重的代价。乔治·威尔说政府“晕头转向地前去参加峰会”，并以嘲弄的口吻评述会议背后的逻辑：“政府认为阻止苏联理性的是苏联的神经恐惧症，而具有疗效的美国政策能够消除这种恐惧，尤其是提倡这一政策的是一位了不起的沟通大师，是一位从40年前在好莱坞工会斗争中就熟知共产党的专家。”查尔斯·克劳萨默警告说，“仓促举行峰会”对于美国利益来说凶多吉少。他写道：“所有的峰会都存在风险，而雷克雅未克峰会更是凶险至极。”他抨击里根用扎哈罗夫交换丹尼洛夫，担心类似缺乏原则和勇气的做法会在冰岛上演。罗兰·埃文斯和罗伯特·诺瓦克指责舒尔茨置总统于“四面楚歌之地”。这两位专栏作家写道：“在还有3个星期就举行选举之前，他要么满足戈尔巴乔夫的要求，要么空手而归。”共和党议员杰克·肯普也认为此次的时机选择非常不利，他说：“在下周举行关键的高层会晤是个错误的选择。”

里根的国家安全团队夜以继日地工作，为总统准备戈尔巴乔夫在冰岛可能抛给他的所有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在给里根的备忘录中写道：“我们下周前往雷克雅未克，几乎不知道戈尔巴乔夫打算如何利用此次会议。当然，当时在日内瓦也是如此，但这一次的不确定性可能更大。”国家安全委员会没有理由认为戈尔巴乔夫已经改变了他的长期目标：“分化西方国家对苏联采取的统一的、更加严厉的政策；稳固美苏关系，让他可以在国内政策中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在全球力量平衡中获得更为有利的地位。”军备控制是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之一，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负责人对此次雷克雅未克之战无法预测任何有意义的结果。关键问题是戈尔巴乔夫是否会同意于1987年在华盛顿举行峰会。在华盛顿更有可能达成军备控制方面的重大协议。这份备忘录提出了三种可能性：戈尔巴乔夫已经同意来华盛顿；他对于进一步会谈还没有最终做出决定；或者他决定只有在冰岛有所斩获之后才来华盛顿。这份备忘录写道：“可以想象得到，从现在起到雷克雅未克开会期间，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苏联研究人员开始露出端倪，暗示戈尔巴乔夫可能会选择哪条路线。然而，更有可能的是，您需要在会谈期间侦测出他的意图。”

乔治·舒尔茨做出了独立的判断。这位国务卿继续与温伯格斗争，力图改变总统的想法。他认为，国防部部长可能会警告说，雷克雅未克之行将不会有任何收获，而舒尔茨则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他对里根说：“对于此次会议，我们应当采取积极、自信和开阔的视野。美国人民都很支持，因此，我们不能妄自菲薄，或者放弃取得进展的机会。”舒尔茨并没有期望能在雷克雅未克取得突破性进展，突破性协议有望在下一轮华盛顿峰会达成。然而，他希望略微取得一些进展，或许在人权方面，尤其是在军备控制方面。“军备控制将成为关键，这并不是因为它是苏联想要的，而是因为我们把它引入到了谈判当中。这并不意味着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很容易对付，而是意味着我们渴望在那里取得突破的想法是正确的。”有可能达成削减弹道导弹框架协议，同样也可能达成中程核武器原则性协议。总统的立场以及美国的立场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坚定。舒尔茨说道：“您在6年前启动的政策让我们今天处于非常有力的地位。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努力实现真正削减核武器——这本身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成就，也是迈向您所设想的更加安全的未来的关键一步。”

戈尔巴乔夫也在为雷克雅未克之行做准备。戈尔巴乔夫认为，由里根发起有关军备控制的实质性进展机会非常渺茫。他对政治局说：“我坚信，在美国统治阶层内部，他们不希望出现缓和局面，不希望减缓军备竞赛。目前这一点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他们不会允许我们扩张我们自己的计划，不会让我们提升我们制度的活力，不会让我们强化我们的民主。”然而，

在这场战争中，苏联赢得了世界的支持。戈尔巴乔夫说道：“现在，在联合国及斯德哥尔摩，每个人看起来都支持我们。的确，他们没法否认我们的倡议。”美国统治阶层已经注意到了世人对苏联倡议的友好态度。“这是让美国人害怕的地方，促使他们试图破坏我们的计划，用军备竞赛来播下不信任的种子，包括在我们人民内部以及对我们的政策的不信任。”

戈尔巴乔夫怀疑，即使里根愿意，他也无法克服美方的阻力。戈尔巴乔夫预言说：“与这届政府很有可能什么也实现不了。”他曾与不同的西方国家领导人交流过，包括加拿大的皮埃尔·特鲁多。“特鲁多警告我们说，我们将无法与里根达成协议，因为他是某些势力的产物，受到这些势力的任命与支持。”但特鲁多要求戈尔巴乔夫把眼光放远，超越里根。“他说，您在做正确的事情，你们的做法已经传到了国会的耳朵里。”

戈尔巴乔夫不打算放弃里根。他意识到，美国总统不会那么容易被说服。戈尔巴乔夫对自己的幕僚说道：“为了能够打动里根，我们需要给他些什么。我们需要施加压力，采取可能取得突破的行动。我们自己必须意识到什么是切实可行的，美国在虚张声势些什么，我们打算做什么，以及我们现在可以从中获得什么。”戈尔巴乔夫说，在雷克雅未克他将以战略武器问题作为先导。“在所有问题当中，战略武器问题让每个人都关注。我们必须强调我们提议消除核武器，在日内瓦我们已经同总统讨论过这一问题。谈判必须全力实现这一目的。”

戈尔巴乔夫猜测，里根一定会坚持战略导弹防御计划。他认为，这对苏联来说是个能带来胜利的问题，即使它可能会妨碍签署更广泛的协议。“在雷克雅未克，我会告诉里根，我们的反应将是积极的，我们不会从你希望的角度出发。我将直盯着他的眼睛这样说：如果您不妥协让步，那在我们面前我问心无愧。我只能向苏联人民和全世界解释为什么我们一无所获。”里根将难辞其咎。

作为谈判者，戈尔巴乔夫尊重里根，并不期望对方能在雷克雅未克有所妥协。他说道：“如果我们的提议有可能削弱美国的安全，那么什么结果也达不到。”双方在谈判期间必须有共通之处。“因此，谈判原则应该是这样的：在平等削减武器装备的情况下，增加双方的国家安全。”戈尔巴乔夫致力于军备控制，因为他认为军备控制对苏联的未来至关重要。“我们的目的是要阻止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只会增加我们面对的威胁。如果我们在一些问题上不妥协，即使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那我们也会丧失主要利益。我们将被迫参加超出我们能力范围的军备竞赛，我们会输掉这次竞赛，因为我们当前已经处于能力的极限。”这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戈尔巴乔夫重申道：“如果新一轮竞赛开始，我们的经济所承受的压力将无法想象。这就是为什么对我们来说，避免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是重中之重。”

即便如此，戈尔巴乔夫认为他不能接受里根关于战略防御的立场。他对自己的助手们说：“我看过关于战略防御计划的所有资料。我们必须把我们所有的资源用于发展我们自己的反战略防御计划。”这一定是当务之急。“我们一定不能让美国在这一问题上抢占优势。到目前为止，据我所知，我们可以以较小的代价达到这一目标。如果美国人不接受协议，那我们将告诉他们，我们将采取他们想象不到的行动。”

戈尔巴乔夫听到过美国保守派反对冰岛峰会的声音。这让他认为更难以与里根谋事。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局说：“右翼分子很关注雷克雅未克会议，他们在威胁里根。我们再次听到了增加边境自由的呼吁，他们再次提到了改革运动，威胁要把社会主义推向历史的垃圾堆。里根现在正在为自己同意前往雷克雅未克安抚右翼分子。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此次会谈将非常艰难，不排除失败的可能性。”

戈尔巴乔夫说，美国总统清楚，自己在宣传战中已经失利。“里根明白——来自特鲁多的消息也证实了这一点——极端分子向他建议的行动路线并不能为世界所接受。他自己发现了一条出路，即为会谈而举行会谈。”然而，一旦来到冰岛，他就感觉到了取得实质性内容的压力。“全世界人民都要求取得建设性成果，里根也需要借此实现个人的雄心壮志，这样就能以‘和平总统’而名留青史。中期选举马上就要开始了。”

然而，如果里根需要在雷克雅未克取得成功，那苏联也需要如此。戈尔巴乔夫再次提到控制军备竞赛的必要性。他说道：“在这一中心指导下，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美国方面有意让谈判机器徒劳空转，而军备竞赛却超出了我们的经济承受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取得突破。我们需要这一过程来行动起来。”戈尔巴乔夫概述了一下严峻的形势：“当务之急是要阻止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否则，就要实现战略武器现代化。美国的三叉戟战略武器系统和民兵式洲际弹道导弹会携带武器进入太空，这将劣化我们的生态、战略和政治安全——这将是全方位的失败，因为我们的经济将首当其冲地被拖垮。这是不能容忍的，这也是为什么不能局限于细枝末节，而无法看到细节背后更大的画面，不能因为细节之争而忽略大局。倘若他们开启针对我们的第二轮军备竞赛，那我们就输定了！”

有一个人没有为雷克雅未克之行做准备，此人就是南希·里根。上一次在日内瓦参加峰会的经历并不太令第一夫人满意。她在提到日内瓦时说：“我对第一次与赖莎·戈尔巴乔娃会面有些紧张。我不知道能与她谈些什么。”南希很快意识到沉默并不是问题。“从我们见面的那一刻起，她就一直说啊，说啊，说啊——她这么能说，期间我几乎插不上话。”苏联第一夫人仿佛非常喜欢自己的嗓音。“我对赖莎·戈尔巴乔娃最主要的印象

是，她从没有停止说话，或者更准确地说，她从没有停止过训诫别人。有时候主题是关于苏联和共产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时是关于苏联艺术，更多情况下，是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有那么一两次，她甚至就美国政治制度的缺陷教训我。我对此没有准备，也不喜欢。”

南希认为，对于一个社会主义者来说，赖莎·戈尔巴乔娃非常专横。她说道：“在日内瓦的第一天，当她前来喝茶的时候，她给我的印象是希望别人对她言听计从。当她不喜歡自己坐的椅子时，她打了个响指叫来克格勃侍卫，他们马上给她调换了座位。在新座位上坐了几分钟之后，她觉得自己也不喜欢这个地方，于是又打了一个响指，他们又给她换了座位。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曾见过许多第一夫人、公主和女王，但我从没见过这样做事的人。”

赖莎·戈尔巴乔娃在苏联使团驻地举办了一次茶话会。南希回忆说：“大厅挂满了孩子们的绘画作品，赖莎坚持让我观看每一幅作品，而她则站在后面介绍作品的意思。我感到自己的身份被降低了，我当时想说：‘够了，你没必要告诉我什么是导弹，我看得明白！’”赖莎带她前往举行茶话会的房间，说道：“欢迎光临，我想让您看一下什么是典型的俄罗斯茶。”南希写道：“桌子上放着一把可爱的俄式古董茶壶，旁边放了一排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鱼子酱薄饼、卷心菜卷、蓝莓馅饼、小饼干、巧克力、蜂蜜和果酱。我不可能每样都吃，最后不得不放弃。这是一次丰盛的宴会，但如果这是普通家庭主妇的茶点，那么我就是叶卡捷琳娜二世。”

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杰克·马特洛克建议她待在家里，不要前往雷克雅未克。南希在日内瓦的经历使她愿意接受这一建议，以防戈尔巴乔夫把赖莎带去，让这次公务谈判演变成常规峰会中的社交陷阱。里根从不喜欢与南希分开，但他接受了马特洛克的建议。苏联政府被告知里根夫人将不会出席。然而，戈尔巴乔夫夫妇要么忽略了这一暗示，要么误解了这一暗示，因为克里姆林宫方面表示戈尔巴乔夫夫人将会出席。

南希回忆说：“这让我处境尴尬。难道仅仅因为她去，我就要前去吗？”她仔细权衡了这件事。“我决定不去，赖莎最后时刻的态度转变让我认为她有些高人一等的做派。我在华盛顿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我想她知道这一点，我也不想改变计划。此外，正如我儿子罗恩所说的，我不能被耍弄，这一点很重要。我感觉赖莎在考验我，想看一下我是否会屈服，改变想法。但她必须知道计划是很早以前就安排好的，因而我决定不屈服。这次只是一次会谈，而不是正规的峰会。据我所知，事情就该如此。”

唐纳德·里甘认为，南希决定留在家裡不到冰岛这件事与她的星象师有关。

这一次里甘意识到，即使是峰会这样的事也没有超越南希的信仰。在计划日内瓦峰会时，他就感觉到了这种影响力。里甘写道：“与以往一样，里根夫人坚持过问总统的每一次出行，这样她就可以从星象学角度咨询旧金山的朋友。那位可怜的妇女一定背负着沉重的负担，针对大量细节，她不但要为我们这个地球上两个最有权势的男人选择会面的黄道吉日，而且还要绘制星象图，提供戈尔巴乔夫的性格特点以及可能的行为举止。”

里甘认为这一切荒唐可笑，但他意识到这无法避免。当琼·奎格利执意坚持南希不要前往冰岛的时候，里甘很不高兴。他写道：“在广泛咨询了朋友的意见之后，里根夫人决定不陪丈夫前往冰岛。”但奎格利还是影响了此次峰会。“里根夫人还向她的朋友咨询了总统出发的最佳日期。这位星象师告诉我们说，10月9日星期四是良辰吉日。我们将这一日期列入日程安排中。”

冰岛政府乐于将此次会谈称作是一次峰会，因为他们以及他们国家的人民很高兴能因为美国总统和苏联总书记的来访而成为关注的焦点。民意似乎倾向于戈尔巴乔夫。雷克雅未克一家宾馆的市场部主任跟记者们说：“现在苏联人在冰岛得到支持，因为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此次会面，因而人们认为他更真切希望进行军备控制。”戈尔巴乔夫也因为带赖莎前来而赢得了支持。但里根因美国文化在冰岛生活中的声望获益匪浅。雷克雅未克的两家迪斯科舞厅被命名为好莱坞和百老汇（第三家被称作克里姆林宫），当前最流行的电影则是歌颂美国海军航空兵的《壮志凌云》。

会议对于当地的经济也大有裨益。宾馆的入住率是平时的4倍，饭店和出租车行业也获得了类似的意外之财。雷克雅未克市市长希望此次超级大国峰会——这是他直截了当的称呼——可以带来会议经济的大发展。他说：“如果我们对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招待得很好，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承办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会议呢？”该国旅游局局长则更为谨慎，祈祷不要发生重大问题。他说：“如果本周末发生不测，那么冰岛就可能卷起行李走人，一直退回到北极地区。”

两位领导人在星期六上午10点30分同时到达赫夫迪大楼。他们握手致意，面对镜头微笑，然后走进大楼，再次握手微笑。他们在各自外交部部长乔治·舒尔茨和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陪同下一同进入会议室开始工作。

戈尔巴乔夫消除世界核武器的提议依然让世人感到振奋，并继续让里根在公共关系中处于劣势。总书记立即开始施压，他说：“我希望明确地、坚定地、清楚地宣布我们支持这一解决方案，这将最终为彻底销毁核武器做好准备。”

戈尔巴乔夫承认这一动作很大，却是可行的。只有适当考虑双方的安全利益才可以实现。他说：“任何其他方案都是不明智的、不现实的，也是难以承认的。”他希望总统也这样认为。

里根点头道：“我们也是这样认为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对签署协议的诚意。总统并没有回应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消灭核武器建议，相反，他采用了杰克·马特洛克帮他找到的一个俏皮话。里根说道：“有一句俄罗斯谚语说得好，‘信任，但要核查’。”

戈尔巴乔夫笑了，说他知道这句谚语，也同意信任是至关重要的。他指

出，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不远万里来到雷克雅未克：“这里几乎刚好处于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位置。”

里根说，他之所以没有选择伦敦而选择了雷克雅未克，是因为雷克雅未克比较偏僻，因而更适合私人谈话。他问戈尔巴乔夫是否想好何时访问华盛顿。

在此次会谈期间，杰克·马特洛克一直坐在里根旁边。在提到总统询问戈尔巴乔夫华盛顿之行的时候，马特洛克回忆说：“我当时想，糟了。”马特洛克认为里根有些急于求成。“戈尔巴乔夫不会讨论具体日期，除非他清楚地意识到可以达成什么样的协议。关于这一点我们曾反复提醒里根，建议他冷静处理，不要显得不计后果，只想会会谈。他也一直同意，但当时在雷克雅未克，他迫切想要向戈尔巴乔夫展示美国的诚意，这影响了他的判断。”

如果戈尔巴乔夫认为里根显示出了自己的意图，那他没有通过任何公开行为显露自己的意图。他说在华盛顿举行峰会的具体日期不及在此处取得谈判成功重要。对双方来说，重大的军备控制协议非常重要。他说道：“你我都不能让随后的会谈失败，这将是非常严重的打击。人们可能会问那两个会谈的家伙到底是什么样的政客，他们说了那么多的废话，谈判了那么长时间，举行了一次、两次、三次会谈，却依然达不成任何协议。这一结果将令人颜面扫地，其后果令人难以推测，很可能在全世界引发失望之情。”

戈尔巴乔夫提出了那个周末的第一个建议。作为消除核武器的开端，他提议削减50%的战略进攻性武器——通过远程导弹和轰炸机发射的武器。他也提出了那个周末的第一次让步，当时他接受了美国关于在欧洲部署中程导弹的决定。克里姆林宫方面一直反对里根的无选择裁军，认为这是让美国不劳而获——放弃苏联真实的导弹，换取美国概念中的导弹。但是美国人已经开始部署潘兴导弹和巡航导弹，因此，利益权衡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戈尔巴乔夫接受了无选择裁军。他说道：“我们同意做出大幅让步，我想您应当理解，我们这是迈出了多么大的一步。”随后，他又同意签署为期至少10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他说，苏联对这一条约的理解是，允许进行战略防御计划的技术测试，但仅限于实验室内。

里根并没有期望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有如此大的收获，但他希望得到的更多。他对戈尔巴乔夫说：“您所表现出来的诚意让我们备受鼓舞。”他说，他也在寻求大幅削减核武库，但他必须指出，双方之间还存在重要分歧。比方说，戈尔巴乔夫没有提到亚洲的中程导弹问题。中程导弹机动性很强，以亚洲为基地的中程导弹可以快速地移动到欧洲。



然而，更大的问题是，戈尔巴乔夫一直坚持战略防御计划必须限制在实验室内。美国人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理解是，可以允许研究和测试，哪怕是在实验室外，但不能部署新的系统。里根声称，对美国来说，战略防御是不容进行谈判的，战略防御处于美国立场的核心地位。他说道：“关键问题是，战略防御计划可以真正消除核武器。”里根重申了自己早期关于战略防御计划技术的观点：“苏联也在研究防御性武器，双方应当在反弹道导弹条约的限制内进行研究。如果任何一方达到了他们认为能够超出反弹道导弹条约限制的范围，那他们将在有对方国家代表出席的情况下进行测试。比方说，如果美国率先达到这一水平，那么苏联代表将受邀来见证这一实验。如果测试表明该系统是切实可行的，那么我们有义务分享它。”里根说，美国不能取消战略防御计划，他说道：“原因就在于我们无法保证将来有人——比方说，像希特勒一样的疯子——不会制造核武器。”

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他希望总统的谈话只是初步内容。苏联方面已经做出了重大妥协，因此，总统需要予以适当考虑。戈尔巴乔夫表达了对反弹道导弹的疑惑：“我们提出要维持和强化这一条约，而您则提议放弃这一条约。我们希望维持，而您希望破坏。对此我们无法理解。”

戈尔巴乔夫说，他希望美国不再继续进行战略防御计划。但如果美国坚持进行，那么苏联也将做好应对准备。他说道：“我们将对此做出反应，但方法会不一样。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将会把军备竞赛转移到新的环境当中。如果这是美国所希望的，那么就可以理解美国为什么提出这样的提议。然而，最终的形势将会更加危险。”

里根无法断定戈尔巴乔夫固执的表现到底是为了达到目的还是有意虚张声势。他回答说，总书记这是在拒绝考虑战略防御的核心内容。他说道：“如果战略防御计划研究成功的话，那就有可能消除核武器。有人指责我们说，我们希望拥有率先发动进攻的能力，但是，我们所提出的条约是要求在采用战略防御计划之前就消除核武器。因此，率先进攻是不可能的。”战略防御是针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一种防御措施。“‘一战’之后禁止使用化学武器，然而，我们没有拒绝防毒面具。它们是一种防御措施，万一有人决定使用化学武器的话，它们可以保护我们。”

戈尔巴乔夫回答说，他们在日内瓦期间曾讨论过这一问题。打那以后，苏联方面仔细考虑过，但没发现有理由改变自己的观点。

意识到谈判陷入了僵局，里根看了看手表，到了吃午饭的时间了。他说：“我们将继续这一讨论。”

打从演员工会开始，里根从没有像他与戈尔巴乔夫这样进行过针锋相对的谈判。他与电影公司老板和其他工会之间的斗争尽管在当时看起来也很重要，但比起同苏联领导人的争论，那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里根记得自己为什么喜欢谈判：他喜欢平等交换意见的氛围，喜欢斟酌词句来消除分歧，喜欢测试与不可小觑的对手交锋的勇气。他与戈尔巴乔夫交谈得越多，这个对手看起来就越令人敬畏，而里根也更愿意通过他来测试自己。

等到下午谈判开始的时候，双方都认识到战略防御计划是两人想取得重大交易的障碍。戈尔巴乔夫不会让美国人在实验室之外进行战略防御计划，而里根则不同意将其局限在实验室里。

问题是双方是否能够妥协。里根首先发言：“今天上午在听您的发言时，我非常同意削减军备是当务之急，采取切实行动的时间已经到来。”协议即将达成，戈尔巴乔夫只需放弃他对于战略防御计划的限制。里根说道：“您担心防御可能被用于进攻，我可以向您保证，这不是战略防御计划的初衷。”这一系统完全是防御性的。戈尔巴乔夫表示非常关注美国可能会利用战略防御计划来发动针对率先攻击的报复性打击。“我想说的是，我们不具备进行率先打击的能力，这也不是我们的目标。”

里根说，问题的答案不是减少防御，而是减少攻击。他提出了那个周末他的第一个全新的建议：“您所表达的担忧促使我提议起草一份协议，消除所有进攻性弹道导弹。”里根说，在目前来说，戈尔巴乔夫想要彻底消除核武器的想法让人难以接受，但消除弹道导弹是可以实现的。这也可以解决戈尔巴乔夫对于战略防御计划率先攻击的担忧。“关于进攻和防御系统的结合可能会让其中一方实施率先攻击的问题将自动消失。”

戈尔巴乔夫不为所动，但他改变了立场，希望能达成一笔小交易。他又回到中程导弹话题上来，重申自己接受美国在欧洲的无选择裁军，并提出讨论亚洲的中程导弹问题。他总结说：“在欧洲实施无选择裁军，在亚洲进行谈判。”美国会接受这样做吗？

乔治·舒尔茨一直在让里根发言，但这一次他说道：“问题是——”

戈尔巴乔夫打断他，说道：“我想听一下总统的意见。”他重复道：“如果亚洲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案，您会同意在欧洲实施无选择裁军吗？”

“是的。”里根说道。

戈尔巴乔夫希望能敲定此事。“我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呢？假如亚洲问题找到了解决方案，您会同意在欧洲实施无选择裁军吗？”

“是的。”里根再次说道。

戈尔巴乔夫点点头，对于能得到确定的协议显得非常高兴。他继续说道：“现在，我们谈一下其他事情，我指的是开放性的反弹道导弹条约问题。”他又回到战略防御计划中来：“我们真的能够违反这一协议而不强化它吗？如果我们真的想要裁减军备，那么双方必须要确保在此期间不会有人研发新的武器，破坏稳定与平等。”他提议，10年内不要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这将使双方在裁减进攻性武器期间获得信心。“否则，当有人在裁军期间在你背后搞小动作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危险。”他又补充说，“同时，您的战略防御计划将限制在实验室研究阶段。”

里根摇头表示反对，他再次为战略防御计划进行辩护：“我敢肯定，这是确保我们这一世纪和平的最佳选择。”他重申，美国不会寻求优势地位：“我们建议在条约中写上——我们愿意与你们分享我们所研发的防御性武器。”

里根在讲话的时候变得情绪激动。他的一些感情可能是装出来的，但大部分是真诚的。长期以来，里根一直梦想着能有一个没有核战争的世界，而最终他或许有能力把人类带入到这样的世界。他说道：“请注意，我们两个文明的国家，两个文明的民族。在我成长的过程中——这比你更早——国家之间制定了战争法则，旨在保护和平的人们。但现在，既然存在反弹道导弹计划，两个国家都拥有致命的导弹，互相瞄准对方，可以杀死无数生命，主要是非战斗人员——妇女和儿童，防止这种可能性的唯一办法就是威胁对方——我们也有能力实施这种大规模的屠杀。这是一种野蛮状态。”战略防御让人类有望摆脱这一窘境：“假如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能够树立榜样，建立防御系统并消除致命的现代化武器，那么，我认为世界将变得更加文明，我们也能够骄傲地注视着世人的眼睛。”

戈尔巴乔夫不为所动，说道：“我更愿意从实践的角度，而不是哲理的角度来回答问题。”总统坚持战略防御计划，这将不会消除世人的恐惧，只会把军备竞赛推向新的方向。他说道：“我们的反应是不同的，不对称的。我们不会采用战略防御计划，我们有另外的想法。”新的军备竞赛会非常昂贵，也会妨碍总统所期望的军备削减行动。

里根再次进行了尝试，重申双方可以分享他们在战略防御计划中的研究成果。

戈尔巴乔夫显然被激怒了，打断他的话，说道：“对不起，总统先生，我完全不赞同您关于分享战略防御计划的想法。您甚至都不愿与我们分享石油设备、自动机械工具或奶制品工具，因此，分享战略防御计划简直就是第二次美国独立战争。战争不会那么频繁地发生，因此，还是让我们现实

一些吧，这样更为可靠一些。”

里根声称自己是认真的，说道：“如果我认为战略防御计划不能分享，那我自己也会反对。”

戈尔巴乔夫耸了耸肩膀，说他认为总统并不了解战略防御计划的实质。

星期六的会谈就在这种充满敌对的氛围中结束了。

然而，里根并不感到沮丧，他明白自己正在从事工作的特殊性。在美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位总统与苏联领导人直接进行过重大的削减武器谈判。以前的谈判一直是通过中间人进行的，在艰苦的谈判工作之后，由当事人交换签字。在世界历史上，还从来没有哪两个大国的领导人曾经为全球这么多国家、这么多人的非同寻常的事务展开辩论。从字面意义上，我们几乎可以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把人类的命运掌握在他们手中。权力和责任令人生畏，甚至令人感到恐惧，一次错误就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但里根并没有胆怯，当然也没有感到恐惧。当晚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非正式宴会上，他显得精神矍铄。他说，白天的谈判没有达成协议，但他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坦诚的交流，确定了依然让双方产生分歧的问题。在经历了几个月意见相左的交流之后，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进步。刚过9点，他就上床睡觉了，并且睡得很好。

周末最后一次会议在星期天上午举行。会议一开始，戈尔巴乔夫讲了一个笑话。《圣经》上说，天地万物开始于第一天，然后是第二天，等等。他和里根总统现在处于第二天，因而在第七天休息之前，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戈尔巴乔夫的记录员谨慎地把这段话从苏联的会议记录中删除了。）

戈尔巴乔夫提议重新审视目前的进展，邀请里根首先发言。总统说，他对所取得的成就表示失望。两位领导人都有意消除世界核武器，这一点很好。他们的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双方都接受裁减50%的战略武器库，这一点也很好。但是，令人烦恼的细节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在中程武器方面，双方接受在欧洲实施无选择裁军，却没有拿出解决亚洲导弹问题的方案。换句话说，他们没有达成可以列入条约的协定。最艰难的问题是战略防御问题，里根说道：“我们在此存在分歧，我无法从我宣称的太空和防御武器领域后退，我实在无法这样做。”

戈尔巴乔夫同里根一样，对于谈判没有取得进展感到失望。他指责总统，说道：“我们向美国做出了重大让步，希望能推动军备控制谈判，切实减少核武器。给我的印象是，美国方面没有考虑我们的立场。”他再次重申，苏联方面已经接受美国在欧洲实施的无选择裁军计划。那美国方面提供了什么样同等的实质性内容呢？戈尔巴乔夫对里根是否真的希望达成协议表示怀疑：“当你仔细倾听美国人的立场时，你会感觉到美国总统及政府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你和你的人们认为，我们比美国更愿意进行核裁军，因而，只要对苏联施加一点点儿压力，它就会举手投降。这是一个非

常危险的错误。”

戈尔巴乔夫强调说，通向有意义的军备削减的大门不会永远敞开。“一年前，情况并非如此。当时，苏联并没有提出重大的妥协性提议，两三年前也没有。当时，我还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不敢保证，1~3年之后我依然具备这种能力。如果我们不利用这次机会，那会发生什么事情呢？雷克雅未克只会成为过往云烟，不会被人们记住。错过这一切会让人感到遗憾。”

里根点头说道：“我的处境也是如此。不久前，我也不具备现在拥有的权力。为什么不利用我们这次机会来做出贡献呢？创造一个没有核威胁的世界呢？”

戈尔巴乔夫把这一问题抛给了里根，说道：“当我坐在您对面，坐在美国总统对面的时候，我可以看到您的眼中问心无愧。我们带来了能够产生深远影响的提议，我请求您理解这一点。达成协议需要一件事情：你方的意愿。”

戈尔巴乔夫说，阻碍战略武器削减的障碍是总统坚持要对战略防御计划实施无限制测试。他再次请求里根重新考虑。苏联方面的提议比总统所理解的更具包容性。“在实验室试验框架内，我们没有触及战略防御计划。我认为这也不会对您造成太大影响。”戈尔巴乔夫说，他已经知道美国在战略防御计划中的进展：“我们知道2~3年之后，你们会取得某些突破。而我们自己也在着手从事某些事情。因此，实验室阶段限制不住你们的。”里根说，自己无法给戈尔巴乔夫他所希望得到的东西。他曾发誓说不会拿战略防御计划进行交易。“我无法改变自己的立场，无法否认对自己人民的承诺。”他重复说，战略防御计划威胁不到苏联。美国愿意分享技术，这将帮助双方自我保护，防止来自第三方国家或核战狂人的侵害。

戈尔巴乔夫重申，苏联方面并没有要求总统放弃战略防御计划，只是要求在经过强化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框架内重新进行定义。“我们现在给你们这次机会，说明你们的这一想法是充满活力的，我们不会埋葬它，美国也可以继续在实验室进行战略防御计划研究，但是一定不能超越研究框架。至于核战狂人，我们也可以在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框架内尽量解决这一问题。”

里根变得很暴躁，回答道：“对此我无法确定。真是的，您在维护什么样的协定呢？”反弹道导弹条约强化了核力量的现状，而这是他试图推翻的。“我不清楚反弹道导弹条约魅力所在，事实上，它只是表明能够保证共同毁灭。我们现在进行谈判是要消除核导弹，是要讨论我们如何才能不再受到核威胁，不会有人按下核按钮毁灭一切。”这是他们应当关注的地方，而不是要冻结现状。“即使我们毁掉这些导弹，我们也必须要有针对

他人的防御系统。妖怪已经从瓶子里跑了出来，有可能再次打造进攻性武器。因此，我提议，为世界的未来创建防御系统，届时你我都已不存在。”

戈尔巴乔夫认为里根不大信任反弹道导弹条约。这是过去10年中保持核稳定的基础。他再次要求总统让步，配合苏联方面已经做出的努力。“正如美国谚语所说：‘一个巴掌拍不响’。军备控制也需要双方努力，来削减和消除核武器。”

里根表达了自己的失望，认为戈尔巴乔夫好像担心战略防御计划是美方试图领先苏联的策略。他说道：“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对你们没有丝毫敌意。我们承认我们双方的制度存在差异，但我们认为我们两个国家完全有能力作为友好的竞争对手共同存在。我明白你们不信任我们，就像我们不信任你们一样。但是，我坚信历史是站在我们一边的。多年以前，卡尔·马克思曾说过——”

戈尔巴乔夫打断了他的话，说道：“您之前提到过列宁，现在您又提到了马克思。”

里根并没有被打断，继续说道：“马克思所说的一切，列宁也说过。马克思先说的，列宁是他的追随者。”他们两人都说过，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必须在全世界取得成功。这一直是苏联领导人的立场。“或许您还没有就此发表您的观点，或者您不相信这一点。但到目前为止您还没有提到过，但其他人都说过。”

戈尔巴乔夫不屑一顾地说：“您又在说马克思和列宁。许多人都曾试图要贬低这一著名社会思想论断的创始人，但没有人能够做到，因此我奉劝您也不要在这方面浪费时间。”

戈尔巴乔夫耸了耸肩，说道：“我不想与您争辩，我尊重您的独立性和您的思想观点。我相信，如果我和您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观念，这也不是你我互相攻击的理由。相反，我认为，除了政治关系之外，我们之间也可能存在完全的人际关系。”

里根回答说：“毫无疑问。”他面带微笑补充说：“我甚至愿意说服您加入共和党。”

戈尔巴乔夫回答说：“这很有意思。”他又回到战略防御计划上来，开玩笑说他是在帮里根的忙。“我认为我这是帮助总统实施战略防御计划。毕竟，您的人民说假如戈尔巴乔夫猛烈攻击战略防御计划和太空武器，那就说明这种思想更值得尊重。他们甚至说，假如换成别人的话，根本没有人

会愿意听这种思想。”如果这些人说得没错，那总统应当表示感谢。“在这件事上我站在您这一边，您却并不领情。”

里根并不认为战略防御计划可以拿来开玩笑。他的笑容消失了，责问道：“如果我们消除了核武器，那反弹道导弹或者其他那些东西又有什么作用呢？”

戈尔巴乔夫回答说：“总统先生，您刚才发表了一个历史性声明：如果我们消除了核武器，那战略防御计划又有什么作用呢？但正是因为我们在努力削减和消除核武器，我才支持反弹道导弹条约。在这些情况下，它变得尤为重要。”

里根尝试使用另外一种策略，他说道：“我是现场年龄最大的一位，我明白‘二战’之后各国决定宣布放弃使用毒气。但感谢上帝，防毒面具依然存在。对于核武器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为了防止意外，我们应当具备防护能力。”

戈尔巴乔夫说：“我越发相信之前我通过二手渠道得到的信息，那就是美国总统不愿意妥协。我现在明白，在反弹道导弹条约这一问题上您不打算对我们让步，但这一问题绝对是我们采取大规模削减核武器的关键条件。”

他停顿了一下，显得有些疲倦。他说道：“我发现不可能达成协议。”他已经竭尽自己所能了。“我想我们可以到此为止结束会谈。”他们两人没有达成他所希望的结果，也没有达成世人所希望的结果。“但我们必须考虑现实问题。现实就是我们无法针对这些问题拿出双方都同意的提议。我与您探讨了大规模削减核武器的可能性，但如果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命运不明确，那么整个构想都会坍塌，我们又会回到雷克雅未克会谈之前的现实中去。”

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反思，说道：“或许您可以向国会汇报这一点，而我们则向政治局和最高苏维埃汇报。我认为世界不会停止不前。事情还会发展，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会继续。但我们没有成功利用当前的机会。”

里根没有退让，但他也不准备放弃。他问道：“我们就这样空手而归吗？”

戈尔巴乔夫冷淡地说：“很遗憾，我想是的。”

舒尔茨和谢瓦尔德纳泽提醒他们的老板说，他们必须发表联合公报。他们交换了看法，寻找一些不完全是带有负面意义的语言。

戈尔巴乔夫变得不耐烦起来，说道：“总统先生，‘未知时刻’马上就到了，



您将如何行动？”

舒尔茨抢在里根前面发言，他说自己准备的一些措辞可能会适合双方要求。他开始读了起来。

刚读了几个单词，戈尔巴乔夫就打断了他，说道：“我们不能接受这种说法。”但他说愿意让舒尔茨再尝试一下，要更详细一些。他说：“或许，如果总统不反对的话，我们可以宣布休会一到两个小时。”

里根点头同意，双方开始休会。

几年来，里根从没有这样长时间高负荷地工作过，他几乎筋疲力尽。他曾指望可以返回白宫与南希一起在周日吃晚饭，但他意识到，他和戈尔巴乔夫正处于世界历史上一次伟大决定的边缘。假如他们可以在战略防御计划方面消弭彼此间的分歧，他们就可能让世界步入后核武器时代，后人也会感激他们、尊敬他们。在没有再次尝试之前，他不能离开冰岛。

这一次，舒尔茨在里根的许可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美方提出，在未来5年内，两个国家都要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中关于研究、开发和测试的规定。这一次，它们要削减50%的战略攻击性武器库。在未来5年内，继续削减它们的攻击性弹道导弹武器库，目标是在10年内彻底消除它们。只要削减行动在进行，那么双方就要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10年后，如果所有攻击性弹道导弹都被销毁，那么双方如果愿意，可以部署战略防御系统。

下午会谈开始时，戈尔巴乔夫提出了自己的反提案。他同意进行5年内两次削减攻击性弹道导弹的做法，也支持恪守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提议，尽管他希望从一开始就遵守这一条约，而不是像美国人提出的那样分成两个5年来执行。然而，他继续坚持要把战略防御技术的研究和测试限制在实验室内，实战测试必须等到10年期满才能开始。

里根没有正面回应。他说道：“我们提供了一个略有不同的构想。我希望可以消除我们谈判中的分歧。”他重复了舒尔茨起草的提议。

戈尔巴乔夫回应说，双方的立场存在明显差异。他说道：“在我看来，你们的设想没有同我们的立场达成妥协。苏联政策的主要方面是，在苏美进行深度裁减核武器的过程中，我们应当强化而不是削弱或破坏反弹道导弹条约。”总统坚持战略防御计划的做法恰恰会起到后一种作用。戈尔巴乔夫说，他的要求完全是在反弹道导弹条约精神下提出的。“我们谈判的要点就是要放弃测试任何反弹道导弹防御的太空武器——也就是说，要限制所有可能为部署此类系统铺平道路的行动。我想再次强调，根据我们的设想所采取的限制措施并不影响实验室内的测试，也为美国方面和苏联方面留有余地，可以进行任何与太空有关的实验室研究，包括战略防御计划研究。我们不是在破坏你们的战略防御计划构想，我们允许那种行动，美国方面也已经开始行动，我们也无法监测。我们只是想将这一系统置于实验室研究的框架内。”戈尔巴乔夫说，他所要求的并没有不合理之处。“我认为美国可以接受这一点，尤其是在考虑到苏联方面所做出的重大让步之后。”

里根摇了摇头，说道：“这并没有消除这样的疑问——假如我们在10年之后希望创建针对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那我们将如何行动。”他无法明白戈尔巴乔夫在战略防御方面的固执，说道：“我就是不理解，您为什么这么反对战略防御计划。”他又补充说：“关于反弹道导弹条约的限制内容和许可的内容，双方的理解存在分歧。”

对于里根坚持战略防御计划的做法，戈尔巴乔夫也感到难以理解。然而，戈尔巴乔夫的提议答应了总统所寻求的很多内容。戈尔巴乔夫说：“诚如您所看到的，我们提出了一种宽泛的构想，针对的就是10年后我们可以采取的行动。假如您认为这对于继续进行战略防御计划非常重要的话，我们可以展开讨论。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当即提前讨论这一问题呢？为什么要强迫我们签署战略防御计划呢？或许我们还有其他利益所在。”

里根毫不退让，他说：“我们希望马上开始采取防御战略，因为从现在开始到10年后，我们不再拥有导弹，而有些人可能会决定再次制造核导弹。”

戈尔巴乔夫要求里根关注双方已经达成一致的内容，关注双方可以采取的行动。他说道：“我们有能力完成历史性任务，消除战略攻击性武器。”他继续说道：“为什么要用一些我们还不确定的问题、我们还不确定的后果来让事情变得复杂呢？这样做只会破坏一方的信任——他们会怀疑自己削减核武器的做法是否正确，因为对方在同样条件下采取的行动可能会对整个过程造成不良后果。”戈尔巴乔夫重申，没有人在消除战略防御计划。“战略防御计划的科学研究依然可以继续下去，你们在那一领域具备了能力。我们的决定绝不是要扼杀你们的战略防御计划项目。”

美国在理解反弹道导弹条约时倾向于支持战略防御计划，里根为此进行辩护：“我们只是在反弹道导弹条约允许的前提下，提议进行此类研究、开发和测试。”他大声质疑苏联方面的反对是否比戈尔巴乔夫声称的还要多：“除非有些事物被隐藏起来，否则，怎么会有如此多的反对呢？”他再次重申愿意分享战略防御计划技术：“如果苏联方面需要，我们也会让他们得到这一技术。”里根补充说，如果一方有理由担心战略防御计划，那么这一方也应当是美国。“如果苏联感到很有必要强化反弹道导弹条约，那他们为什么不消除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的设备呢？”——苏联在该地区建立了一套雷达系统，美国政府认为这违反了反弹道导弹条约——“还有，他们在首都附近建立的整个防御体系。他们拥有庞大的防御体系，而我们什么也没有。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我们连一个对抗核攻击的防御设施也没有。”

戈尔巴乔夫否认这种指控，他说道：“我依然希望您可以仔细审视我们的提议。它包含了你我双方的建议，如果可以接受，我就准备签署。”

乔治·舒尔茨插话说：“您能否把这一构想用英语打印一份给我们，以便我们仔细审查呢？”国务卿问道。

戈尔巴乔夫点头同意。他再次试图说服里根，说道：“您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对我们来说，这是不可接受的。我们希望能有机会发现不同的事务。因此，我们的构想包含了未来10年后的局势。在此我总结一下我们的提议：10年之内双方将严格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并保证不会从这一条约中撤出。同时，继续进行实验室研究。10年期满之后，在完全消除核武器的情况下，双方将再次聚首，决定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并达成协议。”戈尔巴乔夫停顿了一下，说道：“我不明白，是什么东西让您感到困扰。”

里根用自己的一个问题进行回答。“如果我们销毁了所有的核武器，那您还有什么必要为对方考虑到自身安全的想法感到担忧呢？其他人可能会制造导弹，因此，额外的防护措施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你我双方正在彻底消除我们的武器。我可以想象到10年之后，我们在冰岛再次会面，销毁美苏最后一批导弹，到时候我会老得连您都认不出来我了，您会很惊讶地问：‘嘿，罗纳德，那真的是你吗？你来这儿做什么？’到时候我们将好好庆祝一番。”

戈尔巴乔夫并不感到好笑，说道：“不知道我能否活到那个时候。”

“我敢肯定我能活到那个时候。”里根说道。

戈尔巴乔夫说：“您当然会，您已经度过了人生中最危险的年龄段，现在您正顺利地活向100岁。但对我来说，这些危险依然存在。在人的一生中，这些危险会在60岁来临。除此之外，我还必须要与里根总统会面，我发现他真的不愿意屈服。里根总统希望能成为赢家。但在这件事上不可能有赢家——要么我们都赢，要么我们都输，我们在同一条船上。”

里根的幽默感也开始发挥作用了，他说道：“我知道我活不到100岁，如果我整天为这些可恶的导弹提心吊胆的话。”

戈尔巴乔夫说：“那我们就削减并消除它们吧。”

里根说：“现在的形势很特殊，我们都提出了具体要求，你们支持执行10年计划，而我们则说不会放弃战略防御计划。但很明显，我们双方都认为最重要的事情是消除核导弹。”

戈尔巴乔夫反驳说：“你们没有必要放弃战略防御计划，因为没人禁止在实验室内进行研究和测试，因此，你们可以继续战略防御计划框架内进行活动。你们的对手甚至无法开口反驳，尤其在已经消除了核武器的

情况下。无论如何，我都坚决反对我们会谈的结果最终导致一方为赢家，一方为输家。即使现在的确产生了这种情况，那么在下一个阶段准备协议草案期间，其后果也会显现出来，输的一方将会破坏所有成果。因此，无论是在现阶段还是下一个阶段，平等都是至关重要的。毕竟，在达成协议和最终执行协议之间还要经历很长时间。只有这份协议既包含了美国的利益也包含了苏联的利益，它才可以得到支持并予以实施。”

里根进行了不同的尝试，他说道：“或许我们可以这样来解决问题，有关反弹道导弹条约允许进行的研究、发展和测试的问题可以等到您将来访问华盛顿时再进行谈判和协商。这次我们将就10年期限和两个5年期限达成协议，在这一过程中要消除核武器，而其他与测试、实验室研究以及反弹道导弹条约条款有关的事宜我们将在峰会进行讨论。”

戈尔巴乔夫反对说：“但是，没有那些内容就没有一揽子协议。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彼此相关的。如果我们达成深度削减核武器协议，那么我们就必须保证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并在这一关键时期内强化这一条约。在这一历史时期内，我们将大幅削减战略进攻性武器。我重申一次，这一时期至关重要，仓促行事十分危险。”他又补充说：“我深信，坚持这一条约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里根的疲态和沮丧更加明显了，他说道：“看起来我们没有丝毫进展。”他重申，自己无法理解戈尔巴乔夫为什么对10年之后可能发生的事情如此担忧，届时所有战略导弹都将被销毁。“或许我们应当换一个角度看一下我们的分歧。”

乔治·舒尔茨再次插话道：“在我看来，我们之间存在两点分歧。第一，在10年期限内，哪些事是可以进行研究的。第二，在我看来，苏联方面认为他们无法肯定我们会在多长时间内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我们认为是10年。”

戈尔巴乔夫说道：“不，我们需要绝对明确的答复。我们认为，在进行削减核武器期间，需要进一步强化反弹道导弹条约，而不是弱化它。在这10年期间，我们双方都将受到限制，不能从条约中退出。10年之后，我们将拭目以待。或许我们会继续遵守这一条约，或许会出现新的因素。但是，在这10年期限内，这一条约必须得到维持，事实上应该得到加强。”

舒尔茨说道：“换句话说，在这10年期间，双方都不能从条约中撤出。10年之后，这一条件将不再存在，双方可以撤出条约。”

此时，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插话道：“请让我提醒您一下，还有一点，那就是不会对研究进行限制，但研究只能在实验室内进行。”

戈尔巴乔夫敦促里根像他在日内瓦那样采取行动，他说道：“总统先生，我记得在日内瓦事情是如何进展的。当时我和您坐在屋子里，喝着咖啡，心情很愉快，我们都认为会取得成功。国务卿舒尔茨走进来告诉我们事情的进展程度。他说，苏联代表团拒绝同意协议中的某些问题。当时您对我说：‘敲敲桌子，命令你的人达成协议！’我走了出去，15分钟之后，我们达成了协议。如果我们现在休息一下，而您在10分钟之内达成协议，那您可以把这当成是您的一次胜利。”

在里根回答之前，舒尔茨要求进一步澄清问题。戈尔巴乔夫曾数次提到消除弹道导弹，有时是战略进攻性武器，有时是笼统的核武器。戈尔巴乔夫心目中想的到底是什么？

戈尔巴乔夫说道：“要消除的武器包括所有的三合一战略核力量。导弹包括重型导弹、潜艇导弹和炸弹。”

舒尔茨解释说，美国的提议涉及攻击性弹道导弹。“这些导弹不但包括战略导弹——远程导弹，也包括中程导弹和其他导弹。您所谈到的是战略进攻性武器，那是不同种类的武器。”

戈尔巴乔夫对于细节问题的不耐烦再次显现出来，他说道：“我想昨天我们已经提到了，你们也同意了，我们要削减50%的战略核武器，包括像你们非常担心的SS-18导弹。我们能提出这一建议并不容易，但我们还是坚持这样做了，目的是避免陷入泥沼之中。因此在这件事上让我们再次统一起来，我们探讨的不仅仅是导弹，而且包括所有的战略攻击性武器。”

到这个时候，所有人都筋疲力尽，时钟显示的是下午4点30分。里根渴望登上飞机飞往华盛顿，与南希重聚，但他发现戈尔巴乔夫也很疲惫。他在工会时期就明白，疲惫有助于达成协议。

或许戈尔巴乔夫思考的也是类似的事情，他肯定能够熬过谈判桌对面的那个老家伙。

他们同意再次休会。

双方之间的差距很小，却也令人心碎。戈尔巴乔夫希望10年内把战略防御计划的测试局限在实验室内，里根则拒绝接受这种限制。而这种心碎更折磨人的是，此种差距几乎完全是政治方面的原因。没有人向里根表明，在戈尔巴乔夫的10年期限到期之前，战略防御计划能够摆脱实验室限制。里根是以原则为立足点，但是该原则与技术关系不大。他只是不想被人看作在战略防御计划方面有所让步。

里根再次把自己的团队召集到一起，他明确表明自己不会动摇，但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可能会动摇。毕竟到目前为止，戈尔巴乔夫已经做出了很大让步。或许他还能再次让步。有人建议再给戈尔巴乔夫一个晚上，让他考虑一下。里根脱口而出：“该死，不行。”他根本不打算在冰岛待到星期一，因此这一建议被取消了。

总统抖擞精神地再次进行尝试。回到会议室之后，他对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占用了您太长的时间，因为我们之间要达成协议并非易事。我们找到一种方案，可以满足你们所提出的10年期限的愿望。这是我们所能提供的最后方案。”里根宣读了他的提议，这一提议与他之前的提议从根本上讲是一致的。并且他保证在10年内不会从反弹道导弹条约中撤出，同时严格遵守其关于研究、开发和测试的规定。他继续谈到裁军问题：“在第一个5年期限内（直到1991年），双方的战略攻击性武器将削减50%。在之后的5年期限内，双方剩余的攻击性弹道导弹将全部削减。这样一来，到1996年年底，苏联和美国将彻底销毁所有的攻击性弹道导弹。到10年期满的时候，如果双方愿意，他们可以部署防御系统，只要双方没有就其他事情达成协议。”里根放下发言稿，问戈尔巴乔夫：“您认为这个构想如何？”

戈尔巴乔夫没有立即否认，里根认为这是个好兆头。戈尔巴乔夫说道：“在弄清楚美国方面构想的同时，我想问您两个问题。您提到了在反弹道导弹条约许可下进行研究、开发和测试。您的构想没有提及实验室测试这方面。您是特意这样做的吗？”

一开始，里根对这一问题闪烁其词，说该问题在日内瓦军事谈判中已经讨论过了。

戈尔巴乔夫步步紧逼道：“我现在问的是，您是否故意不提及实验室测试？”

里根承认道：“是的，这是故意的，有什么问题吗？”

戈尔巴乔夫说：“我只是要弄清楚这一点。时间关系我就不做评述了。第二个问题：构想的前半部分讲的是在第一个5年内双方的战略攻击性武器将削减50%，但在第二部分，也就是在第二个5年期限内，它提到了攻击性弹道导弹。这儿指的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

里根回答说，在休息期间，他得知苏联方面希望能特意提一下攻击性战略导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它包含在构想之内。”

戈尔巴乔夫说道：“这就引发了某种混淆。当谈到战略攻击性武器的时候，我们之间很早之前就达成了一致。它们包括三合一战略核力量的所有武器——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重型轰炸机。我不明白在这个问题上为什么发生了变化。”之前戈尔巴乔夫无视这些细节，现在却为这些小事固执己见。他在提到这两个5年期限的时候说道：“措辞必须要一致。”

里根问道：“我明白，那么到1996年年底，所有的战略攻击性弹道导弹都会被消除吗？”

戈尔巴乔夫坚持说道：“那些飞机怎么办？毕竟战略武器包括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弹道导弹和轰炸机。因此，我们之间都很清楚，战略武器都是些什么东西。”

里根回答说：“我想知道的是，所有攻击性弹道导弹都会被消除吗？”

戈尔巴乔夫再次表示反对，因为美国提议的第一部分提到的战略攻击性武器包括轰炸机，而第二部分却仅限于导弹。

里根问道：“这是您唯一反对的事情吗？”他无法判断戈尔巴乔夫的思路。

戈尔巴乔夫说：“我只是试图弄清楚这一问题。”

里根说道：“这一点必须要弄清楚。”

戈尔巴乔夫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两种构想统一起来。如果我们在第一部分讨论了所有武器，那么第二部分也应当把一切表述清楚。”

里根说：“很明显，我们只是误解了您。但如果这就是您所希望的，没问题。”

乔治·舒尔茨开始发言。他说道：“在此我们应当谨慎行事。我们在讨论消



除所有战略攻击性武器的时候，并没有指短程弹道导弹。我知道，它们的问题属于另外一个不同的框架。但在我看来，我们在此应当采取决定性措施。”

戈尔巴乔夫和舒尔茨斟酌句地以求满足双方的要求。几分钟之后，里根插话道：“我想问个问题，我们是否考虑过——我认为这一点非常不错——到这两个5年期满结束的时候，所有的核爆炸装置都会被消除掉呢，包括炸弹、战场系统、巡航导弹、舰基武器、中程导弹，等等？”

事实上，这一问题比任何人谈论得都要深远，但戈尔巴乔夫喜欢这一想法，他说：“我们可以把所有这些系统都列进去。”

舒尔茨也很喜欢这一想法，说道：“那我们就开始吧。”

里根非常满意。“如果我们同意，到10年期满的时候，所有的核武器都被销毁掉，那我们就可以把这份协定转交给我们在日内瓦的代表团，这样他们就可以准备一份条约，等您访问美国的时候，就可以签署这一条约。”

“不错，这很好。”戈尔巴乔夫说道，“我们有望达成协议。”他突然听起来充满了希望。

然而，谈判的关键点依然存在。戈尔巴乔夫说道：“我真正关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所讨论的是无条件地严格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目的是承诺10年内不会退出该条约。我们这样做的条件是削减核武器。然而，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美国方面不同意把研究、开发和试验限制在实验室之内。”对这一问题的准确理解是非常关键的，可以防止出现混淆、恶意为以及危害国家安全行为。戈尔巴乔夫重申：“因此，必须强化反弹道导弹条约。这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把实验室那一部分从条约中删除。实验室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里根重复了他之前的说法，美国对于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理解没有把研究和测试局限于实验室。然而，里根认为不一定非要钻牛角尖。“在我看来，从这一问题的实质立场来说，其意义不大。我们的目的是在销毁导弹之后能够保护我们免受再生导弹的攻击，为的是针对核导弹打造某种类似防毒面具的保护。”里根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在摇头。他承认说：“我已经谈过这一点，我也曾谈到过核武器狂人的危险。”

戈尔巴乔夫叹了口气，说道：“是的，我已经听到过有关防毒面具和疯子的说法，可能已经有10次之多了，但依然无法令我信服。”

里根说道：“我谈到的是10年之后可能发生的情况。或许不会发生这种情

况，或许到那时候的领导人认为这种系统部署起来太过昂贵，因而会放弃战略防御计划。无论如何，如果我们能够削减核武器，不让这一问题成为绊脚石，那么世人一定会赞成的。我们要求的是不要放弃战略防御计划，你们现在需要决定的是10年后将会发生什么。”

戈尔巴乔夫摇了摇头，说道：“如果我们在条约中承认可以在实验室限制内进行与战略防御计划有关的研究工作，那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就不能决定与这一计划有关的问题。这种条约不会禁止研究、开发和测试，包括那种与太空武器有关的行为。但它可以保证严格理解反弹道导弹条约，可以防止把这些武器带出实验室，带到大气层和外太空。这些是完全不同的事情。我们探讨的是可以强化和平的协议，而不是让和平面临新的危险。”

里根说：“我并不是要求在太空部署反弹道导弹，只是在讨论反弹道导弹条约允许的研发工作。另外，在这一点上，苏联也并非完全没有可指责之处的。我指的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站。我们对反弹道导弹的理解不同——这是事实。”

戈尔巴乔夫说：“我们讨论的是确保战略防御计划只在实验室中进行。我们不允许在大气层或外太空进行。对我们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里根露出了不满的神色，说道：“您这是在破坏我继续进行战略防御计划的所有努力，我无法接受您提出的条件。”

戈尔巴乔夫说：“这就是您最终的立场？如果这样，我们可以就此打住我们的谈判。”

里根深深地喘了一口气，无力地耸了耸肩，说道：“是的，这就是我的立场。在关于反弹道导弹条约许可和禁止的内容方面，你我双方的分歧太大。”

戈尔巴乔夫努力表明他清楚这种分歧是什么，说道：“通过我们的讨论，我认为美国希望保留这样一种可能性——不但可以在实验室内，而且可以在实验室外进行战略防御计划的测试。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双方无法达成协议。”

里根说道：“但您必须明白，试验和研究无法一直在实验室内进行，有时候必须走出实验室进行。”

戈尔巴乔夫进行了再次尝试，说道：“您必须理解我。对我们来说，实验室问题并不是固执或者执着，也不是诡辩，完全是因为这一问题太过重

要。我们同意进行深度裁军，并最终销毁核武器。但同时，美国方面却迫使我们同意赋予他们制造太空武器的权利。这对我们来说是无法接受的。假如你们同意把研究工作限制在实验室内，不让它进入太空，那么两分钟后我就可以准备好签署适当的计划，采纳这份协议。”

里根说：“我不能接受这一点。”他第一次呼吁戈尔巴乔夫要做一名务实的政治家。“你我立场不同，面对的问题也不同。在你们国家，所有批评您的人都会进监狱，而在我们国家，情况不同。我有很多批评者，他们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假如我同意这样的计划，他们就会对我发动攻击，指责我违背了向美国人民许下的关于战略防御计划的诺言。因此，我保证10年内不会部署相应的系统，也会把研究工作限制在反弹道导弹条约框架内。我并不是在强人所难。”

戈尔巴乔夫用类似的语气回答说：“我是否可以这样理解，总统先生，您是在推心置腹地跟我说话，跟一个与您在国内地位相同的人说话。因此我也坦率地、推心置腹地跟您说：假如我们签署一个一揽子协议，其中包括在重大问题上苏联方面做出的重大妥协，那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您将成为一名伟大的总统。表面上看，您距此还有两步之遥。如果我们达成协议，强化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实验室研究，其中不排除在战略防御计划框架内开展工作，那就将意味着我们的会谈取得了成功。”

他停顿了一下，让里根考虑一下自己在历史中的地位，然后耸了耸肩，说道：“如若不然，那就让我们就此打住，忘记雷克雅未克之行。”他又补充说道：“那样的话，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不管怎样，我知道我是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的。”

他开始回顾此次谈判，说道：“我本来坚信我们可以达成协议，否则我就不会提出与您立即会面，否则我就不会以苏联领导人的身份、带着大量严肃折中的提议来到此地。我希望这些提议能够得到你方的理解和支持，希望我们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如果果真如此，如果我们可以进行深度削减和销毁核武器，那么您所有的批评者就不敢信口雌黄。那样的话，他们就是在与全世界绝大多数人为敌，因为这些人支持我们取得成功的。相反，如果我们没有能够达成协议，那这将成为另一代领导人的工作，而你我都不会再有机会。”

戈尔巴乔夫的声音变得尖刻起来，他说道：“美国方面根本没有做出任何让步，没有对我们做出重大妥协。在此基础上难以有所作为。”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也试着发言道：“请允许我表达一下我的深刻感受，因为我觉得我们距离完成这一历史任务非常接近。假如我们让这次机会溜走，那么等到后人看到我们谈判记录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原谅我们的。”

里根再次企图说服戈尔巴乔夫，他说道：“我想以一位政治领导人对另外一位政治领导人的方式对您讲一件事情。甚至在我来到这里之前，我就遭受着批评。他们说我会做出让步，会同意长期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因此，我请求您，作为一名政治领导人，做出让步，这样可以从根本上巩固我们的关系，并解决我们之间的许多问题。坦率地说，如果我答应您的要求，那我在国内一定会遭到猛烈攻击。”

戈尔巴乔夫皱了皱眉，表示放弃。他说道：“我们到此为止吧。您所提议的是我们无法接受的。我已经仁至义尽，说得很清楚了。”

里根显得同样痛苦。即使到了这个时候，他还是不愿意承认失败。他认为如果自己继续说下去，可能会逼迫戈尔巴乔夫做最后让步。他说道：“您真的决定要因为协议文本中的一个单词而拒绝达成协议的历史性机会吗？”

戈尔巴乔夫反驳说：“您刚才说这只是一个单词的问题，但事实并非一个单词那么简单，这是原则问题。”他现在变得有些愤怒：“我们无法同意这样一种情况——你们在继续发展你们的战略防御计划，并将其带入太空，同时却继续要求削减核武器。如果我回到莫斯科，告诉人们说尽管我们同意大幅削减核武器，尽管我们同意以10年为期，但我们还是给了美国权利，让他们可以在太空测试战略防御计划，这样他们就可以在10年期满之后部署战略防御系统，那人们一定会说我是个傻瓜，是个不负责任的领导人。”

他再次进行了尝试，说道：“如果您同意把研究工作限制在实验室内，那我们可以达成一个框架协议。10年内，在战略防御计划框架内以及在实验室内，你们有大量工作需要研究。如果这一点对您和美国人民如此重要的话，你们可以宣称你们在继续进行战略防御计划，没有放弃。”

这次轮到里根叹了口气了，他说道：“日内瓦会面之后，我认为我和您之间已经建立起了我们两个国家领导人之间从没有过的那种私人关系。您和我彼此非常了解。但现在当我请求您帮忙时——您的帮助可能会对我们未来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您却拒绝了我。”

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帮忙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果您前来跟我说，您和您的农民之间产生了麻烦，他们要求苏联加大购买粮食的数量，而您请求我私下帮这个忙，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无法理解您如何能够要求在深度削减和消除核武器期间，让苏联赋予美国权利，让美国在太空进行反弹道导弹实验，让美国全面实施战略防御计划，而同时我们却在销毁自己的攻击性核武器。请您仔细考虑一下，对美国来说这甚至也是错误的。这将会制造紧张局势，导致互信缺失，我们完全不能接受。您也不会需要这种

帮忙的。”

里根再次说道：“但是，假如你们没有核武器，你们也就没有威胁我们的任何手段。10年之内也不可能部署防御系统。我们已经接受了这种延期做法。至于‘实验室’这一措辞，它具有其自身特殊含义和言外之意。这些意义只是告诉我说，在那种情况下我屈服了，我放弃了之前承诺的不会放弃的东西。我们接受了你方的其他所有条件。我们现在所说的是，我们将在10年内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但现在我发现没有任何收获，这一切都源于那个具有特殊含义的单词。我就是无法理解，您怎么能认为我打算获取某种军事利益。毕竟，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是你们以及你们的行为。然而我们并不是要求你们消除你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并没有以此为条件，出了这个房间，我们也不会提及这一点。”

里根再次无力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但现在这是关系到一个措辞的问题。”他重复道：“或许你们可以提出一个不同的构想？但目前的文本包含了所有你们提出的要求——10年内不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严格恪守其规定，只进行条约许可的研究、开发和测试。鉴于这个原因，我想再次请求您改变观点，帮我一个忙，这样我们就可以以和平缔造者的身份向人民复命。”

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他说道：“我们无法接受您的提议。如果您同意禁止在太空进行试验，我们就会在两分钟之内签署文件。除此之外，我们无法接受。我们已经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不能再承受指责。”

他准备起身离开，说道：“尽管我们的会谈以这种方式结束，但在我的人民和您面前我问心无愧。我已经竭尽全力。”

里根意识到，这一历史性的机会正在溜走。在自己的一生中，他绝少像此刻这样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他写了一张字条递给了舒尔茨。字条上写着：“难道我错了？”

舒尔茨低声回答说：“不，您是正确的。”

之后，里根整理好自己的文件，跟戈尔巴乔夫说：“太糟糕了，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分手。我们差一点儿就达成了协议。”他的声音变得愤怒和失望：“我想您怎么也不希望达成协议。我非常遗憾。”

戈尔巴乔夫说：“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我也很遗憾。我希望达成协议，至少我尽力了。”

里根说：“我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再有像这样的机会，也不知道我们是

否会很快再见面。”

“我也不知道。”戈尔巴乔夫说道。

记者们被拦在谈判之外，也没有得到有关谈判进展的消息。但因为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推迟了他们离会的时间，因而大部分人推测有些事情还在酝酿之中。当这两位政要现身的时候，记者们围堵在赫夫迪大楼前，揣测他们的行为。

里根是他们追逐的对象。与戈尔巴乔夫相比，他在媒体的知名度更高，以其微笑、挥手以及轻松的步伐著称。几十年间在人群和镜头前学会的在公开场合的泰然自若，让他有时候成了一个谜一样的人物。但是，这也让记者们更加仔细地审视他，想要发现他的真实感受。

但在当天那么晚的时候，不需要仔细审视，因为他的表情已经说明了一切。他一下子看起来像是一个75岁的老人，面沉似水，佝偻着身子，双唇紧闭。拉里·斯皮克斯从没有见过自己的老板这个样子，他后来写道：“我担心他的身体状况。”里根标志性的乐观情绪消失了。里甘回忆道：“里根郁郁寡欢，自我认识他以来，我第一次感觉到我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失望的人。”

记者们问是否会发布一份联合声明。里根简短回答道：“不会发表联合声明。”

总统陪着戈尔巴乔夫走到苏联人的豪华轿车前面。戈尔巴乔夫说道：“很抱歉，没有达成协议。”

里根面带愠色，失望地说道：“如果您希望达成的话，本来可以达成的。”

戈尔巴乔夫说道：“我希望与您在美国会面。”

里根回答道：“我不知道能否在美国举行会面。”

在去往机场的路上，里甘在车里对里根说：“振作起来，总统先生。我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但几分钟之后您将与自己的手下会面。您看起来如此沮丧和愤怒，这不太好。”

里根几乎没有听到里甘的话，他说道：“我们差一点儿就成功了，真的非常遗憾。”里根伸出拇指和食指比画着说：“我们就差这么一点点儿就达成协议了。”

里甘继续回忆道：“他的沮丧显而易见。总统说道：‘实验室，实验室，实

验室。’总统反复重复着这个词。然后他继续说道：‘唐纳德，谈判甚至进入到了私人层面。我对戈尔巴乔夫说我认为我们之间关系很好，我请求他私下帮我一个忙。他得到了他的10年，我理解他为什么需要它。但我曾向美国人民许诺不会用他们未来的安全，也就是战略防御计划来进行交易。但戈尔巴乔夫对我的殷切恳求置之不理。’”

正如多少个月以来他一直进行的那样，戈尔巴乔夫在公众舆论斗争中战胜了里根。里根在驱车前往机场搭乘飞机回家的路上，一直在向里甘抱怨失去了这次机会。而此时，戈尔巴乔夫正在举行记者招待会。一位《纽约时报》记者发现戈尔巴乔夫颇具魅力，他写道：“戈尔巴乔夫先生坐在那里，身体前倾，偶尔需要强调的时候，他会挥动右手比画着。在回答问题前，他会滔滔不绝，不看稿子也能讲上一个小时。他举止优雅，偶尔激情四射。”

戈尔巴乔夫解释说，他提出了具有深远影响的建议，本来可以避免核战争的威胁。但里根总统拒绝了这些提议，坚持要求戈尔巴乔夫同意“只有疯子才能接受的”战略防御计划。最终，美国总统甚至拒绝同意自己5年前提出的中程核武器计划。戈尔巴乔夫回忆道：“我当时说：‘我不明白您怎么可以抛弃自己的孩子。’”

然而，尽管感到迷惑和失望，戈尔巴乔夫还是表现出了乐观精神，他说道：“这并不是与美国接触的终结，也不是国际关系的终结。”苏联方面坚持它所提出的条件。“让美国考虑一下，我们可以等待，我们不会撤回我们的提议。”

在机场，里根身上那种演员气质再次显现出来，唐纳德·里甘功不可没。里甘写道：“一路上他一直在谈论他的失望，回忆与戈尔巴乔夫谈判的细节。他的情绪非常低落，最终我试图通过讲笑话让他振作起来。我能想到的唯一的笑话与马有关。”这终于把里根从低落的情绪中拽了出来，因为他无法拒绝马或与马有关的故事。

与此同时，另一辆车中里根的演讲撰稿人正忙于起草峰会后的第一份公开声明。到达机场的时候，他们聚拢到总统身边。里甘说道：“虽然在车里我们谈得很开心，但里根依然情绪低落，抑郁寡欢。他倒弄着手里的演讲卡片，变换着讲话的顺序。接着，又开始倒弄。很明显，他有点儿心不在焉。”



但里根逐渐意识到还是要面对观众的。里甘回忆道：“他又恢复了生活的动力，开始研究自己的讲稿。”他只有几分钟的研究时间。他还在研究的时候，乐队已经开始演奏《向总统致敬》进行曲。里根听到了提示。“总统逐个看了一下我们在座的各位，挺起胸膛，昂首阔步走向搭建在机场停机坪上的讲台。”里甘说道。一小群美国人聚集在一起欢迎总统，他们鼓掌，挥舞着美国国旗。里根像对待友善的观众那样向他们招手致意。里甘写道：“总统的脸上又恢复了血色，呈现出笑容。他用坚定自信的声音开始讲话。这是一次完美的演讲。”

总统说道：“非常感谢大家，回家的感觉真好，我为自己的迟到向大家致歉。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经历了过去两天长达7个半小时的会面后，我和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本来打算在中午时分结束我们的谈判。但到了分手的时候，我们双方都感到有必要进一步磋商，于是，我给南希打电话，告诉她我不能回家吃晚饭了。”听众会心地笑了。里根继续说道：“南希说她理解。大约6个半小时以后，我就能知道是不是这样了。”观众又大笑起来。

总统提到了每个人都在考虑的问题。里根的手下和演讲稿撰稿人决定强调与戈尔巴乔夫会面的积极因素。里根同意他们的建议，也是这样做的。他说道：“我们刚刚进行的谈判非常艰巨，然而我不得不说，它非常有用。我和戈尔巴乔夫先生对于我们的分歧非常坦率，我们必须这样。在几个关键领域，与我们到达冰岛时的预期相比，我们取得了巨大进展。我们在欧洲和亚洲大幅度削减了中程核武器数量，朝着达成协议的方向迈进。我们都要努力削减我们两个国家的战略武器库。”

然而，他们没有最终达成协议。里根说道：“在我们谈判结束的时候，我们在一个领域存在分歧。尽管双方都努力寻求削减核导弹和威胁世界的核弹头数量，但苏联方面坚持要我们签署一份协议，这份协议让我和未来的总统在10年内无权为自由世界的人民研发、测试和部署针对核导弹的防御系统。我们无法接受，也难以做到这一点。”

里根的解释成为政府的路线方针：即总统曾强烈要求削减核武库，但拒绝牺牲以战略防御计划为代表的美国国防来达到这一目的。白宫的这种解释有几点好处：它弱化了核武器反对者的主张，他们认为里根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战争贩子。诚然，里根没有达到自己提出的深度削减核武器的目的，但仅凭把这些建议提到谈判桌上这一点，他就已经超越了之前的所有总统；这种解释安抚了鹰派分子，他们批评峰会召开得过于仓促，担心里根会被狡猾的戈尔巴乔夫所欺骗。在这一点上，鹰派分子应当像感谢里根那样感谢戈尔巴乔夫，因为通过把实验室作为限制战略防御计划的条件，这位总书记弄巧成拙，也在不经意间挽救了美国。与许多美国人相比，中情

局的罗伯特·盖茨并不那么强硬，但他也同意这种观点。盖茨写道：“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一次豪赌，想要欺骗里根，伏击他并扼杀战略防御计划。”但是，伏击失败了，战略防御计划和美国武器库得救了。

美国政府对发生在雷克雅未克的事情的解释还有一个最终的、绝对重要的好处：它反映了里根的真实想法。每一次总统都会非常真诚地重复说，战略防御计划对美国安全至关重要，实地测试对研发非常重要，并且削减攻击性武器也不能保证要放弃战略防御计划。

然而即使在政府内部，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意这种观点。杰克·马特洛克在提到当他得知总统失败的原因时，回忆道：“我感到非常失望。实验室内10年期限并不会扼杀战略防御计划，它很可能会维系这一概念的延续，因为至少需要大量的研究来决定哪些技术是最有发展前途的。”马特洛克拒绝指责里根，因为总统并不是战略防御计划方面的科技专家。相反，他指责乔治·舒尔茨，因为舒尔茨确实了解技术情况，并且在谈判的关键时刻他就坐在里根旁边。马特洛克反问自己：“舒尔茨怎么能让这一切发生呢？让战略防御计划停留在实验室内10年、消除战略核武器以及弹道导弹的协议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如果舒尔茨能够告诉里根这一点，那里根有可能会接受。舒尔茨为什么要如此愚钝呢？”

马特洛克并不是唯一一个怀疑把战略防御计划限制在实验室内10年就会扼杀这一计划的人。西德尼·德雷尔是斯坦福大学的物理学家，他支持战略防御计划。他说道：“鉴于我们目前的技术状况，我认为我们可以遵守这些限制10年。”诺里斯·史密斯是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发言人，该实验室正在进行战略防御计划研究。史密斯说，目前没有项目会因为被局限于实验室内而受到影响，在未来2~10年内，不会有项目能进入实地测验阶段。这主要取决于实验室测验的成功。

乔治·舒尔茨认为，批评者们并不理解战略防御计划的要点。这位国务卿认为，里根也不理解战略防御计划的要点，尽管他非常圆滑地没有这样说。里根否认战略防御计划是个谈判筹码，舒尔茨认为它就是个谈判筹码，只是这个谈判筹码不能廉价出售。对于战略防御计划是否能像里根希望的那样保护美国免受敌人导弹的攻击，舒尔茨并不确定。但他认为，它成功地把戈尔巴乔夫带到了谈判桌前，并迫使他做出让步。一回到办公室，舒尔茨就对一位同事说道：“我相信历史将会证明，在当代军备控制的历史上，雷克雅未克会谈将是一个转折点。”只要美国继续把战略防御的利剑悬挂在戈尔巴乔夫及其继任者的头上，那么它就会继续发挥作用。舒尔茨后来说道：“假如没有战略防御计划的持续推进，那么在未来10年中这些让步将逐渐消失。”而现在，战略防御计划告诉我们，戈尔巴乔夫是多么愿意削减军备。“我知道魔鬼已经跑出了瓶子：在现实中，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所做的让步永远也收不回去了。我们已经发现了苏联人的底

线。”

戈尔巴乔夫认为，泄露底线的是里根。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向政治局汇报雷克雅未克谈判成果时情绪高涨。他把没有达成协议的部分原因归咎于里根，他说道：“在雷克雅未克，我们不但要和阶级敌人做斗争，还要和阶级敌人中的代表人物做斗争，此人展现出极端的原始主义、野人世界观和智力无能。”但是，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对于苏联制度的根本性误解。“他们认为，美国可以通过军备竞赛在经济上拖垮我们，为我和所有苏联领导人制造麻烦，破坏苏联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计划，从而引发人民的不满。”里根认为，这会迫使苏联方面接受他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理解，但事实证明他错了。但是，在这一过程中，里根暴露了自己的意图，表明他是多么不愿意进行军备控制。

戈尔巴乔夫说，冰岛会议之后公众舆论是站在苏联一边的。他说：“世人把没有在雷克雅未克达成协议的责任推到了美国身上。”甚至许多美国人也认为里根不是很明智，对于战略防御计划太过执着。形势会变好的。戈尔巴乔夫对政治局说：“我们当初提出举行会谈，并提出新的提议，我们的这些做法是正确的。我们的路线完全符合我们的期望。里根和他的政府陷入两难之地，让他们折腾去吧。”

1986年11月4日，当时里根还处在从雷克雅未克返回之后的休息期，他受到两次极大的震动。第一次是在中期选举中，他们在参议院中输给了民主党人。8个席位的变化并非完全出乎意料，在第二任期中，总统们所在的党派通常会丧失一些支持率。但是，民主党控制了国会的参议院，这就意味着在里根总统任期的剩余时间内，反对派将控制着国会中的参众两院。里根从来没能控制住蒂普·奥尼尔，他开始揣测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罗伯特·伯德是否更容易打交道。

第二次震动完全出乎总统意料，尽管他不应当如此。美国报纸从黎巴嫩一家阿拉伯语杂志上摘取了一则报道，说美国一直在向伊朗提供军事装备。这则报道还说，罗伯特·麦克法兰曾秘密前往德黑兰联系武器运输事宜。

不久之后，伊朗政府证实了报道中的某些内容，说麦克法兰曾经到过德黑兰，并补充说麦克法兰和4名陪伴他的美国人在被驱逐出伊朗之前曾被拘押过。另外一些新闻报道把武器运输同最近获释的戴维·雅各布森联系起来。雅各布森是名美国人，一年多以前在黎巴嫩遭到绑架。

白宫方面最初否认这一报道。拉里·斯皮克斯对记者们说：“只要伊朗支持使用恐怖主义手段，美国就将继续实施武器禁运。”有人直言不讳地问，武器禁运是否依然有效。在回答这一问题时，斯皮克斯说道：“是的。”

里根拒绝就这一报道公开发表评论，以免凸显这一问题。他在日记中指责媒体报道失实，写道：“我们举行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媒体，他们根据来自贝鲁特的没有根据的传闻疯狂报道，说我们通过向伊朗出售武器换回了人质雅各布森的自由。”里根打算继续保持沉默：“我们的决定是‘我们不能，也不会回答关于这一问题的任何提问，因为这样做会危及我们试图营救人员的生命’。”

里根把雅各布森和他的家人邀请到白宫，总统无法拒绝利用这次机会表达自己对雅各布森获释的高兴，以及对依然被扣押的美国人的担忧。但这件事让记者有机会向他提问关于对待人质和绑架者的政策。一位记者问道：“总统先生，伊朗人说，如果您给他们一些武器，他们就会释放其他人质。您会这样做吗？”

里根盯着自己的稿子说道：“我们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有可能危及我们试图营救的人员的生命。”

记者们发现，在涉及人质以及与伊朗关系问题上，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

会之间关系不和。一名记者希望里根能够证实或者否认这种不睦传闻。“您能否告诉我们舒尔茨国务卿是否同意您的政策？还是像报道中所说的那样，他曾提出过抗议？”

里根拒绝透露他得到过什么样的建议，说道：“我们一直在精诚合作。”

“也就是说舒尔茨国务卿支持这一政策了，卡斯帕·温伯格也是如此吗？”

“是的。”里根说道。

一位记者想要了解更多关于雅各布森如何获释的细节：“先生，为什么不能消除大家的疑虑，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里根说：“因为此事将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直到所有人都获释。”他又看着演讲稿说道：“我们所讲到的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危及未来的营救行动。”

记者们继续施压，一位记者问道：“贵党多数派领袖罗伯特·多尔说您在报答恐怖分子。”

在此期间，戴维·雅各布森一直站在里根旁边。每一个尖锐的问题都让他感到坐立不安。最后，他愤怒地大声说道：“看在上帝的份儿上，你们能不能有点儿责任心，不要打扰总统了！”

总统点头表示同意，他们俩转身进入椭圆形办公室。他们身后又有人大声问道：“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什么是有责任心，什么是没有责任心呢？”

片刻之后，当他们远离记者的时候，雅各布森对里根说道：“上帝啊，总统先生，这些人太野蛮了！他们难道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吗？”

里根再次点头，很高兴雅各布森说出了他心里的想法。里根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一次令人感动、暖人心房的会面。”他很满意自己对于此次危机的反应。“现在我们将前往戴维营。”他结束了一天的记录。

唐纳德·里甘认为，这一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他意识到向伊朗出售武器的报道不是空穴来风。他预测这一问题无法摆脱，要求总统先发制人，讲明他所知道的一切。

问题是里甘并不清楚里根知道多少。他只能猜测总统对所指控的武器换人质交易的了解程度。作为办公厅主任，从理论上说，里甘掌握着进出椭圆

形办公室的信息流向。在国内事务上，理论与实践啮合得非常紧密，但外交政策常常让他无法保持优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直接向总统报告，罗伯特·麦克法兰以及后来的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只是偶尔会向里甘简短汇报一下他们对里根讲了什么，里根对他们讲了什么。

无论如何，里甘认为总统必须面对媒体。在总统出发前往戴维营之前，里甘再次提议说出真相。

里根再次拒绝了，他解释说：“你听到了雅各布森所说的，我无法说明。”

里甘回答道：“总统先生，我管不了这些。我们现在进退两难，保持沉默于事无补。如果这些人质不能很快释放，您将必须解释清楚。您会在周末的脱口秀节目中受到猛烈攻击，而星期一上午的报纸也会大做文章。美国人民会开始要求知道真相。”

里根依然拒绝，但他说自己周一从戴维营返回之后会重新考虑此事。里根飞到总统的静养之地，在那里他继续指责媒体，写道：“星期六晚间和星期天上午的脱口秀节目继续攻击人质和伊朗武器的报道，导致流言蜚语满天飞。他们这种不负责任的鼓噪可能带来极大的伤害。”

里甘希望可以把南希·里根拉进来，帮助说服总统面对公众，但是南希拒绝了。她说道：“他不会对媒体发表讲话。”根据里甘的回忆，南希又补充说：“你知道的，我的朋友说他现在不应当发表讲话。”

对于南希通过星象师来决定总统的行程这件事，里甘一直隐忍不说，但这一次跨入了政策领域。电话中里甘暴跳如雷：“我的上帝啊，南希，如果不发表讲话，那他会被烧成灰烬的。”

星期一，里根与他的国家安全团队会面。他在日记中写道：“主题：媒体风暴指责我们与恐怖分子谈判，用武器换取人质。同时，我们违反了关于向伊朗出售武器的法律。媒体引用了不愿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以及有关政府方面的证据，比方说，一位丹麦船员声称曾在一条船上工作过，这艘船装载着武器从以色列前往伊朗，等等。我命令发表一份声明，表明我们没有进行赎金交易等。但我们不会对指控和问题做出回应，这些指控和问题可能会危及人质的生命，或者我们与恐怖分子之间的联系人的生命。”

里根只勉强同意同国会领导人私下谈话。他告诉国会议员们，政府确实向伊朗运输了武器，但数量很少，也不是为了换取人质。总统讲话的时候，唐纳德·里甘密切注视着与会者的表情。他回忆道：“他们中的一些人心存怀疑，你可以从他们的脸上看出这一点。但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总统所说的。罗纳德·里根从来没有对他们说过谎话（据我所知，也从未对任何

人说过谎话)。我心中丝毫没有怀疑过，他说的都是事实。”

里根也感觉到了这种怀疑，他不习惯于别人怀疑自己的正直。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办法是向美国人民做出解释。他在日记中写道：“媒体对人质和伊朗问题胡说八道，乱加报道，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已经完全失控。媒体仿佛要刻意打造另外一次水门事件。我在上午的会议中决定——我要面对公众，告诉人们真相。”

在报道浮出水面10天之后，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他省去了典型的开场白的那种幽默，对媒体进行了猛烈抨击：“我知道在过去的几天内，你们读到、看到、听到了许多报道，这些报道是关于丹麦船员、没有提到名字的意大利码头和西班牙港口的观察者，尤其是我们政府中没有提到名字的政府官员。现在，你们将听到来自白宫消息人士的报道，大家都知道我的名字。”

电视观众从没有看见过他如此严肃，他说道：“我希望借此机会跟大家讨论一下外交政策中一件极其敏感、非常重要的事情。在过去的18个月里，我们对伊朗采取了秘密外交计划。执行这一计划的理由非常简单，也十分充分：与伊朗政府建立新型外交关系，以体面的方式结束伊朗和伊拉克之间长达6年的血腥战争，消除由国家支持的恐怖主义和颠覆行动，并确保所有人质安全回家。”伊朗方面的合作对于实现这些目标来说非常关键。

里根直接谈到了那份最糟糕的指责：“有人指控说美国向伊朗运输武器，以此作为赎金换取黎巴嫩的美国人质，指控说美国出卖了自己的盟国，并私下里违背了美国不与恐怖分子进行交易的政策。”里根说完这一指控之后停了一会儿，而后盯着镜头说道：“这些指控完全是无中生有。美国从没有向那些把我们的人民扣押在黎巴嫩的人妥协过，我们也不会这样做。美国没有用整船或满满一飞机的武器来换回美国人质，我们也不会这样做。”

然而，他必须对某些事情做出解释。里根说道：“在我们秘密谈判期间，我授权把少量防御性武器及其零件运往伊朗，我的目的是要让德黑兰方面相信，我们的谈判者是在我的授权下采取行动的，并且还要发出信号，表明美国准备用一种新型关系来取代彼此间的敌意。”武器运输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这些少量的武器算到一起也就能装满一架运输机，无法左右长达6年的两伊战争的结果，也不会以任何方式影响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军事平衡。”

关于人质问题，里根说道：“在采取这一计划的同时，我们明确表明，伊

朗必须反对所有形式的恐怖主义，并以此作为我们双方关系的条件。我们暗示说，伊朗所能采取的最重要的行动是利用其在黎巴嫩的影响，确保所有被扣押在那里的人质获释。”

这一计划带来了成果。里根说：“我们已经取得了进展，自从美国政府与伊朗联系以来，没有证据表明伊朗政府在发动针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行为。人质开始回家，我们对伊朗政府过去采取的和当下正在进行的努力表示欢迎。”

里根强调了伊朗的战略重要性。他说道：“伊朗处于苏联和印度洋温暖海域之间，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敌对势力可以以此为据点，控制波斯湾海域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输出。除了地理位置之外，伊朗的石油储量对世界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出于这些原因考虑，美国必须与伊朗建立对话。里根把伊朗比作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中国，把他的秘密政策比作理查德·尼克松的政策：“1971年，时任总统尼克松派遣自己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秘密前往中国。当时的情景跟今天的一样，都需要灵活应对，需要对我们计划与之交往的国家的局势有清醒的认识。”

里根对他的伊朗计划提供了更多细节，说道：“我们的谈判一直持续到今年春天。以我们取得进展为基础，我们试图寻求提高外交联系的等级。我们在德黑兰安排了一次会面，我派我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麦克法兰前往执行一项秘密任务，并给予他明确指示。我要求他前往伊朗展开对话，完全清楚地表明我们的根本目标和分歧所在。为期4天的谈判是以民间组织的形式进行的，美方人士没有受到猜忌。”自那时起，对话一直在持续，不断取得进展。戴维·雅各布森的获释就是最新的证明。

里根重申，雅各布森的获释与武器运输没有任何关系：“我们没有——我重申一次——用武器或任何其他东西交换人质，我们也不会这样做。”伊朗计划并没有表明美国对待恐怖主义政策一帆风顺。“那些认为我们对恐怖主义变得软弱的人可以想一下卡扎菲上校的问题。我们没有，也不会向恐怖分子屈服。”这一计划也没有违反法律。“我所授权的行动曾经是，也将继续是完全符合联邦法律的。”

里根呼吁美国人民的支持和理解，他说道：“作为总统，我经常这样运作，因为我相信美国人民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我现在仍然相信这一点。我无法保证结果，但就像过去那样，我请求你们的支持，因为我相信你们也希望在中东地区实现和平，希望所有人质获得自由，希望得到一个没有恐怖主义的世界。”

乔治·舒尔茨观看着里根的演讲，心里越来越感到不安。他回忆说：“总统的讲话让我相信，罗纳德里根依然没有真切地意识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情。”国务卿逐渐认识到，他和卡斯帕·温伯格的强烈反对并没有阻止伊朗计划的实施。约翰·波因德克斯特没有让他知道详细情况，但舒尔茨还是识破了其中的奥秘，认为这是一次具有极强欺骗性的武器换人质交易，有可能带来灾难。

然而，波因德克斯特成功地说服了总统。舒尔茨说：“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是员工对总统的欺骗，利用了他渴望让人质获释的强烈愿望。他们跟总统讲的是他们希望总统知道的，以及他们认为总统希望听到的，他们为其披上‘地缘战略’的外衣。”这种欺骗进行得非常顺利。“因此，里根对美国人民所讲的也就是他所知道的，尽管这并不是事实。”

舒尔茨不是唯一一个发现里根的解释靠不住的人。《洛杉矶时报》举行的一次民调显示，不足14%的被调查者认为总统关于伊朗计划的讲话是真实的。有1/3的人拒绝相信他所谓的政府没有同恐怖分子谈判的说法。只有1/5的受访者相信里根的说法，认为在向伊朗输送武器方面，他的政府没有违背联邦法律。

舒尔茨非常想辞职。在工作中，他是总统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得力助手，里根却拒绝了他的建议，支持波因德克斯特。他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士，支持总统的政策。但他发现里根并不清楚波因德克斯特借用他的名义在推行什么政策。舒尔茨拒绝为波因德克斯特打掩护。

舒尔茨同意参加《面向全国》电视节目，但很快他就希望自己没有同意。主持人莱斯莉·斯塔尔提问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问题：“美国还会向伊朗运送武器吗？是直接通过我们的政府还是通过任何第三方呢？”

舒尔茨回答道：“这显然违背我们的政策。”

斯塔尔说道：“您不是在回答问题。您为什么不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呢？我再问一次，美国还会向伊朗运送武器吗？是直接通过我们的政府还是通过任何第三方呢？”

舒尔茨回答说：“在伊朗与伊拉克交战的情况下，由于伊朗在从事恐怖主义活动，并且与扣押我们的人质有关，因此我要说的是，就我而言，不会向伊朗运送武器的。”

斯塔尔追问道：“您是否获得授权代表整个政府如此讲话呢？”

舒尔茨因为愤怒和尴尬而变得面红耳赤，说道：“没有。”

里根想必可以代表政府发表讲话。总统发现越来越多的质疑，意识到自己必须回答这些疑问。他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说道：“正如我上星期四所说的那样，18个月前，政府开始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施一项秘密计划。我们有四重目的：改善彼此完全敌对的关系，通过谈判结束两伊战争，结束恐怖主义活动，达到释放我们人质的目的。”里根说，他意识到在这一计划中，美国人质和政府与伊朗对话者都担负着极大的风险。“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信息被限制在适当内阁官员和有绝对知情权的官员内部。”总统第一次承认在其顾问中间存在不同意见。他说：“这种做法在政府官员内部存在相当大的分歧。争论的主要焦点是我们是否应当对武器禁运采取单独的和有条件的破例做法，以此表明我们严肃的意图。”里根没有指名道姓说出争论者的名字，但是所有的记者和许多在电视上观看新闻发布会的人都明白，主要的反对者是乔治·舒尔茨。“几位高级官员反对向伊朗销售哪怕是少量的防御性武器及其零件。其他官员认为，如果不销售武器就无法取得进展。我权衡了他们的观点，考虑了失败带来的危险和成功带来的回报，决定开始实施这一计划。决策和行动的责任完全在我自己，由我一人承担。”里根引用了亚伯拉罕·林肯关于争议性决策的讲话：“如果证明我是对的，那么人家怎么说我也无关紧要；如果证明我是错的，那么即使花十倍的力气来说我是对的，那也无济于事。”

里根拒绝为他所选择的路线道歉。他说道：“我明白，这一决定颇具争议，有些人非常不同意我们的做法。甚至连一些支持我们秘密计划的人也认为向伊朗输送武器是错误的。我理解，也尊重这些观点，但我深信我的决定是正确的。我当时相信，我现在也相信，尽管风险极大，但潜在的回报也相当大，可以让伊朗重新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结束其参与政治恐怖活动，结束那场可怕的战争，让我们的人质回家——这些理由证明我们的冒险活动是正确的。”

里根说，他将继续冒险来提升美国的安全。但由于媒体过度关注，以及通常是不恰当的关注，他过去对伊朗的政策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他也正在改变政策。“为了消除那种广泛但错误的认识，认为我们在用武器换取人质，我已经下令禁止向伊朗销售任何武器，下令所有与我们计划有关的信息必须报送国会相关人员。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或者为了保护我们人质的安全，有些问题我可能无法直接公开回答，但我在此重申，所有信息必须报送国会相关人员。”

里根允许大家自由提问。海伦·托马斯提问说，由于最近暴露的一些问题——在用扎哈罗夫与苏联交换丹尼洛夫之后紧接着又发生的一系列问题，

他是否认为自己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了损害。

里根像以往一样否认用扎哈罗夫交换丹尼洛夫。托马斯提问问题的前提就不正确。关于伊朗这件事，里根说道：“我们并没有企图进行欺骗。我们知道，我们着手进行的事情对我们与之谈判的人来说可能存在极大风险，对我们的人质也存在极大风险。因此，我们必须严格保密，仅限于让极少数必须知情的人知道这件事。”在提到人们无意中想起理查德·尼克松和水门事件时，里根继续说道：“我这样做没有违背任何法律。根据法律，我有权就某一次行动推迟向国会汇报，推迟向国会相关委员会汇报，直到我认为这样做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他说，相关国会委员会会在稍晚的时候收到简报。里根补充说，事后想来，他没有像尼克松那样违背法律责任：“我们没有进行政府间谈判，我们是与那个国家里的某些个人在进行谈判。”

托马斯追问道：“您现在是否准备拒不承认那份让您采取规避伎俩，躲避对伊朗武器禁运的裁决呢？”她问道：“您是否要撕毁那份裁决呢？”

里根有些含糊其辞，回答说：“不，就像我说过，我们会继续遵守禁运条例。其原因是同样的，就像我说的，我们从一开始就要这样做：这是为了看一下，我们是否在这两个国家内促成和平，一种没有胜利者或失败者的和平，承认双方的领土完整。这也是我们所有盟国所寻求的目标。但我认为人民是会理解的，为了挽救人的生命，保证行动成功，你必须保守秘密。就像我们没有提前通知，直接出兵格林纳达一样，因为假如没有保守秘密，那么我们就是在拿所有那些攻击海滩的士兵的生命在冒险。”

另外一名记者问到了舒尔茨。总统和国务卿是否探讨过后者辞职的问题呢？

里根说：“不存在辞职一说。”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台的克里斯·华莱士希望里根解决一个表面上看起来矛盾的问题。“总统先生，您的陈述一直语气坚决，今晚您再次一口咬定没有用武器交换人质。然而，有记录显示每当有美国人质获释的时候——去年9月，今年7月，还有今年这个月——在这之前都会有大宗武器运输。难道我们能相信这一切都只是巧合吗？”

里根回避这一问题，说道：“克里斯，正如我说过，我们卖给他们的所有武器加起来一架运输机也就装下了，还会有大量剩余空间。如果出现大量武器运输的话——我们知道有这种情况——因为还有别的国家在跟伊朗进行武器交易，还有私人军火商也在做同样的事情。而今我也看到过报道，是关于一艘丹麦不定期的货船和丹麦船员工会官员的，他们说他们的

船向伊朗运送各种武器。我对此一无所知，直到看到媒体的报道，因为我们从没有与此类事情有过联系。我们只是进行过一次此类活动，其中涉及风险。伊朗手中没有人质，据我们所知他们也没有绑架过任何人。我们所知道的是，绑架我们人质的人的确与伊朗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伊朗方面偶尔可以影响到他们——并不能总是影响——但可以对他们施加影响。因此我们的三名人质回到了家中。”

华莱士对这一回答并不感到满意，他说：“关于第一点，您自己的办公厅主任里甘先生曾说过，美国容忍以色列向伊朗运送武器。难道您真的没有发出您一直否认的指令吗？难道您没有对恐怖分子说过，您或者您所提供帮助的国家——在这件事上是伊朗——能够从劫持人质中获益吗？”

里根对此予以否认。他说道：“没有，因为我看不出绑架者或扣押人质者怎么能够获益。他们什么也没得到就释放了人质。无论是什么迫使他们释放人质，我都非常感激，因为我们的人质回来了。事实上，倘若没有被曝光的话，我们可能已经把另外两名我们期望的人质解救回来了。”

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的萨姆·唐纳森是里根最不喜欢的记者，因为里根认为此人热衷于冷嘲热讽而不是关注报道事情真相。唐纳森利用当晚的机会来达到其目的，他说道：“总统先生，您在采取武器禁运时，通常会公开要求其他国家，尤其是我们的盟友共同遵守。但同时，您承认私下里您授权美国违反武器禁运禁令。您如何来解释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呢？”

里根不喜欢被人称作骗子，即使用的是个同义词。他艰难地控制住自己的怒火，回答道：“我不认为这是表里不一的做法。我说过，所谓的违规行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两个国家的军事平衡。但我想我们的目的是要让这种行为物有所值。这是我们单方面放弃武器禁运，会持续到将来。但原因我已经在今天开场时说得很清楚——首先，尝试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建立关系，确保中东地区的与平和稳定。同时，对恐怖主义实施打击，让我们的人质回家，就像我们已经做过的那样。”

唐纳森继续说道：“先生，恕我冒昧。民调显示许多美国人不再信任您。在总统任期内您一直想竭力打造您的公信力，但它遭到了严重破坏。请问您能够修复它吗？”

里根显得非常生气，他就整件事情马上开始谴责媒体，唐纳森也包括在内。他说：“我想我是现场唯一一个想要修复公信力的人，我不曾丝毫破坏过它。”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比尔·普兰特对里根没有像唐纳森那样刻薄，但差别不大。他说道：“总统先生，您刚才说输送的武器装备没有改变军事平衡，

然而有这样几件事情：我们知道美国输送了1000枚陶氏反坦克导弹，并且允许以色列和其他国家输送大量武器，作为此次交易的补充——没有直接允许，但还是允许了，否则不可能运输的。因此，先生，您怎么能说没有改变军事平衡呢？您怎么能说没有违反法律呢？1977年的国家安全法明确规定要及时通知国会，并规定如果国家安全需要保密的话，总统依然需要咨询情报委员会的领导层和委员会主席。”

里根摇了摇头，说道：“比尔，你所说的一切都是基于错误的假设。我们没有允许，也不会允许从其他国家运输武器。你刚才还提到什么了？”

“反坦克导弹，先生。”

里根不习惯于这种持续不断的怀疑，这仿佛影响到了他的情绪。他支支吾吾地说道：“不，关于那个——它没有——不，那样做没有违反那个——违反那个法律。不，我已经说过，无论你们相信与否，总统没有权力——如果为了国家安全考虑——没有权力无视法律规定，不能推迟向国会汇报此事。”

普兰特依然想听到关于反坦克导弹的回答。他问道：“是否有这样的可能，先生，伊拉克可能会认为1000枚反坦克导弹足以改变那场战争的军事平衡？”

里根回答说：“这完全是防御性武器，是肩扛式武器。我们没有向伊朗提供任何攻击性武器。我们知道，伊拉克已经宣布他们愿意解决冲突，正如我们所说的，这场冲突没有赢家和输家。其他武器零件只是地对空霍克导弹的零件。我说过，所有这些武器一次就可以轻松运完。”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查尔斯·比尔鲍尔就以以色列方面提出了问题。他说道：“总统先生，我认为以色列方面在此次行动中的作用还是不甚清晰。大家提问的都是关于得到许可的武器运输问题。我们确实知道，以色列在1985年曾运输过武器。还有报道说，是以色列方面与您的政府联系，建议您与伊朗联系。您能否解释一下以色列在这其中的作用吗？”

里根回答说：“不是的，因为我说过，我们与其他国家以及他们的武器运输或他们的活动没有任何关系。事实上，关于有必要恢复伊朗与美国或者西方国家的关系的想法，在我们政府参与之前就已经开始出现了。但从一开始，假如你仔细想想如果那里发生政府更迭可能带来的后果，你就会明白，对西方国家、对希望实现中东和平以及对我们所有人来说，确立这种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在大约18个月以前开始做工作，寻找我们有可能与之打交道的某些人。”

比尔鲍尔说：“恕我冒昧，我能继续就此提问吗？您所指的联系是与伊朗政府和伊朗政权内的温和派的联系。今晚，巴里·戈德华特说，在他看来伊朗国内没有温和派。我并不是想说那里没有温和派，但您是如何知道自己联系的人属于温和派？您又是如何定义伊朗这种政府中的温和派呢？”

里根再次选择回避。他说道：“你看，你又提出了让我无法回答的问题。但请相信我，我们得到情报，我们认为伊朗内部存在不同派别。他们中的许多人认为他们政府内部很快就会发生变化。伊朗人民感到极度不满。”

下一个提问者问道：“请问，我们能否谈一下美苏关系问题？”

里根抓住了这一笑点，说道：“不胜荣幸。”屋子里的人顿时笑了起来。

然而，这种缓和的气氛只持续了一会儿，拷问又开始了。一位记者问道：“总统先生，回顾一下今晚您关于武器运输和武器数量的回答，您是否在告诉我们，我们参与的唯一一次运输发生在您1月17日签署的裁决之后，并且无论您的助手针对事件背景或记录说过什么，美国都没有同意进行其他武器运输？”

“没错。”里根说完突然闭嘴不再说话。但他还是补充说：“我们是在销售武器——很多人在说‘给’这个词——他们是购买我们的武器。”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安德烈娅·米切尔试图迫使里根表明态度。她说道：“总统先生，我们继续前面的问题。办公厅主任唐纳德·里甘告诉我说，我们允许——本届政府允许——以色列在1985年9月运送武器。在那之前不久，人质本杰明·韦尔获释了。4个月之后，您在1月17日做出裁决，您说有权不通知国会。现在您能澄清这一点吗——为什么本届政府没有违背武器禁运条例？为什么可以允许在1985年9月不通知国会就允许向伊朗运送美国制造的武器呢？”

里根推脱自己并不知情，说道：“我从没有听里甘先生说起过这件事，我会过问此事的。因为正如我说过的，我们推行武器禁运政策，但我们放弃它是为了特殊目的。事实上，我们是为了那四个目的考虑的。就这样。”

米切尔进一步逼问道：“我可以继续问那个问题吗，先生？因为我认为许多美国人所不清楚的是为什么——如果如您今晚所说，不再向伊朗出售武器——为什么您没有在1月17日取消根据情报做出的裁决呢？这样一来，您就可以舍弃任何建议——那些建议如果您认为有必要的話，您可以再次不通知国会、完全秘密行事，或许还可以反对您的内阁成员的意见，继续输送武器。”

“不，我并不打算那样做。”里根的回答让他的听众迷惑不已，不知道他不打算做什么：是取消裁决还是运送更多的武器。“但同时，我们希望可以继续与这些人——这些个人进行会谈。”

米切尔要求总统回答清楚，她问道：“您不会取消根据情报做出的裁决？”

里根避免做正面回答，说道：“我不清楚是否需要这样做，还是我必须等到向国会汇报之后再做决定。我不清楚在这一问题上的法律根据是什么。”

一名记者提到了美国人民。他问道：“您是否认为——尽管其战略位置很重要——美国人民会支持向霍梅尼提供武器？”

里根说：“我们不是在向霍梅尼提供武器，情况不是这样的。我说过，我们是在与个人打交道，我们认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政府内部人员，处于政府关键部门。但这些会面不是官方的，不是美国国家元首和伊朗国家元首之间的会晤。但我们认为这些人以及他们与伊朗军方的密切关系使得我们有必要让他们知道：首先，我们十分认真，渴望努力构建良好关系；其次，他们与之交往的是我们政府的首脑，而不是来自某个机构或部门的领导，而是我在指挥一切。”

又有一名记者问道：“总统先生，您刚才说没有进行交换，或者您不认为这是在用武器交换人质。但您是否想到过，还是从没有想到过，伊朗人认为这是在进行交换，因而他们可能会受此诱导而扣押更多的人质呢？尤其是考虑到当前他们只释放了3名人质，还扣押着另外3名。”

多年以来里根一直在说，伊朗是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现在总统发现自己不得不否认伊朗控制着那些它所支持的恐怖分子。“不是这样的，据我们所知，伊朗没有掌控黎巴嫩真主党，无法指挥他们的行动。”里根决定要自圆其说，“显然，他们具备一定的说服力——但并不总能成功说服——但他们有时可以说服或向真主党施压，让他们像在这件事中这样行动。我说过，伊朗政府没有扣押人质，他们只是从我们这里购买了武器。”里根重申，这些武器只不过是象征性地表示诚意。他说，政府一直在提醒伊朗人，美国的政策是反对恐怖主义。“我们告诉他们，我们不希望与任何公开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进行交易，而他们反馈回来的消息说他们没有支持恐怖主义。他们还说，有证据表明霍梅尼及其政府也在弱化这种做法，并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事实上，那里的一些与恐怖分子有关的人员已经被送进了监狱。因此当时我们说：‘很好，有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可以证实你们的说法，黎巴嫩有我们的人质。’”

这位记者说道：“恕我冒昧，如果您运送的武器没有对人质获释产生影

响，那么您如何解释在武器运送之时人质就获释了呢？”

里根回答说：“不是这样的。我当时说——就在当时——我对他们说，他们可以用行动来证明他们的诚意。如果他们真的没有支持恐怖分子，那他们可以开始释放我们的人质。”

里根的不快表现得越来越明显，他现在打算开始回击这些提问者。“事实上，我相信，我也有理由相信，如果不是因为此刻在这间报道大厅中相继出现的混乱状态，到这个周末我们本来可以让他们5个人都回来。”

一位记者回应道：“关于这一点，您之前说过，刚才又说了一遍。如果不是被曝光的话，现在另外两名人质可能已经回家了。您知道，最先曝光此事的是黎巴嫩一家由叙利亚支持的亲叙利亚杂志。因此，您是否在暗示说，参与此事的一方有人在进行破坏，故意泄露最初的报道？”

里根回答说：“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泄露此事的是伊朗政府中的某个人，不是我们与之交易的某个人。此人对我们非常敌视，他把这件事告诉了那家杂志，而那家杂志随后在贝鲁特刊登了这件事。”

一位记者说道：“总统先生，现在对伊朗的政策发生了明显改变：从拒绝与恐怖主义国家打交道变成了向其输送武器以示诚意。根据您的提到的伊朗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您是否会考虑改变对尼加拉瓜的政策呢？”

“不会的。”里根这次的回答要比他之前的几次回答都要坚决。但随后他又打起了埋伏：“我想我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此我想再次强调——不会的，我们将坚持我们的立场。从官方来看，伊朗依然在我们的名单上，属于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但我现在谈论的是我们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个人，这些人告诉我们说，有证据表明他们的政策正在发生改变。因此，正如我说过，为了树立他们的威信，增强他们的力量，我们进行了此次军售。”

一名记者给里根提供了一个摆脱纠缠的机会。他说道：“总统先生，今晚在华盛顿，大家一直在围攻总统，而总统一直在疲于辩护。您为何不抓住这次攻击的机会，支持您的国务卿呢？您可以宣布未来一切秘密行动必须得到他的支持。您为何不抓住这次机会重组国家安全委员会呢？这样就可以化解国会内部的担忧情绪——他们担心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直在没有得到白宫支持，并且无视国务院和国会的情况下进行准军事化行动。”

里根刚才一直在闲扯，这次可算是捞到了一根救命稻草。他说道：“国务院——或者说国务卿——也参与其中。中情局局长也参与到了我们的行动之中。正如我前面讲到的，鉴于某些法律的原因，我必须对我们的行动保



密。但你刚才提到的这些人都已参与进来——并且知道所发生的一切。我认为你刚才提到的这些行动需要这样做，但最让我失望的是你说我今天听起来好像在辩护。我只是一直在试图尽我所能回答你们的问题。我认为我根本无须进行辩护。鉴于当时的情况，我依然认为我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也认为我们实现了部分目的。”

一名记者问道：“总统先生，您认为其他人质还会获释吗？”

里根说：“我必须这样认为。”

“总统先生，在您认为对美国利益有利的情况下，您对武器禁运采取了破例的做法。为什么其他国家在认为对它们的利益有利的情况下不能运送武器呢？”

里根说道：“那我要看看这样做是如何对它们的利益有利的。我明白，在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有些国家会觉得西方国家应当设法让伊朗回归其以前的地位——也就是重新回到民主国家的大家庭中来，回到希望中东地区恢复和平的大家庭中，等等。”

“总统先生，恕我冒昧，向伊朗输送武器的做法如何能帮助伊朗回到国际社会中来呢？您也承认您只是在与伊朗政府中的一小部分人打交道。”

里根说：“我说的是，强化某一特殊群体的力量，这一群体需要威信，这种威信可以赋予他们在自己集团内部的谈判能力。”

《华盛顿时报》对共和党比较友好，他们的记者杰里迈亚·奥利里纠正了里根从新闻发布会一开始就表述有误的一个说法：“总统先生，我想您犯了一个小错，把陶氏导弹说成是肩扛式武器。这是一种地对地武器，‘红眼睛’导弹才是肩扛式的，但这无关紧要。陶氏导弹是用来摧毁坦克的。”

里根说：“是的，我知道。我知道这是种攻击坦克的武器。”

“我不认为它是从肩膀上发射的。”

里根说：“嗯，如果我说错了，那我现在承认错误。但我的理解是那是一种便携式武器。我们有多种肩扛式武器。”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奥利里说道，“我刚才想问您，这场游戏到目前为止哪些地方出现了错误，因为看起来好像能够出错的地方全部都出了错，就像墨菲定律、里根定律和奥利里定律一样——这样说有什么错误：在一次高风险的赌博中犯下了错误，因此您可以在随后的两年中有所建树？”

里根坚持自己的立场，尽管这一立场已经千疮百孔。他说道：“因为我并不认为犯了错误。这是一次豪赌，正如我说的，我认为是形势使然。我不认为这是一次惨败或任何形式的失败。我们依然保持着那些联系，已经取得了某些进展。我们让我们的人质回来了——其中的三位。因此，我认为我们的做法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这是一次令人备受煎熬的经历，里根从没有在面对公众和镜头经历如此不快的时刻。就如他的性格那样，他将此归咎于提问者。里根当晚写道：“他们穷凶极恶，嗜血成性。每个问题都非常尖锐。”但他认为自己表现得很出色。“我们的人似乎认为我干得不错。”

里根一直希望得到正面的评价。从童年时期起，他的性格中就充满了乐观精神。无论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学到的，这种乐观精神帮助他度过了酒鬼父亲所带来的不确定的那段日子。里根核心集团内的人经常听他讲起他最喜欢的一个故事，他讲的次数太多，以至于他们无法再忍受下去了。故事讲的是有个孩子想得到一匹马作为圣诞礼物，醒来后却发现只有一堆马粪。这个孩子并没有丧气，而是抓起一把铲子开始挖起来，边挖边高兴地说：“小马肯定藏在这儿的什么地方。”里根对任何事情看重的都是其积极的一面，认为这是成功的关键。这种习惯构成了他强大个人力量的一部分，让他几乎总是精神抖擞，没有消沉。这也是他在政治上成功的关键。悲观的情绪曾一度弥漫在保守派中间，他们认为这个世界没有希望了。他们可能是正确的，却让人感觉不好。巴里·戈德华特说出了人们头脑中的想法，但也让人们心灰意冷。里根同戈德华特一样，思想上比较保守，但他积极乐观的态度让美国人自我感觉良好，对国家充满信心，也让他在民调中极具魅力。

然而，里根一贯重视事物积极一面的做法有时候也对他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为了让自己的老板开心，他的手下会提供对总统有利的反应，安排友好的人群与之见面。即使在他表现不好的时候，他们也会告诉里根他“做得不错”。这就使得他脚步轻盈，面带微笑。但这也让他无法听到他需要听到的坏消息。

乔治·舒尔茨不属于“好好先生”。他认为里根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表现是“灾难性的”，对于与相关政策的关系感到震惊。他很失望地看到一贯支持政府的《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关于政府行为的灾难性报道。《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这样写道：“假如某个心怀不轨的梅林巫师试图捏造一个阴谋诡计，借助巫师魔杖的法力来破坏美国的原则、政策、人民、利益和盟友，那么没有什么能比向世界上主要的恐怖主义国家秘密输送美国的武器、交换少数人质这件事造成的危害更大、更让人感到耻辱的了。”这位专栏作家继续写道：“在这一过程中，里根先生似乎给自己的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戴上了一顶绿帽子。国务卿在全球反对与恐怖主义合作这件事上

赔上了自己的个人声望。比方说，就在几星期之前，舒尔茨先生在联合国向阿拉伯国家的部长们保证，美国决意要阻止向伊朗输送武器。”

记者招待会之后，舒尔茨给里根打电话，告诉里根他犯了“大量的事实性错误”。舒尔茨要求第二天前往白宫，告诉里根他错在了哪里。舒尔茨回忆道：“我的话让他很吃惊，他同意听取我的意见。”

在国务卿到来之前，总统纠正了其中的一个错误。新闻发布会之后不到一小时，里根在一份书面声明中说：“今晚，我的回答当中可能出现了某种误解。在我们与伊朗的秘密行动中，有第三方国家参与其中。”里根没有提及第三方国家的名字，但在一切曝光之后，每一个感兴趣的人都知道这个国家是以色列。然而，总统接下来的话让这一错误更加严重：“考虑到这一点，我所授权或许可的所有象征性的防御性武器和零件的数量全部加起来，一架运输机可以全部运完。”这显而易见是不真实的，因为所有熟悉军火运输的人都明白这一点。但里根不熟悉武器装备，这一点在新闻发布会上已经很清楚。结果，约翰·波因德克斯特跟他说什么，他就相信什么。

第二天下午，里根和舒尔茨见面，里甘也参加进来。舒尔茨后来写道：“我们讨论的内容很艰难。我详细列举了总统发言中出现错误的地方。他把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给他的信息当作正确信息而接受，但事实上这些信息充满谬误——在我看来，这些信息全部由波因德克斯特进行了整合。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我与总统仔细研究，不断争论，气氛热烈而沉重。我从没有想过，自己会跟美国总统以这样一种直接而对立的方式进行谈话。”

里根仿佛接受了舒尔茨的好意。“但我丝毫没有说动他。”舒尔茨回忆说，“在他看来，问题与媒体有关。”舒尔茨提到了一年前麦克法兰打的一次电话，在电话中麦克法兰提到了武器换人质的交易。里根回答说：“是的，我知道这件事，但那不是拿武器换人质。”舒尔茨说，见过这一证据的人是不会相信他的。里根毫不退让，说道：“乔治，我知道当时发生的事情，我们做的没错。”

里根认为舒尔茨是在小题大做，他在日记中写道：“与乔治·S和唐纳德·R进行了艰难的会谈。乔治对于伊朗事件非常沮丧，我担心他可能会说：‘要么开除某人，要么我辞职。’”总统写道：“我讨厌最后通牒。”然而，里根同意舒尔茨的要求，决定在政府内部摊牌。里根在周四的日记中写道：“我下令在周一下午开会，参加会议的有他和唐纳德、我、卡斯帕·W、威廉·凯西、约翰·P以及副总统，公开讨论伊朗问题。”

里根还是认为这一问题主要是一场误会。他在第二天写道：“我们举行过

国家安全委员会通气会。看起来有件事跟以色列和伊朗的一些霍克导弹有关，必须加以澄清。”里根的自信没有动摇：“埃德温·米斯再次向我保证，我在整件事中是清白无辜的。”

接下来的这个星期刚开始，里根的自信就再次受到考验。他在周一晚上写道：“今天的大事就是就伊朗事件在战情室召开的两个小时的会议。乔治·舒尔茨依然固执地认为，我们不当向伊朗出售武器。我向他讲明了理由。总之，我们都开诚布公。”

实际上，正如埃德温·米斯不久后披露的那样，会上并没有讨论每一件事。这位司法部部长一直在进行秘密调查，盘问波因德克斯特以及其他的人。他给总统带来了更多的坏消息。里根在日记中写道：“会后，埃德温·米斯和唐纳德·R告诉了我一份确凿的证据。在一次军售中，伊朗支付给以色列的价格高于我们得到的价格。以色列人把这份差价汇入一个秘密的银行账户。之后，我们的诺思中校（国家安全委员会）把这笔钱给了反政府武装。”

唐纳德·里甘回忆了总统得知与反政府武装有联系的那一时刻，他写道：“总统本来面色红润，两颊透着亮光，当他听到米斯的话后，脸上失去了血色，面色惨白。总统的表情严厉冷酷，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表情——我想认识总统20多年的米斯也是第一次见到总统的这种表情。”里甘补充道：“那天下午，任何看到总统表情的人都绝不会相信，在米斯告诉他这件事之前，总统知道转移资金这件事。他的表情说明发生了难以置信的事情。”

里根对司法部部长说道：“此事要一查到底，我们要尽快告诉公众我们知道的一切。”

里甘建议总统成立一个两党委员会来调查此事。米斯说有必要让一个独立委员会参与进来。

里根问米斯和里甘，波因德克斯特能如何为自己辩护。米斯解释说，波因德克斯特承认知道诺思的一些做法，但他不想仔细调查，因为担心他可能发现的真相。

里甘回忆说：“总统怀疑地盯着米斯，迷惑地摇了摇头。他面沉似水，脸色惨白。”米斯离开了房间。总统转身问里甘：“他们脑子里怎么想的？你能理解他们吗？”

里甘不能理解，但他知道后果是什么。他告诉总统，波因德克斯特必须离职，里根点头同意。

里甘把这一决定转告给波因德克斯特。第二天上午，波因德克斯特来到总统办公室，手里拿着辞职信。他说道：“总统先生，非常抱歉事情发展到了这一地步。”

里根回答说：“约翰，我也非常抱歉。”

里根、密斯和里甘都认为，白宫应当再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在允许密斯回答问题之前，总统应当发表一份声明。里根对记者们说，他要求密斯详细调查伊朗计划以及与其有关的指控。司法部部长提交了一份初步报告。里根说道：“这份报告让我认为，我并不十分了解与这份计划有关的其中的一次行动的本质。这一行动存在着严重的失检行为。”总统没有具体指出冒犯行为，他说，波因德克斯特已经辞职，奥利弗·诺思已经被开除出国家安全委员会，司法部将继续调查，他也会委任一个专门调查委员会进行独立调查。里根说道：“我非常担忧，一项旨在解决中东地区危机局势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却引发了如此多的争端。我之前讲过，我相信我们对伊朗的政策是有充分理由的。然而，昨天得到的情报却让我相信，在实施这一政策的某些方面出现了严重的纰漏。”

第一位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一个问题：“出现了什么样的纰漏？”第二个记者紧接着问道：“您还坚持说自己没有犯错吗？”

里根说：“不，我不接受任何问题。”

第三位记者坚持问道：“为什么您不回答是什么样的纰漏？”

里根快速地离开了房间，让密斯来收拾残局。司法部部长首先发表了自己的开场白，他解释说，总统要求他调查与向伊朗出售武器有关的指控。他非常谨慎地说，自己的调查还处于初步阶段，但总统坚决要求他披露伊朗计划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密斯说道：“在武器交易过程中，美国把武器提供给以色列，而以色列则转手把武器转交给——实际上是卖给——伊朗方面的代表。以色列代表和伊朗代表交易中出现差价的那笔钱被提供给中美洲反对桑地诺政府的武装分子。”

记者们要求给他们一点儿时间来消化理解密斯的讲话内容，随后，他们开始大声提问。一位记者问道：“先生，请问涉及多少钱？”

密斯回答道：“我们还不知道准确数额，我们估计是1000万~3000万美

元。”

“为什么没有告诉总统？”

“我们一发现这件事就立即告诉了总统。在我向他汇报之前，总统对此一无所知。”

有人问米斯，到底谁知道资金转移这件事。

“美国政府内唯一详细了解此事的人——唯一的一个人——是诺思中校。波因德克斯特上将也了解一些内幕，但没有进一步进行调查。”

“中情局局长凯西与此事有何关系？”

“中情局局长凯西、国务卿舒尔茨、国防部部长温伯格、我本人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对此事都不知情。”

一些记者公开表示质疑，一位记者问道：“你们这是找了一个替罪羊，撒了一个弥天大谎，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你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

米斯说道：“我能说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我们一得到这一消息，就非常谨慎地想让大家和美国公众看清事实。总统认为，为了能够完全讲清楚这件事，首先他应当做一个声明，然后由我来回答大家的问题。我想有一件事你们应当同意，那就是我们在竭尽所能以确保我们没有隐藏任何事情。”

怀疑依然存在。“米斯先生，这件事波及哪个层次？换句话说，你们告诉我们说是一位中校执行的这一计划，并把这些资金转移了，而波因德克斯特上将仅仅是知情而已。您相信这种说法吗？这件事波及哪个层次？”

米斯坚持自己的解释。他说道：“你刚才提到的就是我们目前所知道的一切。据我们所知，我们已经对此进行了广泛地查证，此事并没有波及更高层次。”

有时，南希·里根对自己丈夫的缺点还是比较坦诚的。她告诉迈克尔·迪弗：“罗尼对自己身边的人太过信任。”她曾对一位记者说：“我想这表明他一直是乐观的人，认为如果你放手让手下人去做，那么事情最终会得到解决。但事情并非总是如此。”

1986年秋，事情果然并非如此。随着伊朗丑闻转移到涉及反政府武装，南希对自己的丈夫越来越担心，对他的手下越来越愤怒。南希后来写道：“我永远不会忘记罗尼脸上的表情。当时埃德温·米斯在11月24日下午找到他，告诉他那个令人震惊和警觉的消息，说尽管伊朗为美国的军事设备支付了3000万美元，但报账的数量还不到1/2。奥利弗·诺思承认至少把其中的一部分利润转给了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这一消息非常令人震惊，所有的事情都停了下来。罗尼回到卧室时面色苍白，完全崩溃了。他说：‘亲爱的，我得到一个糟糕的消息。埃德温·米斯刚刚来过，告诉我从伊朗军售中得到的资金被转给了反政府武装。’尽管我对此不是十分理解，但我可以从他的声音中得知问题非常严重。”

南希没有必要完全理解这件事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感受。她写道：“如果罗尼感到难以置信，那我就感到怒不可遏。当晚晚些时候，我从办公室给唐纳德·里甘打电话，告诉他我是多么烦躁。我强烈地感受到罗尼没有得到应有的服务，我希望唐纳德知道这一点。”她还希望里甘明白自己在责备他。南希拒绝接受他的解释，说自己并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他是办公厅主任，怎么会不知道呢？我想他应当知道。一位优秀的办公厅主任应当无所不知。他应当觉察出正在发生的一切。”南希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拿里甘身为办公厅主任任期内的糟糕表现与他的前任进行比较的人。“我无法想象，在罗尼的第一任期内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当时贝克、米斯和迪弗这‘三驾马车’工作负责。当时白宫西翼非常开放，如果白宫内部发生什么阴险的事情，很快就会显现出来——罗尼当然也就会注意到。但现在，三驾马车的所有权力都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

在随后几周内，南希的沮丧情绪进一步加深。她说：“我的体重肯定掉了4.5公斤。我努力吃饭，但就是吃不多。每天一打开电视，我们不知道会听到什么消息。简直糟透了——对于发生在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情，我需要通过媒体来获取信息。”

南希不愿看到自己的丈夫身处这样一种困境之中。她写道：“罗尼真的感到不知所措。他一直希望事情能够尘埃落定，可以对这一切做出合理解释。但他无法阻止事情的发展，也无法控制。”里根甚至不能提及此事。



在任命了他所承诺的调查委员会之后，他自己保持沉默，等待委员会的报告。但是沉默也并非可以轻易奏效。南希解释说：“罗尼处于两难境地。举行记者招待会有可能会产生风险，与新的消息相矛盾；但不举行记者招待会就可能产生真空地带，让某些人觉得罗尼在隐藏什么。”

这种痛苦无休止。南希写道：“那是一段黑暗痛苦的时期，持续了几个月。每次当我翻开报纸或打开电视的时候，都会看到相同的猛烈攻击。”公众也随声附和，里根的威望和支持率处于历史最低。“无论他说过多少次自己并不知道资金转移这件事，都会得到同样的反应：不，你知道的。”

南希尽其所能地保证里根可以得到正确的建议，把里甘的建议分离出去。她和迈克尔·迪弗取得联系，后者把威廉·罗杰斯和罗伯特·施特劳斯介绍进来。罗杰斯是尼克松时期的国务卿，施特劳斯是位民主党人，但也是华盛顿最精明的资深人士之一。南希说道：“通常我不会与罗尼一起参加会议，但当时形势特殊，又是在白宫宅邸举行，所以我迫切希望参加。”

除了预测说风暴即将过去之外，罗杰斯很少说话。南希发现他的话帮助不大，而施特劳斯则更对她的脾气。施特劳斯说：“总统先生，请让我告诉您我第一次来白宫宅邸的情况。当时约翰逊总统在位，我们几个到这里来跟他谈越南战争的情况。当轮到讲话的时候，我退缩了，没有告诉总统我的真实想法，而是跟他讲了我认为他希望听到的。当晚回到家以后，我感觉自己就像个廉价的妓女。当时我跟自己说：如果再有哪个傻总统邀请我回到这里，我希望能够直言不讳。我多次来到这里见卡特，总是跟他说我的真实想法。”

施特劳斯停顿了一下，然后继续说道：“现在，我并不是要责难唐纳德里甘，但您目前面临两个严重问题，而他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没能帮助您。首先，您在国会方面遇到政治难题，而里甘在那里没有支持者，也没有盟友。其次，您面临严峻的媒体困境，而里甘在这方面也没有朋友。无论他是多么积极，您多么欣赏他，或者你们相处得多么融洽，这都没有用。他不是您所要的人。您现在处境艰难，总统先生，您需要一位可以帮助您摆脱困境的办公厅主任。”

南希·里根对施特劳斯的话很满意，她当晚打电话感谢他如此直言不讳。她回忆说：“遗憾的是，罗尼对他的话没有反应。”

里根对她也没有反应。“我对他说：我觉得斯托克曼比较适合，觉得威廉·克拉克比较合适。你为什么不听从大家对于里甘的意见？”里根爱自己的妻子，但在这件事上他听从了自己的直觉。南希写道：“直到最后，罗尼依然认为唐的问题可以自己解决。”

里甘看到了自己的任职行将结束。在回顾里根和米斯披露资金转移的那场新闻发布会的时候，里甘写道：“随着事情一件接着一件被披露出来，记者们叫喊着，跳跃着，比画着，开始明白这件事的重要性。他们的兴奋之情创造了一种氛围，这种氛围只能被说成是压抑之后的释放。基本情感开始发挥作用。通气会房间内的许多人都在想着一个问题：又一位总统要自毁金身。水中已经有了鲜血。”

鲜血并不是里甘的，但他认为鲨鱼们才不会管这些。媒体开始推测里甘能坚持多久，推测认为也就几天或几个星期，而不是几个月。民主党人不出所料地要求他辞职，许多共和党人也是如此。

里甘认为自己可以从来自白宫外部的批评中坚持下来，但他没有把握自己可以经受得住来自内部的指责。他想起了罗伯特·格雷夫斯写的一部关于罗马皇帝克劳狄的小说。在这部小说里，克劳狄问自己诡计多端的祖母利维娅，她是喜欢速效毒药还是慢性毒药。她回答说，慢性毒药更好一些，因为它们看起来像是患了普通疾病一般。里甘后来说道：“毫不夸张地说，在20世纪的华盛顿，最流行的毒药就是恶意宣传。只要加大剂量，它就可以在一夜之间毁掉一个人的名声。而当毒药缓慢地渗入受害人血管时，它也一定会扼杀此人的公共形象，只不过其症状——愤怒、怀疑、沮丧以及失去朋友和影响力——常常被误认为是生病的表现。受害人可能会意识到自己被下毒了，甚至他还清楚地知道谁是下毒者。但他不能说出自己的怀疑，因为每次这样做，他都会在自己的错误中再加上一条被害妄想症，这种病是在报纸中日积月累起来的。”

里甘没有明确指出谁是他的利维娅，但他无须指出。华盛顿中的每个人都知道，南希·里根不信任他，也看不起他。大多数人认为，她一直想开除他。里甘明白，对他造成伤害的一系列的消息泄露都来自第一夫人及其手下。《洛杉矶时报》一条新闻标题醒目地写道：“里根的长期顾问寻求罢黜里甘。”随后的报道引用了“与总统关系亲密的消息人士”的话，解释说迈克尔·迪弗和斯图尔特·斯宾塞将与总统见面：“消息人士说，迪弗和斯宾塞得到第一夫人南希·里根的支持，计划向里根提出建议——除非他罢免里甘并对伊朗武器换人质丑闻采取强硬措施，否则，里根最后两年的总统任期将会受到严重损害。”文章又做了必要的补充：“过去涉及总统面临的关键人事问题上，迪弗、斯宾塞和南希·里根常常合作。”在提到里甘时，文章引用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的话：“他必须离职，因为很明显没人支持他。甚至连他自己的手下都想告诉他，他应当离开，但是他们不敢这样做。对此，每个人都表示支持，除了那位‘老头儿’”——里根。

流言蜚语产生了暂时的矛盾效果。里甘本来计划在中期选举之后辞职，但

他不想屈服于媒体压力，或者让南希因把他赶出政府而得意。并且他认为，在受到严厉批评时，辞职就等于承认自己犯有过失。

而对里根总统来说，他同样不愿意让他人替自己做出人事决定。他继续指责媒体造谣生事——指责它们破坏了一项意义重大的计划，盲目夸大自己手下人轻微的过失。里根对《时代周刊》说：“这些天我一直怒火难消。”他转而使用当下流行的一个比喻，继续说道：“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像他们这样的鲨鱼，围着水中的鲜血一直在打转。”他又补充道：“真正让我抓狂的是，此次计划本来没有失败，直到媒体从贝鲁特听到传闻并开始大做文章之后。我跟他们说过，曝光此事可能会破坏这一计划，可能会导致人员死亡，但他们仍一意孤行。”在被问及他是否觉得被奥利弗·诺思出卖的时候，里根直接否认了这种观点，说道：“奥利弗·诺思中校参与了我们的所有行动，他一直表现良好，是一位民族英雄。我想要批评的唯一一点就是没人告诉我全部事情。”

里根对一些来访的共和党国会议员们说，他不会为了安抚媒体或者向批评者妥协而解雇手下人。他说道：“到目前为止，只提到了两个人。”——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这两人都已经被开除了。如果还提到了别的人，我会采取行动的，但我不会改变我的团队。”在向《洛杉矶时报》透露了此次会谈内容之后，总统在日记中写道：“斯图尔特·斯宾塞和迈克·迪弗一起来访，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并且真心想帮助我。但我不同意他们的建议——解决伊朗问题的途径就是要开除我的手下——高级官员甚至是内阁成员。”

一件意外的麻烦事分散了总统对于自己办公厅主任的关注。就在他任命调查伊朗与反政府武装事情的特别委员会开始工作的时候，参众两院也展开了他们自己的调查。参议院委员会认为，如果有人知道与反政府武装有关的秘密行动，那么此人一定是中情局局长。因此他们传唤威廉·凯西前来做证。但就在凯西出面的前一天，他突发癫痫，必须住院。医生诊断后切除了这个恶性脑瘤。凯西丧失了说话能力，因此无法做证。

里根对待这一情况采取了务实的做法。他写道：“必须开始考虑中情局局长的人选。医生对凯西的诊断很不乐观，除了化疗之外，他还必须接受放疗。如果我们必须换人的话，驻联合国大使弗农·沃尔特斯可能是极佳人选。”

南希·里根希望自己的丈夫立即采取行动。她后来说道：“凯西住院了，中

情局缺少一名局长。在我看来，必须尽快填补这一极其敏感的职位，尤其是在政府危机时刻。”

唐纳德·里甘迟迟不动。他回忆说：“我跟里根夫人说，这样做——让总统解雇一名知名的好朋友，而此人现在正躺在濒死的病床上——看起来不明智，也不人道。”

南希后来说道：“我和罗尼不是凯西的老朋友，尽管媒体一直这样讲。”她继续施压，要求丈夫解雇凯西。

里甘认为南希的瞎指挥令人厌恶，招人反感，他回忆道：“就在圣诞节的前一天，第一夫人自凯西12月18日手术以来，也不知道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打来电话，询问我解雇他的工作进展如何。”

里甘回答道：“什么也没做。”

她问道：“为什么不做？他必须离职，他无法胜任他的工作，只能让罗尼尴尬，他必须出局。”

“但是，南希，他刚刚做完脑部手术还不到一个周，生病前还受到猛烈攻击。此时拆台恐怕不合适。”

南希说，她已经同自己同母异父的哥哥交流过，这位神经外科医生预测凯西再也不能工作了。

里甘回答道：“情况可能如此，但我认为没有人对凯西说过这件事。苏菲和家人把这场病看得很严重，况且还是圣诞节期间。在这种情况下，罗纳德·里根显然不适合解雇任何人，更别说是凯西了。我们不能这样做。”

据里甘回忆，南希变得很恼火。她说道：“与保护罗尼相比，你更愿意保护凯西。他正在把罗尼拖下水，没人相信凯西的话，他的可信度在国会已经不复存在了。”

里甘承认说：“可能的确如此，但是凯西帮助您丈夫赢得了选举，并且也为他做了许多事情。他理应得到感激，应该以更好的方式离开。南希，很快他就会体面地辞职，请耐心等待。”

里甘拒绝解雇凯西，这证实了南希的想法，认为里甘自己必须走人。她再次向自己的丈夫表明态度，直到里根失去耐心，突然发火，声音大得连媒体都听到了。《华盛顿邮报》报道说：“一位消息人士说，本周早些时候，里根夫妇针对里甘发生了争吵。当时，第一夫人要求解雇里甘，而总统最后说：‘不要在我背后瞎嘀咕。’”里根的发言人否认了这句话，也否认

了这一情境。南希说得没有这么肯定，她回顾道：“在唐纳德里甘这件事上，我们之间产生了矛盾，但罗尼和我不会用那种方式讲话。”

里甘坚持到了新年。总统在1月里进行了一次前列腺肥大手术。这件事既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也没有带来特别的压力，然而它却让南希非常担忧。在里根康复期间，南希衣不解带地伺候在他身边。南希试图说服里根推迟他的国情咨文演讲，但里根说自己感觉没事，于是就照常进行了。他健康的表现让里甘认为他准备好下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了，于是就安排在2月底举行。南希对里甘大发雷霆。她后来写道：“我当时火冒三丈，在2月8日的电话里我们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最后我明显无法改变里甘的想法时，我说：‘好吧，召开你那该死的新闻发布会吧！’”

里甘早已对南希忍无可忍，说道：“我当然会召开的！”然后，就挂断了电话。

南希呆住了。她写道：“这真让人受不了。你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个被挂断的电话，无能为力。这让人十分生气。你想把电话给砸了，大声吼道：‘跟我说话！’”

南希没有立即向自己的丈夫诉苦。之前曾有过一次，当时里根刚做完癌症手术，里甘挂断过她的电话，而她没有声张这件事。这一次，她等了几天。最后，里甘打电话来假惺惺地道歉。他说：“我妻子说不应当挂断您的电话。”

南希回答说：“没错，你不应当这样做。唐纳德，不要再对我这样。”根据她之后的回忆，她真心想说的是：“你还需要你妻子告诉你不应当挂断别人的电话吗？”南希后来补充说：“此时，我终于告诉了罗尼这件事。”

这次决定命运的谈话发生在戴维营。她在2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我跟罗尼谈了唐纳德里甘的事情，我想他是第一次听了进去。我告诉他在整件事中我是多么失望，告诉他工作风纪沉沦到了何种地步。”

当晚，他们在床上又谈论了许多，在随后几天继续谈论。南希在2月16日写道：“我想罗尼最终明白自己面临一个真正的问题，必须对此采取措施。”另外一则报道又让南希在第二天写道：“今晚有报道说我跟唐纳德不说话，因为我想让他离职。我们现在的的确不说话，我也的确想让他离开，但这并不是我们不说话的原因。”

里根开始在公开场合疏远自己的办公厅主任。在与来访的以色列总理伊扎克·沙米尔拍照时，记者们争先恐后地提问。一位记者问道：“您打算开除里甘，还是他开始同里根夫人说话了，还是里根夫人开始同他说话了

呢？”

“天呐，看在上帝的份儿上！”里根特意笑着回答道。

“这不是真的？”

“是的，不是真的。没人要被解雇。”

在提问了有关中东地区的问题之后，一位记者又绕了回来：“总统先生，您刚才说没有人会被解雇。请问里甘先生还会继续担任您的办公厅主任吗？”

里根说：“这个问题嘛，取决于他。我一直在说，当那些我邀请参加政府工作的人感到他们必须回归私人生活的时候，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我也从不会试图劝阻他们。”

“先生，这到底是‘是’还是‘不是’呢？”

“对此不予答复，不予答复。”

然而，南希认为这传递了一种信息。她在当晚的日记中写道：“这是毫不掩饰的暗示，但我想唐纳德不会注意到。”几天之内，将会有一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这场报告是以委员会主席、前参议员约翰·托尔的名字命名的。这场报告的到来给了南希进一步的理由，希望里甘离职。“托尔报告将在26日举行，而唐纳德希望里根在27日发表一次电视演讲。上帝啊！你无法在24个小时之内准备好一篇优秀的演讲。这是任何傻瓜都明白的道理。”

事实证明，托尔报告成了长期以来悬而未决的决定的催化剂。里甘后来说，他和总统在去年11月商量好，等报告发布之后他就离职。因此，在还有3天举行报告的时候，乔治·布什的到访让他很惊讶。布什说：“唐纳德，你为什么不前往椭圆形办公室，跟总统讨论一下你的事情呢？”

里甘问布什为什么给他提这样的建议，他原以为副总统知道自己将在报告会结束后离职。

布什说道：“是这样的，总统问我是否知道你的计划是什么。”

里甘来到椭圆形办公室，坐在总统办公桌旁他通常坐的位置。他问里根是否想谈一下他的事情。

里根说：“我认为是时候了。”

里甘后来承认，自己没想要总统轻松达到目的。他说道：“好的，总统先生，您为什么不告诉我呢？您对此的态度是什么呢？您认为我应当做什么呢？”

总统说道：“天呐，唐纳德，是这样的。上周末的电视新闻全是关于南希的。”围绕新近任命的白宫新闻主任杰克·克勒产生了一场争执。此人没有告诉里甘或其他任何人，自己少年时期曾在德国参加过纳粹青年营。报纸报道说南希·里根促成了对克勒的任命，还报道里甘当时说因此应当由南希的手下负责调查克勒的背景。总统坚定地站在南希一边，他对里甘说道：“她因克勒的事受到指责，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真正想雇用他的是我，她从没有见过他。”

里甘没有回答，总统显然感到很不自在，说道：“我想是时候履行我俩在11月的时候定下的事情了。”

里甘回答道：“我信守诺言，您什么时间让我走都可以。”

“很好，报告将在星期四举行，我想你现在辞职比较合适。”

里甘回想起自己当时非常震惊，愤怒地说道：“您说现在是什么意思？现在是星期一，报告还没有举行。您不能那样对我，总统先生。如果我在报告之前离开，您就是把我扔给了狼群。我应当得到比这更好的待遇。”

里根试图缓和当时的气氛，说道：“那么你认为怎样合适呢？”

里甘回答道：“定在下个周的前几天，做完这次报告，让世人看一看到底发生了什么，责任在谁身上。我愿意承担我那部分责任。”

里根表示同意，他为最终解决这一问题感到欣慰。但是里甘还有话要说，他指责南希横加干涉政府事务，说道：“我认为我是总统的办公厅主任，而总统的夫人不是他妻子的。先生，我必须告诉您，我对整件事情感到非常痛心，因为您让忠诚者受到惩罚，而让那些别有用心者得到奖赏。”

里甘回忆了里根的反应：“跟我所认识的任何人相比，总统最不喜欢当面对质。但他看着我，没有表现出愤怒。罗纳德里根温和地说：‘我们通过处理这件事来努力纠正失误。我们将确保你能体面地离开。’”

事情发展得出人意料。托尔委员会工作得十分出色。在3个月的时间里，该委员会采访了50多位证人。尽管它没有传唤权，因而无法强行做证，但它还是得到了除了两个最重要的人物之外的所有人的证词。那两个最重要



的人是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和奥利弗·诺思。

里根是愿意做证的人之一。他在1月底，然后在2月在椭圆形办公室跟委员会人员交代情况。里根在第一次采访中告诉他们，他在1985年8月批准从以色列向伊朗运送首批陶氏导弹。这与里甘的证词矛盾，里甘说总统没有授权批准。在里根准备第二次采访时，他同里甘、乔治·布什以及白宫法律顾问彼得·沃利森碰面，审查了他们的记录和备忘录，看一下谁是正确的。里甘说服里根相信是总统的记忆出了问题。这位办公厅主任说，当他告诉里根导弹运输这件事时，总统表现得惊讶而烦躁。沃利森追问里根：“您当时感到惊讶吗？”

里根说：“是的，我想是的。”

里甘重申道：“我记得是那样的，您当时很愤怒，说什么‘好吧，木已成舟’。”

里根说：“我想他是正确的。”

沃利森为里根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帮助他为第二次采访理清思路。沃利森写道：“关于8月运输陶氏导弹这件事，在同我和戴维·阿布希尔讨论时，您说自己惊讶地发现以色列运送了这批武器。如果这就是您回忆的内容的话，如果在托尔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的话，您可能想说自己当时感到惊讶。”

里根确实被问及自己的证词和里甘的证词之间的差异。他告诉委员们说自己改变了主意。他与里甘讨论过这一问题，认为里甘是正确的，自己并没有提前授权输送武器。当得知此事时，自己感到惊讶。仿佛是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总统站了起来看着沃利森的方向说道：“彼得，你今天上午给我的那张纸在哪里？”找到备忘录之后，里根抓在手里读了起来：“如果在托尔委员会的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的话，您可能想说自己当时感到惊讶。”

沃利森后来说：“太可怕了，真让人感到恐惧。我没想让他拿那张纸读。那份备忘录的目的只是想让他出席前记住之前谈论的问题，记住他的结论。”沃利森摇着头说道：“上帝啊，太可怕了。”

委员们也感到惊讶和迷惑。该委员会的领导人雷特·道森还记得委员们会的反应，包括约翰·托尔、前国务卿埃德蒙·马斯基和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道森说道：“埃德蒙、托尔和布伦特像遭到雷击一样瘫坐在沙发或椅子上。”委员们认为，当总统给委员会写了一封没有丝毫可信度的信后，他关于这件事的记忆，或者他的任何证词没有得到证

实。里根说：“在试图回顾18个月前发生的事情时，我怀疑自己受到了他人记忆的影响，而不是我自己的。我没有私人笔记或记录来帮助我回忆这件事。”他拒绝提及日记中反复写到的关于武器与人质方面的内容。“唯一诚实的回答就是，尽管我尽力了，但我依然回想不起是否在1985年8月前后同意补充以色列的军火库。因此我的回答以及事实的真相也就是‘我不记得当时的情况’。”

托尔报告在2月26日星期四公布，证实了当时大家的普遍观点：政府利用武器交换人质，把从军售中得来的收益转移给反政府武装。这份报告认为，总统的错误在与没有很好地监督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的工作。报告中写道：“总统的管理风格是把政策审议和实施的责任下放到他的顾问身上。尽管如此，在如此复杂棘手、风险极高、赌注巨大的行动中，总统应当确保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制度不会让他失望。他没有要求自己的政策经过最严格的审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员是非常擅长这一点的。他也从没有坚持要求问责制和政绩评估。”

这份报告把大部分行动责任归咎于罗伯特·麦克法兰、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和奥利弗·诺思。这些人都已离开政府。报告对依然留任白宫的高级官员唐纳德·里甘的处理方式粗略而简短：“与近些年几乎所有的办公厅主任相比，他坚定维护自己对于白宫工作人员的掌控，试图把这种控制扩大到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身上。”这份报告写道：“他自己非常积极参与国家安全事务，参加了几乎所有与伊朗计划有关的会议。跟其他人一样，他应当坚持进行监管，让事情有序发展。另外，他尤其应当确保制订出计划，来应对计划被曝光事件。曝光发生后，白宫遭遇了极度混乱的局面，他必须为此承担主要责任。”

在辞职之前，里甘谋取了一段过渡时期，让世人明白总统不同意那份报告的调查结果。他没有奢望总统承认自己赋予了麦克法兰和波因德克斯特非法插手椭圆形办公室事务的权利，结果让里甘无法进行自己的工作。然而，他也不认为总统会把他抛出去承担所有指责。

但是，这恰恰是南希·里根希望自己丈夫去做的，而里根也在很大程度上依从了她。里根开始考虑里甘的接班人。保罗·拉克索尔特提议参议院前多数党领袖霍华德·贝克。里根在星期四托尔报告公布后在日记中写道：“这是个不错的主意。我可能会遇到来自我们右翼分子的冲击，但我应付得了。”在同一篇日记中，总统补充道：“副总统刚刚来过——他又同唐纳德见过面。这次完全不同。”——不同于布什几天前向里根汇报的那次令人

愤怒的会面。“他说他会在周一首先递交自己的辞职信。我的恳求终于得到了回应。”

但是，南希不想等到周一。第二天，也就是星期五，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霍华德·贝克将接替里甘担任办公厅主任。南希不承认这一消息是自己手下人泄露出去的，但利益和证据都指向白宫东翼。

里甘觉得自己已经忍无可忍，他当即写了一封只有一句话的辞职信送给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波因德克斯特的继任者弗兰克·卡卢奇要求他亲自见一下总统，里甘拒绝了。他告诉卡卢奇：“我要疯掉了。这是故意泄露消息，目的是要羞辱我。”

卡卢奇不让里甘在没有同总统谈话的情况下就离开，于是他请里根给里甘打电话。里根为走漏了贝克任职消息一事向里甘道歉，但他希望里甘可以再留任一段时间，以便帮助贝克适应新的工作。

里甘拒绝了，说道：“抱歉，总统先生，我无法再待在这里。今天就是最后一天。我曾担任您的财政部部长4年，担任您的办公厅主任2年，可您却不信任我，甚至不告诉我继任者是谁，不让顺利交接。我不应当得到这样的待遇。我们到此为止。”

里根试图安慰他，但没有效果。总统当晚写道：“里甘很生气，这可以理解。”里根签发了一封得体的书信，接受里甘的辞职。里甘读完后就扔掉了。里甘回忆说：“在与里根总统共事期间，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信件，因此我知道这是别人替他写的。”

南希·里根也有自己的反应，她回忆说：“当晚，我睡得很踏实。这是几个星期以来的第一次。”

3月4日，总统就托尔报告向美国人民发表讲话。他还从没有做过这么重要的演讲，他清楚这一点。他总统任期最后两年的关键在于他能否赢回民众的信任，这种信任是作为总统所取得的任何成就的关键。人们也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怀疑过他，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关于他无能或失职的证据还在继续增加，让他更难以以为自己针对伊朗和反政府武装的政策辩护。然而，里根必须有所表态。

里根开始说道：“在过去的3个月里，我一直对与伊朗有关的问题保持沉默。你们一定在想：‘他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呢？他为什么不能像过去那样，在我们面对麻烦或痛苦的时候跟我们讲话呢？’我想，你们中的另外一些人可能在想：‘他在白宫隐瞒什么呢？’”然而他说，沉默是必要的，因为他不了解事情的全部真相，不希望在没有了解真相的情况下讲话。他承认道：“我为我的沉默付出了代价，那就是你们的信任和信心。但是，我必须跟你们一样，等待事情的全部真相。”现在，托尔委员会发布了报告，因此他可以打破沉默了。

里根继续说道：“经常有人指责我太乐观。的确，我必须从委员会的报告中努力寻找一切好消息。正如大家知道的，这份报告充斥着批评，随后我将提到这一点。”但在坏消息中也有好消息。“我非常欣慰地看到这句话：‘委员会认为，总统的确希望知道事情的全部真相。’”这里面不曾有攻守同盟，也不会有攻守同盟。“在其他调查进行的同时，我就这一点可以继续向大家保证。”

至于坏消息，里根没有假装视而不见。里根说道：“报告的调查结果公正、可靠，非常重要。我接受这些结果。”本届政府不会推卸责任。“我为我自己的行为和我政府内部那些人的行为承担全部责任。尽管对于那些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活动我非常气愤，但对此我依然难辞其咎；尽管我对于手下某些人非常失望，但对此我依然应当向美国人民做出解释；尽管我个人非常讨厌秘密银行账户和资金转移，但是，正如海军部所说的，这是在我的任期内发生的。”

里根提到了那个引发最大争议的话题：“几个月前，我跟美国人民说我不会用武器换人质。我的内心和我真实的本意告诉我是这样的，但事实和证据告诉我不是这样的。正如托尔报告中说的那样，针对伊朗启动的战略计划在实施过程中变了味，变成了武器换人质。这种转变有悖于我的初衷，有悖于政府政策，有悖于我们最初的战略构想。之所以这样是有原因的，但不能成为借口。这是错误的。我开启最初的伊朗计划，目的是与那些可

能在霍梅尼之后掌权的人建立联系。然而，从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我让自己对于人质的担忧发展成涉及伊朗的地缘政治战略。我太过关注人质待遇问题，而没有关注整个伊朗计划的具体实施。”

里根对人质依然很关心。“请让我对人质家属说：‘我们没有放弃，永远不会放弃。我向你们保证，我们将动用一切合法手段，把你们的亲人解救出来。’”但不会再有武器换人质的做法。在谈到总统无能为力的方面时，里根说道：“对于那些目前身处危险地区的美国人来说，他们必须明白，他们应当为自己的安全负责。”

这份报告的另外一部分涉及转移给反政府武装的资金。里根说道：“托尔委员会无法弄清楚这笔钱的去向，因此这一责任就留给了法院指定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和两个国会调查委员会。我相信事实终归会调查清楚。”他也会承认这些事实。“我跟托尔委员会说过，我并不清楚向反政府武装转移资金这件事。但是作为总统，我难辞其咎。”

里根介绍了那些会阻止未来违法行为的新的人事安排。他说：“前参议员霍华德·贝克，也就是我的新办公厅主任，拥有无与伦比的法律知识和外交技巧；我的新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弗兰克·卡卢奇以其政府工作经验而受人尊敬，以其判断力和决策力而得到信任。”里根提名威廉·韦伯斯特担任中情局局长，等待参议院批准。里根之前提名罗伯特·盖茨接替威廉·凯西——凯西依然病重，最终辞职——但提名遇到麻烦，因为许多参议员质疑用中情局内部人员来交替接任这种做法。里根和盖茨同意撤回这个方案。里根认为韦伯斯特完全可以胜任，他说：“韦伯斯特先生担任过联邦调查局局长，担任过美国地区法官。他清楚‘法治’的意义。”

总统说，他已下令审查秘密行动，以保证这些行动都符合美国政策和价值观。“我希望有这样的秘密政策，如果美国人在他们报纸的头版看到它时，他们会说：‘这是有道理的。’”里根禁止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采取秘密行动。总统说：“不能有假设、并且或者但是的说辞。”他新设立了一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法律顾问的岗位，确保符合法律规定。他承诺让国会获得知情权。“严格遵守与国会的磋商程序，不但要在字面上执行，而且要在思想上引起重视。”

里根希望国家可以度过导致托尔报告形成的困难局势。“当你犯下错误的时候，情况应当是这样的：你接受批评，吸取教训，然后继续前行。这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他没有否认继续调查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必须继续下去。”

里根的演讲几乎没有能够减少公众的怀疑。一次新的民调显示，85%的受访者认为白宫参与了伊朗与反政府武装事件中的有组织的攻守同盟，其中

有一半的人说里根是这一阴谋中的一分子。从一个方面来看，此次演讲造成的危害大于其带来的好处。它关注外交事务，而大家对总统又普遍不信任。这使得里根处理外交事务的支持率达到33%的历史新低。

然而，里根拒绝受其负面影响，甚至拒绝承认自己遭到打击。他的手下继续保护着他。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次演讲的效果格外好，93%的电话（超过任何一次演讲）都是支持者打来的。甚至连那些挑剔的人在演讲之后的评论中也对此大加赞赏。”

里根不愿接受不愉快现实的做法，也体现在其他方面。他认识洛克·哈德森同他认识许多其他好莱坞明星的方式是一样的：主要是通过名气，偶尔也会通过偶遇。他在1985年10月确认收到这名演员过世的消息，这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里根在由白宫发布的一份书面声明中说：“我和南希听到洛克·哈德森去世的消息非常悲痛。他给电影业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将永远被铭记。全世界的影迷都会悼念他的离世，人们将记住他的博爱、同情心和名副其实的善良。愿上帝使其灵魂安息。”

没人否认总统表现出来的亲切体恤，但很多人认为这份声明来得有些晚，并且缺少了些什么。几个月以来，洛克·哈德森明显消瘦了许多。南希回忆说：“他曾来白宫赴宴，跟我在同一桌。我记得当时自己坐在他对面还在想，哎呀，他真瘦。我问他是否在节食，他说自己正在赶拍一部新影片，累瘦了。”小报记者发表了关于哈德森健康衰退原因的各种报道。里根听闻过这些报道，私下里自己也做出了反应。里根在1985年7月写道：“给在一家巴黎医院的洛克·哈德森打电话，当地媒体说他患上了癌症，做手术也无法治愈。我当时想，在这种情况下，我或许能让他恢复信心。现在我从电视上得知，关于他的病情有传闻说他是在那里治疗艾滋病。”

哈德森证实了传闻，透露说自己在一年前被诊断出患有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这一病症对于医生和公共卫生官员来说也相对比较陌生，直到1981年才被临床称为艾滋病。由于这种疾病最先出现在同性恋男人身上，因此对很多反对同性恋的美国人来说这是件丢人的事，他们认为同性恋行为邪恶、变态，或者完全是令人作呕的。

里根比他那一代人更宽容一些。他女儿帕蒂·戴维斯（她放弃了自己父亲的姓，采用母亲的）后来说，里根谈起洛克·哈德森的同性恋问题时比较客观，因为多年来，这件事在好莱坞已是公开的秘密。她还说里根和南希有一次曾让一对女同性恋“夫妇”照看她和罗恩，当时他们在夏威夷度假。作为20世纪70年代加利福尼亚州前州长，里根明确反对一次投票结果，那次投票本来可以禁止同性恋男女在加州公立学校教书。

然而，里根却领导着一个团体，该团体包括一些强势组织，他们惊诧于同性恋行为。在他们看来，“同性恋瘟疫”——他们经常这样称呼它——是同性恋者蔑视自然和上帝的结果。“他们向自然宣战，而今自然开始进行可怕的报复。”保守派权威人士帕特里克·布坎南写道（他后来成为里根的新闻主任）。电视福音传道者杰里·福尔韦尔说道：“艾滋病是上帝对于不遵守其教规的社会的审判。”

有时候，里根会迎合社会保守派，如果不是怂恿的话。1980年，在共和党初选期间，记者罗伯特·希尔问里根是否认为同性恋者跟其他任何人一样拥有同样的公民权利。

里根回答说：“我认为是这样的，也应当如此。”

希尔随后问道，既然如此，那为什么据报道你这位候选人的一些说法与此相悖呢？

里根回答道：“我对于同性恋权利运动的批评是这样的，他们不是在争取公民权利，而是在争取承认和接受一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对这种生活方式，我认为社会不会容忍，我也不能容忍。”

希尔问道：“这是出于宗教原因吗？”

里根说：“是的，你在《圣经》中可以看到，在上帝眼里，这是令人厌恶的行为。”

希尔问道：“但这一点能够约束其他不信仰《圣经》的那些人吗？我们难道不是有政教分离的权利吗？”

里根肯定地说：“是的，我们有，的确有。”但他补充说：“请注意，如果其他团体的人也要求同样的权利怎么办？比方说，那些彻底自由主义者——或者性行为放纵者，应当这样说——他们希望得到完全自由和开放的性行为。”

希尔表示怀疑，说那些自诩为保守派的人是在要求政府干预男同性恋者的私生活。

里根显然不愿意处于下风，他说：“没有人要求干预任何人的私生活。我想帕特·坎贝尔在审理奥斯卡·王尔德一案时表述得极为清楚。她说：‘只要他们不在大街上乱来，不惊吓到过往的马匹，那我不反对任何人的性生活。’”

在获得总统竞选提名之后，以及在赢得竞选之后，里根很少提到同性恋权利这一问题。他默许在联邦预算中增加针对艾滋病的投入，但几乎不允许政府中其他人对这一问题说三道四。在其第一任期内，里根作为总统对艾滋病一直保持沉默，尽管艾滋病死亡人数增加到了数千人。

但最终，记者们逼着他表态。在1985年9月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记者问道：“总统先生，我国最知名的艾滋病专家认为，现在应当加大目前的研究力度，研究他所说的小型登月发射项目，对抗艾滋病的蔓延，因为



这种蔓延趋势让全国的医疗工作者感到恐惧，甚至让学生们感到害怕。您是否支持政府采取大规模研究来对抗艾滋病，就像尼克松总统当年发起抗癌运动那样呢？”

里根回答道：“到目前为止，我已经支持这一研究进行了4年多。它是我们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在过去的4年时间里，包括我们在1986年度的预算，我们为艾滋病研究投入的资金超过了5亿美元，这还不算其他研究机构的投入。今年我们的预算是1亿美元，明年将达到1.26亿美元。因此，这是我们的首要任务。的确，这一问题非常严重，需要找到解决方案。”

这名记者表示怀疑，他说道：“那名提出自己观点的艾滋病专家在为政府工作，工作单位是国家癌症研究中心。他说，您的计划和您提议增加的费用在当前情况下不足以真正应对和解决这一问题。”

里根为自己的政策辩护道：“我认为，凭借我们预算中的各种规定，在我看来，一年1.26亿美元的研究经费足以取得重大进展。”

几个月之后，当里根把预算提交到国会时，其中包括了对艾滋病的研究，并作为一项“重要优先”项目。同一天，他在对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员工讲话时说道：“我们的公共卫生首选项目之一就是要继续研发艾滋病的治疗方案，继续研发和测试疫苗，同时继续关注预防措施。”

1987年春，里根宣布成立一个特殊委员会，以研究艾滋病，寻求治疗方法。他说：“很显然，艾滋病是当前世界面临的最严重的医疗问题之一，我们的医疗机构正夜以继日地工作，希望找到治疗方法。该委员会将帮助我们，确保我们能够利用一切可能的公共卫生手段，控制艾滋病病毒的传播。”

当年5月，里根就艾滋病发表了自己的第一次重要讲话。美国艾滋病研究基金会在华盛顿举行募捐活动，邀请里根前来讲话。假如观众指望看到他犹豫不决或不安的表现，那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里根开始说道：“募捐者总能让我想起我最喜欢和最常讲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我已经讲了好多年，因此，如果你们曾经听到过，请迁就我一下。有位先生刚刚被推举为他所在社区的年度慈善活动主席。他查看了所有的记录，注意到社区中一位非常富有的人。于是，他登门拜访，介绍自己的打算，说道：‘我们的记录显示您从没有捐助过我们的慈善活动。’这位富人说：‘我还有一个兄弟，他由于遭遇事故而丧失了劳动能力，永远无法自食其力。你们的记录有没有记录这件事呢？我母亲体弱多病，我还有位寡居的姐姐，带着几个年龄很小的孩子，没有父亲供养他们。你们的记录有没有记录这件事呢？’这位主席局促不安，十分尴尬，说：‘没有，我们的记录中没有这些。’这位富人说：‘那就是了，我连他们都没有资助过，为什么要

资助你们呢？”

一些观众笑了起来，还有一些人认为并不好笑，因为这个吝啬的富人同里根的艾滋病政策非常相似。里根变得严肃起来，说道：“今晚，我想谈一下让我们大家聚集在一起的这种疾病。我们曾谈论过这一疾病，现在我要再说一下。诗人W·H·奥登曾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实干家不是政客和政治家，而是科学家。我想，在艾滋病这件事上尤为如此。我们政府中的工作人员可以就其危害教育人民，可以鼓励安全性行为，可以证明病毒传播的广泛程度，可以做许多事情。但是，只有医疗科学才能够真正击败艾滋病。”里根提到了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进展。“大家想一想，我们直到1981年6月才知道这种疾病的存在，当时在加利福尼亚出现了5例病例。艾滋病病毒在1984年被发现，血液检验在1985年得以实现。随后，治疗药物AZT（齐多夫定）被推向市场，现在类似药物越来越多。目前，许多实验室都在进行疫苗研究。”里根介绍说，联邦政府继续加大用于艾滋病研究的预算。“预算中增加最快的就是用于艾滋病研究的这部分。女士们，先生们，理应如此。”华盛顿方面也在撤销监管限制，允许新药品上市。“我不会指责那些示威游行，他们希望能在治疗艾滋病的药品经过严苛的检验之前就可以得到它们。我同情这些人，我们将尽我们所能向他们提供帮助和希望。”

艾滋病研究的终极目标是要找到疫苗。但是，由于病毒具有较长的潜伏期，因而研发和测试疫苗需要时间。里根说：“我们最早可能会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得到疫苗，推向市场。”同时，国家也有许多重要的问题需要回答。“我们应如何保护这个国家的公民？我们从哪里入手？”信息至关重要。“最近，我已宣布，打算成立针对艾滋病的全国委员会，因为这种疾病对我们的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我们需要一些全方位的解决办法。我们应当如何行动来保护美国人不受病毒感染？我们应当如何尽力照顾那些患病和垂危的人们？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种让我们的医疗制度陷入困境的疾病？”该委员会将听取专家证词，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里根反对艾滋病是同性恋疾病的说法。他说：“我不希望美国人认为艾滋病只影响到某些特殊群体，它影响到我们所有人。我们的人民必须明白：美国面临着一种致命的传播疾病。这需要紧急行动，而不是恐慌；需要同情，而不是指责；需要理解，而不是无知。”里根同样反对道德说教者的相互指责，这种指责成了讨论艾滋病时常见的现象。“最终的审判归为上帝，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缓解痛苦，找到治疗方法。这是一场针对疾病的战斗，而不是针对我们美国同胞。我们绝不允许那些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们遭到歧视。”

里根说，有关艾滋病的许多恐惧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这些恐惧都是出于无知。曾有人跟我提到过报纸上的一张照片：医院病床上的一個嬰兒身

边放着一个标牌，上面写着‘艾滋病——请勿触碰’。还好，那张照片拍摄于几年前，现在我们都知道这种恐惧是没有根据的。但是，类似事件在我们国家其他地方依然在发生。我曾读过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个艾滋病患者回去上班时发现桌子上有一张匿名纸条，上面写着‘不要使用我们的饮水机’。还有人给我讲了这样一件事：在佛罗里达州有3个兄弟——年龄分别是10岁、9岁和7岁——血液中都带有艾滋病病毒。牧师要求他们全家都不要到教堂去。女士们，先生们，这是过时的恐惧，在‘勇敢者的国度’里没有它的立足之地。”

里根呼吁大家要开明、包容。“卫生和公共服务部已经明确说明，从医学角度来说，没有理由禁止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参加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没有理由让那些携带艾滋病病毒的人佩戴红色字母A。艾滋病不是轻易就可以传播的疾病。我们依然还在研究艾滋病的传播方式，但专家告诉我们，你不会因为打电话、共用游泳池或饮用水而感染艾滋病，也不会因为握手或乘坐公共汽车等而感染艾滋病。最重要的一点，你不会因为献血而感染艾滋病。”

然而，行为举止也的确关系重大。里根可以避免谈及道德说教，但他谈到了道德价值，尤其是个人责任的价值。在缺少疫苗和治疗方法的情况下，减缓艾滋病传播的唯一途径就是要改变感染者和高危人群的行为举止。“作为个体，我们负有道德责任，不能危及他人。这可能意味着用枪、汽车或病毒危及他人。如果有人认为自己可能携带病毒，那么此人就有责任进行艾滋病检测。人类尊严需要这样做，理由十分简单：无辜的人们正在受到这种病毒的感染，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因患上艾滋病而死掉。”里根采用了一个典型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观点：“肯塔基州乡村地区的一位医生接诊过一位妇女。她丈夫通过静脉注射吸毒，而她从丈夫那里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来他们离婚了，两人都不知道自己已被感染。他们又与别人结婚，现在这种疾病已经被传染给了她的新丈夫。正因为绝大多数人不清楚自己携带病毒，因此没有人知道这种病毒对我们整个社会的影响程度。艾滋病正在我们中间秘密传播，然而我们却不了解其传播范围。此刻，我们应当准确了解我们所面临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支持常规检测。”里根补充说，他已命令卫生和公共服务部评估当前艾滋病的发病率，并预测一下未来趋势。“我还要求卫生和公共服务部把艾滋病病毒加入传染病名单，这样一来，试图在美国永久定居的移民和外国人将因此被禁止入境。”

一些听众不喜欢最后这些关于常规艾滋病病毒检测和禁止感染病毒的移民入境的讲话。他们开始向总统发出嘘声，最初还有所节制，随后声音越来越大。

里根不为所动，继续讲话。他指出，一些移民可能因为感染其他传染病

——远没有艾滋病这样致命——而暂时被禁止入境。“我要求司法部制订计划，对所有联邦犯人进行检测，想方设法来保护未受感染的同狱犯人和他们的家人。此外，我要求审查其他联邦机构，比如退伍军人医院，来看一下在这些领域进行检测是否合适。这是作为当前已经在军队和涉外服务部门进行检测的补充。”

“反对！反对！”观众中的一小部分人发出了相当大的喊声。

里根面对叫喊声继续讲话。他说，各个州也都应当担负起各自的责任。“尽管我已经意识到个人在防治艾滋病方面的作用，但我还要鼓励各个州向那些申领结婚证和因性传播疾病或滥用毒品而前往诊所看病的人提供常规检测，鼓励各个州在州监狱和地方监狱进行常规检测。检测不但可以让我们得到更多的信息进行决策，而且，在申领结婚证这一环节，可以至少防止新生儿患上艾滋病。任何了解艾滋病对婴儿危害的人都不会反对这一人性化的考量。我认为所有想要结婚的人都希望得到检测。”

里根的演讲接近尾声时，许多观众依然感到很沮丧。“大家知道，据说每当夜色深沉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星星。在艾滋病蔓延的恐怖时期，曾出现过一些充满希望的时刻。”他指的是志愿者们们的奉献精神，他们照顾艾滋病病人。他重点提到了旧金山的一个志愿者组织的工作，他们为该市的艾滋病患者提供了超过10万个小时的支持。“这种同情在全国一再出现，体现了最佳的互助传统。我鼓励美国人民以此为榜样，志愿帮助他们感染艾滋病的同胞。”里根引用一位年轻的晚期艾滋病患者的话说：“尽管我接受死亡，但我认为，为了生存而奋斗非常重要。我将努力与病魔做斗争，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里根停顿了一下，最后说道：“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也应当继续奋斗。”

观众对于里根演讲的反应差别很大。激进主义者一直在谴责政府对于艾滋病研究的资金投入迟缓而薄弱。他们指责里根想要增加患者的负担。全国同性恋权利倡导者组织的律师本·沙茨说：“我感到愤怒和沮丧。”他预测说，里根要求进行常规检测，尽管这种检测没有保守派要求的强制性检测那么令人恐惧，但它也会让国家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所有那些检测呈阳性的人都会被取消保险，接受医疗救助，可能会失去工作，流离失所。在同性恋团体内部，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这样的事情。”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际艾滋病专家认为，里根的演讲更像是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所逐渐意识到的、一位无知和缺乏爱心的总统的表现。他说道：“本届政府从一开始在对待艾滋病问题上就像是一群业余人士。他们没有听取医疗专家的意见，也没有开展全国艾滋病教育工作，他们甚至没

有讨论过性行为。”推动总统采取行动的是政治活动而不是公共卫生问题。“政府意识到，在选举即将来临的时候，他们必须有所建树，而不会关心人民正面临死亡的威胁。”

保守派人士从相反的方向攻击里根。共和党议员威廉·丹内梅耶说道：“常规检测是避重就轻的做法，这再次说明他们把这一问题当作是民权问题，而不是公共卫生问题。”里根对艾滋病问题的公共教育缺乏具体指导。丹内梅耶警告说，他有可能让同性恋看起来是正常行为。政府应当首先教育儿童和大众避免这种行为，因为它给全国带来了瘟疫。“我们应当重申我们社会中的异性恋伦理道德，应当告诉他们同性恋生活方式是非常不健康的。”

加利福尼亚医疗协会的继续教育主任认为，里根表现得相当不错。马克·马德森说：“我想听他多讲一些，但我很欣赏他公开讲到的这些内容。考虑到这是他第一次关于艾滋病的重要演讲，我给他的表现打个B+。”

里根同往常一样，在评价自己时一贯愿意打高分。他在日记中写道：“演讲一直很受欢迎，直到我提到对艾滋病进行常规检测。同性恋群体中的一批人猛烈地嘘我。但还好，总的来说，我还是比较满意的。”

总统们上台、下台，来来往往，最高法院的法官们在位的时间却很长。约翰·亚当斯的总统任期容易被人们忽视，但亚当斯任命的大法官约翰·马歇尔令人难以忘怀。安德鲁·杰克逊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目送他们的英雄和死敌在1837年离开白宫，但他们一直与杰克逊任命接替马歇尔的罗杰·B·托尼打交道，直到1864年。威廉·O·道格拉斯在自己的“主子”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并卸任30年后，还一直在为难保守派。

里根有三次任命最高法院法官的机会。前两次进展很顺利，以至于桑德拉·戴·奥康纳和安东宁·斯卡利亚在参议院审议中连一票反对票都没有得到。奥康纳之所以无懈可击，原因在于她身份特殊，是第一位被提名担任最高法院法官的女性。里根认为，如果否决这样代表女性平等的先锋人物，自由派将面临巨大压力。结果没人这样做。斯卡利亚则体现了另外一种不同的考虑。他除了是个斗志旺盛的保守派之外，还具有难以抵挡的魅力。他接替保守的威廉·伦奎斯特，后者被里根提升为首席法官，接替退休的保守派同僚沃伦·伯格。因此，斯卡利亚的任命没有引发法院内部的思想失衡。同时，时机的选择也有利于斯卡利亚的任命。1986年夏天，里根压倒性的胜选连任让民主党人还没有缓过劲儿来，几乎没有民主党参议员认为就最高法院法官一职拿总统出气会有什么好处。

提名罗伯特·博克这件事则完全不同。温和派人士刘易斯·鲍威尔马上就要退休，保守派希望里根可以通过调整鲍威尔的继任者，把法院转移到右翼分子手里。几十年以来，保守派一直在抱怨司法能动主义，指责法官在制定法律，而不是简单地解读法律。里根对此也不十分满意，因此这次就满足了保守派的要求。1987年7月1日，里根在宣布提名时说道：“大家普遍认为博克法官积极提倡司法克制，是位十分杰出、智慧的法官。他同我一样，都认为法官的个人偏好和价值观不应当成为他们宪法解释的一部分。司法克制的指导原则认为，根据宪法，制定法律是立法机关的专属职权，而解释法律是法院的工作。”博克法官将帮助高等法院重新获取这种失去的平衡。“我们很幸运，可以利用这样一位令人钦佩的法律专家、一位经验丰富的法官。他已经为公共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必将为法院和他的同事，以及他的祖国和宪法，赢得赞誉。”

与斯卡利亚相比，博克不是明显的保守派。但他被提名的时候，民主党人比1986年的时候战斗力增强了许多。他们现在控制着参议院及其内部非常重要的司法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就博克的提名举行听证会。民主党内有望角逐1988年总统大选的人已经开始抢占有利地位，每个人都希望能在与政府的斗争中胜过其他人。因为博克要取代一位温和派法官，民主党意识

到，假如他就职，那就可能影响到未来几十年内法院中的力量平衡。

他们决定阻挠此次提名。他们从狭隘的党派利益出发，认为可以以此在1988年大选之前让总统和他的政党蒙羞。他们在法律方面也有考虑。博克所坚持的司法克制让他在某些民权问题上质疑联邦政府的权威，引起了倡导少数民族和妇女平等的那些人的警觉。他在1973年担任代理司法部部长时，听从理查德·尼克松的命令，解雇了水门事件的特别检察官。而他在司法部的两位上级当时则是以辞职进行抗议。这让自由派以及很多温和派人士认为，尽管他口口声声说司法克制，但实际上很容易受到行政权力的驱使。

民主党的攻击当即展开。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攻击博克，说他对美国普通百姓不够友善。“罗伯特·博克心目中的美国是这样的：妇女只能鬼鬼祟祟地进行堕胎，黑人只能在实施种族隔离的便餐柜台就座，流氓警察可以在半夜三更闯进百姓家中突袭，学校的孩子不会接受进化论教育，作家和艺术家只能随意接受政府审查，成千上万的百姓无法叩开联邦法院的大门。”肯尼迪说道。特拉华州参议员约瑟夫·拜登担任司法委员会主席，他的讲话没有肯尼迪那样夸张，但正因为如此，更具有说服力。拜登仔细研究了博克的文章，表达了自己的担心：这些文章表明他拒绝考虑重大问题，而这些问题极有可能出现在法庭上。拜登认为自己无法同意这一提名，说道：“除非他能证明自己可以在法庭上更开明，否则我很难同意。”

里根认为这些批评是党派之争，不予理睬。他在7月初的日记中写道：“有人在谈论博克，昨晚的报道也都是关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其中充斥着大量煽动言论。”几天之后，里根预测说：“我们会让博克获得批准，进入最高法院，但这将会是与左翼空想主义者的一场论战。”

霍华德·贝克当时正在适应里根的管理风格。这位办公厅主任回忆道：“总统高度自信，认为自己可以运作一切，无论是这对某一问题的投票，还是针对某一提名或条约。他十分自信，认为等待博克的将是一场巨大的风暴，但里根的处理方式就是这样的——无论如何我要做成这件事，而他确实做到了。”

关于博克的听证会从夏天一直推迟到9月中旬，这给了反对派组织反攻的时间。博克在听证会上的证词与他公开发表的观点有差异，有些差异出现在语气上，而有些则出现在内容方面。这让批评者指责他为了能够获得批准而改变说辞。博克辩解说，这种差异是因为语境变化的结果。他说，自己那些比较具有煽动性的文章是自己担任学术职务时写的，是为了达到煽动的目的。而作为法官，如果此次能够获得批准，他将继续采取慎重的立场。博克为自己在民权和妇女权利方面的立场进行辩护。他对委员会说

道：“从布朗诉教育局案开始，我就一直支持黑人的平等权利。我从没有说过任何让妇女感到恐惧的话，也没有做过任何类似的决定。”他否认自己为了赢得那些举棋不定的参议员的支持而修改证词，说道：“如果我在这里说一套，而在法院又做另一套，那将是非常荒谬的，我也会遗臭万年。”

委员会中反对博克的人没有妥协。来自俄亥俄州的霍华德·梅岑鲍姆说道：“你不是一个令人感到恐惧的人，但你的观点令人感到恐惧。”他指的是博克曾在上诉法院规定，允许一家化工厂让女员工在进行绝育手术和失业之间做出选择。博克为此进行辩护，说自己既不支持绝育手术，也不反对妇女工作。梅岑鲍姆继续说道：“法官大人，我必须指出，您的这种观点令人震惊。我不明白，作为一名法官，您怎么能让妇女选择绝育或失业呢？”他又补充说：“我必须强调一点，那就是全国的妇女对于您的任命深表忧虑和恐惧。”梅岑鲍姆皱了皱眉头，又说道：“妇女团体很担忧，博克法官。事实上她们害怕您。黑人也是如此。”

面对这些诘难，博克变得暴躁起来。他说：“我已经说过无数次，我支持黑人的平等权利。我从没有说过任何让妇女感到恐惧的话，也没有做过任何类似的决定。”在民权这一特殊问题上，博克说：“假如我是一名黑人，知道自己担任过司法部副部长和法官，那我就不会担忧，因为我在民权方面的表现很优秀。”他再次否认自己为了迎合参议员而修改证词，说道：“16年以来，关于法院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法院必须以立法者的意愿为指导，同时适当尊重先例。假如我进入最高法院，却表现异常，那我就会被历史所耻笑。我想，这是我可以向大家做出的最好的保证。”

听证会结束的时候，提名面临被否决的危险。里根出手太晚，弄巧成拙。他游说那些骑墙观望的参议员，并威胁说，如果参议院否决博克，他要让法院的第9个职位空缺。他明确否认自己可能放弃被提名者的谣传。10月初，里根在白宫玫瑰园与一群中学校长见面。在他们走向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萨姆·唐纳森提问说，博克的提名是否完蛋了。里根回答说：“除非我死了。”总统微笑着在日记中提到这件事：“校长们欢呼雀跃，然后转向记者们，教训了他们一顿。”

然而，里根可以计算出票数。随着民主党步步紧逼，他逐渐意识到此次提名可能失败。他没有放弃博克，而是打开门路，让博克自己去争取。一位记者问道：“总统先生，现在有51名参议员反对博克法官，他无法获得通过，没有胜算，先生。51名参议员已经宣布反对这一提名。”

面对这一含蓄的问题，里根回答说：“他需要自己做出决定。我做出了我



的决定，无论如何我都支持他。”

一位记者追问道：“无论他的决定是什么，您都会接受吗？”

里根说：“是的，很显然我只能这样。”

总统是在放弃吗？

里根说：“面对动用私刑的暴民，我不可能放弃。”

博克也没有放弃。他婉拒了里根提供的出路，坚持要举行全体参议员投票。里根别无选择，只能支持他。总统说道：“我和博克法官认为，我们对于参议院投票结果不抱有不现实的想法。但我们同样认为，一项重要原则目前处于危险之中。这一原则就是用来决定合适人选、服务法院的过程。假如我们不能取消已有做法，并确保不再发生类似的情况，那么最终的决定必将影响我们每一个人，影响到我们的每个孩子。”

里根试图在道德上占据优势，但有时他无法克制自己的愤怒。他同共和党参议会会面，讨论博克提名一事。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向他们保证，我不会为了最高法院法官的职位软化自己的要求，不会哀求动用私刑的暴民。”在一次共和党人举行的募捐活动中，一位妇女大声喊道：“我们需要博克！”里根回答说：“我也需要博克。争论的焦点是，我们要确保任命和批准法官的行动不再被转变成一场政治闹剧。假如我不得不重新任命另外一位法官，那么他们依然会像这次这样反对我提出的人选。”

事实上，里根采取了相反的做法。在参议院提交给里根最高法院法官提名历史上最为一边倒的失利结果之后——博克未获通过，结果是58：42——总统决定降低损失。他马上提名道格拉斯·金斯伯格，选择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他不是保守派。里根在解释这一提名时说道：“通过推举金斯伯格法官，我更希望可以尽快得到批准。金斯伯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学术界、在政府内部以及在担任法官期间，金斯伯格法官在所有集团内部都深受同事们的爱戴。”

但是，里根的仓促决定导致了金斯伯格没有通过审查。几天之内，记者们就发现政府所没有发现的事实：年轻时，金斯伯格吸食过大麻。最初里根对此不予理睬，认为这一消息无关紧要。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件事不足挂齿，因为当时许多人都经历过，没有太大关系。我想泄露消息的人当时是他的朋友，曾跟他一同吸食过。我认为没有理由撤回他的提名。”

要是换作别的总统，那他很可能会安然度过这种争议。但是，南希·里根把禁止非法使用毒品当作自己主要的公共事业。因此，当南希恳求国家的年

轻人“勇于向毒品说不”的时候，那总统就几乎无法对一位承认使用过毒品的人说“没关系”。

里根拒绝承认自己再次失利。教育部部长比尔·贝内特是继南希之后第二位公开反对非法使用毒品的人。他给里根打电话，要求他撤销对金斯伯格的提名。里根写道：“我告诉他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但随后，金斯伯格提出退出提名，里根也就就坡下驴。他写道：“形势日益明显，他承受着太多的诽谤，无法获得批准。”

最后，里根在第三次尝试中取得了胜利。为了避免可能招致麻烦的不检行为，他们仔细审核了安东尼·肯尼迪的过去。里根欣慰地写道：“联邦调查局核实了肯尼迪法官：干净清白。”肯尼迪的私人生活看起来像是个典范。“可爱的妻子；美丽的女儿，斯坦福大学大二的学生；儿子在斯坦福读大四；另一个儿子已经工作。”在政治上，肯尼迪也没有争议。“到目前为止，我们听到的全是正面消息，他得到了来自民主党和共和党两个政党的支持。”

听证会进行得很顺利。里根满意地写道：“他们没有攻击他。”因为假期的缘故，最后的决定被推迟。但等到1988年年初，参议院以97：0的票数批准了肯尼迪的提名。

1987年夏天，保罗·沃尔克结束了自己作为美联储主席的第二任期。里根在4年前就再次任命他担任主席，因为假如不这样做，很可能在总统竞选连任前再次引发经济衰退。里根在1983年夏天写道：“因为有了他的缘故，金融市场看起来比较稳定。我不想动摇人们对于经济复苏的信心。”再次任命沃尔克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曾暗示说自己不想再待满4年。里根写道：“我认为我们可以任命保罗·沃尔克担任一年半的美联储主席，因为他不想要完整的任期。”

在二次任命沃尔克的几个月里，里根有了进一步的想。他在1984年年初写道：“卢·莱尔曼带来了关于保罗·沃尔克的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他坚信我们必须减缓经济增长速度。”莱尔曼是位投资银行家，一位保守的激进主义分子，最近得到共和党提名，担任纽约州州长。“保罗一直担心再次出现通货膨胀，据卢说，他试图利用美联储来减缓经济复苏的速度。”总统通过打电话、面谈以及通过像里甘这样的代理人来向沃尔克施压，要求他放宽对于货币供给的限制。然而沃尔克却坚持自己的方针。里根在选举前的一周抱怨说：“美联储在幕后操纵货币供给，供给量不足经济增长率的1/3。唐纳德正在努力推动保罗·沃尔克采取行动，不要停止供给。”

或许沃尔克的确打算在第二任期结束前辞职，或者，里根可能误解了他发出的信号。无论到底是怎么回事，在面对来自白宫方面持续不断的压力下，沃尔克还是决定不改初衷，以防抑制通货膨胀所取得的进展遭到破坏。他的固执坚定了里根的想法，认为无法忍受沃尔克连任两期。里根在1987年春天写道：“如果保罗体面地下台，我们打算看一下艾伦·格林斯潘是否愿意接手这一工作。”

沃尔克同意是时候更换美联储的领导层了。里根在当年6月公布了格林斯潘的提名。他向记者、市场以及整个国家保证，美联储人事变动并不代表政府对通货膨胀的控制会有所松懈。他说：“我们在过去的50个月里创造了奇迹，降低了通货膨胀。现在又出现了反弹，主要是由于能源价格带动的。但我完全信任艾伦·格林斯潘以及他的理念，认为他完全有能力抑制通货膨胀，不会再次失控。”

事实证明，通货膨胀只是格林斯潘上任后第一个月里所面临的众多挑战之一。他回忆道：“我感到真的有必要旗开得胜，取得开门红，因为我清楚美联储马上将面临重大决定。”里根在第一任期内遭遇经济衰退，之后经济开始复苏，现在已经是第4个年头。但经济不稳定的迹象正变得越来越明显。自年初开始，股市飙升了40%，几乎没有减缓的迹象。“华尔街出

现了投机性泡沫经济。”格林斯潘说道。联邦预算也起不到缓解作用。“里根治下的巨额政府赤字导致国家背负的公共债务几乎增至原来的3倍，从总统上任之初的7000亿美元多一点儿增加到1988财政年度的2万多亿美元。”通货膨胀也再次慢慢攀升，从不足2%到近乎原来的2倍。这一数字依然远比20世纪70年代的两位数要低很多，但同样令人担忧。格林斯潘写道：“我们面临危险，有可能丧失保罗·沃尔克时期经历巨大痛苦、付出惨重代价所取得的胜利果实。”

为了抑制通胀压力，格林斯潘说服美联储董事会提高利率。这是重要的一步，因为美联储三年以来还没有提高过利率。“我不禁想到了曾读过的一些物理学家的记录，当时他们在阿拉莫戈多沙漠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这颗炸弹是否会失败？是否会像他们希望的那样运行？或者，这种连锁反应会失去控制，引发全球大气层大火？”

天空没有着火，但股市发生了内爆。10月的第一个星期，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降6%，接着在第二个星期又下降12%。在10月16日星期五这一天，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暴跌108点。格林斯潘和其他人一起共同屏住呼吸，紧张地等待着周一股市开盘。

周一当天早些时候的消息令人恐怖。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午的交易再跌200点。格林斯潘计划前往达拉斯发表演讲。他登上飞机飞往西部，3个小时的时间内他无法得到消息。着陆后，他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华尔街那边怎么样了。达拉斯那边的接待方从当地美联储分部报告说：“又跌了5.08。”

格林斯潘松了口气，认为下跌5.08点比他预期的要好许多。但接待人员脸上的神情表明，这个消息并不好，而是非常糟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508点。这在华尔街历史上是单日最大跌幅，比1929年崩盘期间的任何一天都要高。转瞬之间，数万亿美元蒸发了。

格林斯潘当即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曾研究过1929年的大崩盘以及随后发生的经济萧条，知道美联储的错误做法。他决定不再重复自己前任犯下的错误。他回忆说：“我径直前往宾馆，守着电话，一直到晚上。在股市恐慌期间，美联储的工作是避免金融瘫痪——在这种混乱状态下，企业和银行会停止支付所欠彼此的债务，经济会逐渐瘫痪。”与格林斯潘交流过的年纪大一些的那些人同意他对于危机的分析，也同意采取适当的补救措施。但一些年轻一点儿的人则建议谨慎行事。他们曾受到20世纪70年代通货膨胀的影响，并没有受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萧条的影响。他们当中有人建议美联储静观其变。

格林斯潘写道：“尽管我刚接手这份工作，但长期以来，我一直在研究金

融史。我认为他们的建议没有道理。当晚，我说话的口气非常严厉，我告诉他：‘我们不必静观其变，因为我们知道会发生什么。’随后，我又补充解释道：‘你知道人们对于被子弹击中的说法吗？你会感觉到被刺了一下，但这种创伤十分严重，你难道不能立即感觉到疼痛吗？在未来24小时或48个小时以内，我们会感受到剧痛。’”

格林斯潘飞回华盛顿。在那里，里根试图不去理睬来自华尔街的坏消息。在他穿过白宫草坪的时候，一位记者大声问总统：“我们是否正面临着又一次严重的大崩盘呢？”里根没有听到这个问题。这名记者重复道：“我们是否正面临着又一次严重的大崩盘呢？”另一位记者附和道：“股票市场带来的大崩盘。”

里根回答说：“哦，原来是股票市场。我只能说一点：我认为大家都有些困惑，我不清楚它可能带来的影响，因为所有的企业指标都在上升。经济没有任何问题。”

记者们问道，那既然如此，是什么原因导致股市暴跌呢？

里根说道：“我也不清楚，或许有些人窥探到了攫取利益的机会。但我十分清楚这一点，那就是：许多人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在努力工作；我们的生产力在提高；我们制造业的产量也在上升；没有像过去那样出现通胀失控的局面。因此我想说，大家没有必要恐慌，因为所有经济指标都很正常。”

格林斯潘知道总统在尽量安慰大家。在这种情况下，除此之外，总统又能说什么呢？但是，里根的话让格林斯潘想起了1929年大崩盘时赫伯特·胡佛类似的讲话。格林斯潘马上与詹姆斯·贝克取得联系，因为他比自己同总统相处的时间更长。两人同意一起去找总统。格林斯潘回忆说：“我们同里根在白宫见面，建议他尝试一种不同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我和詹姆斯·贝克提出，最具建设性的做法应当是主动与国会合作，削减赤字。因为这是长期困扰华尔街的经济风险之一。”

里根受到启发，跟记者们说他正命令政府工作人员开始与国会探讨削减赤字。一位记者当即提出疑问：“先生，您愿意在税收方面妥协吗？愿意妥协吗？”

最初里根拒绝正面答复。他说：“在我的预算中，我提出了一个计划，该计划将提供220亿美元的额外收益，这笔收益不一定来自税收。”但随后，里根或许想起了格林斯潘和贝克在谈话中透露出的担忧，他又补充说道：“我愿意考虑一下他们可能提出的建议。”

里根的讲话或许安抚了市场，或者也可能被当作是政治扯皮。对此无人能够知晓，因为他的讲话没有得到严格检验。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向银行施加影响，让银行继续贷款。更重要的是，让银行提供新的资金，充实金融系统。市场稳定了下来，随后开始收复失地。随着黑色星期一记忆的消失，总统也无意在预算问题上同蒂普·奥尼尔妥协。

在后来提到当年10月发生的事情时，里根写道：“当时，对整个国家来说，在许多方面都是一场危机。但我必须承认，那段时间我不是很担心股票市场，更担心的是那可能成为我个人生活中一场更大的悲剧。”南希常规的乳房X线检查发现了令人担心的肿块。约翰·赫顿负责南希和里根的医疗保健，他陪同南希前往贝塞斯达医院检查，之后来到椭圆形办公室向里根报告了这一消息。他说肿块看起来是恶性的，但需要进行活体组织切片检查才能确定。里根惊呆了。“之后，约翰告诉南希，他永远忘不了我听到这个消息时的表情。”里根回忆说。赫顿说：“我想总统一直认为您永远不会有事的。”里根补充说：“他说的没错。”

不确定病情让人备受煎熬。里根写道：“接下来的10天，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最为漫长的10天。”南希手术前夜，里根同南希搭乘直升机前往贝塞斯达医院。回到白宫后他彻夜难眠。他早早起床打算飞回医院，但飞机由于大雾无法起飞，里根不得不乘车前往。赶到医院时南希正要进入手术室，他只能匆匆告别南希。

南希的弟弟迪克从费城开车赶来。里根和他坐在等候室里等待着。里根当晚写道：“我和迪克埋头看报，偶尔会有医生进来通报手术进展情况。”不久，他们就知道了结果。“活体组织切片检查发现了医生们所说的没有扩散的恶性肿瘤痕迹——很小。医生们决定实施局部乳房切除术。”午饭之后，里根和迪克得以探望南希。里根写道：“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她对失去一个乳房感到很难过。我们尽量让她明白，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清除掉癌症更让人高兴的了。医生们对手术非常满意——进展顺利，效果明显，根本不需要任何进行任何化疗或放疗。”

在回忆录中，里根对当天事情的描述更是充满了感情色彩。他写道：“我抬头看见约翰·赫顿和梅奥疗养院的奥利·比阿斯医生向我们走来。他们的神色流露出了他们要告诉我的消息：南希体内出现恶性肿瘤，她和医生决定进行乳房切除。我知道南希多么希望事情不是这个样子。我无法跟他们交谈，只是低下头哭了起来。他们离开后，我一动不动坐在桌边，无法开口说话。”他还提到了在康复室探望南希的情景。“我和迪克到那儿的时候，她还没有醒过来。当我们站在她床边的时候，她的身体突然动了一下。她没有张嘴，但我听到了一丝微弱的声音说道：‘我的乳房没了。’由于麻醉的原因，南希还几乎没有意识，但她还是感觉到我们在她身边。失去乳房让她不知所措——并不是因为她担心自己，而是因为她担心我，以及我对她作为一名女人的感受。我说道：‘没关系，我爱你。’随后，我俯身轻轻地吻了她，反复说对我来说这没什么不同。但是，看到她眼中的悲

伤时，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避免再次失态。”

10天后，南希遭受了第二次打击。她的母亲伊迪丝·戴维斯去世了。总统首先得到了消息。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回家后告诉了她这个消息，她很悲痛。”第二天，他们飞往菲尼克斯。里根写道：“一到菲尼克斯，我们就直接前往太平间。我们看到伊迪丝身着红色睡袍，神色安详。南希难忍悲痛，开始抽泣，告诉她自己是多么爱她。我告诉南希，伊迪丝现在知道她爱她，她的‘灵魂’不在陈列尸体的房间，而在她的公寓里。我们来到她生前的寓所，她的老朋友们正在等候我们。”

与朋友们见面的确有所帮助。里根在当晚写道：“听着我们所有人都在谈论伊迪丝，谈论我们对她的爱，南希的精神状态好了许多。”里根飞回华盛顿，然后又返回菲尼克斯参加葬礼。南希让他致悼词，葬礼仪式进一步缓解了她的痛苦。里根写道：“全国各地的朋友都来到现场，让人感到无比温暖。”



有关伊朗与反政府武装的丑闻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里根对于中东地区和中美洲地区的政策。政府违反自己关于禁止向伊朗出售武器的规定，这一做法削弱了美国在世界许多地区的公信力。政府在反政府武装这件事上绕过国会的做法使它失去了支持，甚至许多共和党人在所有涉及尼加拉瓜或其邻国的事情上都不予支持。

但奇怪的是，虽然如此，这却成了一件好事。在排除了对其他地区采取新的计划的情况下，伊朗与反政府武装这件事使得里根可以专心致力于他一直认为是重中之重的外交政策：与苏联的关系。在国内政坛他已经无所指望，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就等着他出局。而在外交政策方面，逐渐局限于与苏联方面的关系。在这一点上，只有戈尔巴乔夫一人可以与之过招。

但是，有些观察家一直在关注着双方的动向。1987年春天，里根前往欧洲，参加在意大利举行的七国集团年会。美国的一些盟友对雷克雅未克峰会感到挫败沮丧，担心总统在军备控制方面动作过快。杰克·马特洛克回忆说：“玛格丽特·撒切尔气势汹汹来到现场。”这位英国首相斥责里根，说他甚至考虑撤销维护了欧洲几十年和平的核威慑。她提醒里根，美国核武器的目的是要抵消苏联在常规武器方面的优势。不解决常规武器问题的军备协议对欧洲来说只能让苏联处于危险的控制地位。撒切尔后来写道：“关于军备控制问题，有一点我想阐明我的立场。我不希望看到在德国的英国军队失去核武器的保护。我曾强烈表达过这一观点。”

里根向她保证自己不会削弱核威慑。里根认为撒切尔已经平静下来。里根在日记中写道：“我们像往常一样达成了一致。”

里根从意大利前往柏林。西柏林市市长邀请他在该市成立750周年活动中讲话。里根的顾问们希望他的讲话中规中矩，无伤大雅。因为国会依然在调查有关伊朗和反政府武装的丑闻，因此，他们认为总统应当保持低调。

里根并不这样认为。他坚持提醒世人关注美国和苏联之间的道德差异。霍华德·贝克看到一份演讲稿，其中包括向戈尔巴乔夫提出挑战，要求推倒柏林墙。贝克以为这部分内容出自一位过于激进的演讲稿撰写人之手，因此打算把它划掉。但转念一想，他又谨慎起来。贝克回忆说：“里根对此态度坚决。”他后来得知那部分内容是里根写的。“那些是里根的话。”里根不想让人篡改这些话。“他说留着这部分内容。”

这些话被保留下来。里根站在勃兰登堡门前面，说道：“戈尔巴乔夫总书

记，如果您想谋求和平，如果您想为苏联和东欧人民谋求繁荣，如果您谋求自由，那么，请到这座大门前面来！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打开这扇大门！戈尔巴乔夫先生，请推倒这堵墙！”

戈尔巴乔夫感到不高兴，并不是因为他反对里根的要求，而是因为他赞成这一要求。雷克雅未克峰会之后，戈尔巴乔夫行动非常谨慎。他的双重改革——改革开放与体制变改——让苏联的自由派人士燃起了希望，尽管他们对保守派一直心怀恐惧。但是，戈尔巴乔夫缺乏斯大林或者甚至是勃列日涅夫那样的高度，只能摸索着前进。在某些方面，他不如里根。里根至少裹挟着两次竞选获胜的余威，并且在对美关系中，他绝对不能像里根那样，被视作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妥协。

里根和美国人也不给力。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根据其蛮荒西部的优良传统，美国又在展示肌肉，把所有的罪名扣在苏联头上。美国人（不仅仅是美国人）动用大众传媒来操纵公共舆论，在国际事务中抢夺主动权，强迫我们接受他们的规定。我跟同事们经常讨论这一问题，我们都认为绝不能放弃主动权。”

但是，他们放弃了比主动权价值更高的事物。戈尔巴乔夫决定把他在雷克雅未克提出的一揽子交易计划分解开来。他宣布，苏联政府愿意就中程核武器（INF）展开谈判，将其从战略武器谈判中分解出去。双方曾希望达成战略武器削减条约（START），戈尔巴乔夫把INF从START中分离出去，也就把INF从战略防御计划（SDI）中分离出去。他曾希望利用里根渴望达成中程核武器条约的心理，说服他放弃战略防御计划，或者将其限制在实验室内。但是，戈尔巴乔夫的策略最终落空。之后，戈尔巴乔夫认为中程核武器条约对苏联有利。他曾私下里质疑过自己前任们的决定——部署SS-20导弹，结果引发了全面的中程武器争端。戈尔巴乔夫写道：“在考虑部署这些导弹的时候，无论当时提出了什么合理的理由，苏联领导人都没有考虑到西方国家可能做出的反应。甚至我可以将其视作一次不可原谅的冒险行动，是苏联领导人在军工企业压力下开始着手的计划。”SS-20导弹威胁的仅仅是美国的盟友，可是美国和北约用以还击的潘兴导弹却威胁到了苏联本土。事实上，它们对苏联造成的危害比美国其他所有武器都要严重，因为这些导弹可以在极短的5分钟之内击中目标。“因此，务必避免使我们国家遭受这种致命威胁，改正苏联领导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所犯下的致命错误，我认为这是我的责任。”

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跟他讲了自己的决定。之前，戈尔巴乔夫把舒尔茨看作里根身边最为沉默的搭档，但在莫斯科，他开始欣赏他，把他当作最高级别的外交官。戈尔巴乔夫回忆说：“或许

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与之打交道的这个人严肃稳重，具有正确的政治判断力。”他们讨论了中程核武器问题，并拟定了一份协议纲要。两人都希望当年年底能够签署协议。

里根也希望如此，但他希望得到的更多。中程核武器条约非常重要，这是在军备控制方面所有总统所取得的最大成就，但这还不够，里根还希望驱散笼罩在人类未来之上的核武器阴霾。从一开始这就是他的目标，在雷克雅未克，他几乎达成了这一目标。随着他的白宫生涯接近尾声，里根越来越觉得有必要解决导弹问题——这些导弹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他对国家安全计划小组说道：“现在我们必须完成这一任务。我不接受任何建议，说什么在我离任之前，我们已经没有时间达成战略武器削减条约。”里根知道他面临着怀疑，甚至在政府内部也存在怀疑。他明确表明，自己不会为了达成协议而达成协议，他说：“我希望能达成战略武器削减条约，但前提是该条约必须令人满意，能够得到我们的核实，能够提升我们的安全。”

卡斯帕·温伯格对任何协议都持怀疑态度，他认为雷克雅未克峰会是一场勉强躲过了过去的灾难。尽管他觉得自己无法再正面反对，但他还是不喜欢中程核武器条约这一主意。他警告里根和计划小组成员，不要对苏联做出任何让步。他说，如果必须做出让步的话，那还不如没有战略武器削减条约。

乔治·舒尔茨不赞同温伯格的观点，他支持中程核武器条约和战略武器削减条约。他怀疑温伯格之所以反对战略武器削减条约，是想以此破坏中程核武器条约。舒尔茨说，战略武器削减条约是中程核武器条约的根本。他说：“苏联很容易就可以部署更多导弹，这对我们来说非常麻烦。”他还说，假如没有战略武器削减条约，那么中程核武器条约就没有任何价值。因为苏联人可以轻易部署新的战略导弹，替换被销毁的中程导弹。

温伯格否认自己想要破坏战略武器削减条约或中程核武器条约，他说道：“我同意你的观点，我们需要战略武器削减条约。但这不能成为我们屈从于苏联方面要求的原因。我们已经签署了一份满意的中程核武器条约，这是因为我们立场坚定。我们在战略武器削减条约中也可以做到这一点。”

里根把此次讨论提升到基本原则的领域，他说道：“大家必须记住，整个计划都源于这样一种理念——世界需要消除核武器。我们必须谨记，我们无法赢得核战争，也不能发动核战争。苏联人并不想通过战争获取胜利，而是想通过战争的威胁获胜。他们希望能够发布最后通牒，逼迫我们屈

服。如果我们能够探讨基本步骤，那我们就需要打破僵局，避免发生战争的可能——我的意思是说，仔细考虑一下：战争幸存者会生活在什么地方？到那时，世上绝大部分地区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我们要共同采取措施，密切合作，认识到我们需要消除核武器。”

温伯格迎合里根想要消除核武器的想法，说道：“总统先生，在这一方面我们必须十分谨慎，因为我们希望做到的是消除核武器，假如我们处理不当，那就无法消除它们。一旦动用核武器，我们将无法生存。我们不能消除核武器，因为没有防御核武器的手段。我们不当限制我们防御核武器的能力，我们需要提前防御，需要保护我们的大陆，而不仅仅是保护几处地点。”

温伯格跟一些人一样，对于里根在雷克雅未克峰会上拒绝限制战略防御计划的做法感到欣慰。他担心里根一心想要达成战略武器削减条约的想法可能会让他将来在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立场不坚定。因此他当时提出，不能以任何方式来限制战略防御计划，不能限制美国测试或部署战略防御的能力。

弗兰克·卡卢奇指出，在雷克雅未克，总统和戈尔巴乔夫原则上同意不会在1996年之前从反弹道导弹条约撤出。

温伯格说：“的确如此。但是，我们现在正在撤离，并已经取得进展。”

里根突然插话道：“我们为什么现在不能达成一致呢？假如我们希望部署防御的话，我们可以彼此提供有关各自防御系统的所有情报，这样我们都可以拥有防御体系。假如其中一方准备部署防御，那双方都同意向对方提供他们的所有研究成果。”

温伯格说：“我不相信我们能做到这一点。”这位国防部部长从没有如此断然地否定里根关于战略防御构想的这一层面。但是，总统什么也没说。

温伯格的支持者也参与进来。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罗伯特·赫雷斯将军说：“总统先生，交换技术信息存在极大风险。我们的许多技术可以很容易转化成为其他目的服务，转化到攻击性领域。”

肯·阿德尔曼也持类似的观点。这位军备控制主管说：“总统先生，这应当是西方世界所知道的最大规模的一次技术转让。”这将破坏战略防御的目的。“如果对方非常了解我们的防御体系，那他们就很容易采取反制措施。”

里根表示反对，他说：“我们一旦进行部署，难道他们就不会了解这一体

系？他们难道不会因此进行反制？因而，假如对方得到情报进行反制，或者假如我们向他们提供情报，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差别吗？”

温伯格没有理睬总统的问题，说道：“在这一点上，问题的关键是，他们的要价过高，我们必须立场坚定。”

随后，开始讨论技术方面的问题，总统心不在焉地听着，最后他说道：“我们必须回答所有这些问题，因为有朝一日人们会问，我们现在为什么没有采取措施消除核武器。大家知道，我一直在看《圣经》，关于世界末日的描述谈到了许多城市的毁灭。我认为，我们绝对需要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现在一定要有所作为。”

卡卢奇表示同意，说道：“我们当然需要避免世界末日的来临。”

温伯格说道：“答案就是战略防御计划。”

12月初，当戈尔巴乔夫抵达华盛顿的时候，他很高兴地看到迎接他的是乔治·舒尔茨。美国派往日内瓦的谈判人员与他们的苏联同事已经就中程核武器问题达成协议，制定了一份条约，等待签署。戈尔巴乔夫最终接受了里根在雷克雅未克向他发出的邀请，飞往西方参加华盛顿峰会。

国务卿从未看到戈尔巴乔夫的状态如此之好，他回忆道：“他精神愉快，乐观向上，充满生机，满腔热情。他谈到了自己国家发生的变化，谈到自己希望结束与美国之间的冷战。”戈尔巴乔夫询问美国方面那些反对中程核武器条约者的情况，他问舒尔茨：“美国那些批评者的情况如何？”

舒尔茨回答说：“大部分美国人支持里根总统的做法。”确实存在一些反对者，但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取得更大的进展。

戈尔巴乔夫对舒尔茨说：“我努力工作，我一直这么努力。如果我累了，另外有人会继续下去。”舒尔茨没有料到戈尔巴乔夫会感到疲惫，写道：“他看起来仿佛从来不知疲倦。”

第二天上午，戈尔巴乔夫和里根从他们在雷克雅未克结束的地方开始谈判。里根在谈及他们首回合的谈判时写道：“这是一次令人鼓舞的愉快会面。”戈尔巴乔夫指责里根在柏林发表的演讲，他说道：“总统先生，您不是检察官，我也不是在接受审判。同您一样，我代表着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希望我们的对话能在互利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否则，将不会有对话。”

里根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告诫只不过是游戏的一部分，总统后来写道：“我喜欢辩论，我想他也喜欢。我们同意存在分歧。”

他们共同出席签字仪式。白宫东厅挤满了外交人员、国会议员、政府工作人员、戈尔巴乔夫的随行人员以及媒体工作人员。里根率先讲话，总统非常自豪，这可以理解。他说道：“今天的仪式和我们今天即将签署的条约完美地体现了耐心所带来的回报。6年多以前——1981年11月18日——我第一次提出建议，后来该建议逐渐被称为无选择裁军。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一项简单的建议，可以让人消除疑虑。”众人如愿地发出笑声，里根也笑了。他继续说道：“与以往的条约不同，这一建议不是简单地罗列现状或新的军备建设项目，也不是简单地谈及控制军备竞赛，在历史上，‘军备控制’的表述第一次被‘军备削减’所代替——在这一点上指的是完全销毁美

苏两国所有级别的核导弹。”里根承认自己的建议遭到了反对，他说：“至少可以这样说，反对的理由各种各样：对有些人来说，无选择裁军根本无法实现，不符合现实；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它只是一种宣传策略。现在看来，我们凭借耐心、决心和承诺把这种不可能的构想变成了现实。”

里根的研究人员从俄罗斯文学中寻找恰当的例子。总统转向戈尔巴乔夫说道：“戈尔巴乔夫总书记，我相信您一定熟悉伊万·克雷洛夫那则关于天鹅、虾和梭子鱼的寓言。故事大概是这样的：从前，这三个家伙打算一起拉动一车货物，它们套上车，开始用力拉。货物并不沉，但无论它们多么用力，车子还是纹丝不动。您知道，天鹅在向空中飞，虾一直在后退，而梭子鱼则向水里用力。结果它们原地不动，至今那辆车还停在那儿。”幸运的是，美苏两国政府更为通晓这一道理。里根承认道：“我们两个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根本的道德差异。但是，今天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我们至少看到，如果我们同心协力，我们就可以有所作为。”

里根列举了所取得的成就。苏联将销毁所有的陆基发射中程导弹，同时销毁的还有1500多枚核弹头；美国方面将销毁所有的潘兴II型导弹和陆基发射巡航导弹，同时还包括大约400枚核弹头。里根继续说道：“但是，此次条约的重要意义超过了数字本身。我们曾听说过一句饱含智慧的谚语，我相信您也很熟悉，总书记先生，尽管我的发音可能会让您难以理解。这句谚语是：信任，但要核查。”

戈尔巴乔夫面对镜头露出了微笑，他说：“每次会议您都会重复这句话。”现场的政要们哈哈大笑。

里根抗议说：“我愿意这样做。”大家笑得更热烈了。他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希望中程核武器条约能够带来战略武器方面的进步，同时也能对常规武器、地区冲突和人权问题产生积极的影响。他引用了另外一句谚语（“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正成为谚语方面的专家。”）他说道，结果引发了更多的笑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随后，他邀请戈尔巴乔夫讲话。

戈尔巴乔夫说，他将让后人评说这份条约的重要意义，但是，即使在目前看来，同意签署条约的行为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说道：“对每个人来说，尤其对我们两个超级大国来说，桌子上的这份条约最终提供了一次伟大的机会，踏上了一条远离巨大灾难威胁的道路。我们有责任充分利用此次机会，共同迈向无核世界，为我们的子孙以及他们的子孙带来希望，让他们能够过上富足幸福的生活，不再担心毁灭性武器，也不会有毁灭性武器带来的资源浪费。”

他转向里根，说道：“我们历经7年的漫长历程，进行过紧张的工作和激烈

的辩论。我们朝着这张桌子再迈进最后一步，就可以签下这份条约。”他又补充道：“我希望，1987年12月8日将成为史书中被永远铭记的一刻，这一天将成为标志性的分水岭——把核战争威胁时代同销毁军备的人类生活时代分割开来。”

签字仪式过程中的美好感受贯穿于戈尔巴乔夫的整个访问过程，但这并没有有助于达成其他协议。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径直前往内阁会议厅，讨论下一步的行动。里根希望讨论战略武器，并推进战略武器削减条约，但戈尔巴乔夫出人意料地提出了常规武器问题。他没有明说，但是常规武器协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有望节省巨额开支。

里根回答说，他愿意讨论常规武器问题，尽管他认为应当首先讨论战略武器削减条约。但无论在哪个领域，信任是最根本的。里根说道：“并不是武器装备带来了不信任，而是不信任带来了武器装备。”他指出，尽管中程核武器条约具有历史意义，但依然需要修订。任何引发不信任的行为都可能损害修订条约。

戈尔巴乔夫说，他自己也有修订方面的问题。苏联销毁导弹的数量是美国的4倍，最高苏维埃有2000名成员，人数远远多于美国参议院，最高苏维埃会问他为什么对美国人如此慷慨。苏联国内有许多人不相信美国，因此也不相信裁军。“人们会问，当苏联被美国基地包围的时候，怎么可能进行裁军呢？人们会问，戈尔巴乔夫怎么能向美国卑躬屈膝呢？”戈尔巴乔夫再次提到里根在柏林发表的演讲，说美国政府把所有罪恶都扣在苏联头上，但是美国人自己也要负相当大的责任。“在‘二战’开始后的45年时间里积累了大量的问题。如果我们一味地指责抱怨——苏联方面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指责：杜鲁门主义、艾森豪威尔主义和卡特主义——那么我们都将把对方推向审判台。”这不是人们所希望的有建设性的办法。回顾里根执政的这些年，戈尔巴乔夫转向副总统布什，说道：“除非政策能反映人们的希望，否则，你可能会赢得选举，却无法取得长远的胜利。”

竞选的话题促使里根说，美国支持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与开放中向民主迈进的步伐，说自己无意冒犯戈尔巴乔夫，却不禁想要讲个故事，他是最近从一位出访过苏联的美国学者那儿听到这个故事的。这位教授说，当他离开自己所在城市的住所时，一位即将大学毕业的兼职出租车司机把他送到了机场。他问这个年轻人，拿到学位之后他打算做什么。里根说：“他回答说还没有定下来。”在苏联，这名教授也曾搭乘过一辆出租车，开车的也同样是一名大学生，教授提出了同样的问题，问他下一步打算干什么。这名司机说自己还不清楚——“他们还没有告诉我。”



戈尔巴乔夫皱了皱眉，说自己知道总统喜欢趣闻轶事，而苏联则充满了趣闻轶事。但他又说，自己要向总统提出一个要求：“您不能要求马特洛克为您收集趣闻轶事。”

此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也没达成任何协议。然而，戈尔巴乔夫在提到签署条约时说，那是成功的一天。“这是通向未来的桥梁。苏联方面准备建造这座桥梁。等到总统来到莫斯科的时候，处于桥两侧的双方应当可以紧密相连。”

里根回答道：“他们应当在桥中央会合。”

戈尔巴乔夫说，自己完全同意。

第二天的谈判取得了些许进展。里根提出了一个战略武器削减条约的一揽子计划，其中包括削减50%的战略武器，并明确声明双方有权在实验室之外进行防御系统测试，包括在太空进行测试。里根无视温伯格的保留意见，建议双方共享测试结果。

戈尔巴乔夫一如既往，反对战略防御构想。他说，总统的建议只会引发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戈尔巴乔夫重申了他在雷克雅未克提出的观点，苏联不打算与美国展开战略防御计划竞赛。他说：“这会引发反应，但这种反应有别于战略防御计划的路径。”单凭这一点，就不能接受总统提出的技术共享条款。

虽然如此，戈尔巴乔夫还是就战略防御计划做出了重大让步。他接受了削减50%战略武器的原则，对把战略防御计划限制在实验室内进行测试却只字未提，只是坚持要美国答应在一定时期内不能从反弹道导弹条约中撤出。在这一时期内，可以进行战略防御测试，但不能进行部署。戈尔巴乔夫指出，苏联认为战略防御计划是一笔亏本的买卖，无论美国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他说：“这会拖垮苏联经济。美国可以自己决定，从经济角度来说，战略防御计划对其是否有意义。苏联认为这没有意义。”倘若美国在反弹道导弹条约期限结束时决定部署战略防御，那么苏联会做出反应，但其方式要比战略防御计划的性价比高。戈尔巴乔夫说：“对苏联方面来说，在维护其安全方面，探索尝试其他方式要比战略防御计划这种方式更划算。”

里根重申，战略防御计划是他无核世界构想的核心内容。他说道：“核武器秘密的传播不可阻挡。假如美苏能够达成一致，销毁他们所有的核武器，他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某个国家的某个疯子可能会发展

核力量，目的是进行征服或敲诈。”里根知道戈尔巴乔夫可能会畏缩不前，但他再次提出“一战”之后的一种情况进行类比，当时宣布使用毒气弹是不合法行为。里根说：“人们当时还保留着防毒面具。防御措施总还是必要的。”

戈尔巴乔夫说，他需要美国承诺不撤出反弹道导弹体制。“假如美国希望削减50%，那就应当保证10年内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他说，在那之前，无论如何不能实施战略防御计划。

里根拒绝以任何方式限制战略防御计划，认为自己没必要这样做。他提高嗓音，说道：“我不想讨论削减50%与战略防御计划之间的联系，不想讨论双方如何销毁他们半数的核武器。我想讨论我们如何能像昨天那样签署协议，这一协议可以让世上每一个人都感到高兴，就像昨晚晚宴上大家感受到的那样。让我们开始着手工作吧！”

戈尔巴乔夫说：“我准备好了。”但他在没有得到保证遵守反弹道导弹条约的承诺前拒绝开始下一步工作。

南希·里根明确表明要全程参加此次峰会。她发现赖莎·戈尔巴乔娃一如既往的令人讨厌。南希后来写道：“我和赖莎有两年时间没见面了，但她没有太大变化。”在她们的丈夫准备签署中程核武器条约的时候，南希为赖莎、芭芭拉·布什和其他几位女士举行了一次招待会。南希回忆说：“我本来打算得很好，但我的客人完全被赖莎惊呆了。当时，赖莎对我们讲了整整一个多小时的话，她谈到苏联的历史、政治制度以及苏联不存在无家可归之人。后来，一位客人走到我跟前说：‘这是我所见到过的最失礼的事情。’其他人一直在惊讶地摇头。我很高兴，因为大家终于看到了我所经历过的遭遇。”南希不满地指出，赖莎没有询问自己与癌症搏斗的经历，也没有就自己母亲去世这件事表示安慰。“苏联人什么都知道，因此我无法相信，她竟然不知道几周前我所经历的一切。或许我太敏感了，但我并不这样认为。”

南希极不情愿地带着赖莎参观白宫。三周前，她就发出了邀请，但赖莎迟迟没有答复。南希说道：“我很恼火，因为在我们这个圈内，没有人会无视国家首脑或其妻子发出的邀请。”最后，赖莎说她会来参观，但时间不是南希所提到的时间，因为她的日程安排非常紧张。然而，她却有时间跟记者们聊天。一位记者问她是否愿意住在白宫，她回答说白宫看起来不像正常的住家，更像是一座博物馆。南希强压怒火说道：“这个回答非常不礼貌，尤其是回答问题的这个人根本就没有参观过私人官邸。”

南希的怒火一直持续到当晚她安排的国宴上。她写道：“可以理解，戈尔巴乔夫夫妇因为长途旅行显得有些疲惫。因为他们特意提出早些结束当晚的活动。因此，我们对活动进行了一些调整，让他们可以在晚上10点钟离开，这也是他们要求的。”南希取消了她计划好的在黄色椭圆厅举行的私人招待会，下令在国宴大厅的餐桌上提供咖啡，而不是单独在蓝厅上咖啡。南希还告诉她为当晚活动聘请的小提琴家们压缩曲目，甚至当晚的钢琴家范·克莱本也被要求缩短节目时间。

南希回忆说：“为了确保早些结束当晚的活动，我们做出了这么多调整。但是，戈尔巴乔夫夫妇来参加晚宴时却迟到了，当时我有些恼火。”然而，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真正的耽搁出现在迎宾队伍那里，或许这是文化差异的原因，而赖莎只是想表现得礼貌周到，她试图与每一位客人认真对话。‘你叫什么名字？你有几个孩子？’她好像非常清楚我们的那些客人都是谁，而她也明显想让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但是这样一来，迎宾队伍移动缓慢。我当时要疯掉了。”

如果赖莎·戈尔巴乔娃注意到了南希的不满，那她也没有任何表示。她丈夫也是如此，戈尔巴乔夫看起来很享受此次晚宴。南希坐在理查德·珀尔身边，这位好斗的国防部副部长同戈尔巴乔夫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因此，毫无疑问，南希坐在戈尔巴乔夫身边，但南希无须挑起话题。珀尔矮小肥胖，但在英国一家电视台创作的雷克雅未克峰会的节目中，一位干瘦的演员扮演了珀尔的角色，戈尔巴乔夫取笑道：“我在电视上见到你的时候，你比现在瘦多了。”

珀尔反问戈尔巴乔夫，苏联的经济产量有多少用于军事开支。

戈尔巴乔夫回答说：“这是个秘密。”

珀尔追问道：“您确定您知道详细情况？”

戈尔巴乔夫说：“我知道所有事情，我是国防委员会主席，现在跟你一起吃饭的是一位军人。”

珀尔说：“我想你们的花费是20%，或许更多。”

戈尔巴乔夫顾左右而言他，让珀尔自己去猜测，但他非常享受当晚的活动。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那些日子里，我参加了许多有趣的会谈，其中一些让人为之动容，在白宫的那次晚宴就是如此。晚宴之后，范·克莱本进行了独奏表演。我们对他有印象，1958年，作为年轻钢琴家，他在莫斯科演奏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获得柴可夫斯基奖。范·克莱本与我们亲切拥抱之后，坐到那架三角钢琴前，开始轻柔地弹奏并演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是送给苏联客人的一份珍贵的礼物。这首歌曲是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为1957年莫斯科青年节谱写的，已经成为一首家喻户晓的、非正式的国歌。我们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起来，俄语和英语歌词汇聚成同一种情感。”

戈尔巴乔夫美好的心情贯穿着此次访问活动。他面对华盛顿大街上的一群人时，表现得好像是一位经验老到的美国政客。他命令自己的豪华轿车停下来，跳下车，挥手致意。他对自己遇到的第一位女士说道：“你好，我很高兴来到美国，很高兴与大家交朋友。”面对另外一位观众时，他说道：“我的人民强烈要求我来更好地理解美国人民。”他慷慨激昂的言行表现得淋漓尽致。一位饭店老板邀请他到店里品尝罗宋汤。当他挥手致意时，店里一群公款报销的用餐者报以热烈的掌声。其中一位说道：“甚至从阳台上，你就可以感受到此人的非凡魅力。那就像是一场游行或庆典，一位世界领导人走过来握手，而你们会感到这个世界会变得十分美好。我

们当中没有人想要错过这一时刻，这是温馨的一刻，充满了爱意。我是个玩世不恭的人，但我也受到了感动。”

戈尔巴乔夫也打动了乔治·舒尔茨为他举行的国务院招待会上的观众。他说道：“今天，上千万人逐渐意识到，20世纪末期代表了人类发展的分水岭。这一分水岭分开的不仅仅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且分开的是生存的常识和意志——这是其中一个方面——和缺乏责任感、民族利己主义和偏见，简单地说就是陈旧的思维方式——这是另一方面。人类已经逐渐意识到，自己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应当彻底结束各种战争。”过去，和平的基础是军事平衡，这是很危险的。“从本质上来说，来自武力的和平是靠不住的，无论人们对此有何说法。这种和平的本质在于冲突，无论是隐藏的或是公开的。这种和平总是潜伏着爆发的危险，暗藏着动用武力的诱惑。”世界不能继续沉湎于这一错误观点，中程核武器条约代表了我们的初步行动，这一行动超越了武力威慑，在信任的基础上共同迈向全新的安全时代。“简而言之，无论用俄语还是用英语来说，我们所取得的成就是——复苏的希望。”

分别时，戈尔巴乔夫送给里根一份礼物。多年以来，总统一一直在指责苏联向尼加拉瓜的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输送武器。对此，戈尔巴乔夫予以还击，批评美国向阿富汗境内的反苏联圣战分子提供武器。戈尔巴乔夫已经原则上同意把苏联军队从阿富汗撤出，这样一来，就使得那个国家的武器问题失去实际意义。现在，他告诉里根，自己将会中断对桑地诺解放阵线的援助。

里根曾希望能在战略武器削减条约方面取得更大进展，但他愿意接受已经取得的成果。他在当晚写道：“我想，这是我们与苏联方面所举行的成果最为丰硕的一次峰会。”

里根通常会过圣帕特里克节，作为爱尔兰人，这一天非常有趣，也经常成为很好的政治活动。但是，1988年的3月17日却不是那么有趣。里根在日记中写道：“首先讨论的是针对诺思中校、约翰·波因德克斯特、西科德和哈基姆将军的23项起诉。”他指的是理查德·西科德和阿尔伯特·哈基姆，这两人在伊朗与反政府武装事件中担任中间人。他所指的还包括自己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波因德克斯特及其副手诺思。“真的没有什么好说的。”

随着起诉的进行，他的确没有发表过多少讲话。面对记者的提问，他都以三权分立作为借口：法院必须能够独立履职。政治让他无法超越法律，因为无论他说什么，都会让选民联想到他身为总统所犯的大错。

在另外一件相关事件中，他可以发表更多的言论，但这件事很特殊，令人尴尬。唐纳德·里甘的怒火并没有因为离开政府而熄灭。1988年春天，他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在书中他进行了报复。他重点描述了南希星象师的故事，这自然吸引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里根对此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写道：“媒体表现得就像得到新玩具的孩子一样，不要管它，纯粹是胡说八道。”第二天，他又写道：“举行了一次简单的会议——一些人谈了一下里甘那本书所引起的有关星象学的东西。洛杉矶的某个女人自称自己经常前往白宫，常带给我们一些资料。她甚至宣称，是她建议我选择乔治·布什。我们一生从未见过她，根本不认识她。”

起初，里根在公共场合的态度同样明确。在一次表彰冰激凌生产商本·科恩和杰里·格林菲尔德的活动中，一位记者大声提问：“总统先生，您还继续利用占星术来安排您的日常行程吗？”

里根回答道：“不，我从来就没做过。”

白宫工作人员表现得更加谨慎，他们没有从根本上否认这件事，但他们说，南希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咨询星象师了。琼·奎格利随即跟记者们说，她每周都与南希联系。里根新任的新闻发言人马林·菲茨沃特站出来维护第一夫人——即使可能在无形中危害到总统——他说道：“她当然有权咨询星象师，这根本没错。我反对那种说法，说什么这样做是错误的，不当当继续下去。”

南希说自己因为里甘所披露的消息受到伤害，她在一份书面声明中写道：“这种报复性的攻击让我很惊讶，我终于明白，里甘真的不喜欢我。”

里根出面维护南希。面对记者，他把里甘的描述说成是“一派胡言”，并且

说道：“如果我袖手旁观，让他们污蔑我妻子，那我才是浑蛋一个呢。”

然而这几乎无法平息公众的议论。最新的传言说，签署中程核武器条约的日期也受到占星术的影响。之后，有人问里根这是否属实。里根没有回答这个问题，相反，他说奎格利与他在1967年担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时半夜起来宣誓没有任何关系。

这名记者又把他带回了这个问题，他问道：“您这是在否认，在白宫期间，无论是您还是您夫人从来没有利用占星术来设定行程安排或确定中程导弹条约签署日期，是这样的吗？我必须说明一点，先生，您的这种说法与许多助手告诉我们的不一致。”

里根说道：“是这样的，我没有否认，我只是想告诉你一件事情。在我受到枪击之后，对我妻子来说，那是一次极其严重的创伤经历——”

这名记者打断他的话问道：“对您来说怎么样呢？”

“不一样的，我当时坚信自己一定会没事。”记者们笑了起来，气氛有所缓和。里根继续说道：“但朋友们给她打来许多电话，其中一位朋友在电话中说——或者希望他能够知道我当天的行程，因为——他提到了某个人以及所有的不祥之兆。而南希当时并没有轻松渡过那次创伤。当突然再次发生类似事情的时候——当我准备参加与上次事故类似的活动时，她就会问这次的情形如何？事实上，并没有因为我的做法而更改过任何行程安排——”

这位记者追问道：“但为什么会发生此次签署中程核武器条约这样的事？”

“不是这样的，情况并非如此。我再说一遍，这完全是虚假骗人的消息。我们没有提前安排，不会让我们的生活受其束缚。我并不想要招惹那些有这种信仰的人，或者那些对此事非常严肃的人——”

一位记者问道：“您相信占星术吗？”

“我不会让它主导我的生活，但我也不会否认这一问题，因为我对此了解不多，无法说它到底有没有道理。”

“您认为可以避免针对您的刺杀行动吗？”

“不能，这位朋友认为，如果我提前得知自己将遭遇可怕的经历，那么我就可以采取一些行动——但事实上，我们没有。”

里根和南希希望这种喧嚣可以自行消失。然而，他们从星象师自己的预测

那里没有得到多少安慰。星象师说这件事不会对总统造成长久伤害。琼·奎格利对一名记者说，里根同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亚伯拉罕·林肯一样，都具有坚强的力量。她说道：“他们都是水瓶座的人，都具有伟大的远见卓识。”她又补充道：“里根的星象图中有很大一部分属于摩羯座，因为他非常务实。另外，在其影响最大的位置有三颗行星，这说明其品质极佳，意味着他的一生非常重要。”



在这场闹剧中，里根与几位外国电视记者会面，他们认为占星术这件事充满神秘色彩，怪诞而诱人。其中一位记者代表自己国内的电视观众问道：“您的前办公厅主任说，占星术在您的行程安排中发挥着一定作用，甚至在计划召开峰会时也是如此。对此您认为这会如何改变戈尔巴乔夫先生对总统的看法，以及对他与之打交道的政府的看法？”

里根对这一问题并没有感到惊讶，他回答说：“我希望戈尔巴乔夫先生听说过我对这些指控的解释，因为没有人根据占星术做出任何决定。”

戈尔巴乔夫的反应对里根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此时，这位苏联领导人是为数不多的关注总统的少数人之一。里根的势力在快速萎缩，竞选活动已经全面替代了总统的行动，他获得美国人民关注的能力正在削弱，国内项目根本不可能做到，而外交政策是他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唯一领域。

但是，他的外交政策目标也在发生变化。刚刚入主白宫的时候，他的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击败共产主义。克里姆林宫就是敌人，所有工作都旨在挫败克里姆林宫方面的企图。现在，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成为他的伙伴。里根意识到，自己的目标和戈尔巴乔夫的目标并不一致，但他认为，他们这些目标也并不是对立的。他曾称苏联是邪恶帝国，但他丝毫没有认为戈尔巴乔夫邪恶诡谲。事实上，他逐渐认为戈尔巴乔夫与自己没有太大差别。他十分信任戈尔巴乔夫，认为他在努力寻求结束军备竞赛，甚至是结束核时代。他承认，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安抚自己的拥护者，就像他自己也必须这样做一样。

里根前往莫斯科，参加与戈尔巴乔夫的最后一次峰会时，心里想的就是自己的拥护者。他清楚，在执政晚期，不可能达成战略武器削减条约，但他希望维持住自己和戈尔巴乔夫在军备控制方面的发展势头。里根还清楚，美国的保守派依然怀疑戈尔巴乔夫的动机，有些人甚至怀疑他与戈尔巴乔夫走得如此之近的动机或智慧。许多保守派分子好像渴望那些意识形态泾渭分明的日子——当时美国总统称苏联是邪恶帝国。

莫斯科峰会开始之后，两人握手不久，里根就提出了他所谓的敏感话题。他说这一话题十分敏感，如果他的话被泄露给媒体，那他会予以否认。这一话题与宗教信仰自由有关。里根首先说明自己是以朋友的身份在说话，他问戈尔巴乔夫：“假如您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是人民的权利之一，信仰任何宗教的人们——无论是清真寺的伊斯兰教、犹太教、新教或是乌克兰教会——都可以前往自己选择的教堂，那么会怎么样呢？”宗教信仰自由及

其优点更有助于与美国达成协议。里根说，假如戈尔巴乔夫能够保证实施宗教宽容政策，那么美国对苏联的态度将发生重大改变。“您将成为一名英雄，反对您的国家的大部分敌对情绪将会消失，就像烈日下的水汽一样。”里根重申，自己从来没有试图逼迫戈尔巴乔夫实施变革。“如果房间内任何人说是我提出的这一建议，那我就会说此人在说谎。”

最初，戈尔巴乔夫对这一建议不予理睬。他说，在苏联，宗教问题并不严重。他自己曾接受过洗礼，现在却不信仰宗教，这体现了苏联社会的革命进程。在苏联，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选择信教或者不信教。戈尔巴乔夫说：“这是个人自由。”美国没有主场挑衅滋事，因为美国并不像总统说的那样信仰自由。他问道：“为什么有时候那些不信仰上帝的人会受到压迫呢？”

里根反驳说，他们没有受到压迫。他说自己的儿子罗恩是个无神论者——“尽管他自称是不可知论者。”他说，在美国，教会与国家完全分离，在公立学校中不能祷告。

戈尔巴乔夫承认，俄国十月革命之后，反对宗教运动走得过于极端，但那些日子早已过去。“今天，宗教的发展趋势完全是朝着您提到的方向发展，政府和宗教活动家之间存在某些冲突，但只有当他们进行反苏活动时才会发生冲突。近些年很少有这样的冲突发生，这些冲突必将消失。”

里根要求戈尔巴乔夫就这一预测做出承诺。

戈尔巴乔夫再次反对，但没有之前那样坚决。此次对话结束时，两人谈起私人话题，比较有趣。里根说他一直想对自己那个无神论的儿子做一件事，想让他吃上一顿丰盛的大餐，好好享受一下。吃到最后的时候，他会问罗恩是否相信世上有厨师。里根说，他一直在想，罗恩会如何回答。

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只可能出现这样一种回答：是的。

他们探讨了战略武器削减条约，但几乎没有取得进展。他们重复了之前关于战略防御计划的观点，但很快就意识到彼此无法达成共识。尽管没有明说，但两人都意识到，里根出于“跛脚鸭”状态，无法实现关于战略武器的任何重大协议，因而，对戈尔巴乔夫来说，提出任何关于这一协议的妥协也是不明智的。

此次峰会的重点转移到了正规谈判之外的事件当中。里根提到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一些知名作家和艺术家，东正教神职人员，以及莫斯科国立大学

的学生和教职员工。他的主题是关于自由，他高度称赞自由，认为这是人类发展所有领域中进步的关键。里根在莫斯科国立大学发表讲话，说道：“自由是质疑的权利，是改变已有行事方式的权利，是提出某种思想的权利——尽管这种思想可能遭到专家的嘲笑——并等待着它在人民中间产生深远影响。自由是秉持梦想的权利——坚持你们的梦想或者遵从你们的良知，哪怕你独自一人身处怀疑者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称赞自由时，里根提到了美国历史，但他的主题同样适用于经济改革，他的听众是理解这一点的。他们为他支持戈尔巴乔夫和支持改革而鼓掌。当时，杰克·马特洛克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他在莫斯科国立大学聆听了总统的演讲，为听众的反应感到惊叹。他说：“演讲非常令人震惊，打动了在场的学生。他产生的深刻影响像闪电一样横扫各大媒体。”马特洛克还记得，当时有位认识他的苏联知识分子欣喜若狂地拥抱了他。这位朋友说：“这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之一。”马特洛克平静地暗示说他可能有些夸张。“不，没有夸张。”他回答说：“假如里根认为我们走对路了，那我们就有希望。”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关键时刻几乎是在不经意间来到的。他回忆说：“我和里根先生在克里姆林宫散步，一群游客跟美国总统打招呼，里根幽默地回应，偶尔停下来聊上几句。”一位莫斯科居民问总统：“您现在依然把苏联看成是邪恶帝国吗？”

里根回答得简洁干脆：“不。”

戈尔巴乔夫回忆说：“我当时就站在他身边，自忖道：‘正确。’”

戈尔巴乔夫精心安排第二天的记者招待会，陈述此次对话，并重复总统的回答，要求记者们询问里根，是什么让他改变了看法。

里根回答道：“我认为，目前我们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两国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他又补充说：“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总书记，我认为他与以往的苏联领导人不同。”

在回国途中，里根进一步提炼了自己对于苏联和世界所发生的变化的评价。在伦敦市政厅，里根对玛格丽特·撒切尔和一群政要显贵们说道：“我们极有可能正在开始拆除‘二战’之后的壁垒；极有可能正在步入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其间，苏联正发生持久的变化。”他也不十分肯定，说道：“我们将拭目以待。”但他的语气和举止表明他充满了希望。

里根自己对于此次峰会的反应也同样乐观，但更为感性。他在日记中写道：“除了说一句‘感谢上帝’之外，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乔治·布什在安德鲁空军基地迎接里根。这位副总统说道：“您让我们感到骄傲。在这个星期，一位美国总统阔步跨过红场坚冰，通过自己坚定的步伐和轻松的语言，让世人明白自由是一件多么令人振奋的事情——一件多么感人 and 令人鼓舞的事情。”

布什的讲话不仅仅是出于对总统的崇拜之情。共和党初选阶段是对里根总统任期的全民投票，在这期间，布什获得了足够的代表支持，确保他获得提名，继任总统。在布什和这位副总统的主要竞争对手鲍勃·多尔之间，里根表面上采取不偏不倚的姿态。但跟其他人一样，他认为投票支持布什就是支持他自己。在得知布什赢得了新罕布什尔州初选的时候，里根指出：“尽管我的确需要公开保持中立，但这一结果还是让我感到满意。”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不见得是里根执政岁月的一次庆功大会。伊朗与反政府武装引发的丑闻依然挥之不去，里根任期内增加的巨额联邦债务依然是传统保守派的梦魇。但是，大会组织者认为，里根超凡的领导魅力会带来再一次胜利，因此他们把总统安排在正中央最重要的位置。众多支持者歌颂他杰出的领导才能。一部纪录片介绍了他的人生经历，盛赞其超凡的成就。

之后，里根本人发表讲话。他的心情从来没有这么好过。他回顾了自己当选时国家面临的可怕窘境，回顾了自己和共和党所承诺的补救措施。他说：“我们当时的梦想是团结一致，拯救美国，重新开始，创建全新的山巅上的光辉之城。我们共同的梦想是改造我们的政府，将其由原来的挥霍繁荣的政府改造成一个能够再创辉煌的政府。这是一个重振国家雄风的梦想，目的是能够维护世界和平和自由，重拾我们的民族使命。”这一挑战十分巨大，但是美国人民已经习惯于迎接挑战，因此在过去的8年时间里，他们勇敢地接受了挑战。

里根的讲话内容和无与伦比的演讲技巧让代表们激动万分。他们不想让他往下说，反复地高喊着：“里根！里根！里根！”

里根把这种热情引向自己党内新的总统提名者，说道：“现在请乔治讲话。”

观众们并不买账，他们想要自己心中的英雄，于是高声喊着：“再干4年！再干4年！”

里根强调说：“不可以的。大家没有听清楚。”他提到自己的政府在努力削

减官僚作风，说道：“乔治·布什率领这个工作组，根除那些规定。”

这些话出自一个最近刚刚完成自己第4次超级大国峰会的人之口，这几乎是明褒暗贬。但是，代表们最终见风使舵，一些人开始反复高呼：布什，1988。”

里根点头表示赞同。然而，他只不过是适当地努力，擢升布什以自己个人的能力担任领导人，他甚至削弱这种努力，告诉布什：“行动起来去为吉普赢得选举。”

里根使用共和党人逐渐喜欢上的一个比喻总结道：“几年前，我们点燃了燎原之火，激情四射的思想和信念助长了火势。我们决定要在美国全境燃烧起来。”他们确做到了这一点。“但是，我们绝不能熄灭此火或停止战斗，因为斗争永远不会结束。我们必须不断地维护我们的自由——生生不息，直至永远。”

里根说，自己将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加利福尼亚州，那里的牧场需要清理灌木，修补栅栏。“但是，我想让大家明白，如果火势变弱，我会留下我的电话号码和住址，以防大家需要我这名老兵。尽管通知我，我必将全力以赴，只要我一息尚存，只要这个美丽的国家在努力争取它在这个星球上的荣耀时刻。”

代表们如痴如醉，他们无一例外地鼓掌、欢呼，经久不息。几乎所有人都希望他们可以再次提名里根。一名代表挥舞着一幅标语，上面写着“里根国王”。菲尔·格拉姆是布什的得克萨斯老乡，也是指定的副总统提名者。他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对于里根的爱戴之情，说道：“我同罗纳德·里根共事8年，我热爱我们的总统。在很长时间内，不可能再出现像他这样的总统。”

里根的幕僚们坦言，里根在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表现相当于政治告别演说。没有人奢望，总统在剩下的5个月的时间里还能够取得什么重大成就。大家都明白，对于自己启动的改革，他最后的贡献就是帮助自己的门徒赢得大选。

然而，还有一些工作需要做。美国的政坛大选季碰巧遭遇到了伊朗方面新的麻烦。跟以往一样，这次麻烦还是由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血腥僵持引起的。里根在伊朗与反政府武装这件事上提出免责声明，说美国向伊朗输送的武器不足以改变这两个海湾敌对国家之间的战略平衡。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同时也是出于利己目的考虑。持续的僵局促使德黑兰方面尝试新的策

略。伊朗军舰开始攻击海湾中的油轮，尤其是那些在科威特装船的油轮，因为科威特向伊拉克提供战争资金。德黑兰方面认为，恐吓科威特的客户可以切断该国的收入，削减它向伊拉克提供支持的数量。

科威特的海军不值一提，因此它转而求助那些拥有海军舰队的国家。科威特人非常狡猾，他们同时向美国和苏联求助。克里姆林宫方面表示同意，这使得里根政府试图抢在苏联人之前行动。卡斯帕·温伯格回忆说：“我知道，苏联政府已经告诉科威特他们将施以援手。我当时认为，现在依然认为，苏联军队进入对我们来说如此重要的地区不符合我们的利益。”温伯格和政府中的其他任何人都无意相信吉米·卡特提出的卡特主义，该主义认为苏联对于波斯湾地区的渗透严重威胁美国安全。但他们采取的行动体现了卡特主义的精神。温伯格继续说道：“从一开始我就坚信，如果我们不对科威特人做出积极反应，那么苏联会立即填补这一真空。”温伯格向里根阐明这一观点，里根同意把一些科威特商船的注册国改为美国，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动用美国海军予以保护。

政府官员否认改变商船注册国的做法表明美国在两伊之间的中立政策有所变化。他们说，科威特是中立国，而美国长期以来一直保护战时中立国的航运业务。然而，伊朗不接受这种论调，谴责这种更改商船注册国的做法，认为这进一步表明了美国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不良企图。

伊朗人并不是唯一的批评者。国会中的民主党指责里根，说他把美国带入了一场与美国安全无关的冲突中去。他们指出，海湾地区的战争已经吞噬了数万人的生命。假如里根推行新的政策，那可能会开始吞噬美国人的生命。当一架伊拉克战机突袭美国的佩里级护卫舰“斯塔克”号，杀死37名美国水兵时，民主党人的警告得到了证实。里根接受伊拉克政府关于身份误判的说法，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其他合理的解释。但他采取了预防措施，防止发生类似事故，命令美国战舰对任何貌似危险的飞机开火。

新政策产生了悲剧性的后果。护航行动促使伊朗人派遣武装快艇攻击美国军舰。美国军舰予以还击，并攻击伊朗海上石油平台的通信设施。1988年夏天，美国“文森斯”号导弹巡洋舰发现一架飞机正沿着一条危险的弹道导弹轨迹接近。巡洋舰舰长下令发射导弹，击毁了这架飞机。舰长和船员后来才发现，他们击落了一架伊朗民用航空公司班机，造成将近300名乘客和机组人员死亡。里根回忆说：“这是一次可怕的悲剧。”他在公共场合也是这样说的，并下令展开调查。但他并没有责怪“文森斯”号的指挥官。“我认为舰长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向飞机开火。”

此次飞机击落事件让人们想起了1983年苏联击落韩国班机事件，尽管里根拒绝承认两者之间有相似之处。这件事本来会激怒伊朗人，使他们对美国军舰发起新的攻击，但经过8年血腥而徒劳的战争，伊朗人打算停战。伊

拉克人也是如此，于是，交战双方接受了联合国的调停，决定停火。

共和党对里根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演讲的反应暴露出一个严重问题——总统使被提名者相形见绌。乔治·布什也明白这个问题，却不知道如何解决。一方面，他在讲话中想要明确表明自己与里根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他在讲话中想让自己听起来比里根自己还像里根。他在二者之间游移不定。布什说：“我想让我们的国家更加友好温和。”这表明里根时代的削减开支计划做得太过。然而，与此同时，他继承了里根的衣钵，坚决要求削减税收。布什通过导演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电影中的人物警探哈里说道：“看着我的嘴唇：不增加新的税收。”

里根让布什自己设法解决这一问题，他只提供必要的帮助。这位总统提名者提出，让来自印第安纳的一位年轻的默默无闻的参议员丹·奎尔担任自己的2号人物，这一做法让整个国家感到惊讶。里根表达了对布什的支持，尽管不是亲自讲话，而是由白宫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里根说道：“布什副总统做出了一个不同凡响的决定，选择奎尔担任自己的竞选伙伴。我知道他一定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副总统。”里根代表布什出现在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场合，重申自己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并声明只有布什获胜，才能阻止民主党被提名者迈克尔·杜卡基斯以及自由派分子，阻止他们倒行逆施，破坏过去8年的工作成就。在丹·奎尔与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劳埃德·本特森进行面对面辩论之前，里根向奎尔提供了辩论建议。当大部分观察者认为本特森赢得辩论的时候，里根表现得很忠诚，指责媒体不公。他写道：“奎尔表现得非常出色，而本特森则凭借一些无耻的谎言侥幸得手。”

詹姆斯·贝克从财政部辞职之后，加入了自己这位休斯敦老朋友的团队，成为布什团队的领导人。布什团队克服了对于提名奎尔的质疑，发起了一场咄咄逼人、富有成效的竞选运动。他们把杜卡基斯说成是一个冷漠、不友好的家伙，而民主党这位被提名者对这一印象几乎无力还击。布什在竞选中一路领先，轻而易举赢得大选：选民投票结果为53：46。

里根非常高兴，在看完选举结果报告之后，他写道：“了不起的夜晚。时间大约是晚上11点，上床睡觉——太高兴了。”

**第七部分 云中牧场 1989~2004**



随着布什顺利当选，里根加紧完成自己最后的庆祝活动。玛格丽特·撒切尔来到华盛顿，以摸清当选总统的底细。她抽时间向自己即将离任的战友表达了敬意，她说道：“总统先生，您不仅是一位坚定的盟友和聪明的顾问，对我和我的国家来说，您还是一位非常棒的好朋友。”温斯顿·丘吉尔曾经说过，美国人民好像是世界上唯一能够一边大笑一边战斗的民族。撒切尔引用了这句话，并补充说道：“总统先生，您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既具有真正的勇气，又不乏温情与幽默。”

里根前往加利福尼亚的西米谷市，在该市一处距离马利布牧场不远的山坡上，他协助破土动工，建造罗纳德·里根总统图书馆。查尔顿·赫斯顿主持了对美国的效忠宣誓活动。活动之后，里根开玩笑说：“非常感谢。我希望在场的每一位都能因为你的出现而感到荣幸。毕竟，你不大经常让摩西领导你进行宣誓活动。”台下的南加州人发出阵阵笑声，因为总统提到了赫斯顿的一个鲜明特征。里根趁着笑声，对自己的年龄自嘲道：“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甚至不会说英语。”

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为里根举行了一次晚宴。里根对参加晚宴的人说道：“我们这个团队非常优秀，我们经历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大家面对阻力，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事实上，当我告诉鲍勃·霍普今晚我要来参加宴会的时候，他以为我要进行劳军表演。”在近期的选举当中，民主党人增加了他们在参议院中的多数席位，这让里根感到失望，但也让他今晚多了一个段子。他说：“我想大家都知道共和党参议院和民主党参议院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体现在一个是绝对多数，另一个是简单多数。”或许是因为酒精的作用，大家的反应有些迟钝，因而笑声也有些滞后。里根说：“我最好给大家一点儿时间思考一下这句话。”更多人笑了起来，只是略微有些难为情。

1989年1月初，里根出席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图书馆成立15周年的纪念活动。这一次，他比以往更为坦率，公开把自己与自己的政治偶像联系起来。里根说道：“富兰克林·罗斯福激发了年轻人对于政治和政府的热情，鼓励他们为国效力。他的魔力为华盛顿带来了数千名工作人员，这其中既有智囊团成员，也有许多理想主义者。他们充实了新政时期的政府机构。但我想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告诉大家，这种魔力远不止于此。全国上下数百万新选民仰视着这位总统，因为他对未来充满信心，对人民充满信任，对民主斗争感到快乐。人们对自己说，或许有朝一日，他们也愿意为国效力。我就是这数百万人中的一员。”里根在其政治生涯中曾抨击过罗斯福的成就，但在其政治生涯要结束的时候，他承认自己应当感谢富兰克林·罗

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是我第一位投票支持的总统，是第一位我终生视作英雄的总统。”里根提到了罗斯福总统在1936年到访得梅因市时自己见到他的情形。“当他乘坐敞篷车经过的时候，群情激动，爱戴与自豪之情似山呼海啸——他的嘴角挂着大家熟悉的笑容，风度翩翩，充满自信。这让我们重新记起了有些人已经忘记的自信与激情。”里根回忆了自己的反应以及对罗斯福的感激，说道：“正是这种洋溢的热情和富有感染力的乐观精神，才使得一个年轻的体育节目广播员认为，作为一名公民，自己或许应当更加积极向上。”

在那之后的几十年里，里根反思了自己与罗斯福的其他相同之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对于人民的信任。里根提到在经济大萧条时期收听罗斯福“炉边谈话”的情景。“我至今记得，屋子内每一个听他讲话的人的眼里都闪烁着光芒，也记得，因为他的信任，我们也相信自己的能力，重新焕发出克服任何危机与挑战的信心。”里根说，他希望自己也能同样被人们记住。“在我看来，罗斯福曾在政府中表现得十分杰出，而作为政府中的一员，总统所能得到的最高奖赏莫过于他增强了我们对自己的信心。”各种政策优劣参差，变换更迭；各位总统上台离职，流水落花。但美国人民永远存在。“只要美国人民强大、自信，只要他们的领导人善纳忠言，那么，无论经历何种暴风骤雨，美国都能够安然度过，必将永世长存，无往不胜。”

里根即将离开白宫，这促使他开始寻求私人工作的报酬。幸运的是，他没有利用自己的政府工作的便利条件欠下良心债。在他参加的演讲机构开始兜售自己的巡回演讲之前，他和南希几乎没有参加过加利福尼亚的活动。他每次演讲的酬金是5万美元，同时他的个人影响力极大。演讲机构的一位发言人说：“你必须把这一点考虑在内。假如某家企业参加活动或者召开会议，得到组织方当晚殷勤周到的招待，那他们就可能支付10万~30万美元。”如果按照这个计算，那前总统就可以说是物美价廉的人选。

有时候，里根赚到的更多。在加利福尼亚周边进行了一系列的热身活动之后，里根飞往日本发表演讲，支持索尼公司最近收购哥伦比亚影业公司。这笔交易体现了自由市场在发挥作用。除此之外，里根说自己“当前不太看好好莱坞”，因为它净拍些垃圾作品，比不上黄金时代拍的那些优秀高雅的影片。索尼公司的影响力可能有益于电影业健康发展。当里根的讲话在美国被报道后，他感到有必要收回自己关于好莱坞的讲话。在贝弗利·威尔希尔酒店，他对一群影业高管发表讲话。当天酒店招待他的菜单上写着“乌鸦蛋奶酥外加内脏馅饼”，意思是说里根被迫要做丢脸的事，忍气吞声承认错误。里根表扬了好莱坞在宣传美国价值观方面发挥的作用，说道：“你们都是真正了不起的传播者。”然而，尽管他收回了自己的话，但他拒绝返还200万美元的演讲酬金，辩称说这是他的劳动所得，并将此与美国演员在东京进行一次商业活动得到的300万美元进行对比，以图对自己有利。不管怎么说，他需要收复自己在政府工资单上所失去的“阵地”。他说：“我只是在想，16年来我从没有赚到过一分钱。”

当里根同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签署写作回忆录的合同时，他得到了另外一笔巨额收入。他的这本回忆录和第二本内容尚不确定的著作让他得到了500万美元的稿费。出版公司不在乎里根已经写了一本回忆录，当时出版的目的是为了推动他第一次竞选州长的活动。尽管在新版回忆录中，他参政之前的那部分可能包含同样的内容（事实证明有些时候里面的语言几乎是一样的），但出版商认为真正能够提升销量的是他总统任期这部分内容，而不是美国演员工会那部分。许多保守派和共和党人会购买这本书，作为再次支持他们心目中英雄的方式，至于读不读这本书则无关紧要。

南希也没闲着。与里根有预约的同一家演讲机构也把南希招募进来，每场演讲酬金是3万美元。兰登书屋付给她200万美元，让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对唐纳德·里甘和其他批评她的人进行还击。

里根的演讲机构还向奥利弗·诺思发出了预约。他曾因对国会说谎和在伊朗与反政府武装事件中干扰司法公正而面临刑事指控，但即使在那时，诺思在保守派中的支持率也在上升。里根担任总统期间，最后要处理的事务中有一件就是决定到底赦不赦免诺思。他有心这样做，也有人向他施压要求他这样做。里根写道：“福尔韦尔牧师送来一份有200万人签名的请愿书，要求赦免奥利弗。”乔治·舒尔茨远没有里根那样同情诺思，但他还是强烈要求总统赦免诺思，以防审判可能会泄露国家安全机密。里根写道：“他说得头头是道，我下令说以后再讨论这一问题。”

最终，里根决定不予赦免。媒体和公众当中有一些人依然紧咬不放，指责里根在伊朗与反政府武装事件中的合谋。率先赦免诺思可能会让人看起来好像是在包庇。里根还清楚地记得，当年杰拉尔德·福特提前赦免理查德·尼克松，结果严重削弱了福特自己的力量，让自己处境危险，受到来自自己党内的挑战，也就是里根的挑战。里根不再竞选连任，但他还要考虑自己的名声。埃德温·米斯在涉及国防合同的一次丑闻中惹了一身骚，之后理查德·索恩伯勒接替他担任司法部部长。索恩伯勒认为，在诺思的案件中，应当走正常的司法程序。里根快快不乐地说：“我想他说的没错。”

里根没有意识到的是这一案件对他的影响。在他打包准备前往加利福尼亚时，被传唤前去做证，这让他处境艰难。一方面，从行政特权和三权分立来说，在任总统和卸任总统几乎没有在涉及他们总统职责的案件中做过证，里根也不想开创这样的先例，因为这有可能虚弱政府权威。另一方面，他既然拒绝赦免诺思，那前提就是认为必须保证司法公正，但拒绝做证又会妨碍司法公正。诺思为自己辩护的基础是，他声称在策划对伊朗军售以及把收入转移给反政府武装的行动中，自己都得到了总统的首肯。他的律师说，如果这一点属实，那么要求里根做证就是这一案件的关键。

里根不同意，或者说他无论如何都拒绝做证。他在一次采访中解释说：“我打定主意，绝不前去做证。我想这会成为一个先例，总统没有权利强加在其他总统身上。”

这一案件的法官格哈德·格塞尔决定不去难为里根，他写道：“当前庭审记录中，没有证据表明被告诺思曾从里根总统那里得到过任何授权，无论是直接或是间接的，无论是口头或是书面的，允许他参与被指控的违法行为。”这对里根来说再好不过，因为前总统不必站到证人席上了。

然而，里根还是成了法庭辩论的焦点。诺思的首席律师布伦丹·沙利文提出质询：“奥利弗·诺思的行为与总统的行为有什么差别吗？”沙利文说，这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差别。然而法院对他们两人的处理却截然相反。“总统在加利福尼亚开始了幸福的退休生活，而奥利弗·诺思则在过去两年半的时间内在华盛顿为维护自己的荣誉而战。”沙利文回顾了里根曾表扬诺思是民

族英雄这件事，说道：“奥利弗·诺思不想成为英雄，他只想回家。”

陪审团不为所动。诺思被判有罪，罪名是销毁、篡改文件以及妨碍国会调查。诺思郑重宣布要提起上诉，并保证说：“我们将被证明完全是无辜的。”

里根继续保持缄默。他的发言人对记者们说：“鉴于有可能采取进一步的司法程序，因此里根总统不便发表评论。”

法官裁定里根不需要做证之后，对诺思的判决促使约翰·波因德克斯特的律师们加倍努力，争取要让前总统在他们委托人的庭审中出来做证。他们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最终取得了部分胜利。负责波因德克斯特一案的法官哈罗德·格林裁定，里根的确需要做证，但可以在加利福尼亚进行，而不必在案件审判地华盛顿。做证过程将被录像，之后向华盛顿陪审团播放。

格林法官对媒体关闭了在洛杉矶的法庭，但允许被告和检方人员尽数到场。波因德克斯特与自己的律师坐在一起。中情局和其他联邦情报机构派专家警告提问者 and 总统，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触及国家安全底线，那将有可能危及接下来的庭审工作。里根提前从波因德克斯特的律师那儿收到了154个问题，开始准备证词。

里根的证词对波因德克斯特没有丝毫益处，也无益于里根的名声。两天多的时间内，里根在证人席上待了8个小时。他将近100次声称自己并不知情，从不了解所涉及的事件，或者说回想不起这些问题。他无法描述自己所参加的各种会议和谈话，无法辨认出一起工作过的同事，包括约翰·维西将军，此人曾担任过3年里根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他也无法记起托尔委员会报告的大致内容。

本来被告方希望证明，波因德克斯特的行为都是得到里根同意的，但他含糊不清的证词没有让他们达到目的。波因德克斯特被指控多项罪名。（后来这些指控被撤销。）然而，里根的表现让旁观者——包括公众，他们观看了格林法官后来同意公开的录像——开始揣测里根的为人。他当总统时就是这样难以沟通吗？还是说只是在他下台之后这一年的时间里他衰老得太快？

录像中的里根看起来跟所有79岁的老人一样，老年抽搐症状很明显：貌似局促不安的浅笑，不停地点头，声音颤抖。可是，美国人习惯的里根身上的那种活力不见了。他面部松弛苍白，双眼时常空洞无物，身体极易疲劳。里根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从来没有像他在事先准备好的演讲中那么

出色，也没有像他自诩的那么出色。尖锐的提问会让人看穿他薄弱的知识面。然而，他也曾步履矫健，常常能够避开猛烈攻击。这一次没有人猛烈攻击他，这只是因为质问他的人不想让他表现得比他自己看起来的更糟糕。陪审团或许会惩罚攻击一位思维不清的老人的那一方。

对里根来说，不幸中的万幸是，他糊涂而笨拙的表现减少了他可能面临的刑事指控。检察官劳伦斯·沃尔什正在升级对政府机关领导人的指控。据说，在成功对诺思、波因德克斯特和麦克法兰进行起诉后，他正在调查卡斯帕·温伯格和乔治·舒尔茨。很显然，最终的目标就是里根。但里根在波因德克斯特一案中的倒霉表现表明，对整个调查工作来说，任何针对这位前总统的审判都可能是一场公共关系灾难。

南希·里根认为自己丈夫健康状况的下滑与6个月前的一次事故有关，当时他们刚刚离开白宫。里根夫妇前往威廉·威尔逊夫妇位于墨西哥北部的牧场做客。他们两对夫妇是多年的朋友。威尔逊曾担任里根政府驻梵蒂冈大使。里根同以往一样，非常喜欢骑马。这次他同一小队人一起骑马穿过牧场一处崎岖地带。里根善于骑马，尤其是骑自己的马。但当天，他骑的那匹马变得难以驾驭，几次后蹄踢跃。两名特工处特工赶上前来试图稳住它，但这匹马不听指挥，最终把里根甩出马鞍，摔到坚硬的地面上。

里根爬起来，掸了掸身上的土，看来摔得不太严重。但南希坚持要他飞往图森市的一家医院进行全面检查。各种检查结果表明没有出现骨折。他和南希离开医院，前往他们自己的牧场，庆祝南希的生日。

然而，进一步的检查发现，里根的颅骨中出现了一个血块，医生称为硬脑膜下血肿，很可能是这次坠马撞击到头部所致。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洛杉矶的医生们一直在监测病情，最后决定不实施手术。里根看起来恢复得比较令人满意。

但在9月，当他和南希前往明尼苏达的梅奥疗养院进行年度体检时，里根的医生发现了新的血块。他们建议手术，里根同意了。手术过程需要在颅骨上钻一个孔，插入导管，让积攒的液体流出来。手术很顺利，几天后里根就出院了。他的幽默感没有丝毫减弱。在看到自己剃光的脑袋时，他对护理人员说：“我想我的理发师可以休息一个星期了。”

南希一如既往比里根自己更关注她丈夫的健康。她在回忆这次手术时说道：“我非常震惊，当时媒体刊登了一张照片：罗尼离开医院时，摘下帽子向人群致意，而我则冲上前去，试图用我的手遮住他头上被剃光的那一部分。他不在乎自己的一边脑袋没有头发——可我在乎！”

南希继续说道：“我一直觉得，1989年那次脑部严重受伤加速了罗尼阿尔茨海默病的发作。医生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然而，里根的状况时常看起来不仅仅是年龄老化问题。他的回忆录《里根自传：一个美国人的生活》在1990年秋出版，他开始参加脱口秀栏目推销此书。他的宣传人员安排采访他的人都十分友善。的确，芭芭拉·沃尔特斯、查尔斯·吉布森和威廉·F·巴克利都再友善不过了。他们提的问题都很温和。每当他忘词时，他们就会提示。电视评论员沃尔特·古德曼在《纽约时报》中撰文说：“大家对待里根先生就像是对待一位受人爱戴的大叔，他最近在谈话中需要一些帮助。”古德曼说，里根看起来身体不错，微笑依然十分迷人。“然而，他讲话不大流利，或者语序不对。在谈到他过去的白宫生活时，他时常从过去的讲稿中找些话来应付。他找的这些话语有时候并没有说到点子上，但大家都没有难为他。”

对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来说，这本书是一次成功的商业运作；对里根来说，也是一次个人胜利。该书位列畅销书榜首，表明里根的仰慕者们依然狂热地热爱他。然而，这种胜利也是喜忧参半，因为采访者们发现，本书的作者已经不再是这本书所描写的那个人了。

冷战正不可挽回地走向结束，此时，这本回忆录的出版提升了里根日趋形成的历史声望。里根卸任后的一年时间里，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启动的改革浪潮席卷整个东欧地区。1989年11月，柏林墙象征性地被拆除，而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彻底被拆除。1990年秋天，也就是里根的回忆录刚刚上架的时候，联邦德国与民主德国合并，建立了统一的联邦共和国，清除了长期以来超级大国对峙的前沿阵地。同时，苏联周边地带其他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随着这种转变不断发展，里根一直与戈尔巴乔夫保持联系。1990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来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邀请里根在旧金山共进早餐。戈尔巴乔夫现在更喜欢里根，因为他们不再为战略防御争执不休。他也明白，这位前总统在美国政坛依然具有影响力，或许有助于戈尔巴乔夫的访问活动。此次旧金山会面进展顺利，戈尔巴乔夫邀请里根和南希在秋天访问苏联。

加利福尼亚会面结束后，里根对戈尔巴乔夫感到更加惊讶。不久，里根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题为“我坚信戈尔巴乔夫希望自由市场民主”。里根回顾了自己在东欧剧变中发挥的作用。他写道：“3年前的

今天，我站在柏林墙前，敦促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把它拆掉。这不是心血来潮的想法，而是反映了我的观点——我认为我与戈尔巴乔夫先生的关系以及他在国内推行的改革政策的实效都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我可以公开称为东西方和解阶段。”里根指出，戈尔巴乔夫并没有马上积极回应，但他相信这位苏联领导人能够做出最终的选择。“苏联的改革与开放政策把自由言论这个魔鬼从苏联的瓶子里放了出来，戈尔巴乔夫先生的改革为他的人民提出了美好的愿景。”里根在提到自己最近与戈尔巴乔夫的会面时说道：“跟我之前见到他时一样，他非常热情、迫切和乐观，对自己国家的未来充满希望。”然而，他也面临着艰巨的挑战：苏联内部民族主义蔓延，人民抱怨商品短缺，还有俄罗斯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领导的政治反对派。里根认为戈尔巴乔夫应当得到美国的支持。苏联的政治经济改革将其置于正确的发展道路之上，但更大的变革即将到来，在这一过渡时期，美国理所当然应当支持戈尔巴乔夫。在苏联以及在其他地方，可能出现积极成果，不可限量。“就像最近柏林墙的墙砖在被四处买卖一样，民主也可能会席卷全球。”

里根和南希接受了戈尔巴乔夫的邀请，出访苏联。他们把此次行程拓展成一次欧洲11日游，首先到达德国。在德国，里根受邀前去敲击柏林墙。他用锤子和凿子击打了几次，结果没有效果。里根说道：“该死，真坚固啊！”旁边一位德国人说道：“德国质量工程就是这样的。”他们穿过勃兰登堡门，进入东柏林。联邦德国议会主席前来迎接，说道：“总统先生，我们万分感谢您。”里根回答说：“柏林将再次成为原来的柏林。”

他们从德国前往波兰。波兰政府报纸称赞里根是“真正的改革之父”，并称他此次的欧洲之行是作为总统支持自由的“象征性收获”之旅。里根与莱赫·瓦文萨会面，后者依然是目前分裂的团结工会运动的领导人。里根要求各股反对势力在被允许的范围内保持分歧。他说：“要想保护你们已经赢得的自由，你们需要从各个方面包容和开放，这也是波兰的传统。”

这种美好的感觉一直追随着他们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戈尔巴乔夫拥抱了自己昔日的外交对手，称赞他是真正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戈尔巴乔夫说：“我相信，您在我国逗留期间，一定感觉到了我们苏联人民对您的无比崇高的敬仰之情。”

里根投桃报李，向最高苏维埃称赞了戈尔巴乔夫。跟在波兰一样，里根提醒要警惕急功冒进。他说：“现在时局动荡，暗流涌动。自由能够激发不同群体的人们的热情，有可能导致情绪失控。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那就需要领导人采取冷静的安抚措施，以便降低方方面面的激烈程度。”里根提到美国内战期间的苦难，说他希望苏联人民能够不遭受类似的痛



苦。“如果有什么特殊办法可以有助于解决分歧的话，那么一定就是理性战胜愤怒。”他说，长期以来美苏之间一直相互敌视，互不信任，但两国之间的情况已经发生了改变。它们开始共同努力，解决波斯湾危机——最近伊拉克又在那里入侵并占领了科威特。在这一问题上，两个超级大国站到了同一阵线，里根对此感到满意。他希望彼此间的合作可以为解决其他危机树立榜样。“让我们携起手来，发挥我们彼此的能力，为全人类服务，劝说那些愤怒已经达到危险程度的人再次冷静下来。”

1991年2月，里根年满80岁。梅夫·格里芬在贝弗利山希尔顿酒店举行了一次正式晚宴，同时作为为里根图书馆基金会的募捐活动。里根在好莱坞和华盛顿的将近1000名贵宾前来捧场，每人捐助了2500美元，表达对这位前总统的敬意。查尔顿·赫斯顿、伊丽莎白·泰勒和吉米·斯图尔特同乔治·舒尔茨、卡斯帕·温伯格以及保罗·拉克索尔特都来到现场。玛格丽特·撒切尔从伦敦赶来，她在去年11月与自己的保守党决裂后辞去了首相一职。她举杯祝贺道：“25年前，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您引用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话，他说我们所有人都应运而生，肩负伟大使命。您确实已经完成了这样的使命。感谢上帝，您生逢其时。”丹·奎尔代表乔治·布什前来，因为布什正忙于指挥海湾战争。当地的危机没有能够和平解决。虽然如此，布什还是送来一份提前录好的祝词。他预测说：“他们会把您的头像雕刻到总统山上。”莱赫·瓦文萨也通过录像发表讲话，表达了对里根为波兰所做贡献的感激之情。圣迭戈海军陆战队乐队负责现场演奏。

里根感谢客人们前来捧场。他吹灭了4层生日蛋糕上的8根蜡烛，不小心弄脏了礼服上的装饰品。里根与来宾分享了自己的生日愿望：“上帝将保佑我们在波斯湾地区英勇战斗的每一位战士和他们的家人，无论他们身在何处。希望他们明白，我们整个国家坚定地支持他们。”晚会结束时他与南希手挽手，同来宾们一同唱起了《天佑美利坚》。

此次晚宴为里根图书馆募集了200万美元的资金，该图书馆在6个月后将向公众开放。这伙来宾中的许多人再次在西米谷市聚会，参加图书馆落成典礼。另外还有2000人也来到现场，其中主要是共和党人，外加数百名媒体记者。美国所有在世的总统都来到现场：尼克松、福特、卡特和布什，以及里根。共和党的总统们对里根不吝溢美之词。尼克松说道：“他认为，美国站在历史发展正确的一边，与正义力量站在一起，对抗世界上的邪恶力量。一些人曾蔑视他，认为他不过是个空想家。但事实证明，罗纳德里根是正确的。”福特称赞里根是一位“伟大的国家领导人，能够表达美国人民最崇高的理想和最坚定的信念。”布什称其为“政治先知，引领潮流，实现保守主义理想。”卡特是位民主党人，身处局外。他忍不住指出，里根在执政期间没有彻底解决贫穷和机会不公问题，但他还是加入到庆祝的行列，赞扬自己的继任者，说在里根的领导下，“我们国家日益强大坚韧，可能正开始结束冷战。”

里根接受了这些赞扬，补充说道：“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我目睹了这个

世界曾经混乱无序，传统观点遭到颠覆。山顶上的人们可以看到柏林墙蜿蜒交错。这是邪恶帝国的邪恶象征，该国家曾监视其人民、欺骗其人民，剥夺他们的自由、面包，甚至他们的信仰。而今，那堵墙仅仅存在于博物馆，成了收藏的纪念品，存在于一个不再遭受压迫的民族的记忆里。它同时也在提醒人们，我们的世界需要一个强大的美国，这是必需的。”

在退休不到三年的时间里，里根上升为共和党的传奇人物。该党衷心爱戴他，喜欢他在职期间推行的政策。但他们更喜欢他传递出来的远见卓识，相信美国固有的伟大之处。他让美国人自我感觉良好，让共和党人感觉无与伦比。

然而，人们对几件事还心存疑虑，即使在保守派中也是如此。在里根遭遇枪击10周年之际，他签署了一份以詹姆斯·布雷迪命名的手枪管制法案。布雷迪在当天头部受伤，再没有康复。布雷迪法案要求，在购买手枪时，需要有7天的等待期。在这期间，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可以审查有意购枪者的刑事犯罪记录和精神状况。之前里根曾支持购枪等待期，但那只是在各个州的法律框架内。他支持在联邦法律框架内实施等待期的做法标志着对他长期以来所批评的大政府做出了重大让步。

里根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解释了他观念转变的理由。他回忆了自己在约翰·欣克利手中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介绍了对布雷迪造成的永久性伤害以及警官托马斯·德拉汉蒂和特工处特工蒂姆·麦卡锡的伤情。里根写道：“4个人的生活被完全改变，全都由于星期六晚上由一个有精神病史的年轻人在达拉斯一家当铺购买的一件廉价商品——一把便宜的点22口径的手枪。倘若现在国会面对的这份立法——布雷迪法案——在1981年通过的话，这场噩梦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他承认，他自己也常常提出把枪支管制权交给各个州。但逐州实施的办法不起作用。“罪犯可以到附近没有此类法律规定的州购买武器。”必须改变当前这种制度。里根写道：“每年平均有9200人死于手枪之下，这一暴力活动必须予以阻止。”他承认，没有法律能够阻止所有蓄意伤害，但国家必须开始有所作为。“假如通过布雷迪法案可以减少谋杀总数的10%或15%（有可能数字更大），那就非常值得在全国通过这一法律，而像布雷迪、德拉汉蒂、麦卡锡以及里根这些家庭那样，在每年3月30日都要面临创伤纪念日的家庭也会大幅减少。”

反对枪支管制的人反应十分激烈。支持里根的户外运动爱好者组织是1980~1984年的一个竞选团队，该团队前领导人说：“我感到有人在背后捅了我一刀。”枪支持有权公民委员会主席摇头说道：“他的这一行动让人们认为，他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名政客。”这位主席又心有不甘地补充

道：“他不再是美国政坛的主力军。”俄勒冈州射击协会一名发言人说，里根态度的转变让他开始怀疑前总统的整个政党。他说：“每当我看到一名共和党人的时候，我都开始怀疑他所告诉我的的是不是他所想的，或者说他为了得到我的选票，只告诉我我想听到的。”

布雷迪法案得以通过，但延长两年实施。这表明里根的确不再是曾经的主力军。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他的影响力也在衰退。尽管乔治·布什是作为里根保守派竞选成功的，但他的管理方式又倒退回以前，共和党人又开始采取严格平衡预算。里根卸任不久，他最后6年令人兴奋的经济增长速度开始放缓，之后开始倒退，把国家拖入经济衰退的境地。与所有的经济衰退一样，这次的衰退也减少了政府收入，导致里根时期的严重赤字变得令人恐慌。投资者担心经济前景，也担心他们自己的未来。里根任期内通过的格拉姆-拉德曼-霍林斯法案规定，如果国会和总统无法达成一致，那就将自动开始令人备受煎熬的开支削减。

与增加税收相比，布什倾向于削减开支。但是，容易削减的开支项目在里根时期已经完成。而依然控制国会两院的民主党则坚持，削减任何开支都要同时增加税收。布什曾仿效影片《肮脏的哈里》中的镜头，许诺不增加税收。但经过无数的痛苦和煎熬之后，他同意与民主党谈判，削减开支，同时增加税收。

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它激怒了共和党右翼分子。《纽约邮报》大声疾呼：“请看我的嘴唇：我说谎了。”持自由主义观点的卡托研究所称布什的逆向而为是在上演“世纪罪行”。但随着各项工作确立下来，谈判开始产生成效，赤字开始缩小，推动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快速增长。另外，比尔·克林顿时期增加的税收进一步削减了赤字。到20世纪90年代末，联邦预算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首次出现盈余。

然而，布什在税收上的退却证实了里根保守派的观点，即布什跟他们从来不是一路人。里根的拥趸们还记得布什曾称里根的政策是“巫术经济学”，那些没有抛弃布什的保守派当即明确表明，他们有可能随时抛弃他。

在讨伐布什变节脱党的声浪中，少数保守派注意到，他在预算方面的妥协实际上是在效仿自己前任的做法，只是表述不同。里根一直提倡较低赋税，而从总体来说，他实现了低赋税的目标。但当增加赋税能够保证与国会达成最佳交易时，他允许适当提高赋税。里根是个保守派，但他也是个实用主义者。他接受自己能够得到的一切，永远不会让实用效果单纯成为意识形态的人质。詹姆斯·贝克听到里根多次表达过类似的意思。贝克回忆说：“如果里根告诉我一次，那么他就已经跟我讲了成千上万次：‘我宁愿

得到我想要的80%，也不愿以身涉险，跌落悬崖，尽管战旗还在飘扬。””

在另外一个问题上，布什也一样效仿里根的做法。1991年7月，布什与戈尔巴乔夫签署战略武器削减条约。该条约规定大幅削减战略武器，就像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在日内瓦开始谈判，而在雷克雅未克几乎达成的那样。戈尔巴乔夫放弃了自己最后的坚持，不再把战略武器削减条约与限制战略防御计划联系起来，而战略防御计划的发展也比里根以及积极支持这一计划的那些人所希望的要缓慢许多。战略武器削减条约没有像里根梦想的那样消除核武器，但它标志着朝着驱除核幽灵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这一幽灵在里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威胁着世界，挥之不去。

1992年，布什再次赢得总统提名。尽管保守派心有不满，但里根还是很乐意代表其继任者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对一位81岁的老人来说，里根看起来精神矍铄。如果说他的举止和手势缺少了早年那种自信和活力的话，那么他的演讲依然精彩，声音洪亮。与他这些年的许多演讲一样，他此次演讲依然是对美国例外主义的赞美诗。他从没有过比这更好的机会来宣扬美国的伦理道德。解决苏联帝国的最后阶段是苏联自己解体了。1991年年底，苏联政府在选举中失败，把权力让与了构成苏联的各个共和国。美国将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对手不复存在。

里根没有幸灾乐祸，但他为自己的国家以及国家所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他说，美国是世界道德的指南针，是自由的守护神，是机会的指路明灯。毕竟，美国已经取得成功，前途不可限量。他预测说：“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变化将使美国比我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更加充满活力、更加安全。”人类希望美国比以往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将一直是世界其他地方唯我们马首是瞻的国家。”他要求共和党和整个国家对美国历史保持本心。“希望所有美国人永远不要忘记你们英勇的祖先，永远不要忘记寻求神的指引，永远不要丧失你们天生神赋的乐观精神。”

代表们为他们心目中的英雄的表现和演讲感到万分激动。他们不断地打断他的演讲，高声呼喊：“里根！里根！”以及“谢谢你，罗尼！”他们挥舞着精心装饰的横幅，上面印着“里根国家”，同时挥舞着手写的标语，上面写着：“我们爱你，罗尼。”

并不是所有美国人都像共和党人那样爱戴里根，但甚至连许多民主党人也

都承认比较喜欢他。毕竟，他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然而，身为总统，他的功绩却引发了一种截然相反的矛盾心理。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曾举行过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只有43%的受访者对里根任职期间的工作表示满意，而有50%的人表示不满意。另外一次民调要求受访者对里根的总统业绩评级，33%的人表态说低于平均水平，39%的人说处于平均水平，28%的人说高于平均水平。

其中的一些不满反映了近期的经济衰退情况。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下滑是否是源于里根时期的赤字争执不一，但停滞的经济增长和上升的失业率让总统所在党的选民们感到失望，里根的名声同布什的名声一起受到了影响。

里根的业绩也受到一直在进行的针对伊朗与反政府武装丑闻调查的影响。劳伦斯·沃尔什不依不饶，他对里根政府的调查已经深入到内阁层次。1992年6月，他说服大陪审团起诉卡斯帕·温伯格，罪名是做伪证和其他严重罪行。尽管起诉里根本人的机会几乎微乎其微，但对其政府所犯错误的持续关注为其执政生涯蒙上了一层阴影。

里根尽量不去理睬这一调查，一直继续着离开华盛顿之后养成的生活习惯。他和南希把时间花在牧场和位于贝莱尔市的家中。他在世纪城保留着一间办公室，每天在那里从上午10点到下午3点正常工作。“这不是退休生活。”他的女发言人说。她又补充说：“这种生活跟白宫生活一样劳累——甚至更累。”这种说法一不小心证实了总统不会让自己过度劳累的名声。来访的政要们——莱赫·瓦文萨、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以及其他人士——共同讨论时事，并在里根位于34层的套房里欣赏太平洋的美景。

里根和南希一直坚持锻炼身体。他们到怀俄明州划船，到阿拉斯加东南方诸岛间泛舟。里根在家中的健身房练习举重，与朋友们打高尔夫，在牧场骑马，修剪灌木。他和南希密切注意他们的身体状况，经常在梅奥疗养院体检。1992年8月，里根办公室拒绝透露他们最近体检的细节，只是说：“他们的医生发现他们两人都非常健康。”

对里根来说，情况并非如此。一个月前，他在沃尔什委员会上做证。从提问一开始，他的表现就明显让人难受，记忆在消失。他无法记清一些基本信息，比如谁曾为他工作过，他们做过什么。沃尔什一开始提醒道：“您1984年再度当选总统，在1985年1月开始第二任期。当时国务院归国务卿舒尔茨领导，乔治·舒尔茨。是这样的吧，先生？”

里根说：“我想是的，但无法保证。我知道国务院不断有人事变动，但我想你说的没错。”

沃尔什说：“埃德温·米斯在您的第一任期内先是担任总统顾问，之后在您的第二任期成了司法部部长。这大致没错吧？”

里根回答说：“我相信你所说的。我记不清这些人事变动的时间，但埃德温是这样的。”

“在您的第二任期内，罗伯特·麦克法兰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吗？”

“我无法告诉你，也记不得他何时离任。”

“是否是大约在1985年12月5日？”

“我记不清了，只知道我让他在那个位置上干过一段时间，他干得相当出色。”

“您能否告诉我们一些唐纳德·里甘和罗伯特·麦克法兰之间的分工情况？”

“我无法做到。我只能告诉你这一切以及每天——所发生的这一切在我们——在我卸任以后，我和南希开始谈论我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能记住的很少——事情总在不断变化——尤其是总统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要写日记，因为我们无法记住过去8年我担任领导人时发生的事情。”

沃尔什询问其他工作人员的情况以及他们与前总统的关系。“迪弗先生——他曾与您一起在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工作过？”

“我得想一下。”

“好吧，不要——”

“说实话，我无法保证。我不愿他听到我这样说。”

“克拉克法官曾在您的政府工作过？”

“是的。”

“他随后又成了内务部部长？”

“我想迪弗两方面工作都做过，可不能肯定。”

沃尔什的调查人员发出传票，得到了里根的日记。沃尔什向前总统展示了日记的各种记录手稿，希望能够唤起他的记忆。他要求里根朗读一下1985年2月26日的日记。

里根读道：“国家安全委员会通气会。阿萨德看来正努力从黎巴嫩真主党那里得到4名被绑架的人质。”里根看起来不大熟悉这份资料。

“您想不起这件事？想不起阿萨德总统要做什么？现在想起来了么？”

“没有。你看，我现在在想阿萨德是谁。”

沃尔什自己朗读了另外一份日记记录：“被绑架人质的照片，令人痛心。”

里根说：“我根本不记得这些了。”

“您还记得1985年6月，6月14日？当时环球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被劫持。”

“我一点儿也不记得了。”

“这对您可能比较重要，因为当时有人认为伊朗出手协助人质——帮助这架飞机获释。”

“你提醒我，我才想了起来。我敢肯定的确有这么回事，但完全不记得了。”

对话就这样极其痛苦地进行着。沃尔什再三试图唤起里根的记忆，而前总统的记忆一直没有出现。沃尔什问里根是否记得，布什副总统曾领导过一支反恐特别行动小组。里根回答说：“我忘记了。”沃尔什又读了里根的一篇日记，是关于他在1985年7月的手术之后与麦克法兰见面的内容。里根说：“那件事我也不记得了。”

交流变得越来越折磨人。沃尔什提问了更多的问题，里根都无法回答。里根沮丧地摇头说：“我非常难受，十分抱歉。”



沃尔什试图安慰他，说道：“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尽管只有几年的时间。

里根说道：“仿佛我根本就没当过总统。”

里根的证词直到几年后才被公开，因此公众并不了解他心智衰退的程度。他继续出现在公共场合，发表提前准备好的演讲，他朗读的跟以往几乎一样出色。偶尔，他也会就公共政策方面的问题发表评论。1992年总统选举中，比尔·克林顿击败乔治·布什，帮助他获胜的是持外卡参选的、有时表现十分狂热的得克萨斯亿万富翁罗斯·佩罗。之后，民主党开始取消里根政府传承下来的、困扰他们许久的政策方针。1993年5月，克林顿的国防部部长莱斯·阿斯平宣布终止战略防御计划。战略防御计划的批评者指出，在里根提出这一项目的10年时间里，该计划花费了300亿美元，产生的实际效果却寥寥无几。战略防御计划支持者承诺的实验性技术从来就没有成功过。民主党认为这些技术永远也不会成功。阿斯平回顾了近些年国际政治局势的变化，他在五角大楼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今天，我们在此见证一个时代的结束，也就是星球大战时代的结束。星球大战计划的命运由于苏联的解体而宣告结束。”阿斯平说，导弹防御尚未取消，但正在被重新定义。里根计划所要应对的威胁——来自苏联的大规模进攻——已经“行将消失”。因此，导弹防御将变成陆基防御，而不是太空防御，主要是拦截单独导弹攻击，而不是导弹集束攻击。

里根抨击了这一决定。他对南卡罗来纳州军事学院的毕业生说：“我可能不是一个罗德学者，但我明白这一点。假如我们可以利用防御盾牌保护美国免受来袭导弹的攻击，那我们就应当全力以赴这样做。”里根认为战略防御计划功不可没，帮助美国赢得了冷战胜利。他认为该计划还有未竟的使命。他说：“假如华盛顿新政府认为我们不再面临危险，那么他们应当睁大双眼，仔细地认真地观察一下世界形势。”

有时，劳伦斯·沃尔什对伊朗与反政府武装事件的调查好像无休无止。从1987年开始，沃尔什的调查活动持续到里根总统任期结束，然后又持续到乔治·布什的任期结束。布什离任前赦免了卡斯帕·温伯格——当时他即将出庭受审——和罗伯特·麦克法兰——他已经承认有罪，向国会隐瞒情报。这一做法让沃尔什的调查遭遇挫折。沃尔什曾希望审判温伯格可以产生新的证据。然而，他却发现自己一直在努力让一件日渐失去吸引力的调查维系下去。调查又持续了一年，在1994年年初，沃尔什发表了关于伊朗与反政府武装事件的最终调查报告。

这份报告宣布里根无罪，但责备他允许其他人有过失行为。沃尔什在报告中说道：“我们认为，里根总统的行为缺乏犯罪事实，无法进行起诉。从根本上说，除了有理由怀疑里根总统了解伊朗与反政府武装事件存在犯罪行为之外，或者怀疑他对此有错误的理解之外，其他的都无法证明。”然而，这份报告指出，里根应当承担相当大的责任。“里根总统创造了条件，让其他人产生了犯罪的可能。他秘密改变国家对伊朗和人质的公开政策，公开决定维护反政府武装的实际存在，尽管法律禁止向反政府武装提供援助。在伊朗计划中，里根总统选择秘密行事，无视政府禁止向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销售武器的公开政策。他还无视国家法案和武器出口管制法案，拒绝向国会发出通知。除了不向国会解释之外，总统也没有在政府内部建立有效机制，也没有管控他所授权的一系列行动。”

至于把资金从伊朗转移给反政府武装这件事，该报告说道：“没有直接证据表明，总统曾授权或得知对伊朗军售的收入被转而用来支持反政府武装。但是值得怀疑的是，里根总统竟然容忍1986年期间伊朗人的连续冒犯。”——对于释放人质约定的出尔反尔——“除非他知道，军售在为反政府武装持续提供资金，以弥补国会预期拨款生效之前的空缺。”

里根及其支持者驳斥了沃尔什的裁决，认为公诉方严重曲解了事实。在一份书面声明中，里根称这份报告是一份“用过时的信息、缺乏根据的结论和不负责任的猜想堆砌起来的大杂烩”。里根的声明继续指出，沃尔什的报告是一份“自问自答的自我吹嘘，是一个缺乏证据的指控工具，永远不会在法庭得以证实”。里根的律师西奥多·奥尔森称沃尔什的报告是一场“幻觉”，是一个“在对几处关键事实错误解读基础上的完全虚妄的理论猜想”。奥尔森说，沃尔什对里根总统的指控“被确凿的证据驳得体无完肤”。

对里根来说，假如奥利弗·诺思没有选择竞选参议院席位的话，沃尔什的调查本来可以成为这一漫长而让人遗憾的事件的终结。对诺思的判决在上诉中被推翻，当时上诉法庭认为，他庭审中的证据可能受到他在国会证词的影响，因为他当时被授予豁免权。诺思把上诉法庭的判决当作无罪证据，并把里根称自己为民族英雄作为基础，开始自己的政治生命。但当他开始把自己说成是伊朗与反政府武装事件中的替罪羊、声称里根命令自己就向反政府武装转移资金一事向国会撒谎的时候，里根变得非常愤怒。

一开始，里根拒绝做出回应。他不想让伊朗与反政府武装事件进一步发酵。并且，他认为批评诺思有可能被当成是在弗吉尼亚州参议院初选中为了反对诺思的共和党人的利益在进行干涉。但是，保罗·拉克索尔特告诉里根，他理应为了国家、为了自己而进行拨乱反正。里根同意了，给了拉克索尔特一封信用以公开发表。前总统重申自己无意介入共和党候选人之间的争斗。“但是我必须承认，奥利弗·诺思的声明让我十分恼火。”他写道：“我从没有命令他或是我的政府中的任何人在伊朗与反政府武装事件

或其他任何事件中误导国会。关于伊朗与反政府武装资金转移一事我的确一无所知。事实上，正如大家知道的那样，我们一经发现这件事，立即告诉了美国人民，并要求调查。他所说的与我私下会谈之事纯属无中生有。”

里根坚定的语气打动了许多读者，并导致诺思发表声明，说自己没有说过被报道的那些话，也没有这方面的意思。诺思赢得了共和党提名，但在普选中失利，因为在普选之前南希·里根说：“他对我丈夫说谎，也说了关于我丈夫的谎话。”诺思和大多数美国人所不知道的是，里根的声明并不是以他自己的记忆为基础的。他在给拉克索尔特的信中语气坚定，但关于事件的记忆已经不复存在了。

不久，美国人就明白了这一点。南希已经注意到，自己丈夫的心智能力在不断变化，但她犹豫不决，没有跟任何人提到这些变化。“一旦媒体得到任何蛛丝马迹，记者们立即就会把注意力集中到前总统身上，随时测试他。”迈克尔·迪弗说道，主要考虑到南希和总统本人的感受。但是，南希无法永远掩盖这件事，一些人开始注意到这些变化。菲尔·格拉姆后来谈起一次在公共场合与前总统见面时的情形。里根神色略带迷惑地看着他说道：“我想不起你的名字了，但我还记得你做过的事情。”格拉姆安慰他说这就足够了。1994年2月，在里根83岁的生日聚会上，当着一大群华盛顿的亲朋好友，里根的讲话语无伦次，非常糟糕。来宾们尽量不去理会这些口误，尽量搪塞过去。但很显然情况不对。

即便如此，南希一直等待着，等到8月的全面体检。约翰·赫顿依然担任里根的主管医生，他把里根丧失记忆这件事告诉了梅奥疗养院的医生们。他们在常规检测中增加了几项神经系统检测，结果发现里根处于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阶段。

诊断结果令人惊讶，尽管不是十分意外。决定如何应对这一疾病，无论是私下还是公开的，都需要一些时间。里根决定亲自告诉美国人民。他在11月5日公开发表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的美国同胞们，最近我得知，我同数百万美国人一样，患上了阿尔茨海默病。”他解释说，他和南希决定向公众公开这一诊断结果，这样一来，其他人可能从中受益，更好地认识这一疾病，更深刻地理解该病的实质。里根继续写道：“当前我感觉良好。我打算在上帝赋予我的有生之年里，继续我一直在进行的工作。我将继续与我挚爱的南希和家人一起，分享人生旅程。我计划享受美好的户外活动，与我的朋友和支持者们保持联系。”里根承认，对病人家属来说，阿尔茨海默病病人常常是个沉重的负担。“我只是希望能有办法把南希从这种痛苦的经历中解脱出来。我相信，等到了那一时刻，在你们的帮助下，她一

定会满怀信心和勇气来面对它。”

到目前为止，里根曾发表过数次告别演说。但这一次演说饱含深情。他说道：“在这临别时刻，请允许我谢谢你们，谢谢美国人民。是你们赋予了我无上的荣耀，允许我担任你们的总统。当上帝召唤我回家时，无论那一时刻何时到来，我都将带着对我们这个国家无限的热爱离开，带着对我们国家的未来永远的乐观离开。”

许多读到这封信的读者都眼含热泪。他们可以想象到，里根露出那标志性的微笑，头微微侧向一边，挥手同他们道别：“现在我就开始这一旅程，它将引导我进入生命中的日落时刻。”

就从那一天起，里根从政坛退入历史。他在公开场合露面的次数越来越少，越来越短，因为可以理解，南希希望能够保护他，不让他感到尴尬和不安。他前往里根图书馆，参观圣诞节展览。在新年之际，他跟老朋友们一起，在兰乔米拉市的沃尔特·安纳伯格庄园敲钟。在自己世纪城的办公室内，他偶尔与新婚夫妇或来访的学生们拍照留念。

但随着自己最后一丝记忆的消退，里根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不再外出离开加利福尼亚旅行了。前往牧场活动一直是他最快乐的事情，现在却让他苦恼。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被带往那里，也不知道自己应当做什么。南希结束了这些活动，并在1996年把牧场登记出售。

里根逐渐连自己最亲密的朋友也不认识了。迈克尔·迪弗回忆了自己在1997年最后一次探望里根的情景。他写道：“我开门走进的时候，他看起来气色很好——身着蓝色西装，法式袖口完美合体，领带搭配也十分合适。但不久，我就意识到罗纳德里根不知道我是谁，也不明白我为什么来到他的办公室。他手里拿着一本书，全部精力都在书上。最后，我悄悄来到他的身边，看一看那是一本什么书。他正在看一本关于罗伯特·李那匹著名的马——‘旅行者’——的图画书。我当时伤心至极。”

虽然里根忘记了世界，但世界并没有忘记里根。1996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提名鲍勃·多尔来对抗比尔·克林顿，然而代表们最高兴的是在大会上授予罗纳德里根巨大的荣誉。在一份专门录制的专题节目中，亨利·基辛格、葛培理、汽车大亨李·艾柯卡以及其他一些人纷纷称赞里根，歌颂里根的生平事迹。代表们看到了里根鼎盛时期笑逐颜开的形象，又不禁联想到他当前遭受的苦难，大家热泪盈眶。录像放完之后，灯光亮起，大家看到南希站在与会人员面前。她的出现让大家泪崩，也引发了更热烈的掌声。南希发表了简短的讲话，感谢大家在他们夫妇身处困境时支持自己和自己的丈夫。她引用里根在往届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告诉代表们永远不要丧失美国与生俱来的乐观精神。最后，南希说：“罗尼的乐观精神，同美国的乐观精神一样，依然光芒万丈。愿上帝保佑他！我们两人也衷心祝愿：上帝保佑美利坚！”代表们再次为之动容。

全国也在向里根表达敬意。国会全票通过，以这位前总统的名字命名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一座新建的联邦办公大楼。这让一些人在内心揣测，里根，这位公开反对政府扩张的总统，是否会赞同这种做法。他的名字被写在华盛顿国际机场的前面。这一做法再次让人侧目，尤其对那些曾被里根解雇的空管人员来说更是如此。更为恰当合理的做法是对一艘新建航空母

舰的命名。这艘航空母舰体现了美国的军事力量，被命名为“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

2001年年初，国人得知里根在家摔了一跤，导致臀部骨折。这种摔伤通常会产生并发症。许多熟悉这种并发症的人猜测，不久可能就会看到里根去世的讣告。但里根不久就出院了，赶上了在2月庆祝自己90岁的生日。里根在当年早些时候，超过约翰·亚当斯，成为美国历史上寿命最长的总统。

里根又挺过了3年，于2004年6月5日在位于贝莱尔的家中去世，享年93岁。

里根去世之后，他的遗体从加利福尼亚州被运往华盛顿，然后又返回加州。第一次遗体告别仪式在西米谷市的里根图书馆举行。迈克尔·里根、罗恩·里根和帕蒂·戴维斯陪同着南希。莫琳·里根于3年前死于癌症。里根夫妇的教堂——贝莱尔长老会的退休牧师致了悼词。

里根的灵柩被安放在图书馆一天半的时间，以供数千名来访者——包括许多名人和大量普通百姓——吊唁。之后，灵柩被运往华盛顿，在国会的圆形大厅再次举行了追悼仪式。

公开追悼会在国家大教堂举行。4000名吊唁者挤满教堂，数以百万计的民众通过电视观看了现场报道。前总统福特、卡特、布什和克林顿出席了追悼会。玛格丽特·撒切尔、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以及莱赫·瓦文萨从国外赶来。撒切尔的继任者托尼·布莱尔代表英国政府前来吊唁。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带来联合国的慰问。

乔治·W·布什发表了悼念致辞。他说：“罗纳德·里根在处理世界事务中相信真理的力量。当他发现世界上盘踞着邪恶势力的时候，他公开指出这种邪恶。监狱和劳改营中没人怀疑，持不同政见者奔走相告，对美国总统的无畏言论击掌相庆；在船厂、教堂和秘密劳工会议中没人怀疑，那里的勇敢者们开始听到一个帝国摇摇欲坠垮台的声音；在那些挥舞铁锤砸墙的人当中没人怀疑，罗纳德·里根总统是第一个猛烈攻击那堵令人心怀憎恨的高墙的人。”

追悼仪式结束后，南希和孩子们护送灵柩前往安德鲁空军基地，返回西部。回到加利福尼亚之后，他们把里根安葬在他的图书馆旁边的山坡上。罗恩·里根说：“现在他回家了，自由了。”帕蒂·戴维斯谈到父亲向母亲最后一次表达挚爱时说道：“他已经很多天，很多天没有睁眼，他最后睁开眼睛，注视着我母亲。他让我们明白，无论疾病还是死亡都无法战胜爱

情。”

乔治·布什在华盛顿举行的追悼仪式上说：“在最后的岁月里，他透过放大镜模糊地看世界。现在，他可以面对面地看着自己的救世主。我们期盼着能够再见到他的那一天，看到他容光焕发，思维敏捷，健康自信，面带微笑，永远不再有这种生离死别的痛苦。”

布什说的是来世，但类似的情景出现在2011年，当时是里根100周年诞辰纪念日——或者，用他喜欢的算法来说，当时是他39岁生日的第61个纪念日。眼泪已流干，笼罩他最后10年的阴霾已散尽。他已经卸任很长一段时间，这让人们可以更清楚地认识他的生平事迹和总统生涯。

与他刚去世时相比，对于纪念活动没有当时那么多的限制。里根已经成为偶像级人物，民间组织和企业集团可以放心地把他们自己和对里根的追思联系起来，不用担心这有可能会让客户或顾客心生隔阂。玫瑰花大赛中有一项以里根为主题的彩车游行，加入到帕萨迪纳市每年一度的彩车游行中。国家橄榄球联盟在一则视频中向吉普表达敬意，并在超级碗开球前发布了这一视频。代托纳500汽车赛开赛之前也举行了类似的纪念活动。职业高尔夫协会在其帽子上印上了里根的头像。美国邮政局发行了一套里根邮票。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把里根的头像印在50美元的钞票上。全国每一个地区都开始启动以里根的名字命名的活动。

更为理性的一些做法是，在一些专题研讨会和讨论会中，人们开始思考里根的成就，把他的贡献与他那个时代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进行权衡。与会人士没人否认，在里根执政时期，美国和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国家政治明显转向右翼。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自由主义之后，美国人再次发现保守主义的优点。由于苏联的解体，国际秩序发生了变化。冷战的结束完成了美国总统自1945年以来一直企图完成的心愿。

20世纪成为历史，此时又恰逢里根百年诞辰，因此，把里根与他的政治英雄富兰克林·罗斯福进行对比显得合情合理。对比结果对他非常有利。罗斯福在20世纪上半叶十分出色，而里根则在下半页表现完美。罗斯福上台时，私营企业面临危机，保守派不得人心。罗斯福倾向左翼，开启了美国政坛的自由主义时代。在外交事务中，罗斯福确立了美国的领导地位。里根上台时，国有企业面临危机，自由主义形势低迷。里根倾向右翼，在美国政坛重振保守主义。

进一步的对比表明，尽管人们难以否认两位总统的重要成就，但这些成就的意义继续引发着激烈的辩论。在罗斯福自由派支持者的心目当中，新政

挽救了民主；而对那些保守派的批评者来说，新政则是社会主义的开端。在里根的保守派追随者看来，里根的革命恢复了自由；而对那些自由派反对者来说，革命则是抛弃了弱势群体。

在某些方面，里根的成就大于罗斯福的成就。在新政成型阶段，罗斯福在国会中享有肆意行事的绝对优势。珍珠港事件之后，作为三军统帅，罗斯福在重新规划外交政策方面几乎遇不到任何阻力。相反，里根则不然。在其整个总统任期内，里根都必须与民主党领导的众议院进行斗争。而在其最后两年任期内，他不得不与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进行斗争。在国际事务中，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让他能像罗斯福那样享受全权负责的待遇。

里根成功的关键同罗斯福成功的关键一样，都在于他们有能力恢复美国人民对他们自己国家的信心。里根被称作是“伟大的沟通者”，不无道理。他是继罗斯福之后最具说服力的政治演说家，其演讲融合了信念、专注和幽默，同代人中无一能与之比肩。里根的批评者们常常忽视信念在其说服力中的作用，他们将其演讲技巧归因于他当演员时所受到的训练。但这种做法完全错误。里根讲话时不是在表演，他的表达能力完全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相信自己对美国以及美国人民的歌颂，相信他们不屈不挠的过去和美好的未来。他相信美国人民一直以来对自己国家的希望，也让美国人民相信这一点。

里根的信念一直鼓舞着美国人民，这一点意义非凡。里根在抨击国家问题的时候，抨击的是美国政府，而不是美国人民，就好像政府——所有制度下的民主政府——存在于人民之外似的。里根的思想很容易被人接受。他几乎从没有向人民提出过要求，既没有像约翰·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提出的巨大牺牲，也没有像卡特那样寻求逐日调整。里根向美国人民承诺削减税收，他做到了，并且没有坚持强调保守派的一贯前提条件——削减开支。

里根演讲中的专注同他的信念一样重要。专注常常是专业知识的对立面，但里根明白，在最高层面上来说，专注更为重要。他拒绝让细节搞乱自己的思维，因为细节可能会让自己偏离主要目标。自始至终，里根在政治生涯中的主要目标始终如一：在国内缩减政府规模。其他一切事物都排在次要地位。里根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沟通交流，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从本质上来说，他反复在讲同一件事情。旁枝末节和趣闻轶事可能有所不同，但主要信息从未改变。

然而趣闻轶事非常关键。自林肯以来，里根是最为擅长讲故事、说笑话的总统。他明白幽默的巨大力量：让听众与你一起发笑就等于让他们同意了你一半的观点。里根不是一个热情的人，但他表面上看起来是这样的，这在政治上尤为重要。许多人讨厌他的政策，但几乎没有人不喜欢他的为人。民主竞选，最为本质的东西就是比拼人气，而里根深知如何受人欢



迎。

里根的成功还有一个关键因素，那就是他能够让别人替他做一些不光彩的事情。里根被认为是一个不称职的管理者，他不愿意解雇下属，无法掌握以他的名义开展的工作。假如他担任大公司的总裁，那这些特点无疑会招致失败。但作为总统，这些特点却是成功的关键。1980年大选前的几个月里，无论威廉·凯西应当负什么责任，里根都置身事外。里根可能没有鼓动凯西阻止人质获释，但他不必明说，因为他知道凯西是什么样的人，也明白凯西能够做什么。

在伊朗与反政府武装事件中，里根十分清楚武器销售与人质获释之间的关系。他的日记明确表明了这一点。但他自己置身于具体事务之外，让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和奥利弗·诺思具体操作。波因德克斯特没有告诉里根诺思的行为，因为他从里根那里得到的每一个暗示都告诉他，总统不想知道。通过这种隐身在暗处的做法，里根最终让自己相信，这些交易并不是在用武器换人质。他对于同恐怖分子进行交易的指控感到愤怒，从情感上来说他是真诚的，但从逻辑上来说并不让人信服。至于同反政府武装的联系，里根不清楚资金转移这件事，这还是因为他不想知道。他给政府设定了道德水准，该水准将反政府武装的生存置于几乎所有其他事情之上，包括不断采用立法形式规定的国会意志。里根让自己的下属自己去想办法如何让反政府武装生存下去。他命令波因德克斯特和诺思制订具体计划。当丑闻曝光后，他又让他们代人受过。即使在沃尔什对他展开调查时他的记忆没出现问题，他也不大可能受到起诉，因为他没有留下蛛丝马迹，没有确凿的证据。

里根还有一种相关的能力，他可以说一套做一套。如果是个人这样做，那就是虚伪的表现；但如果是总统这样做，那就是务实的表现。里根在政治理念上是强硬的保守主义。他把自由看得比平等重要，把个人看得比团体重要，把私营部门看得比公共领域重要。在他做的每一次演讲中，他都会宣扬这种保守主义信条。但是，里根在政治实践中是灵活的实用主义。他反对堕胎，但作为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他放宽了该州的堕胎法律规定；他倾向于更低的税收政策，但为了与国会达成最佳协议，他接受增加税收的要求；他认为苏联是邪恶的国家，却与其领导人建立起联盟关系。

里根的实用主义做法反映了他的雄心壮志。终其一生，里根一直在寻求更大的舞台。当他登上美国政坛最大的舞台并担任总统后，他开始寻求历史上更大的舞台，希望可以有所作为，而不仅仅是雁过留声。他明白，政治的目的是要实现管理与统治，而不是维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里根通过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手段实现了巴里·戈德华特的目的。同罗斯福以及其他成功的总统一样，里根也明白进步来自分歧。如果在谈判中他能得到他要求的4/5，那他就赶紧拿了就跑，因为他清楚自己还会回来争取剩下的部

分。

与他的能力相比，里根一生的时机——有人说那是他的运气——对他的成功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从历史角度来说，里根生活和事业的时机好得不能再好了。里根出生之后的那个世纪是美国主宰世界事务的时代。里根逐渐成熟起来，美国也成熟起来；他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战”的愚蠢行为把美国推向了世界领导地位；他经历了经济大萧条，感受到了它对美国人性格的磨炼；当美国对日本和德国开战时，他前往好莱坞，参加了好莱坞式的战争；当冷战达到高潮的时候，他的事业也达到顶峰。

在人类事务中，时机通常是机缘巧合使然，是生活和时刻的重叠。里根执政的时刻与两个人的时刻重叠，这两人对他的成功起到了关键作用。保尔·沃尔克是吉米·卡特送给里根的礼物。正是沃尔克缩小了经济中的通胀预期，把经济带上了稳定增长的道路。他行动的时机对里根来说非常恰当。倘若沃尔克提前两年执掌美联储，那么经济形势就可能得到很大改善，而在1980年当选的就可能是卡特而不是里根。倘若沃尔克晚来两年，那么在1982年击垮共和党的经济衰退就可能在1984年把里根赶下台。

同样，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莫斯科送给里根的礼物。里根曾尝试与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展开军备谈判，但都没有成功。只有在戈尔巴乔夫出现后，才让里根有机会与这位愿意谈判，也有能力谈判的对手展开正式谈判。然而，苏联解体的时机取决于有人愿意承认这一不可否认的事实。倘若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再一起多活几年的话，那么里根将永远无法找到自己的谈判伙伴，而这一任务就将落到他的继任者手中。

然而，总统的荣誉体现在既成事实之中，而非假设之中。倘若不是因为那场严重的经济危机，赫伯特·胡佛也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总统。就里根来说，他为自己设定了目标——组建一个小政府。里根削减了税赋，裁减了政府管制，但没有能够削减开支。其结果就是经济得以复苏，但同时也让联邦债务翻倍。

在里根图书馆的奠基仪式上，里根曾经说过：“我从内心里认为人性本善，正义必胜。”这几句里根的信条，被雕刻在里根图书馆旁他的墓碑上。

但更为人们普遍记住的，却是里根向美国人民告别时发表的令人心酸的演讲中的最后几句话。这些话体现了里根的信仰，让他为众人所铭记。长久以来，记忆消失的乌云一直笼罩着里根的人生道路，然而他对祖国的乐观

精神和坚定信念没有丝毫减弱。里根写道：“我知道，对美国而言，前方永远是灿烂的黎明。”

# 致谢

本书作者想要感谢许多人，没有他们的帮助就没有这本书的问世。杜克·布莱克伍德、麦克·达根、詹妮弗·曼德尔和雷·威尔森以在里根图书馆做研究为荣；国会图书馆的档案管理员和图书管理员、普林斯顿大学的斯利马德图书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和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州立大学都非常专业；我那些在奥斯汀的得克萨斯州立大学的同事和学生们，就像最近两三年听我做关于罗纳德·里根报告的观众一样，允许我测试他们的观点；乔纳森·亨特从自己的研究中抽出时间来查证一些难以确定的出处。

道布尔迪的克里斯·波波洛堪称编辑中的楷模，总是在恰当的时刻敦促我、表扬我；丹·迈耶保证了本书的顺利出版；数年来，比尔·汤姆斯一直在支持我的工作，至今仍然如此。

特别感谢那些亲自传递给我关于里根及其总统任期的故事和知识的人们。这其中包括罗恩·里根、乔治·H·W·布什、乔治·舒尔茨、詹姆斯·贝克、埃德温·米斯、罗伯特·麦克法兰、约翰·波因德克斯特、罗伯特·盖茨、杰克·马特洛克、肯·阿德尔曼、博比·雷·英曼、菲尔·格拉姆、亨利·诺、吉尔伯特·鲁滨逊、哈里森·施米特、汉斯·马克、本·巴恩斯、格雷格·利奥、劳伦斯·弗雷德曼、格雷·西克、道格拉斯·布林克利以及拉里·坦普尔。